



拉丁美洲经济展望 (2016)

Latin American Economic Outlook 2016: Towards a New Partnership with China

发展与中国的新型伙伴关系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中心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 主编

CAF - 拉丁美洲开发银行

浙江外国语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唐俊 等 / 译



拉丁美洲经济展望 (2016)

发展与中国的新型伙伴关系

Latin American Economic Outlook 2016:
Towards a New Partnership with China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中心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 主编
CAF- 拉丁美洲开发银行
浙江外国语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唐俊 等 / 译

中译本翻译质量及其与原著的一致性由译者负责。
中译本与原著若有不一致，以原著为准。



本报告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秘书长领导下出版，报告所表达的观点和使用的论据不一定反映 OECD、OECD 发展中心及其成员国政府、联合国拉美经委会（UNECLAC）和拉丁美洲开发银行（CAF）的意见。

本报告及其包含的任何一张地图，无论是对任何领土现状或主权、疆界和国际边界划分，还是对任何领土、城市或地区的名称而言，都不存在任何偏见。

关于以色列的统计数据由以色列政府负责提供。OECD 在使用这些数据时遵循国际权利条款，对于戈兰高地、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的现状不存在任何偏见。

封面说明：本报告封面由 OECD 发展中心设计。本书封面上“合作”二字由林淑灵（音译）手书。

本报告最初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英文和西班牙语发布，题为：

Latin American Economic Outlook 2016: Towards a New Partnership with China /
Perspectivas económicas de América Latina 2016: hacia una nueva asociación con China

© OECD/United Nations/CAF 2015

版权所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中文版

前 言

《拉丁美洲经济展望》分析了与拉丁美洲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关的问题。自2007年在圣地亚哥（智利）召开的第十七届伊比利亚美洲国家元首峰会上推出第一期以来，该报告致力于提供一个比较拉丁美洲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绩效且与该地区官方分享成功经验的平台。

2011年，报告的出版得到了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拉美经委会，ECLAC）的加盟，并与由伊比利亚美洲国家政府与伊比利亚美洲秘书处举办的一年一度的伊比利亚美洲首脑会议的经济主题结合在一起。2013年，CAF - 拉丁美洲开发银行加入作者团队。今年的这份报告分别于2015年11月在蒙得维的亚（乌拉圭）召开的CAF - 拉丁美洲开发银行年度董事会议、2015年12月在卡塔赫纳（哥伦比亚）举行的伊比利亚美洲峰会外长会议上发布。

每年的报告中都会包括宏观经济分析，探讨全球经济背景如何影响区域经济。今年的报告中有一章内容分析中国和拉丁美洲在财富转移中所扮演的角色，还有一章分析中国和拉丁美洲之间日渐增强的贸易联系，最后将讨论在中国发展战略发生结构性转变的背景下中拉关系发展的趋势。全书对拉美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结构性政策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发展重点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建议。

近20年来，世界经济重心已经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向新兴经济体转移，这一现象被称为“财富转移”。本书作为系列报告的第九个版本，将聚焦于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和拉丁美洲之间日趋增强的纽带关系，深入分析中拉合作以及超越贸易的纽带关系。这将有助于理解拉丁美洲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从而采取具体的改革措施，促进包容性增长，与中国建立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

致 谢

本报告由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CAF – 拉丁美洲开发银行和 OECD 发展中心联合完成。

在本报告的写作过程中，OECD 发展中心方面在发展中心主任 Mario Pezzini 的指导下，由拉美处处长 Ángel Melguizo 领导，Rolando Avendaño 和 José Ramón Perea 予以协助；拉美经委会方面由经济事务司司长 Sebastián Rovira 领导；CAF – 拉丁美洲开发银行方面由高级经济学家 Adriana Arreaza 负责。全书由 Rolando Avendaño 进行统筹协调。

本报告得益于来自各大机构的作者们的研究、文字起草和富有成效的合作，这些人包括：Adriana Arreaza (CAF)，Rolando Avendaño (OECD)，Carolina Camacho (CAF)，Paula Cerutti (OECD)，Pauline Charousset (OECD)，Abelardo Daza (CAF)，Guillermo Díaz (CAF)，José Duran (ECLAC)，Ariel Gruver (OECD)，Anna Jankowska (OECD)，Sammy Libos (OECD)，David Lopez (OECD)，Ricardo Martner (ECLAC)，Ángel Melguizo (OECD)，Nanno Mulder (ECLAC)，Juan Obach (OECD)，José René Orozco (OECD)，Sebastián Nieto-Parra (OECD)，Andrea Pellandra (ECLAC)，Nicole Perelmuter (CAF)，José Ramón Perea (World Bank, former OECD)，Daniela Trucco (ECLAC)，Juan Vazquez Zamora (OECD)，Dayna Zalcicever (ECLAC)。特别感谢为各章节提供专栏内容的外部专家，他们是 Ignacio Bartesaghi (拉美—太平洋观察)，Juan Blyde (美洲开发银行)，崔守军 (中国人民大学)，Jeff Dayton-Johnson (蒙特雷 Middlebury 国际研究院)，Chris Garroway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Helmut Reisen (OECD 前财富转移顾问)，Amelia Santos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 和 Carol Wise (南加利福尼亚



大学)。OECD 发展中心同样要感谢刘沛林（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参与本项目工作。报告的出炉也得到了 Rita Da Costa 和 Ana Gonzalez 的协作与组织，他们还提供了整个项目过程中的行政管理上的支持。

本报告的内容广泛吸收了 2015 年 7 月 1 日在巴黎召开的专家会议的反馈建议而不断丰富充实。特别感谢参与此次会议热烈讨论的以及发送建议的专家，他们有：José Antonio Ardavin (OECD), Jens Arnold (OECD), Ignacio Bartesaghi (ALADI and Latin America-Asia Pacific Observatory), Thomas Bonschab (TiNC International GmbH), Melody Chang (OECD), Mario Cimoli (ECLAC), Cui Shouju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Carl Dahlman (OECD), Christian Daude (OECD), Jeff Dayton-Johnson (Middlebur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Monterey), Enrique Dussel Peters (UNAM), Robert Ford (OECD), Sonsoles Gallego (Bank of Spain), Nicola Harrington (OECD), Irène Hors (OECD), Rhys Jenkins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Przemyslaw Kowalski (OECD), Peilin Liu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lexandre Kolev (OECD), Kui-Wai Li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rés López (University of Buenos Aires), Anu Madgavkar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Alvaro Méndez (LSE), Nanno Mulder (ECLAC), Margaret Myers (Inter-American Dialogue), Mauro Pisu (OECD), Carlos Quenan (Institut des Amériques), Annalisa Primi (OECD), Helmut Reisen (Shifting Wealth Consulting), Federico Poli (former SEGIB), Juan Ruiz (BBVA Research), Amelia Santos (UNCTAD), Kensuke Tanaka (OECD), Daniel Titelman (ECLAC), Jingjing Xia (OECD) 和 Juan Yermo (OECD)。

智利和墨西哥驻 OECD 发展中心理事会的代表团以及来自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国、巴拿马、秘鲁、乌拉圭等国驻法国的大使们都对涉及本国的内容进行了审查和核对，其工作极富建设性，使报告增色不少。

OECD 发展中心还要向智利财政部、智利外交部、西班牙外交与合作部、瑞士发展局、拉丁美洲开发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推广与合作办公室对

致 谢

《拉丁美洲经济展望》提供的经济资助致以崇高的谢意。中心还要感谢伊比利亚美洲秘书处和秘书长 Rebeca Grynspan 女士一直以来对报告的支持。

最后，感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出版和联络处对本报告及相关材料的出版方面的持久耐心和所做的出色工作。尤其要感谢 Aida Buendía, Delphine Grandrieux, Vanda Legrandgérard, Louise Schets 和 Bochra Kriout (媒体关系部门)。感谢 OECD 公共事务和联络部门 Anne-Lise Prigent 和 Laurence Gerrer-Thomas 等领导层人士的支持。作者还要真诚地感谢 Wanda Ollis 和 Colm Foy 的编辑工作，以及 Yolanda Bravo Vergel 和 Lidia García de Vicuña 的翻译服务。

单词缩写表

AAGR	年均增长率
AfDB	非洲发展银行
AIIB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LADI	拉美一体化协会
ASEAN	东南亚联盟
BANDES	委内瑞拉经济和社会发展银行
BCRP	秘鲁中央储备银行
BIS	国际清算银行
BITs	双边投资协定
BRIC	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金砖四国）
BRICS	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金砖五国）
CAF	拉丁美洲开发银行
CARICOM	加勒比共同体
CC	一致性系数
CCP	中国共产党
CDB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
CELAC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
CEO	首席执行官
CEPAL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西班牙语缩写简称）
CIAT	美洲税务管理中心
CMI	清迈协议



COMTRADE	联合国商品和贸易统计数据库
Corfo	智利经济发展局
DRC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ECI	经济复杂性指数
ECLAC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Edstats	世界银行教育统计
EIU	经济学人智库
EU	欧洲联盟
Ex-Im	中国进出口银行
FAO	联合国粮农组织
FC	财政状况
FDI	外国直接投资
FED	美国联邦储备局
FR	财政法规
FTA	自由贸易协定
FX	外汇
GDP	国内生产总值
GVCs	全球价值链
HI	高收入
HKND	香港尼加拉瓜运河发展集团
H - P	Hodrick - Prescott
HSLE	人文、社会服务、法律和教育
IBRD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ICBC	中国工商银行
ICIOs	跨国投入—产出表
ICT	竞争威胁指数
ICTs	信息与通信产业
ICTUM	美国市场竞争威胁指数

IDA	国际发展协会
IDB	美洲开发银行
IFI	国际金融机构
IFR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
IFS	国际金融统计
IIF	国际金融学会
ILO	国际劳工组织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NDSTAT UNIDO	工业统计数据库
ISIC	国际标准工业分类
ISO	国际标准化组织
IT	信息技术
ITF	国际运输论坛
KLEMS	资本、劳动、能源、原材料和服务
LA	拉丁美洲
LAC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LI	低收入
LMI	中低收入
MERCOSUR	南方共同市场
MNCs	跨国公司
MOFCOM	中国商务部
NAFTA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BS	中国国家统计局
ODA	官方发展援助
OECD	经济与合作组织
OPEC	石油输出国组织
P. R. china	中华人民共和国
PAE	泛美能源公司



PBoC	中国人民银行
PDPs	生产性发展政策
PFI	公共财政政策
PISA	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PPP	购买力平价
R&D	研究和发展
RCA	显性比较优势
RCE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RMB	人民币
ROW	世界其他地区
SITC	标准产业贸易分类
SMEs	中小企业
SOE	国有企业
STEM	科学、技术、工程、数学
STRI OECD	服务贸易限制性指数
TFP	全要素生产率
TISA	国际服务贸易协定
TiVA OECD/WTO	贸易附加值数据库
TPP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UMI	上中等收入
UN	联合国
UNCTAD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UNDP	联合国开发署
UNECA	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
UNESCO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IDO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US	美国
US Ex-Im Bank	美国进出口银行

USA	非洲联盟
USD	美元
VAR	向量自回归模型
WB	世界银行
WDI	世界发展指数
WEO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
WTO	世界贸易组织
YoY	与去年同期相比

编者序

经过整整十年的努力，拉丁美洲逐渐缩小了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差距，并在解决不平等问题上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在 2015 年，拉丁美洲的平均增长率低于 OECD 国家的平均水平，这已经是连续第二年出现这种情况，中期前景也不乐观。在面临外部环境恶化和重大社会挑战的背景下，生产和投资的增长乏力所反映出的国内脆弱性已经尽人皆知。拉丁美洲仍然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地区之一：贫困依然影响着 28% 的地区人口，非正规就业仍是顽疾。美国经济的恢复对少数几个拉美经济体产生了积极影响，但中期影响仍然不可预见，特别是随之而来的货币紧缩导致金融状况收紧。拉美地区的经济尽管有所恢复，但其步伐要慢于预期中的欧洲和日本。

中国的表现对于拉丁美洲的发展而言是一个相对较新但非常关键的因素，创造着挑战与机遇。在过去的 15 年里，中国与该地区之间的贸易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扩张，增长了 22 倍以上。当前，中国对大宗商品的需求下降，其价格下跌，影响拉丁美洲的商品出口国经济下行，具体情形取决于它们与中国的双边关系。总体看来，以商品出口为基础的增长结构的脆弱性已经暴露无遗。采取应对这种下行趋势的政策行动显得非常迫切：提高生产率、经济多元化程度和技术有效性，长期发展干预措施应以创新和社会政策为核心，以包容性增长为目标。在这一发展路径中，中国将继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2016 年的《拉丁美洲经济展望》深入分析了中国当前的转型和拉丁美洲发展模式之间的经济联系，提出了一个讨论未来 20 年趋势的前瞻性框架，涵盖了从贸易、金融到技术、生产性发展等关键政策，确定了应对发展挑战的战略和政策措施，包括与中国的伙伴关系。这些挑战源自中国正在向一个以消费为基础的、城市中产阶级日益增长以及金融开放度更高的新的社会经



济模式转型，本报告将探讨在这些领域中的宝贵经验和最佳实践，并提出消除阻碍拉丁美洲经济和社会发展结构性约束的战略。

拉丁美洲遭遇中等收入陷阱持续的挑战，需要立即采取行动。在这方面，拉美地区必须推动更高层次的生产多元化、升级和区域一体化。中国的转型为拉美地区实现发展战略目标提供了重要的机遇，显示了建立有效合作计划的重要性。拉丁美洲政府应投资于创新型的生产发展政策，以保持全球竞争力以及对中国的吸引力，这些政策包括加快融入供应链，加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改进物流，加快在服务、投资、知识产权与竞争政策等领域的法制建设。

技术和创新上的短板，仍然是拉美地区首先面临的挑战，这一点在2015年的《拉丁美洲经济展望》中已经分析过。中国和其他新兴地区在提升国民经济中的技术存量、质量和相关性方面的成就举世瞩目，足以激发拉丁美洲国家重新思考、构建它们的科技战略。科技质量低下酿成了长久以来的广泛的非正规就业问题，这种状况影响着拉丁美洲最脆弱的人群，连新兴中产阶级也不能幸免，这也是拉美地区提升创新能力的核心问题。吸引中国投资来缩小拉丁美洲基础设施的差距，尤其是在能源、运输和物流方面，对于跨越生产率和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双重障碍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这将需要更好的法治、更强大的治理能力，以确保环境的可持续性和执行上的更高透明度。巴西、智利与中国在科技项目上的合作计划，中国、墨西哥在能源和基础设施上的双边基金都是很好的范例。

我们希望，在构建中拉互利共赢的发展型双边伙伴关系的目标下，CAF - 拉丁美洲开发银行、拉美经委会和 OECD 发展中心的通力合作，能够为加强中拉纽带关系建言献策。

Alicia Bárcena

拉美经委会执行秘书

Enrique García

CAF - 拉丁美洲开发银行执行主席

Angel Gurría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

内容概要

《拉丁美洲经济展望（2016）：发展与中国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探讨了拉丁美洲应该如何将深化和改善与中国的伙伴关系作为其发展议程的一部分。中国已经成为并且将继续是拉美地区规则的改变者。在过去的 20 年中，世界经济的重心已经从 OECD 国家转向新兴经济体，这种现象被称为“财富转移”。中国与拉丁美洲的关系已经跨越了简单的贸易关系，这将会倒逼拉丁美洲国家采取具体的改革措施，促进包容性增长，建立与中国的互利共赢的双边伙伴关系。

在过去的 15 年中，拉丁美洲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扩展，但以大宗商品为基础的增长模式暴露出它的局限性。自 2000 年以来，中国和拉丁美洲之间经历了一场举世瞩目的贸易繁荣，贸易额增长了 22 倍多。2001 ~ 2010 年，拉丁美洲向中国出口矿产品和矿物燃料总量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惊人的 16%，其次是农产品，达到 12%。如今，中国是巴西、智利和秘鲁的最大贸易伙伴。尽管过程有曲折，但从结果上来看，中拉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联系越来越强。在拉美向中国出口的产品中，大宗商品占比 73%（在向全球的出口中占比 41%），而科技类产品只占 6%（在向全球的出口中占比 42%）。中国对消费的依赖程度上升，对投资的依赖程度下降，造成对大宗商品需求下降，加上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影响了拉丁美洲大宗商品出口国的发展。

2014 年，拉丁美洲 GDP 的增长率只有 1%，远低于 2005 ~ 2010 年平均 5% 的增长率，这预示着潜在的增长要弱于预期。特别是与中国之间的大宗商品贸易出现了下跌，对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但具体到各国，情况有所不同。拉美地区对外部环境的脆弱性造成了当前的经济下行，



复苏水平将低于预期的 3% 左右。在拉美各国国内，企业和家庭的信心较低，财政杠杆上调，公共和私人投资走弱，生产回报低下，这些构成了该地区的经济基本面。经济增长虽然曾使贫困人口显著减少，但是严峻的社会经济挑战仍然不容忽视。在拉丁美洲，仍有 28% 的人口，即约 1 亿 6400 万人受到贫困的影响。拉丁美洲仍然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地区。不过，对该地区也不能一概而论。例如，墨西哥和中美洲制造业的出口商，已经融入美国的价值链，比南美的纯商品出口商的情况要好得多。

中国正在经历一次深刻的社会经济转型，会给拉丁美洲的发展带来挑战和机遇。中国正在实践一个雄心勃勃的发展议程，以保持第二阶段财富转移过程中的主导角色。所谓的“新常态”意味着增长的转型，其特征包括扩大国内消费、人口老龄化、巩固城市中产阶级，以及向科技密集型产业升级。此外，中国将实施更为广泛的发展战略，可能会影响拉丁美洲的基础设施融资，因为拉美地区将是其优先投资的区域之一。

为保持对中国的竞争力，拉丁美洲必须在创新性生产发展政策的基础上，实现多元化，升级产品结构。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元化的贸易体系，在近 60 个行业上具有比较优势。拉丁美洲与中国相比相形见绌，只有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的表现最好，能跟得上中国的变化。中国的转型可能会对拉丁美洲传统的大宗商品出口国产生负面影响。根据我们的预测，到 2030 年，金属矿石的出口可能将从 10 年前的 16% 下降到 3%，化石燃料的出口可能将从 16% 下跌至 12%，食品的出口将从 4% 下降到 2%。与此同时，中国的消费重组也将向拉丁美洲开启机遇之门，特别是在某些食品、服务和旅游等产业。不过，拉丁美洲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要远远低于其他地区。为了克服这一问题，该地区的一些国家可以将目标定位在农业和服务业的升级上，尤其是在知识、技术密集型的服务业。

拉丁美洲必须在创新、科技的质量和适用性及缩小基础设施的差距等方面投入，从而受益于全球价值链。拉丁美洲的创新资本要远低于 OECD 国家，这就要求鼓励国内投资、激励创新，同时要吸引外国投资。在科技领域，预计到 2030 年，将有 2.2 亿中国人受过高等教育（占劳动人口的

21%)，人数是拉丁美洲（9000 万人，占劳动力的 19%）的 2 倍多。此外，中国的大学生中有一半从事与科学和技术相关的研究，相比之下，拉丁美洲只有 1/5。设计一个有关教育、科技和创新的实际战略，是紧紧跟上中国人力资本强国之策的基本要求。这个战略不仅包括传统的教育方式，而且包括提升工作人员技能的在职培训。改善基础设施和物流，也是帮助拉丁美洲经济重新定位，更好地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关键所在。

金融对于增强与中国的伙伴关系非常重要。中国已经宣布拉丁美洲为其金融投资的优先区域。自 2010 年以来，仅中国的贷款就达到 940 亿美元，而世界银行、CAF - 拉丁美洲开发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的贷款加起来是 1560 亿美元。这一趋势表明中国的长期金融战略是扩大其在国家和产业方面的投资组合。这个机会应该与透明度和法治相匹配，特别是环境。中国在拉丁美洲的直接投资，尤其是在通信、电力、绿色科技和购置土地等方面的投资形成了其在该地区今时今日的地位。

区域贸易协议和平台也有助于提升拉丁美洲的竞争力，增强与中国的谈判能力。只有与中国建立起超越双边关系的区域性整体合作，才能激发全部的合作潜力。现有的平台，如加勒比共同体、中美洲共同市场、南方共同市场和太平洋联盟，都有望建立同中国的合作协调战略。区域贸易协定可以加强境内规则，这恰恰是当前该地区新市场一体化和服务业、投资、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以及竞争政策与法治透明度等方面规范化的阻碍。

构建面向发展的中拉合作伙伴关系是互利共赢的，但需要全球治理。中国的转型可能会加快拉丁美洲经济复苏的进程，但是拉美地区需要更好的法治、更强大的治理能力来发展营利性项目，需要保证环境的可持续性、更为透明的执行力和善治来对接中国的转型。拉丁美洲将作为中国可靠的商品来源地、广阔的出口市场和具有吸引力的对外投资多元化目的地，这种关系也会让中国从中受益。中拉之间的协同努力，如目前中国与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墨西哥的科技计划，已经显示出双边科技交流的互利性。总之，中国需要从整体上理解拉丁美洲的发展挑战，构建一个以未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合作对话机制。

目 录

第一章 面向发展的中拉伙伴关系·····	001
第二章 拉丁美洲的宏观经济前景·····	020
第三章 财富转移、中国“新常态”和拉丁美洲·····	063
第四章 中拉贸易的趋势和机遇·····	099
第五章 拉丁美洲—中国伙伴关系的发展趋势和前景·····	158
国别信息·····	229
译后记·····	278

图表目录

图 1 - 1	拉美和中国的全球价值链	003
图 1 - 2	拉美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007
图 1 - 3	按照国家的产业集群对 2010 ~ 2030 年拉美向中国的 出口预测（出口国年均增长率）	009
图 1 - 4	2013 ~ 2030 年拉丁美洲和中国在科技方面的预测 （高等教育人口）	012
图 1 - 5	中国和特定的多边组织对拉美的贷款	016
图 2 - 1	各大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展望（年增长）	022
图 2 - 2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的影响	024
图 2 - 3	游资流入新兴市场 and 全球风险厌恶	025
图 2 - 4	特定的商品价格（2005 年的指数为 1）	027
图 2 - 5	特定的拉美经济体的周期位置的例证（2015 年，利用 HP 过滤的背离趋势）	029
图 2 - 6	拉美 GDP 增长和需求因素的贡献（年增长率）	030
图 2 - 7	选定的拉美经济体投资紧缩周期的持续时间和幅度 （相对于 GDP 紧缩周期的比率）	031
图 2 - 8	选定的拉美国家和世界的投资率（占 GDP 的百分比， 取 2010 ~ 2014 年的百分比）	032



图 2-9	拉美国家和特定的经济体集群中各要素对实际 GDP 的贡献 (简单平均, 年均百分比)	033
图 2-10	选定的拉美国家的产出增长趋势 (年增长率)	035
图 2-11	特定拉美经济体的通货膨胀率和目标 (2014 年和 2015 年, 每年百分比)	038
图 2-12	特定拉美经济体的货币对美元的汇率 (设定 2000 年 6 月的指数 = 100)	038
图 2-13	特定拉美经济体的财政波动和产出缺口 (2007 年、2009 年 和 2013 年; 百分比和占 GDP 的百分比)	040
图 2-14	特定的拉美经济体的公共债务 (占 GDP 的百分比)	041
图 2-15	拉丁美洲选定国家的财政态势 (财政波动, 7 年期的 逐步回归)	043
图 2-16	拉丁美洲选定国家的经常账户赤字和资本流动 (占 GDP 的百分比, 2014 年)	044
图 2-17	特定拉美国家的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债务证券化 (占 GDP 的百分比, 2013 年)	045
图 2-18	GDP 增长和通货膨胀率: 中国的硬着陆和软着陆的比较	048
图 2-19	商品价格和利率: 中国的硬着陆和软着陆的比较	050
图 2-20	特定拉美国家的 GDP 增长: 中国的硬着陆和 软着陆的比较	053
图 2-21	特定拉美国家的汇率: 中国的硬着陆和软着陆的比较	055
图 2-22	特定拉美国家的通货膨胀: 中国的硬着陆和软 着陆的比较	058
图 3-1	各区域对全球增长的贡献	065
图 3-2	追赶曲线	066
图 3-3	中等部门人口 (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收入在 4 ~ 50 美元) 对比人均 GDP (2011 年恒定国际美元)	068

图 3 - 4	特定新兴经济体的出口行业多元化（国家排名， 1990 年对比 2008 年）	069
图 3 - 5	投资率 vs. 工业附加值（占 GDP 的百分比，选定的 OECD 和新兴经济体）	072
图 3 - 6	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的抚养比（2015 年和 2030 年） （特定的 OECD 国家和新兴国家）	074
图 3 - 7	选定经济体的能力指数 vs. 制成品占出口的比重 （2000 ~ 2013 年）	077
图 3 - 8	研发支出（占 GDP 的百分比）	077
图 3 - 9	特定国家收入水平	084
图 3 - 10	中等收入陷阱的决定因素：中国和拉丁美洲上中等 收入国家 vs. 高收入国家平均值	090
图 4 - 1	2000 ~ 2014 年拉美和中国的贸易值	101
图 4 - 2	2013 年拉丁美洲对中国及世界的科技密度结构	103
图 4 - 3	2000 ~ 2013 年拉丁美洲出口到中国的产品	103
图 4 - 4	2000 ~ 2013 年拉丁美洲和中国的农业贸易	106
图 4 - 5	2000 ~ 2014 年中国进口农产品中贸易伙伴的参与情况	107
图 4 - 6	拉丁美洲出口到中国的农产品构成	108
图 4 - 7	在选定年份和国家从中国和世界的进口在制造业中的 渗透率（占表观消费的百分比）	112
图 4 - 8	2000 ~ 2014 年美国 and 拉丁美洲的进口市场比例	114
图 4 - 9	2000 ~ 2013 年拉美各国竞争威胁指数的波动	116
图 4 - 10	2013 年美国市场竞争威胁指数：中国 vs. 中美洲	118
图 4 - 11	巴西和中国在特定产业上对美国的出口	119
图 4 - 12	墨西哥和中国在特定产业上对美国的出口	120
图 4 - 13	2011 年外国附加值在中国各产业终端需求的比例分配	123
图 4 - 14	2011 年特定的地区内中间产品和终端产品的区域 内贸易的比例	126



图 4 - 15	2000 年、2011 年特定国家和地区全球价值链中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比例	128
图 4 - 16	2011 年拉丁美洲和中国的中间产品贸易（按行业区分）	130
图 4 - 17	2011 年拉丁美洲和中国全球价值链中后向联系的比例	132
图 4 - 18	2011 年拉丁美洲和中国全球价值链前向联系的比例	133
图 4 - 19	2000 年、2011 年中国和拉丁美洲每个国家后向联系部分比例	135
图 4 - 20	2000 年、2011 年全球价值链中拉美区域和中国在拉美地区中的比例	136
图 4 - 21	作为中间产品出口到中国的农业、矿业和基础金属的比例	137
图 4 - 22	2000 年、2011 年按照目的地和广义部分构成区分的拉美中间产品的出口	140
图 4 - 23	全球范围内外国直接投资管辖下的总公司网络	143
图 4 - 24	2011 年拉美中间服务业的总出口的目的地	144
图 4 - 25	2011 年拉美向中国和世界的中间服务总出口的行业分布	145
图 4 - 26	2011 年拉美在计算机和研发类产品的出口	146
图 5 - 1	对不同群组国家的出口增长率预测（2014 ~ 2030 年）（出口比重的年均增长率）	163
图 5 - 2	中国农产品消费比例的变化预测（2010 ~ 2030 年）	167
图 5 - 3	中国人均牛肉、鱼和生鲜乳制品的消费（2014 ~ 2024 年）	168
图 5 - 4	基于中国需求量的拉美食品机遇指数	169
图 5 - 5	2010 ~ 2030 年不同地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25 岁以上）在全球人才库中所占的比重	173
图 5 - 6	中国和拉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预测（2013 ~ 2030 年）	175
图 5 - 7	中国和拉美的中等教育质量：PISA 阅读考试成绩	176

图 5 - 8	中国和拉美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的专业分布	177
图 5 - 9	竞争力缺口：企业用工难（2006 ~ 2009 年）	177
图 5 - 10	拉丁美洲和中高收入国家在国际市场中的 融资来源	182
图 5 - 11	拉美的贷款：双边和多边贷款	183
图 5 - 12	拉美债券息差和中国的贷款（2005 ~ 2014 年平均）	185
图 5 - 13	2008 ~ 2014 年拉丁美洲融资成本：中国的贷款 vs. 主权债务	186
图 5 - 14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出（2010 年）和拉丁美洲外国 直接投资流入（2009 ~ 2013 年）	187
图 5 - 15	拉丁美洲对中国出口和对世界出口的环境影响	199
图 5. A1 - 1	群组树状	216
图 5. A1 - 2	出口预测（分国家）——样本的结果	227
表 2 - 1	选定的拉美经济体非居民投资的紧缩周期指数 （2011 ~ 2014 年，季度数据）	031
表 2 - 2	1980 ~ 2012 年选定的拉美经济体中生产率相对于 GDP 的扩张 与紧缩阶段（持续期和幅度的中位数，每年的数据）	034
表 4 - 1	中国—拉美国家自由贸易协定	149
表 5 - 1	在基准情境下不同群组国家的出口增长率	163
表 5 - 2	中国人均食品消费现状与预测（2014 ~ 2024 年）	168
表 5 - 3	拉丁美洲：2014 年大型合并或收购案	188
表 5 - 4	中国对拉美融资的不同情境（分部门和国家）	193
表 5. A1 - 1	2013 年拉美国家出口构成	215
表 5. A1 - 2	固定效应面板模型结果	219
表 5. A1 - 3	2016 ~ 2030 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和投资率的 两种情境	220
表 5. A1 - 4	拉美国家群组分类	221

第一章

面向发展的中拉伙伴关系

本书探讨了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的演变。在本章对中拉当前和未来的经济联系进行了总体概述和预测，包括从贸易、金融、科技到生产性发展政策等关键问题。它确立了拉丁美洲应对发展挑战的短期和中期的战略及政策措施，其中包括与中国的伙伴关系。

为了应对当前的挑战，拉丁美洲应该深化和改进与中国的发展型伙伴关系。中国已经成为拉美地区的外部环境的规则改变者。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世界经济的重心已经从 OECD 国家转向了新兴经济体（OECD，2010；Quah，2011），这种现象被称为“财富转移”（shifting wealth）。财富转移的第一阶段从 21 世纪初开始，这期间拉丁美洲与中国之间的贸易迅速扩大，不过这种关系正在发生改变。如果发展下去的话，拉美地区的竞争性将依赖于各国执行各自有针对性的改革以促进广泛的、包容性的增长。这些改革包括提高生产力和创新，产品多样化，对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创造正规就业等领域的投资，以应对中国所谓的“新常态”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这一结论基于以下四点发现。

第一，拉丁美洲和中国之间的贸易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扩张，但以大宗商品为基础的增长结构特征导致了该地区目前出现的衰退。

第二，面对这种衰退，拉丁美洲政府正在寻找保持竞争力和吸引中国的途径，探索具备创新性的生产发展政策，以便更好地参与全球价值链，促进经济多元化。中国的内需可能为拉丁美洲的食品出口、服务和旅游业开辟新的机遇。



第三，拉丁美洲必须在创新、科技、区域一体化和基础设施方面进行投资，以受益于中国的新常态。

第四，吸引中方投资参与拉丁美洲未来的发展可以实现中拉的互利互惠。对此，拉丁美洲需要更好的法治，更强的发展盈利项目的政府能力，更加深入且更具流动性的资本市场，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更加透明的执行能力以及理论和实践兼备的善治。拉丁美洲将成为中国可靠的商品来源地、广阔的出口市场和具有吸引力的对外投资多元化目的地，这种新型关系也会让中国从中受益。

拉丁美洲和中国之间的贸易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扩张，但以大宗商品为基础的增长结构特征导致了该地区目前出现的衰退

在“财富转移”的第一阶段，中国和拉丁美洲之间经历了一次贸易大繁荣，该地区的商品出口国从中受益匪浅。在这一时期，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工场和商品消费大国，中国对大宗商品的需求为那些商品出口国开辟了一个外汇创收的新来源。2001~2010年，拉丁美洲向中国出口矿产品和矿物燃料总量以每年16%的惊人速度递增，农产品紧随其后，年均增长率达12%。因此，拉丁美洲国家本来就很强的自然资源禀赋加重了其在这些产品方面的贸易专业化，或可称之为出口的再初级化。就初级产品来看，2014年，该地区所有国家（墨西哥除外）对中国的出口值80%以上集中在五个主要的国家，它们是在大宗商品出口榜单上名列前茅的国家。对出口价值贡献最大的产品分别是石油、铁矿石，铜、大豆、废金属、鱼粉、木材和糖。

这种贸易关系导致中国和拉丁美洲之间在全球价值链（GVC）上发生了更加紧密但又不对称的联系。在2000~2011年，拉丁美洲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缓慢上升，但还是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而中国与全球平均水平逐渐接近（见图1-1A）。同一时期，中国参与拉丁美洲的全球价值链的步调非常迅速。拉美本地区内部参与全球价值链后向联系的比例才从5%上升到9%，中国的这一比例就从1%跃升到11%，同一时期，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全球价值链的前向联系比例从5%上升至16%，增长相当惊人（见图1-1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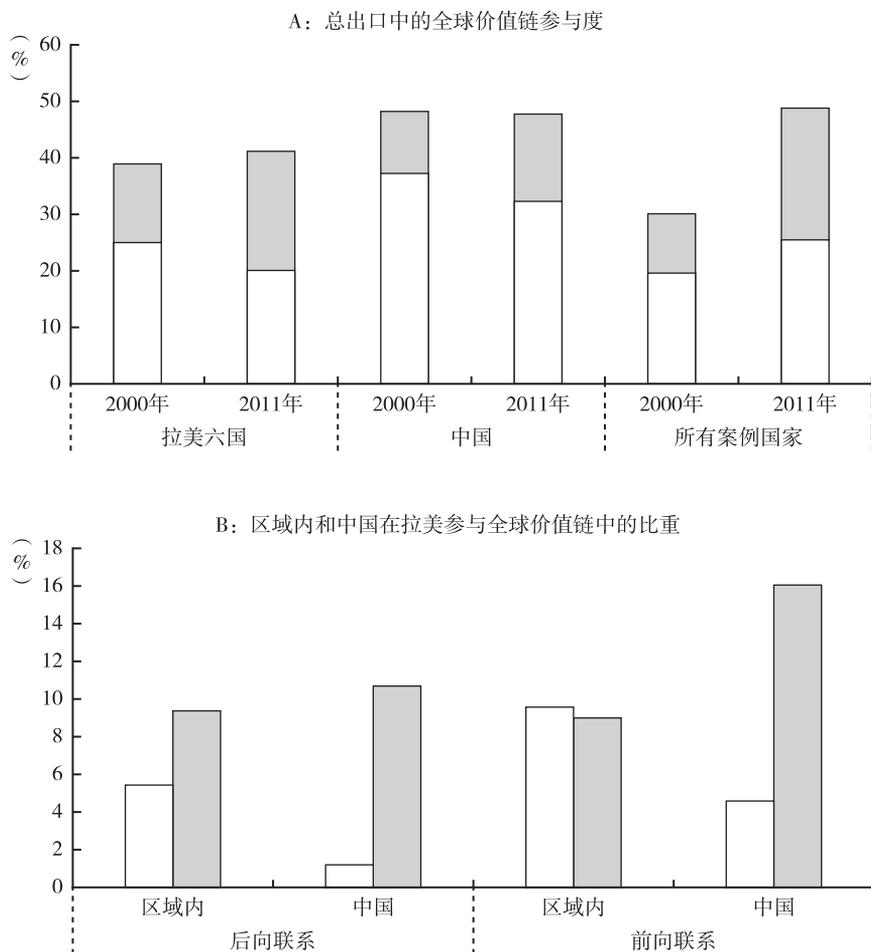


图 1-1 拉美和中国的全球价值链

注：拉美六国包括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这是根据可获得的数据来源确定的。“所有案例国家”包括 61 个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

资料来源：OECD/CAF/ECLAC calculations on the basis of 2015 OECD/WTO TiVA data (OECD/WTO, 2015)。

统计链接：<http://dx.doi.org/10.1787/888933291306>。

换言之，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全球价值链中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拉美地区内在的联系。这也表明，全球或区域内的价值链存在新环节，可能为该地区的出口多元化提供机遇（IDB，2014）。拉丁美洲向中国出口的商品和服务存在



巨大的不对称性，要远甚于该地区向全世界出口的组合。2013年，在拉美地区向中国出口的商品中，73%为初级产品，相比之下初级产品在同期该地区向全世界出口中的占比为41%。同年，在拉美从中国的进口中，低、中、高科技产品占到91%，而这一比重在拉美从全世界的进口中是69%。

中国在发展制造业比较优势方面的能力无与伦比，因此中拉贸易关系存在不对称性一点都不让人惊讶。1998~2008年，中国在58个新兴出口产业（国际贸易4位标准分类）中确立了比较优势，从20多年前的全球贸易结构多元化的第10位上升到第8位（OECD/CAF/ECLAC，2013）。在拉丁美洲，只有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在多元化方面表现优秀，各自在贸易组合中新增了60种产业，于是，哥伦比亚在全球贸易多元化中的排名从第54位上升到第45位，而哥斯达黎加相应地从第57位上升到第47位，其余国家则几乎没有什么长进，有些国家甚至出现了退步。巴西从第26位跌至第35位，阿根廷从第34位下滑到第39位，智利从第52位降至第69位，委内瑞拉从第58位一落千丈到第107位。

当前，在中国经济再平衡的背景下，以初级产品为基础的增长结构特点导致拉丁美洲正在经历经济下行，这是自21世纪初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结束以后，拉丁美洲面临的棘手新挑战。在2009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的短暂恢复以后，从2012年开始，拉丁美洲的经济增长势头急转直下。2014年，拉美地区GDP的增长率仅为1%左右，远低于前十年的平均水平。在2003~2011年，全球需求旺盛、大宗商品价格居高，流动性充分，带动拉美的经济快速增长，年均增长率曾达到5%。而在当前全球经济增长疲软、大宗商品价格下降、资本流动性减弱的背景下，拉丁美洲经济机构转型悬而未决的问题暴露无遗，生产率及其增长都处于较低水平（OECD/CAF/ECLAC，2014）。不过，拉美地区发展并不平衡，例如，墨西哥和中美洲的制造业出口国就很好地融入美国的价值链，其表现要优于南美洲的商品净出口国。

地区内的投资动力衰减是拉美经济下行的另一大因素。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以后，从2010年开始，投资曾为保增长做出了关键性贡献。直到2014

年，投资的贡献转向负面。许多外部不利因素，特别是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美国的货币宽松政策和随之而来的更严峻的财务状况以及一些（可能）短期存在的国内因素，再如政策的不确定性和改革法案的通过（特别是在一些国家，如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和委内瑞拉的税收法案），都会导致公司推迟投资计划。经济在不久的未来复苏前景不明，信贷条件也会随之收紧。公共投资不够强大，不能弥补紧缩的私人投资，在某些情况下，实际上还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中期增长预测表明，拉丁美洲的潜在产出要低于之前所认为的水平，需要做出结构性的改变。有证据表明，潜在增长率约为3%，不仅低于预期，与2005年以来年均5%的增长率相比更是相形见绌。2010~2015年，拉美的大多数国家都有所增长，但最近几年增长非常缓慢，存在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资本积累动力减弱，要素使用效率降低，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限，加上人口老龄化，使生产率降低（IMF, 2013; Powell, 2015）。过去十年中，拉丁美洲和新兴的亚洲国家之间的增长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第二，宏观经济管理还没有跟上经济结构的剧烈变化。拉美地区需要解决供应侧方面的瓶颈，将更多的资源从生产率低的行业转移到生产率高的行业，并激发产业的活力。中小企业的成长受到信贷难以获得和成本高昂等方面的制约，尤其是在长期信贷方面（OECD/ECLAC, 2012）。要支持经济结构改变，加强地区一体化，就必须改善基础设施和物流方面的表现（OECD/CAF/ECLAC, 2013）。更加完善的一体化区域市场能够创造为更广泛的消费者需求提供服务的机会，实现规模经济，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对接提高竞争力的政策。职业技能与创新也是至关重要的，由于人力资本短缺，面临严重经营问题的公司在拉丁美洲的数量是南亚地区的3倍，是亚太地区的13倍（OECD/CAF/ECLAC, 2014; Melguizo and Perea, 2015）。生产率的提高应当融入更具包容性的增长，进一步降低不公平、减少贫困。2013年，拉丁美洲尚有1亿6400万人口生活在赤贫线以下，占总人口的



28%。非正规就业的水平也很高，大约有一半的工人在非正规部门就业。新的挑战已经出现或者可能恶化：对政府部门的信任削弱，优质公共服务难以满足需求，仍然脆弱的新兴中产阶级和持续的不平等。必要的财政改革将更加具有挑战性，特别是对中美洲和安第斯地区的经济体来说，踟蹰不前的进程加重了它们的税收负担（OECD/ECLAC/CIAT/IDB，2015）。

无论是拉丁美洲国家还是中国，中等收入陷阱都是一个潜在的挑战。在中国，多年的超高速增长已经使其在短时间内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还是一个下中等收入国家（按1990年的美元购买力平价超过2000美元），而到了2009年，已经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当前更是逼近高收入国家标准线（按1990年的美元购买力平价超过11700美元）。中国的强劲增长推动了生活水平多维度的标准大幅度上升（OECD，2015a）。而对于拉丁美洲，绝大多数国家都遭受到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其中许多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均收入增长呈现长期的、明显的停滞（见图1-2）。法律法规的缺陷、寻租行为以及生产结构不够集中于知识密集型的活动等都是拉美国家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定因素。如今，中国已经远远超越了中等收入国家线，可能会相对容易地跨越这个陷阱。不过，一些风险因素可能会危及中国未来的增长模式。首先，公共部门积极参与经济活动，可能会挤出私营部门，产生有害的影响。其次，过去几十年高速增长已经沉淀了相当大的环境成本。最后，收入不平等在增加，基尼指数从1990年的0.32升高到2010年的0.42，可能会拖累增长。

拉丁美洲应该牢牢抓住财富转移的第二阶段，确立一个专注于生产性发展政策的经济新模式，改进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促进经济多元化，加大食品、服务和旅游等行业的出口

中国正在实施一项雄心勃勃的发展议程，致力于在未来的财富转移过程中保持领先地位。财富转移已经进入第二阶段，即“财富转移Ⅱ”。“财富转移Ⅰ”阶段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由中国和印度开始向世界开放市场这些简单事件所决定的。“财富转移Ⅱ”会有一个长期的重新调整期，新兴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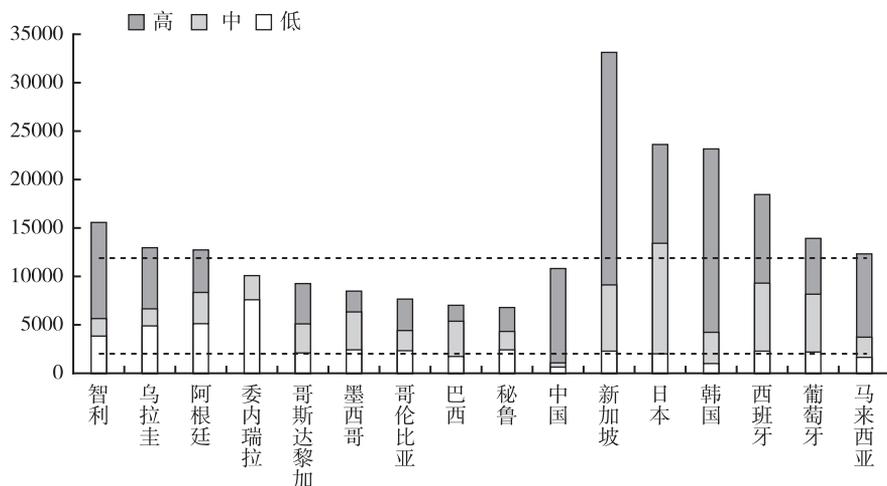


图 1-2 拉美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选定的拉美国家、亚洲和 OECD 国家的人均 GDP,
按照 1990 年的购买力平价美元计算)

资料来源: OECD/CAF/ECLAC 根据 Felipe, Abdon 和 Kumar (2012) 提出的方法进行计算, 数据取自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2015) 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5/01/weodata/index.aspx, and Maddison (2010) database www.gdpc.net/maddison/。

统计链接: <http://dx.doi.org/10.1787/888933291317>。

场大国在经济和社会的大变革中将延续未来的增长和收入的收敛 (World Bank, 2015)。中国将仍然是这一过程的关键动力, 这要归因于“新常态”: 增长转型换挡, 更多依赖国内消费; 以人口老龄化、城市化和中等收入家庭持续增多为主要特征的社会转型; 面向科技密集型行业而又确保传统制造业稳定的结构转型。

拉丁美洲仍然需要制定一个多元化和升级生产结构的发展议程, 以便从更多的贸易和投资的新机会中获益, 在应对冲击时具备更大的弹性, 优化金融流动, 弥补基础设施上的缺口。中国向“新常态”的成功转型, 意味着更具可持续性的增长路径是建立在再平衡基础之上的, 其手段是通过更高的消费、更加专注于高附加值行业和服务业、加强教育和技能培训体系以及在全球治理平台中更加突出亚洲国家角色等 (OECD, 2015b; World Bank/



DRC, 2014)。拉美未来的发展战略需要对接以上这些因素。因此，拉美国家重新评估该如何最大限度地从中国的“新常态”中受益和应对挑战恰逢其时。在这种情况下，拉美国家一方面要积极主动地与中国进行战略整合；另一方面，自身也要增强多元化和竞争力。

贸易关系将继续成为中长期内中拉关系中的一个决定性特征，但在中国从投资和出口转向内需的背景下，传统的商品出口将大幅下降。根据对中国官方宏观经济方案的分析（世界银行/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中国，2013年更新版），拉丁美洲向中国的出口将会出现一个显著的放缓，其程度根据出口结构及各国的国情而有所区别。如智利和秘鲁这样的矿业出口国将受到最严重的冲击，它们的出口会从此前2001~2010年的年均16%的惊人速度上缓慢滑落，在现有条件不变的条件下，到2030年将会降至3%以下。石油燃料出口国（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和玻利维亚）和以传统农业部门为主的经济体（尼加拉瓜、危地马拉、乌拉圭、巴西、洪都拉斯、巴拉圭和阿根廷）也会经历相似的下降（例如，能源会从16%下降至4%，农产品会从12%下降至3%）；以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体（墨西哥、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经济也可能出现下降，但降幅会较低（从2010年以前5%的年均增长率降至未来几年2%的年均增长率）。在中国“低投资方案”的假设条件下，矿产出口国将面临具有更大挑战的环境，而制造业出口国面临的环境将更具弹性（见图1-3）。

中国的再平衡也涉及消费的重组，为拉丁美洲的出口开启机遇，特别是在某些农业食品行业。中国仅拥有世界耕地面积的7%和水资源的6%，但它的人口却占世界的19%。此外，由于城市化进程和中产阶级的巩固，以人均每天收入在10~50购买力平价美元的人口来定义的话，中国的中产阶级将从2005年的略高于5000万人上升到2030年的将近10亿人。在同一时间段，拉美的中产阶级将从1.35亿人增长到3.1亿人。（Bussolo, Maliszewska and Murard, 2014），中国的食品消费模式也正在发生变化。营养和加工食品成为一时之需，对质量和安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未来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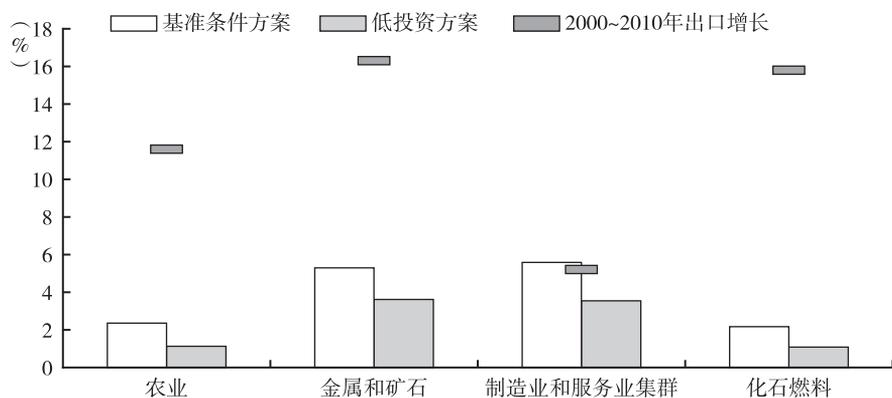


图 1-3 按照国家的产业集群对 2010 ~ 2030 年拉美向中国的出口预测
(出口国年均增长率)

注：基准条件方案和投递投资方案代表 2011 ~ 2030 年年均出口增长率。产业集群分类如下：农业（阿根廷、巴西、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拉圭、乌拉圭），金属和矿石（秘鲁、智利），制造业和服务业（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国、墨西哥）和化石燃料（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厄瓜多尔）。

资料来源：OECD/CAF/ECLAC 利用 Avendano, Obach and Perea（即将发表）的预测所进行的计算。

统计链接：<http://dx.doi.org/10.1787/888933291324>。

年，中国在人均食用糖、家禽和羊肉上的消费量将增加 20% 以上，而鱼、植物油、水果、蔬菜、牛奶和牛肉的消费量将增加 10% ~ 20%。相反，大米和小麦等基本作物的人均消费将下降（OECD/FAO, 2015）。囿于其有限的土地和水存量，仅靠自主生产已经不能完全满足中国对这些产品的需求。拉丁美洲对接这种消费升级的形势一片大好，阿根廷、巴西、萨尔瓦多或危地马拉等国在肉类、牛奶或蔬菜的出口方面前景无比光明。

面对中国的粮食需求增长的前景，拉丁美洲应积极主动地在这些行业实施生产性发展政策以及更广泛的基础政策。为了充分抓住食品产品不断增长的趋势，拉丁美洲的政府应该努力将其公司定位在生产链的附加值的更高端，提供各种类型的服务，这可以避免商品价格波动。拉美地区向中国出口的农产品的比重从 1990 年的 1% 上升到 2000 年的 3%，再到 2013 年的 13%，在农业贸易中形成了一个丰厚的且不断增长的顺差。中国在肉、鱼和



水果等产品上不断增长的消费为拉丁美洲出口更高的附加值创造了广阔的空间。如乌拉圭肉类产业中的电子追踪、阿根廷大豆产业中的种子制造等都是很好的案例。尽管关税升级和非关税壁垒，如有关原材料和半加工产品的卫生与植物防疫规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拉美向中国出口加工食品，但中国不断上升的需求会在未来提供机遇。价值不再只集中在价值链的始端，如研究和开发活动和产品设计，而且存在于营销和物流等上游活动之中（OECD/FAO，2015）。拉丁美洲产品的附加值上升以及对接中国的最终需求，会提高拉美出口的产品在中国国内消费中的比重（OECD/WTO，2015；ECLAC，2015）。农业部门的出口相关性很强，如果拉丁美洲的农业公司想要让它们的最终产品到达中国消费者的手中，它们需要创造关注度和国家、品牌的知名度。

拉丁美洲的矿业公司需要确定一个将其活动从采掘行业扩展到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业的战略。成功的生产性发展战略应当促进当地产业的能力，加强与当地供给者的联系，并鼓励中国企业和当地企业之间的升级活动。采矿项目，如厄瓜多尔的米拉多（Mirador）、巴西的米纳斯·格拉伊斯（Minas Gerais）就投资了与采矿相关的服务业与其他产业，落实了这一战略。

拉丁美洲应扩大服务业的范围，以适应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所创造的新机遇。这其中包括为中国的跨国公司全球网络提供后台和离岸业务的全天候服务，还可以包括娱乐、建筑、城市规划、环境管理、医疗卫生、老龄人口服务以及其他更为传统的行业，如旅游、运输和物流。OECD 服务贸易约束性指数（Services Trade Restrictiveness Index）显示，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和墨西哥在广播、快递、通信和航空运输服务等行业中的约束性较高，部分原因是行业的特殊规则，如对外国人参股的门槛和一般性的规定（OECD，2015c）。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旅游业显示出了进一步发展的潜力。从拉丁美洲到中国的游客人数（2013年为25.1万人）和从中国到拉丁美洲的游客人数（2013年为33.4万人）在近年来都呈现显著的上升（UNWTO，2015），但仍然不及中国游客总数的1%。必须对拉丁美洲的签证限制和复杂的移民程序进行检讨，以便区域间的交流能够更加顺畅。

区域内的贸易，包括参与全球价值链（GVCs），可以进一步激发拉丁美洲的生产力。拉丁美洲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低于其他地区，例如欧盟和亚洲，这主要是因为后向联系程度较低。全球价值链贸易的主要在区域内发生。除了墨西哥很好地融入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之外，拉丁美洲的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区域内贸易占比很低，中转贸易的比重则更低。2011年，拉丁美洲后向联系（包括巴西、墨西哥、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和阿根廷这六个可获得数据的国家）占总出口额的比重为20%，相比之下欧盟和亚洲的这一比重接近30%。拉美地区后向联系的这一水平还是沾了墨西哥的光，后者受益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一体化，后向联系占到了出口总额的32%。如果排除墨西哥，拉美地区的后向联系则下降到其总出口的13%。与之相反，拉美地区的前向联系与欧盟和亚洲几乎相当（占比在21%~23%），这得益于智利和哥伦比亚，这两个国家的前向联系的比重在30%~32%（OECD/WTO，2015），确保了拉美在全球价值链中稳居上游的位置。

拉丁美洲的目标可以锁定在如信息和通信技术这样的知识、技术密集型的服务业，以及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其他商业服务业，包括那些与中国开展的业务上。服务业价值链对于制造业中心的距离不太敏感，但是对投资周期和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开放度会更加敏感。在面临当前的结构和地理上的约束时，它将促进拉丁美洲进行的多元化成效。到目前为止，对中国的出口一直集中在相对传统的服务行业，如运输、储存、批发零售贸易。只有巴西和哥斯达黎加已经成功地扩展到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这一动态预示着服务业将提供多元化和跨区域间进一步一体化的途径。亚洲其他地区（不包括中国）和欧盟国家在计算机和其他商业服务领域恰逢最佳的机遇，美国、加拿大和中国的融合则提供了其他行业机会。

在创新、技术、区域一体化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可以帮助拉丁美洲从中国的新常态中获益

要想从全球价值链的机遇中受益，拉丁美洲必须升级它的“技能池”



(pool of skills)。为了应付竞争，挖掘新机遇，拉丁美洲必须更新技能，改善教育和培训体系的质量。正如在《拉丁美洲经济展望 2015》中所强调的，该地区的教育质量仍然很低。在中学教育阶段，根据 2012 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数据，拉丁美洲的学生与 OECD 国家的学生之间的差距，几乎相当于两个学年。教师培训和早期教育对于提升整个教育绩效至关重要。教育和技能提升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个长期困扰拉丁美洲的问题，创造出高质量的工作岗位，缩小非正式经济的规模（OECD/CAF/ECLAC，2014）。

当前的趋势表明，中国可能是全世界高等教育人群的主要供应者，无论是从人群规模还是劳动力的技术熟练程度角度来讲，都要远胜拉丁美洲。在我们的基准预测方案中，中国当前科技战略在全球范围内培养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到 2020 年将达 1.25 亿人，到 2030 年将会超过 2.2 亿（占中国适龄工作人口的 21%，人数相当于今天的澳大利亚总人口），这些数据显然要高于拉丁美洲（到 2030 年预计只有 9000 万人，占该地区适龄工作人口的 19%，相当于今天的奥地利，见图 1-4）。根据最近几年的趋势，在中国高水平毕业率的预测方案中，这种差距会进一步拉大。中国越来越有能力掌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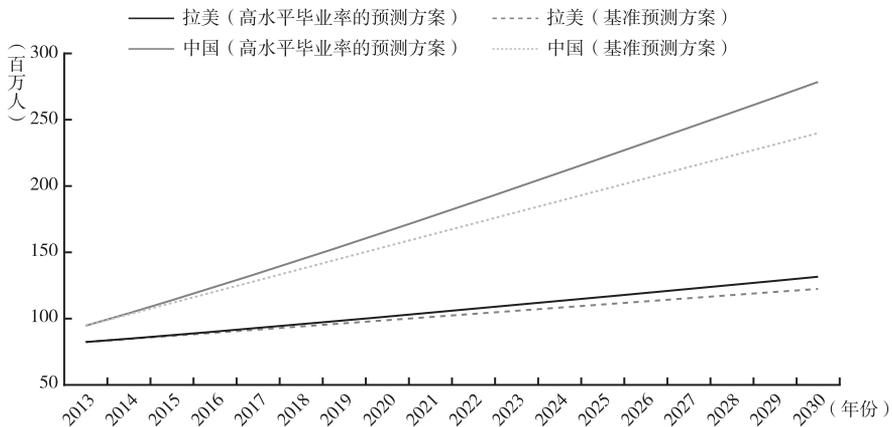


图 1-4 2013 ~ 2030 年拉丁美洲和中国在科技方面的预测（高等教育人口）

资料来源：OECD/CAF/ECLAC calculations 根据世界发展指数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数据计算。

统计链接：<http://dx.doi.org/10.1787/888933291334>。

全球价值链的高附加值阶段，生产出更复杂的商品，发展好服务业，而在这些领域的竞争中这种情况可能会将拉丁美洲置于弱势地位。

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拉丁美洲的技术构成集中在与经济中的生产领域联系较少的领域，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投资不足。技能的针对性应该是该地区在就业能力方面优先考虑的问题，在中国，大约有一半的高等学校学生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等专业学习，这一比例在拉丁美洲只有 1/5。在科技越来越成为生产力重要驱动力的背景下，良好的技能对于吸收和创造技术进步至关重要。中国主要通过机器人技术将科技融入生产过程，而拉丁美洲却缺乏应对这一挑战的战略，在 STEM 领域从事研究的就业潜力也被大多数人所低估。而如智利的“我的未来”（*Mi Futuro*）项目、秘鲁的“专业入门”（*Ponte en Carrera*）等研究这些领域科技回报等的信息系统可能会激励入学率。提高科技和职业教育的质量仍然是弥补拉丁美洲在科技上短板的首要任务。要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建立行业需求与劳动力供给之前的匹配机制，通过职业认证体系和未来需求的预测来提供职业生涯方面的信息。

更多、更好的教育和工作技能培训对于创新来说必不可少。在同等方式的研发支出条件下，拉丁美洲的创新资本存量（占 GDP 的 13%）远低于 OECD 国家（占 GDP 的 30%），必须改进这方面的制度性安排，以利于科技和创新的传播。尽管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能够为拉丁美洲的科技和创新发展提供一定的机会，但必须做到投资流动与创新和结构转变有关的政策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OECD/CAF/ECLAC, 2014）。

中国愿意加强与拉丁美洲的关系，以成功加入全球价值链，期待一个由更完善的基础设施所支撑的区域一体化议程，这就需要一个区域性的合作机制，以便能成功地实现对话和谈判。最近的经验表明，双边协议虽然有利于一些国家或市场，但可能会对其他国家和市场产生负面影响。利用区域性平台，发展区域贸易协定，应该能够增加区域内的竞争力，加强拉美地区未来与中国谈判中的议价能力。现有的平台，如加勒比共同体、中美洲共同市场、南方共同市场和太平洋联盟，可以帮助建立协调机制，设计与中国相关



的战略，同时可以创造一个更大的区域市场，对外国投资者更具吸引力。依托公共和私人投资，改善基础设施和物流，有助于一体化议程，可以帮助拉美地区经济在全球价值链中重新定位。在拉丁美洲，57%出口的是易腐烂或是物流密集型产品，货运成本高，运输服务不可靠。通过基础设施升级，从而提高进入全球生产网络的层次，必定大有可为（OECD/CAF/ECLAC，2013）。

在与中国的对话中，拉丁美洲应将区域性的贸易协定置于关税政策之上，而且应涵盖服务、投资、政府采购、知识产权、竞争政策与法治透明度等方面的规则。高水平的法治监管，尤其是在服务业，对竞争力有一定的影响。因为服务价值链非常特殊，减少投资壁垒，消除外国投资进入大多数行业的限制，减少竞争壁垒，有助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扩大法律服务、会计、工程等专业服务市场的流动性和市场整合，推动国家之间相互承认彼此的资格认证，放宽许可证制度对工作权利诸多的限制，这不仅有助于在地区内规范的和谐统一，而且能推动通信、金融服务等领域的行业改革。

此外，中国和拉丁美洲之间的合作成效证明，双方在农业、能源、基础设施和环境管理等领域的技术交流的空间非常广阔。作为“巴西—中国十年合作规划（2012~2021）”的一部分，两国签署了5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协议。同样，通过一个雄心勃勃的太阳能计划，中国已成为智利能源多元化的重要支持者。在阿根廷，来自“科学与食品科技中心”的本土科学家与中国的同行一道，已经在农业食品、生物技术、纳米技术、能源、可持续食品加工、保鲜、包装与运输等领域开展了合作研究。

中国投资拉美能够互利共赢

中国的“走出去”战略，推动了中国企业收购全球资源和国际化，其效果远大于过去30年。近期的一些行动固然还受“走出去”这一相同的目标所驱动，但更是经济的基本面转型所致，这为拉丁美洲的基础设施融资提供了一个关键的机会。与过去几十年不同的是，拉丁美洲将是中国的重点合

作地区之一，这是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 2015 年访问拉美地区期间所释放出来的信号。尽管类似于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和投资协议这样的政策工具已经存在了多年，但中国正在尝试通过对接多边平台（拉共体、南共市，太平洋联盟）来寻求进一步深化贸易和投资一体化。通过主要的金融贷款和投资等手段，当今的中国已经成为重构全球金融体系的“关键先生”。通过双边贷款、加盟多边发展银行（从 2009 年加入美洲开发银行到深化与拉丁美洲开发银行的关系）以及在金砖国家体系（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内建立新的发展银行，中国确立了在拉丁美洲的重要存在。此外，拉美各国政府应在吸引投资、提供更多的信息、联系当地的合作伙伴等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出口和投资的促进机构可以在设立可预见性的投资政策框架、增进中拉之间的了解和沟通等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过去 10 年中，中国—拉美的金融流动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能源和采矿等方面。来自中国的贷款，已经成为拉丁美洲某些特定国家（阿根廷、巴西、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外部融资的最大来源，超过了一些在本地区经营多年的国际机构。2010 年以来，来自中国的贷款达到 940 亿美元，相比之下，世界银行、拉丁美洲开发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加起来的贷款总共为 1560 亿美元（见图 1-5）。中国的融资在行业和国别上对国际金融机构起到了很好的补充作用。中国的资金主要集中在采矿、基础设施运输和能源等行业，而 60% 的国际金融机构项目集中在其他行业（金融、教育、健康、环境，公共管理）。阿根廷（16%）、巴西（19%）、厄瓜多尔（9%）和委内瑞拉（47%）在接受中国融资方面最为积极，占到了 2005~2014 年中国贷款总额的 91%。这里也要强调的是，从中国借款的国家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的壁垒都非常高（例如，这些国家的平均主权评级是 750 个基点，而拉美其他地区是 350 个基点）。

中国的存在，不仅在拉美地区的采掘行业，而且在其通信、电力、绿色技术和土地购买等方面都在扩大。根据 2015 年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举办的中国—拉共体论坛（China - CELAC Forum）上宣布的计划，到 2025 年，中国在拉丁美洲的累计投资预计将达到 2500 亿美元。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扩



大了在通信行业上的参与力度，牢牢占据了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等大国市场中当地网络供应商和技术援助的地位，还进一步将这种参与扩展到了玻利维亚、古巴、厄瓜多尔、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等国。中国还积极参与阿根廷、巴西、哥斯达黎加和厄瓜多尔以及其他国家的水电站项目建设。此外，鉴于本土市场出现产能过剩，中国企业开始在为拉美地区提供风能和太阳能发电等绿色技术方面发挥作用。建在智利阿塔卡马沙漠的9亿美元项目就是其中一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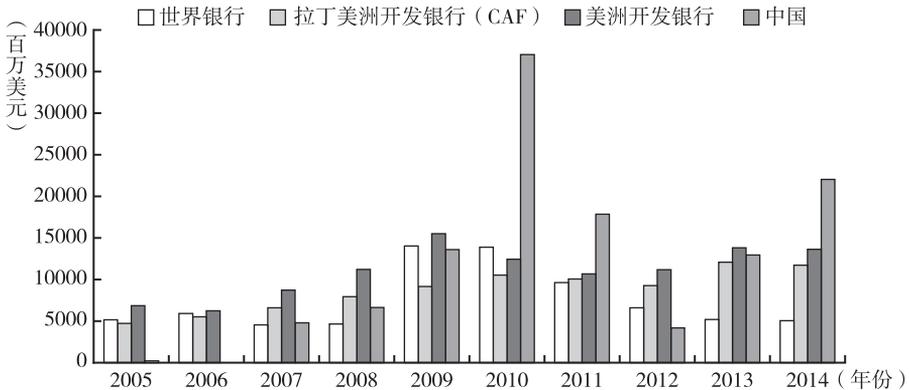


图 1-5 中国和特定的多边组织对拉美的贷款

注：中国的贷款包括主要由国家发展银行和进出口银行提供的贷款。世界银行贷款是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国际发展协会的贷款，CAF 贷款指的是贷款承诺，美洲开发银行贷款包括贷款和提供的担保。

资料来源：OECD/CAF/ECLAC 根据 CAF, IDB, World Bank 的年报，以及 Gallagher and Myers (2014) 关于中国贷款的数据计算。

统计链接：<http://dx.doi.org/10.1787/888933291344>。

随着中国企业在拉美地区寻求新的机会，中国的金融和投资将会面向更多的国家和行业。2014 年和 2015 年，中国高层领导人两次访问拉美期间曾经宣布，将增加信贷额度，未来将面向该地区新的国家。中国的商业银行在拉美地区的日益增多，也有助于中国的投资组合在该地区的多元化，降低部分金融风险。虽然金融业继续关注传统的行业，如能源、运输基础设施和通信等，但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分配范围更广，包括制造业、科学和技术创新

与信息技术。

面对中国提高在拉丁美洲的融资参与度所带来的机会，拉丁美洲应努力提高透明度、改善法治，特别是在环境方面。在这点上，拉丁美洲政府可以更加积极主动一些。中国投资的重点在采矿业上，这就需要加强评估和监测机制，提高政府部门在推行采矿业的标准和法律的能力，建立一个能够回应本地关切的清晰的咨询过程（包括国际劳工组织第 169 号公约），推动民间组织和中国政府合作，督促投资者能够遵守当地的环境准则和现行法规（Ray et al.，2015）。法制框架也应该扩展到国际标准。中国对商品的需求不断增加，以及中国设备在拉美地区的潜力剧增（例如外商直接投资、经济特区），意味着要对现有的出口标准和认证（ISO，欧盟 CE 市场规则、中国强制认证）进行修改，特别是当中国挑战收敛性的时候。

一个成功的中拉伙伴关系需要完善的多边治理。中国的转型给拉丁美洲地区带来了新的挑战 and 机遇。这些都需要纳入更加广泛的以升级、多样化和一体化为目标的发展战略之中。正因为如此，中国也需要理解拉丁美洲的发展挑战。建立合作渠道的意愿应超越双边形式的对话，而将地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结构性对话。最后，这种伙伴关系应该对当前的议程进行补充，包括将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法律法规事项纳入合作的主要事项。

参考文献

Avendano, R. , J. Obach and J. R. Perea (forthcoming), “China’s rebalancing: What scenarios for Latin American exports?” *Working Paper*, OECD Development Centre, Paris.

Bussolo, M. , M. Maliszewska and E. Murard (2014), “The long-awaited rise of the middle class in Latin America is finally happening”,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6912,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ECLAC (2015),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and China: Towards a New Era in Economic Cooperation*, United Nations – ECLAC, Santiago, http://repositorio.cepal.org/bitstream/handle/11362/38197/S1500388_en.pdf?sequence=1.

Felipe, J. , A. Abdon and U. Kumar (2012), “Track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What is



it, who is in It, and why?”, *Working Paper No. 175*,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of Bard College, www.levyinstitute.org/pubs/wp_715.pdf.

Gallagher, K. P. and M. Myers (2014), “China-Latin America finance database”, *Inter-American Dialogue*, Washington, DC., www.thedialogue.org/map_list/.

IDB (2014), “Synchronized factories: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in the era of global value chains”, Special Report on Integration and Trade,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Springer, Washington, DC, <http://link.springer.com/book/10.1007%2F978-3-319-09991-0>.

IMF (2015),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April, 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5/01/weodata/index.aspx.

IMF (2013),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Western Hemisphere: Time to Rebuild Policy Spac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www.imf.org/external/pubs/ft/reo/2013/whd/eng/wreo0513.htm.

Maddison Project (2010), database, www.ggdc.net/maddison.

Melguizo, A. and J. R. Perea (2015), “Mind the skills gap! Regional and industry patterns in emerging economies”, *OECD Development Centre Working Paper*, forthcoming.

OECD (2015a), *All on Board: Making Inclusive Growth Happen in China*, OECD, Paris, www.oecd.org/china/all-on-board-making-inclusive-growth-happen-in-china_EN.pdf.

OECD (2015b), *China in the Changing Global Environment*, OECD, Paris, www.oecd.org/china/china-in-a-changing-global-environment_EN.pdf.

OECD (2015c), “OECD Services Trade Restrictiveness Index”, OECD, Paris, www.oecd.org/trade/stri.

OECD (2014), *Perspectives on Global Development 2014: Boosting Productivity to Meet the Middle-Income Challenge*,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dx.doi.org/10.1787/persp_glob_dev-2014-en.

OECD (2010), *Perspectives on Global Development 2010: Shifting Wealth*,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dx.doi.org/10.1787/9789264084728-en>.

OECD/CAF/ECLAC (2014), *Latin American Economic Outlook 2015: Education, Skills and Innovation for Development*,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dx.doi.org/10.1787/leo-2015-en>.

OECD/CAF/ECLAC (2013), *Latin American Economic Outlook 2014: Logistics and Competitiveness for Development*,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dx.doi.org/10.1787/leo-2014-en>.

OECD/ECLAC (2012), *Latin American Economic Outlook 2013: SME Policies for Structural Change*,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dx.doi.org/10.1787/leo-2013-en>.

OECD/ECLAC/CIAT/IDB (2015), *Revenue Statistics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2015*,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dx.doi.org/10.1787/rev_lat-2015-en-fr.

OECD/FAO (2015), *OECD – FAO Agricultural Outlook 2015*,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dx.doi.org/10.1787/agr_outlook-2015-en.

OECD/WTO (2015), “Introduction to Trade in Value-Added (TiVA)” (database), www.oecd.org/industry/ind/measuringtradeinvalue-addedanoecd-wtojointinitiative.htm.

Powell, A. (ed.) (2015),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Macroeconomic Report. The Labyrinth: How Ca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Navigate the Global Economy*,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Washington, DC.

Quah, D. (2011), “The global economy’s shifting centre of gravity”, *Global Policy*, Vol. 2, Issue 1, pp. 3 – 9,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j.1758-5899.2010.00066.x/pdf>.

Ray, R. K. P. Gallagher, A. López and C. Sanborn (eds.), *China in Latin America: Lessons for South-South Cooper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Initiative, Boston University, Centro de Investigación para la Transformación, Tufts University and Universidad del Pacífico, Boston.

UNWTO (2015), *Yearbook of Tourism Statistics, Data 2009 – 2013*, United Nations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Madrid.

World Bank (2015), *Latin America and the Rising South, Changing World, Changing Priorities*,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P. R. China (2014), *Urban China: Toward Efficient,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www.worldbank.org/en/country/china/publication/urban-china-toward-efficient-inclusive-sustainableurbanization.

World Bank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P. R. China (2013), *China 2030: Building a Modern, Harmonious, and Creative Society*,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2013/03/17494829/china-2030-building-modern-harmonious-creative-society>.

第二章

拉丁美洲的宏观经济前景

进入 21 世纪以来，在有利外部环境的刺激下，拉美经济经历了一波高增长。不过这个阶段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是，在无重大内忧的条件下，拉美地区不得不持续地应付日益恶化的外部环境，导致经济增长乏善可陈。然而，中期的增长预测显示，下行趋势会进一步加大，这意味着潜在的产出增长要低于预期，也就是说最近的社会经济成就都要面临风险。本章将评估拉丁美洲在具有挑战性的国际环境中的增长前景，探讨拉美地区在外部条件进一步恶化时的脆弱性。内部展望侧重于稳定和提高投资率和生产率，外部展望则关注中国“新常态”的影响，并考察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变会如何缓慢地改变拉丁美洲的前景。然后将讨论这些因素如何影响拉美地区的主要实体和金融指标，并将如何塑造未来几十年的外部环境。在本章的最后会简要地提出一些长期的经济政策建议，总结拉丁美洲多样性的社会经济前景。

中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宏观前景的规则改变者？

在过去的 20 年中，中国已成为一个经济强国，极大地改变了全球贸易动态和金融流动，其经济利益已经扩张到多个大洲。许多贸易地区和国家都加强了与中国的关系，因为中国的高增长率提供了前途无限的经济机遇。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LAC）也不例外。中国是拉美地区许多国

家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也是直接投资和双边资金越来越重要的来源（见第五章）不过，拉美各国在参与模式上各有特色。南美洲的大宗商品出口国在加强与中国贸易联系的步伐上要快过中美洲的制造业出口国，后者则继续加紧融入与美国的价值链。与中国的关系也会根据出口的商品类型（石油、矿产品或者农产品）的不同而存在显著的差别。直接投资会转移到大宗商品行业，而双边融资对那些难以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国家更加重要。

然而，世事变迁只在转瞬之间。中国的经济从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转变为消费拉动型增长模式，增长率也已经换挡到更具可持续性的水平。宏观经济的发展必然伴随着深刻的结构性变革，包括大量对技能的投资、经济多元化和超越金融的开放战略，正如我们将在第五章中讨论的，它着眼于未来的趋势。这些内部的变化对不同的伙伴国家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规模越小、开放度越高的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金属类大宗商品出口国，受到的影响越大。

尽管中国经济放缓且处于调整中，但在过去十年中它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全球中的份额不断飙升，预计未来五年内全球增长部分的30%左右会来自中国，甚至会超越它的下行轨迹。此外，中国经济向消费的再平衡可能会向拉美地区和某些产品行业（例如食品）打开新的市场。不论地理位置或者过去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模式如何，拉美国家都可以在变化的环境中因势利导：有所为，但也需要能够抓住中国机遇的新战略。

全球背景：处于挑战的时代

尽管不同国家路径不同，全球经济正在转向低速增长。当前的全球状况显示，发达经济体的复苏正在触底，而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长持续下行趋势（见图2-1）。拉美国家的增长动态也呈现出分化的趋势。尽管2015年开始比较疲软，但美国的经济在就业和信贷的刺激下，预计会回暖，美元升值可能会损害出口，但不足以影响经济复苏。在欧盟，经济随着信贷条件的改善和失业率的降低正在缓慢复苏，但希腊债务危机的永久性解决方



案仍然难以确定下来。欧元和日元对美元的贬值应该会加大这两个经济体的出口，降低通缩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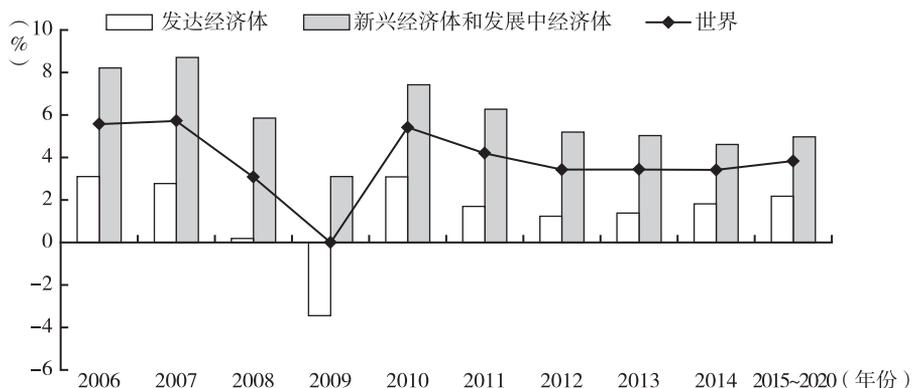


图 2-1 各大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展望（年增长）

资料来源：OECD/CAF/ECLAC 根据 IMF《世界经济展望》（2015）数据库计算，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5/01/weodata/index.aspx。

统计链接：<http://dx.doi.org/10.1787/888933291357>。

2015 年末，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金砖四国）等几大新兴经济体所面临的经济形势差异巨大。在中国，经济增长有所放缓，尽管增长再平衡进程使硬着陆的风险得到有效遏制，但在 2015 年夏季，首先是中国股市崩盘，继而引发人民币贬值，这场大动荡揭示出改革进程可能并非一帆风顺（见专栏 2.1）。与此同时，印度正在加紧经济扩张；俄罗斯正经历着一场严重的经济衰退；巴西的经济仍然深陷负增长的怪圈。总体来说，制造业出口国要比商品净出口国的表现要好。

专栏 2.1 人民币贬值：今日的易变，明日的增长？

2015 年 8 月 11 日，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弱化人民币，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超过 4%。该措施的初衷是让每日指导汇率能紧跟前一天的报收基点汇率，一步步过渡到更多由市场来主导的机制。人民币贬值引发全球市场的轩然大波，加剧了对中国经济脆弱性的担忧。许多观察家

认为，人民币贬值的决定可能证实了中国当局在一定程度上的关切。

尽管对人民币可能的汇率失调众说纷纭，但有证据表明人民币存在一个相当大的溢价。例如，对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BIS）有效（贸易加权）汇率的广泛测算得出的结论是，人民币在过去的五年中已升值约 30%。根据巴克莱银行（Euromoney, 2015）的说法，一种趋势认为人民币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被高估的货币。人民币被高估的又一个迹象是一直以来市场和中国企业都被预测会缩小。另一个显而易见的例证就是 2014 年中国的外汇盈余激增，主要是由于公司在出口过程中掌握了更多的外汇。同时，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比 2014 年的峰值水平减少了 1/10。

人民币贬值是拉美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对于该地区几个专门从事商品出口的国家，人民币贬值已经迅速压低了许多产品的价格。例如，大豆和石油价格短期内受到影响最大，在 2015 年 8 月 10~13 日，分别累计下降 7% 和 6%。

抛开这些直接影响不谈，人民币贬值可以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催化剂。中国可以通过直接刺激本国的增长，间接地影响他国增长，从而将货币贬值最有效率地转化为世界高速增长，这点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在国内增长问题上，人民币每出现 10% 的名义有效升值，就会拖慢中国每年人均 GDP 增长的 0.9%（Rodrik, 2010）。也就是说，在过去的五年里发生的 30% 的升值，可能拖慢了中国 2.5% 的 GDP 增长率。此外，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与新兴市场之间的增长联系，包括与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已经趋于紧密（Garroway et al., 2012）。具体而言，中国增长率每变化 1%，就会带来低收入国家的增长率在同一方向上变化 0.3%，而中等收入国家在同一方向的增长关联会达到 0.7%。

从长远来看，未来的问题是中国是否会为了促进出口而加快人民币贬值的速度。越来越多的观察者倾向于认为这种现象不会发生，并指出这会对资本流出产生潜在的影响，实施投资和出口导向型模式升级转型的长期战略也可能会因此遭遇挫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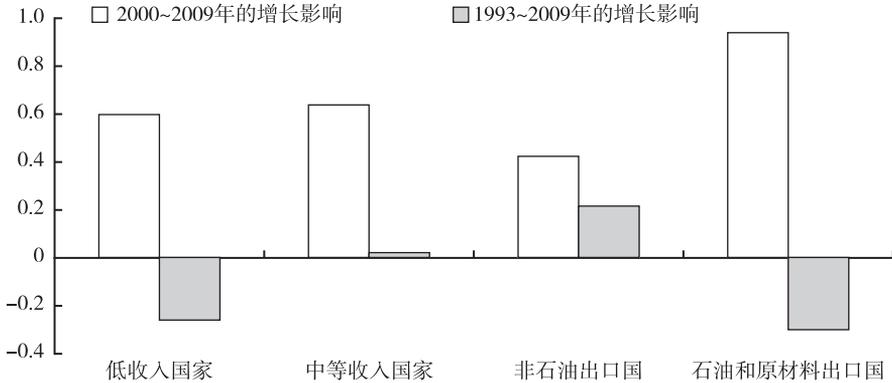


图 2-2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的影响

注：对不同类型的国家（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非石油出口国、石油和原材料出口国）的增长率进行固定效应的面板回归的贝塔系数，纵轴代表 1993~2009 年（增长影响）和 2000~2009 年（进入 21 世纪以来）的一国增长对中国增长的弹性。

资料来源：Garroway et al. (2012), “The Renminbi and Poor Country Growth”, *The World Economy*, Vol. 35 (3),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twec.2012.35.issue-3/issuetoc>。

统计链接：<http://dx.doi.org/10.1787/888933291362>。

增长动态的分化是发达经济体不同货币政策的写照。美国联邦储备局 (The US Federal Reserve, FED) 预计在 2015 年末开始加息，欧盟和日本也将进一步放宽货币政策，以对抗通货紧缩风险和支持经济活动。收紧利差将减少压缩到新兴市场的资本流量，进一步削弱资产价格和货币（见专栏 2.2）。市场应该在美国紧缩周期的开始时就完成定价，但如果美联储加息快过预期的话，可能会引起资本市场新的波动。

专栏 2.2 资本流入新兴市场的最新趋势：减弱、反复无常，但不会崩溃

2015 年以来，资本流入新兴市场继续减弱，可能标志着到 2020 年之前将会持续经年的低谷。各种推进、拉动的因素已经影响了新兴市场资产的“胃口”。这一年的第一个星期以一个有关全球风险厌恶上升的警示开始，标示着私人游资从非居民向新兴市场的流动减弱（见图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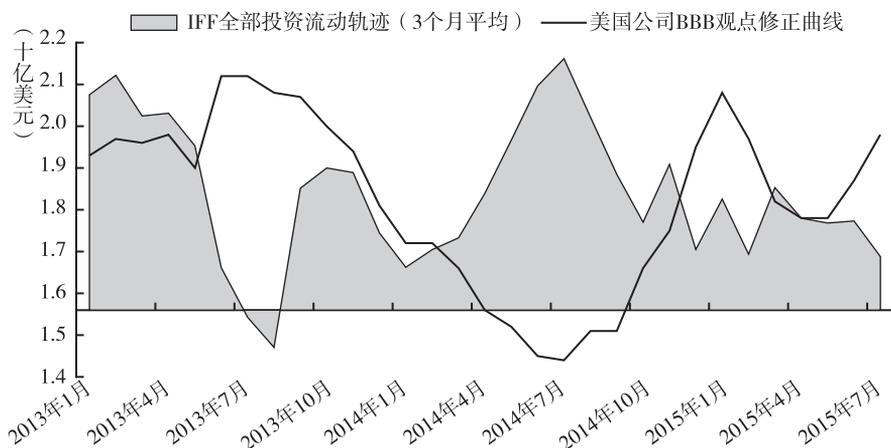


图 2-3 游资流入新兴市场 and 全球风险厌恶

注：风险厌恶由美国 BBB 传播公司抓取。

资料来源：OECD/CAF/ECLAC 根据 IIF 游资轨迹信息（2015 年 8 月）和美国美林银行的相关数据计算。

统计链接：<http://dx.doi.org/10.1787/888933291377>。

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复苏延缓，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俄罗斯、巴西——的经济活动疲软，标志着增长前景黯淡，投资者陷入困境。尽管外国直接投资比游资的稳定性要高得多，但在新兴市场环境弱化和大宗商品价格走低的背景下也出现了衰退。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直接拖累了对采矿业和石油行业的投资。自然资源依赖型的国家在此趋势下更加脆弱。

还有什么可以期待呢？全面的、突然的停滞是最不可能发生的情况，当然全面恢复也不可能。风险的天平正在向下倾斜。美联储加息无力支撑游资转化为资产或者债务流动的前景，特别是在新兴经济体为了刺激经济增长而继续保持中性的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之时。

欧盟的量化宽松政策可能会支持资金流向新兴市场，但无法确定它是否可以弥补美国紧缩的影响。资金流入新兴市场的主要推动因素似乎还是美国利率预期的变化，这在 2013 年削减恐慌（taper tantrum）的时候已经明朗。

围绕着增长进展的不确定性，市场风声鹤唳。因此，如果美联储加息超出预期的话，资本向新兴市场的流动可能会进一步回落，出现较大的波



动性。

新兴市场的基本面和政策框架都比较脆弱。例如，经常账户赤字较大和政策信誉度较差交织在一起，酿成了在最近的波动期内较差的绩效（IIF，2015）。再往前发展，可能会形成一个风险来源。此外，有些国家的非金融类公司在过去几年较大幅度地增持美国国债，这些国家将面临本国货币走弱的挑战。

在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继续维持扩张性政策的背景下，欧元和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大跌的趋势不会有太大的改观。尽管通货膨胀率保持在可控水平，但要么接近央行的目标，要么在某些时候有所超越，这限制了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降息的余地。如果很大一部分的负债已经完成了美元化的话，那么基于金融稳定性的考虑将会阻止这些中央银行更多的降息行为。

大宗商品在全球需求低迷而供给增加的综合影响下，价格进一步回落。金属和农产品价格自2011年以来已经出现下降，而石油价格直到2014年6月前还一直坚挺，在随后六个月时间里狂跌50%。以石油为例，市场紧俏时，数量的变化足以引发剧烈的价格变化。美国大幅增加页岩油的供应对价格的影响被中东石油的产量控制所抵消，直到2014年，来自利比亚的石油产出重新进入市场，导致供应过剩。石油输出国组织（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PEC）决定不干预价格，加上美元进一步升值，导致了石油价格暴跌。尽管在2015年第2季度以后价格触底后出现一定的反弹，但是在将来仍然难以在短期内恢复到21世纪初的高油价水平（见图2-4）。较低的石油价格对消费者（即净能源进口国）有利，但损害了净能源出口国。虽然海湾国家似乎能够承受这一冲击，但在石油暴跌前已经出现经济失衡的石油出口国将面临严峻的形势。

铁矿石、铜和镍的供给能力上升、需求疲软以及库存增加，使工业金属价格持续着走低的趋势。作为市场主要的价格推动者，中国房地产业萧条，其增长模式将更少依赖投资，这是全球金属需求下降的主要决定因素。这一趋势预计在不久的将来不会有所改变，并且将继续施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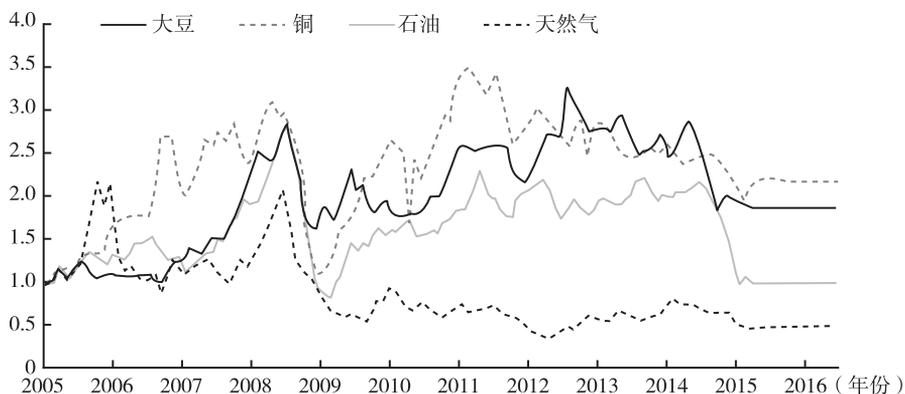


图 2-4 特定的商品价格 (2005 年的指数为 1)

资料来源: OECD/CAF/ECLAC 根据拉丁美洲开发银行和布隆伯格 (Bloomberg) 数据计算。

统计链接: <http://dx.doi.org/10.1787/888933291385>。

价格下行的压力。2011 年以来, 贵金属价格大幅度下降, 尽管在市场风险厌恶上升时, 黄金等出现过价格上涨, 但由于利率向上调整, 美元升值, 抑制了避险资产需求, 故短时期内贵金属的价格可能会保持震荡。

另外, 农产品价格自 2013 年以来一直波澜不惊。主要品种 (小麦、玉米) 和油料收成好, 2014 年的价格走低。以大豆为例, 耕地和产量的增加在价格持续走低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价格是受供给驱动的)。其他主要谷物价格, 如大米价格比较稳定。巴西干旱导致的咖啡价格上涨在 2014 年终结, 饮料价格因此而下降。意外的天气条件可能会对供给条件有所影响, 但预计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拉丁美洲的宏观经济趋势: 寻找潜力

拉美地区在 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曾迅速复苏, 但增长势头在 2012 年之后已成强弩之末。2014 年的 GDP 增长率仅为 1%, 远远落后于前十年年均 5% 的增长率。2003 ~ 2011 年, 全球需求强劲, 大宗商品价格高企, 资本流动性充足, 推动拉美地区经济强势增长, 而之后全球经济增长疲软, 大宗商品价格走低, 资本流动减弱, 拉美的活力正在被削弱。



平均值掩盖了拉美的异质性

贸易动态足以解释这段时期拉美地区的异质性。融入了美国价值链的制造业出口国的表现要好于南美的商品净出口国。相比之下，在过去十年里与中国接触不断增多的主要大宗商品出口国的贸易从2012年起遭受较大收缩，整体经济活动也因为大宗商品行业中的出口购买能力和投资的下降而受到不利影响。所谓的“大宗商品超级周期”的终结，正在影响着南美洲，特别是石油和矿产出口国。尽管美国的经济复苏助长墨西哥超越了该地区的平均水平，但石油行业的投资前景疲弱，还是会对墨西哥的经济活动产生负面影响。相比之下，中美洲的净能源进口国和讲英语的加勒比地区，却从较低的原油价格中获益，前景更好。

政策框架的范围和能力也有助于解释拉美地区各国间的异质性。如智利、哥伦比亚和秘鲁这样的商品出口国，具有较强的货币和财政结构，比那些财政积累失衡、结构较弱的国家的状况要好得多（见专栏2.4中以财政政策 and 稳定性为例进行的更深入的分析）。

这种异质性可以用在一个典型的经济周期中各个国家所处的地位来诠释，它取决于各个国家当前（2015年）和预期（2016年）的产出差距。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此有过预测，如图2-5所示，大多数南美洲国家的产出缺口都为负数，特别是巴西、委内瑞拉和秘鲁，连智利和厄瓜多尔也不能幸免。未来的产出仍然疲软，直至这些经济体在这个周期中触底后不同程度地反弹。尽管哥伦比亚接近它的增长潜力，但是未来因为石油价格而出现严重的萎缩可能会暴露无遗。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的情况也差不多。智利和秘鲁会在之前金属价格下降背景下所做出的转型调整的基础上更加深入。阿根廷、巴西和委内瑞拉等国无力实施逆周期的政策，将会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这也显示了政策框架在经济困难时期的重要性。

受美国经济恢复和能源价格低廉的支持，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似乎从低于潜在产出的状态回升。受石油行业近期改革所导致的投资前景疲软和国

内需求不振的影响，墨西哥的表现比其他国家稍弱。讲英语的加勒比国家，除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外，总体上都从低油价中获益，不过作为净出口国，这些国家主要面临财政可持续性的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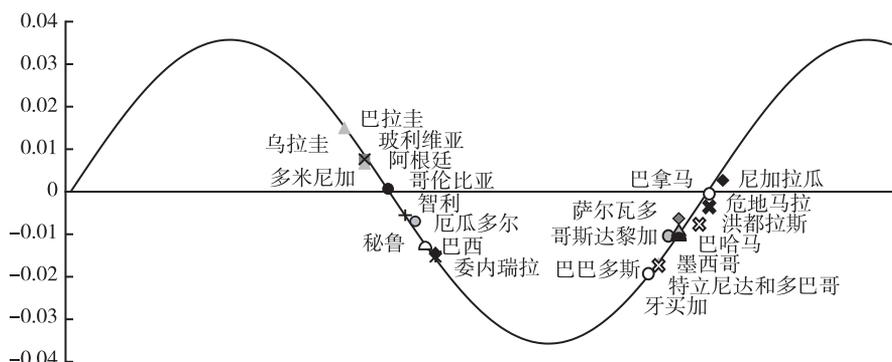


图 2-5 特定的拉美经济体的周期位置的例证
(2015 年，利用 HP 过滤的背离趋势)

注：产出差距是利用 HP 滤波 [Hodrick-Prescott (HP) filter] 的背离趋势计算得出 ($\lambda = 400$)。国家的位置是根据 2015 年的产出差距和 2016 年预计估测值而确定的。本图所描述的模拟化周期仅作参考之用，不应被理解为一个国家的预测。

资料来源：OECD/CAF/ECLAC 利用 OECD (2015), *OECD Economic Outlook*, http://dx.doi.org/10.1787/eco_outlook-v2015-1-en; IMF (2015), *World Economic Outlook Update*, 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5/01/weodata/index.aspx 计算得出。

统计链接：<http://dx.doi.org/10.1787/888933291393>。

拉美地区需要更高的、更稳定的投资

投资动力丧失是拉丁美洲经济体近期经济放缓的关键因素之一（见图 2-6）。2009 年金融危机之后，投资曾在拉美地区 2010 年取得增长中居功至伟，但是到 2014 年，它的贡献已经走向了负面。投资往往具有高度的顺周期性，投资者的预期在过去几年不断恶化，影响了拉美地区经济体的投资计划。这背后蕴含着两种不同类型的因素。第一组因素是全球背景的变化，导致了拉丁美洲的外部条件的恶化（例如，全球需求更加疲软、商品价格更低、财务状况更加严峻）。第二组因素来自各国国内，如一些国家的政策不确定性和改革法案（特别是税收）的通过（阿



根廷、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和委内瑞拉）可能会推迟投资计划。后者可能是短期的，前者则可能更为持久，会影响未来的投资前景，因为经济主体要应付不利的外部条件。公共投资的贡献还不够强大，无法弥补私营部门的紧缩，相反在某些情况下，它甚至加剧了紧缩。



图 2-6 拉美 GDP 增长和需求因素的贡献（年增长率）

注：拉美地区的简单平均包括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危地马拉、墨西哥、巴拉圭、多米尼加共和国、乌拉圭和委内瑞拉。

资料来源：OECD/CAF/ECLAC 根据拉美经委会汇编的官方数据计算。

统计链接：<http://dx.doi.org/10.1787/888933291400>。

因此，尽管该地区存在异质性，但是大多数经济体正在经历一个周期性的投资紧缩，见表 2-1 中 11 个南美洲和中美洲经济体所显示的情况。这种紧缩型投资周期有两个重要的特征。现有的经验证据表明，投资紧缩持续的时间往往比 GDP 收缩要漫长得多（平均要多 30% 以上）。更重要的是，它同时显示，投资收缩的幅度是 GDP 收缩的 4 倍（见图 2-7）。此外，这些投资周期在拉美地区往往要比在其他地区更为明显（Pérez Caldentey, Titelman and Caldentey, 2014）。1990~2014 年，拉丁美洲周期性投资紧缩的中位数比亚洲国家要大 30%，比欧洲新兴经济体和 OECD 国家要大 45% 左右。

表 2-1 选定的拉美经济体非居民投资的紧缩周期指数
(2011~2014 年, 季度数据)

单位: %

国家	投资紧缩阶段的 开始时期	投资紧缩阶段的 结束时期	紧缩持续期 (季度)	紧缩幅度 (变动百分比)
阿根廷	2011 年第 4 季度	2012 年第 2 季度	3.0	-12.5
	2014 年第 1 季度	进行中	4.0	-8.1
玻利维亚	2012 年第 1 季度	2012 年第 3 季度	3.0	-5.7
	2012 年第 1 季度	2012 年第 3 季度	3.0	-2.2
巴西	2013 年第 3 季度	进行中	6.0	-6.2
	2013 年第 1 季度	进行中	8.0	-6.2
智利	2013 年第 3 季度	进行中	6.0	-4.2
乌拉圭	2014 年第 2 季度	进行中	3.0	-5.5
委内瑞拉	2013 年第 1 季度	2014 年第 3 季度	7.0	-29.9
哥斯达黎加	2014 年第 2 季度	进行中	3.0	-3.9
多米尼加共和国	2012 年第 4 季度	2013 年第 2 季度	3.0	-9.2
危地马拉	2013 年第 4 季度	进行中	5.0	-7.7
尼加拉瓜	2013 年第 3 季度	2011 年第 4 季度	2.0	-15.4

注: 哥伦比亚和墨西哥尽管被提到, 但是 Harding-Pagan (Quarterly Bry-Boschan) 商业周期信息处理系统的数理分析结果并没有显示出这两国处于一个普通的周期中。

资料来源: 根据 ECLAC (2015a), *Economic Survey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2015 年计算得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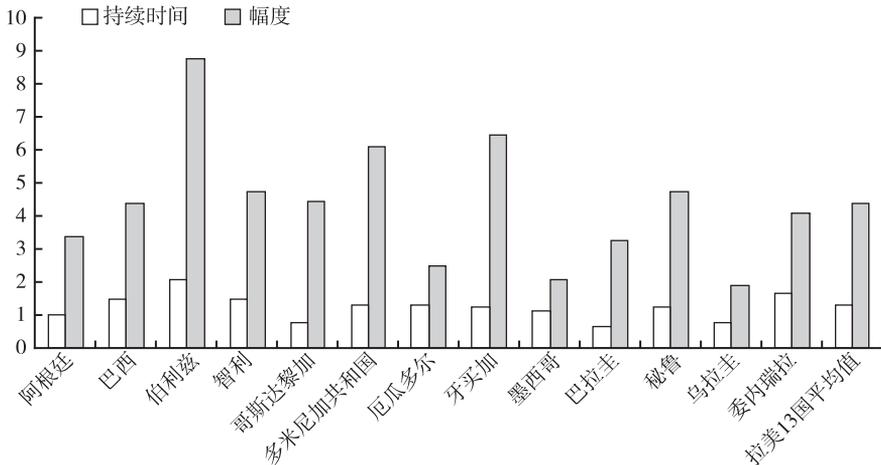


图 2-7 选定的拉美经济体投资紧缩周期的持续时间和幅度
(相对于 GDP 紧缩周期的比率)

注: 拉美 13 国就是上述所选的 13 个国家的简单平均。

资料来源: OECD/CAF/ECLAC 根据 ECLAC (2015a), *Economic Survey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2015 年计算得出。

统计链接: <http://dx.doi.org/10.1787/888933291418>。



这种波动性在短期内带来了许多政策上的挑战，并足以影响发展趋势。拉丁美洲的平均投资率仅占 GDP 的 20%，与那些资本密集型行业占主体的经济体的投资率接近，而比其他新兴经济体低得多。显然，这个平均值掩盖了该地区投资率高低不一的情况：像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这样的大型经济体的投资率较低，在地区平均中权重较大；而安第斯共同体和巴拿马在过去的五年中，投资率上升到接近 27%（见图 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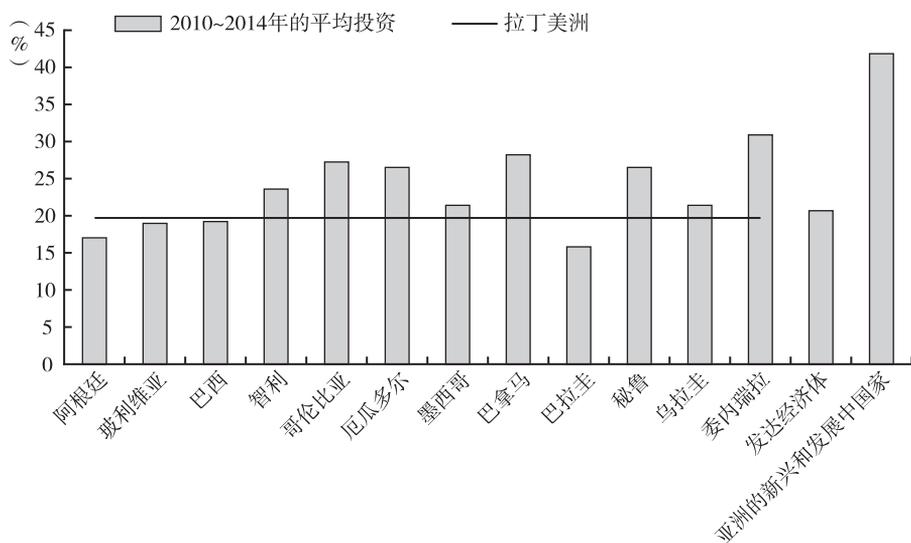


图 2-8 选定的拉美国家和世界的投资率（占 GDP 的百分比，取 2010~2014 年的百分比）

注：拉美国家指的是选定的 12 个国家的简单平均。

资料来源：OECD/CAF/ECLAC 根据拉丁美洲国家的国内数据来源和 IMF（April, 2015），*World Economic Outlook*, 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5/01 计算得出。

统计链接：<http://dx.doi.org/10.1787/888933291421>。

因此，生机勃勃的投资至关重要，应该是政策优先考虑的事项。它不仅可以使当前放缓的经济活动重新恢复，也可以促进长期的增长。当然，还需要公共投资和结构改革等顺应周期的行动来克服许多国家投资利率所出现的历史新低。

资本积累低且波动性大，生产力衰弱，阻碍了潜在产出的增长

提高生产率是保持长期增长和发展的关键。在拉丁美洲，生产率对增长的贡献率非常有限，这是造成拉美与亚洲之间增长差距的核心因素（IMF，2013；OECD/CAF/ECLAC，2013）。许多拉美国家（智利、乌拉圭和少数几个加勒比国家除外）仍然深陷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之中（OECD/CAF/ECLAC，2014；本报告第三章）。

图 2-9 显示在过去十年中拉美国家与亚洲新兴国家的增长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较低。相比之下，2003~2012 年，拉美国家与亚洲新兴国家在要素积累（考虑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贡献方面的差距趋于缩小，这些赶超因素在紧缩周期之前也许能扭转局面，但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放缓给宏观经济政策施加了额外的挑战（Ros，2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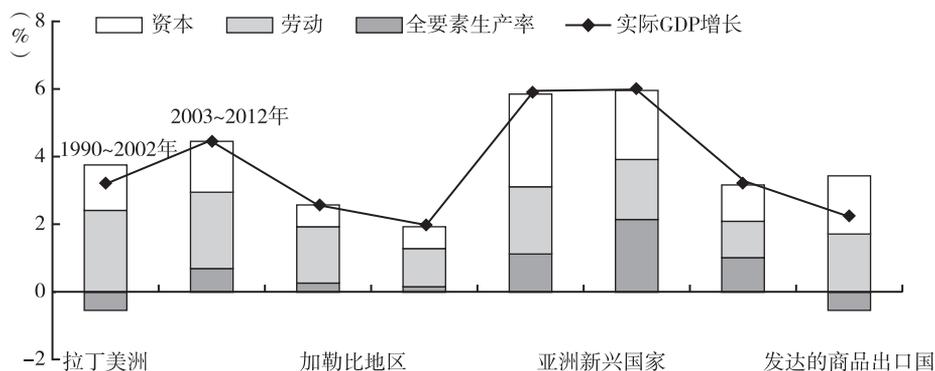


图 2-9 拉美国家和特定的经济体集群中各要素对实际 GDP 的贡献
(简单平均, 年均百分比)

注：TFP 全要素生产率。

资料来源：OECD/CAF/ECLAC calculations 根据 IMF (2013),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urveys*,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Western Hemisphere: Time to Rebuild Policy Space”, www.imf.org/external/pubs/ft/reo/2013/whd/eng/pdfwreo0513.pdf 计算得出。

统计链接：<http://dx.doi.org/10.1787/888933291438>。

与投资一样，生产率紧缩往往比 GDP 更尖锐，时间也更长。此外，生产率在扩张的时间和程度上都不及 GDP 的变化。这在表 2-2 拉丁美洲经济体的样本中有所反映。



表 2-2 1980 ~ 2012 年选定的拉美经济体中生产率相对于 GDP 的扩张与紧缩阶段（持续期和幅度的中位数，每年的数据）

国家	扩张		紧缩	
	持续期	幅度	持续期	幅度
阿根廷	0.7	0.5	1.0	0.9
玻利维亚	0.4	0.2	0.9	1.1
巴西	0.4	0.3	1.7	1.9
智利	0.5	0.3	1.3	1.0
哥斯达黎加	0.1	0.0	0.8	0.5
多米尼加共和国	0.4	0.3	1.5	1.6
厄瓜多尔	0.2	0.1	1.8	2.3
危地马拉	0.3	0.1	2.4	1.9
墨西哥	1.0	0.5	2.5	2.2
秘鲁	0.9	0.7	1.4	1.8
乌拉圭	0.5	0.5	0.9	1.0
委内瑞拉	0.7	0.5	1.4	1.6
拉美 12 国平均	0.5	0.3	1.5	1.5

注：对哥伦比亚的分析并没有显示出它处于任何周期之内。

资料来源：根据 ECLAC (2015a), *Economic Survey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2015 计算得出。

而且，促进该地区生产率所面临的挑战不止管理周期性波动那么简单。缺乏创新、采用落后技术使拉美国家无法扩大生产领域、减少内耗和缩小差距（基础设施缺口、物流不畅、技术落后、机构薄弱、法治不健全，以及其他方面），这阻碍了资源在行业内和行业间的有效分配。

有相当比重的人口在生产力低下的非正规部门工作正是这一挑战的明显反映。预计拉美地区有近 1.3 亿名工人，即工人总人数的 55% 左右受雇于非正规部门（Bosch, Melguizo and Pagés, 2013）。将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非正规部门转移到规模更大、效率更高的正规部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使在经济扩张期内，这种转移的可能性仍然很低，资源配置失衡的成本很高。在拉丁美洲的制造业中，资本和劳动从正规部门的生产力低的企业到生产力高的企业的重新配置，可能会提高 45% ~ 127% 的全要素生产率，每个

国家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 (Busso, Madrigal and Pagés, 2013)。换言之, 克服生产率低下需要结构性解决方案。考虑到拉美地区潜在的增长正在“泄气”, 即便是各国的增长态势存在差异 (见图 2-10), 提高生产率也已是当务之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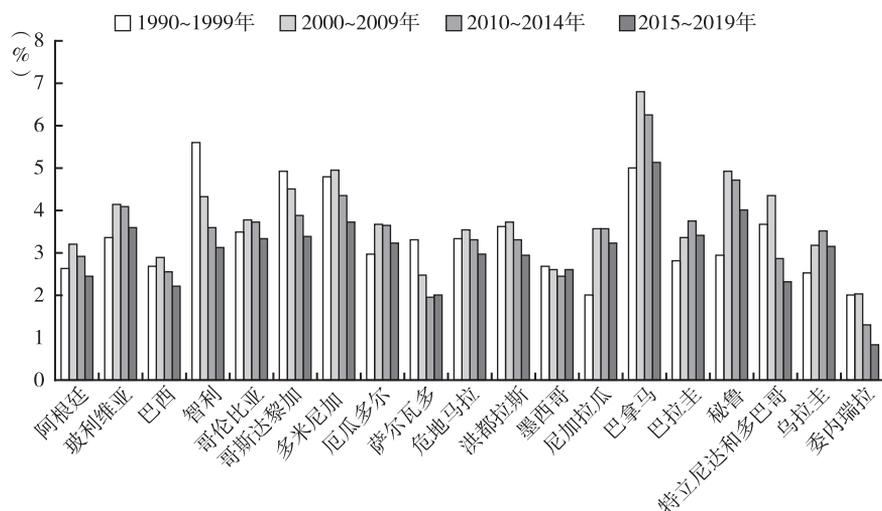


图 2-10 选定的拉美国家的产出增长趋势 (年增长率)

注: 产出趋势利用 HP filter, $\lambda = 400$ 得出。

资料来源: OECD/CAF/ECLAC calculations 根据 IMF (2015), *World Economic Outlook*, 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5/01/weodata/index.aspx 计算得出。

统计链接: <http://dx.doi.org/10.1787/888933291448>。

2010~2015年, 大多数国家的潜在增长率都有所上升 (除了墨西哥、智利和中美洲几个国家)。但在接下来的五年中, 它可能会放缓, 除了全球经济放缓和中国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之外, 还存在其他原因。上述因素可能会叠加在一起, 即全球金融状况不景气、与大宗商品相关的财政收入锐减、投资陷入低迷, 致使动资本积累的前景惨淡; 同时, 劳动力对增长的贡献也受到无法扩大正规劳动参与、无法进一步降低失业率和人口老龄化等诸多因素的限制。最后, 由于经济增长降速、要素使用强度降低, 生产率的增长放缓 (IMF, 2013; Powell, 2015)。



正如 2015 年出版的《拉丁美洲经济展望》（OECD/CAF/ECLAC，2014）总结的那样，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似乎正在滑向较低的 GDP 增长，少数国家正在经历着剧烈的调整，潜在的增长前景仍然不强，甚至，可能比目前估计的还要低。统计模型演示出的变化趋势非常缓慢，所以目前的放缓态势可能没有被完全捕获。这可能对需求政策有一定的影响，因为产出缺口实际上可能要比目前预测的要小得多，管理那些阻碍长期增长的结构性缺陷的政策的需求会大幅度上升。

提升潜在增长率的结构性改革至关重要，健全的需求政策也不可或缺

生产率的变化令人沮丧，主要原因之一是宏观经济管理跟不上生产转型。2011 年，拉美国家的大宗商品占货物总出口的 60%，比 2000 年的 40% 有所上升。在商品出口增加的同时，拉丁美洲本地生产的产品出现了进口替代，导致制造业的退化。正如亚洲新兴国家和 OECD 国家所证实的，生产性发展政策是经济现代化的一个关键驱动因素，必须通过资源更有效的配置政策来应对供给侧瓶颈。举例来说，中小企业（SMEs）的发展受到了高成本、融资难、服务差的限制，尤其是长期信贷方便。公共政策以提高融资资源可获得性为目标——包括增强发展银行为中小企业和创业公司服务的功能，可以产生显著的变革性影响（OECD/ECLAC，2012；本报告第五章）。支持新企业的机制对生产性增长同样至关重要，例如，创建一个传播现有信息的新门户网站，可以纾解当前信息不足之困，为潜在的企业家提供信用解决的方案。

为了支持结构性变革，加强区域一体化，需要改进基础设施和物流。在拉丁美洲，57% 的出口产品是对高效的物流绩效有严格要求的易耗品或产品，是 OECD 国家平均水平的 3 倍。高昂的运输成本显然限制了区域一体化，在拉美地区的全部贸易中，只有 27% 是区域内贸易，相比之下，这一比例在欧盟是 63%，在亚洲是 52%。更好的道路、铁路、港口和机场必不可少，解决方案包括制定综合性的物流政策，提供现代化的仓储设施和高效

的报关和认证程序；更好地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促进交通运输业的竞争。（见 OECD/CAF/ECLAC，2013 和本报告第五章中关于基础设施融资与中国的潜在作用的内容）。

技能和创新也非常重要。在拉丁美洲，存在严重经营困难的企业数量是南亚地区的 3 倍以上，是亚太地区公司的 13 倍以上，这主要归因于人力资本的短缺，汽车和机械行业尤为典型。职业教育和培训作为联系高等教育机构和私营部门之间的纽带，更加需要加强。建设人力和物质资本的努力，必须配套一个包含着生产力发展战略的重大创新（OECD/CAF/ECLAC，2014；本报告第五章）。

将重点转移到需求侧政策，表明在当前经济氛围下进行干预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在货币政策方面，从 2014 年到 2015 年，拉美国家普遍采用了逆周期办法，试图重振经济活动（除巴西外）。逆周期的货币政策立场在较低的通胀率下有一定的可行性，但最近的数据表明货币政策的范围正在缩小。换言之，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的政策已经陷入了产出缺口为负和通货膨胀接近（或高于）目标的两难困境中。价格波动在该地区的大多数国家得到了控制，以抑制通货膨胀为目标的体制有助于锁定预期。尽管如此，由于最近的货币贬值和供给冲击，一些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越来越逼近预定的目标，但在其他一些国家（巴西和乌拉圭）已经超出了目标（见图 2 - 11）。此外，金融系统美元化的国家在降息时可能会面临着美联储加息的额外约束。实现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的汇率有所削弱（见图 2 - 12），这不见得是一件糟糕的事情。它提高了竞争力，并帮助对外账户的重新平衡，但同时存在通货膨胀的短期成本。因此，目前对通货膨胀的抑制还算适中，但作为大多数国家锁定的目标，对其预期应加以密切监测。

一旦美联储开始加息，拉丁美洲央行将面临利率可能脱钩的挑战。美元化程度更高的经济体的中央银行正在采取“去美元化”（de-dollarise）信贷的行动，向平稳过渡到一个较弱的汇率而进行干预。汇率波动可能会影响金融市场，进而影响公司的投资决策。为了维护金融稳定，央行可能会进行干预，降低汇率波动。这种稳定金融的出发点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为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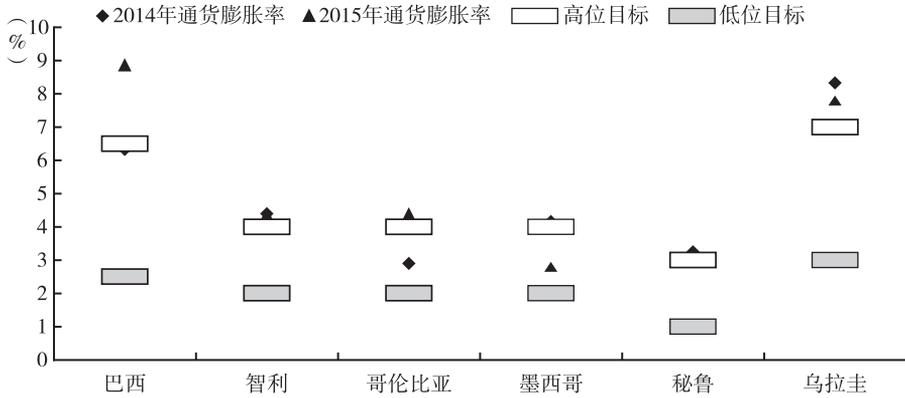


图 2-11 特定拉美经济体的通货膨胀率和目标 (2014 年和 2015 年, 每年的百分比)

注: 2015 年的数据来自 IMF。

资料来源: OECD/CAF/ECLAC 根据 IMF (2015), *World Economic Outlook*, 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5/02/ 和特定国家的中央银行有关数据计算。

统计链接: <http://dx.doi.org/10.1787/8889332914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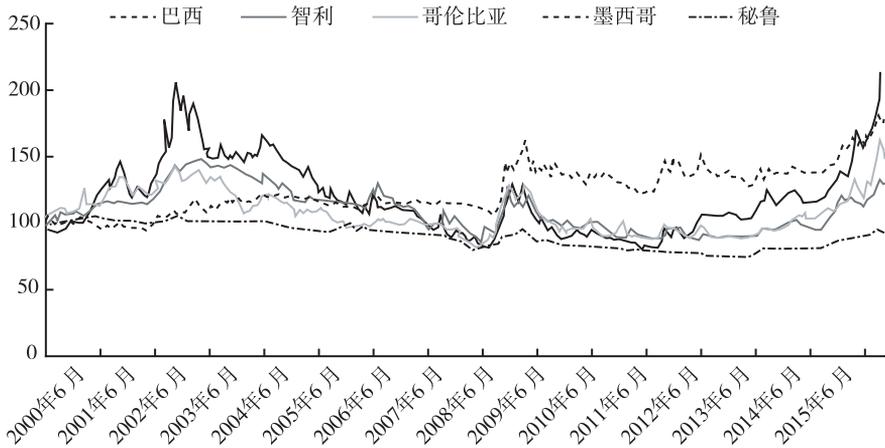


图 2-12 特定拉美经济体的货币对美元的汇率 (设定 2000 年 6 月的指数 = 100)

资料来源: OECD/CAF/ECLAC 根据 Datastream 有关数据计算。

统计链接: <http://dx.doi.org/10.1787/888933291460>。

经济活动而降息的范围 (见专栏 2.3)。采用盯住美元或者固定汇率的国家, 将货币作为应对对外账户再平衡挑战的名义锚; 其中一些国家采用了配额管

理或设置进口壁垒，以避免外汇资产枯竭（阿根廷、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这既是对经济活动征费，又会破坏竞争力。

专栏 2.3 财政稳定、汇率和货币政策：依然不可兼得？

自从 2013 年夏季“削减恐慌”以来，大多数以稳通胀为目标的拉美国家都允许货币急速贬值。任何干预措施都是为了减少波动性，平稳过渡到较弱的利率，而不是抑制自身的贬值，这使得中央银行的利率政策决策重点放在了周期性考虑方面。然而，负债美元化会影响中央银行货币贬值的容忍度。当公司、主权基金或银行业部门的大部分债务以外币计价时，货币的大幅贬值会引发货币错配，导致企业和银行的失败，中央银行也许并不愿意让货币自由浮动（Calvo and Reinhart, 2002; Caballero, Cowan and Kearns, 2005; Levy Yeyati, Sturzenegger and Reggio, 2006）。

过去 15 年，银行信用的美元化有所下降，但它在一些国家仍然比较高，足以引起重视，比如在秘鲁或乌拉圭。事实上，2013 年以后，秘鲁中央储备银行（Central Reserve Bank of Peru, BCRP）货币政策的重心是利用外汇储备要求来降低金融美元化和货币波动，具体措施包括对外汇储备中的本国货币（6.5%）和外币存款（70%）的差异化要求，及提供外币贷款时附带的供给流动性和资本要求。从 2012 年 12 月到 2015 年 5 月，秘鲁银行信贷的美元化从 43% 降低到 35%。

去美元化也并不是没有风险的。履行流动性规定，减少外汇信贷，会将成本转嫁给银行，也会组织非投机对冲，这可能妨碍政府进一步以本国货币发行公共债务时无法实现对冲。

由于经济增长低迷，与大宗商品相关的收入下降，大多数拉美国家的财政收支状况都在恶化。公共债务较低的国家（因此更容易获得融资）实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例如智利、秘鲁）以应对经济下行，而在那些公共债务水平更高或面临融资难的国家里，脆弱的公共账户已经提示未来必须削减公共预算（巴西、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萨尔瓦多）。遏制支出也



应该考虑到保护投资的需要，避免恶性循环，即因过度调整财政而扼杀了增长和税收，最终扩大了赤字，增加了公共债务负担。对于拉美国家整体而言，尽管财政结构比以前更稳健了，但是现在的财政平衡比金融危机前要弱多了，在经济放缓的条件下，反弹的迹象要等待很久，或者甚至滑落谷底（见图 2-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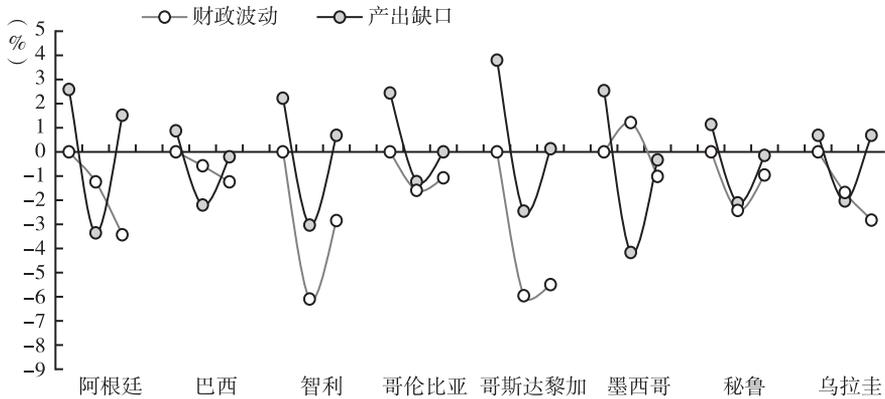


图 2-13 特定拉美经济体的财政波动和产出缺口（2007 年、2009 年和 2013 年；百分比和占 GDP 的百分比）

注：2007 年的基本财政平衡的周期性调整设为 0，The cyclically adjusted primary fiscal balance was set to 0 in 2007。

资料来源：OECD/CAF/ECLAC Alberola et al. (2015)，“Fiscal policy and the cycle in Latin America；The role of financial conditions and fiscal rules”，Banco de España 计算。

统计链接：<http://dx.doi.org/10.1787/888933291472>。

这种低增长、财政平衡恶化的状况使拉丁美洲的绝大部分经济体在 2014~2015 年公共债务占 GDP 的比重出现轻微的上升。2000 年以后，拉美国家都致力于减少债务。巴拿马、秘鲁和厄瓜多尔已将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降低了 20 多个百分点。然而，这种积极的偿债方式可能存在一定的风险。2010 年的一段时间里，拉美在后危机时代取得最高速增长的同时，大多数国家的债务水平开始上升。债务结构在过去的 14 年中也发生了重大变化。2000 年，总债务的 72% 是外债，而到了 2014 年，外债比例下降到 54% 左右，拉美国家在货币贬值面前不再那么脆弱了。拉丁美洲各经济体的

债务水平差异很大，巴西的债务占 GDP 的 62%，秘鲁或巴拉圭则不到 GDP 的 20%（见图 2-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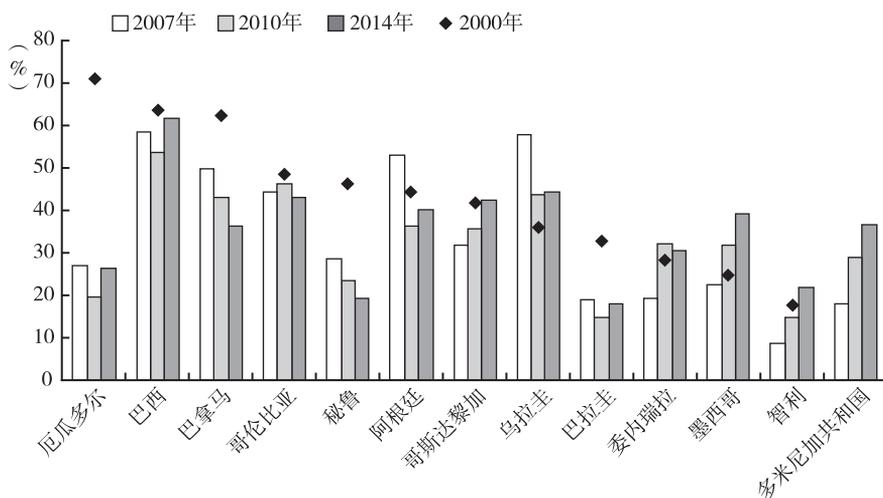


图 2-14 特定的拉美经济体的公共债务（占 GDP 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OECD/CAF/ECLAC 根据 ECLAC (2015b), *Fiscal Panorama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2015: Policy Space and Dilemmas* 计算。

统计链接：<http://dx.doi.org/10.1787/888933291487>。

除了支出和收入的水平之外，政府必须改善公共支出效率，寻求设计更好的社会政策，这样才可以提供用以提高生产力、保证公平的公共产品。例如，政府的低效能也许会阻碍逆周期政策的有效性。一个清楚的例子就发生在秘鲁，地方政府推进投资计划不力，反而拉长了这个周期，抵消了中央政府扩大公共投资的努力。同样，在哥伦比亚，地方政府也面临着土地使用费支出的困难，限制了中央政府逆周期行动的效果。在财政收入降低和融资成本升高的背景下，公私合作的伙伴关系可以在应对该地区缩小基础设施缺口的挑战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专栏 2.4 拉美的财政规则、稳定和投资：时代在改变？

在过去的 20 年中，拉美地区的货币和财政框架日趋合理，以此为基础



的宏观经济管理有了很大的改善。其中，财政规则作为一个典型案例，自21世纪初以来就广为传播。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拉美地区的九个国家正在实施一套财政规则（尽管类型各有不同），这些国家是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牙买加、墨西哥、巴拿马和秘鲁。这套规则通常遵循三个主要目标，即确保债务可持续性、加强稳定、改善支出构成（投资）。本专栏集中谈后面两个。

拉美传统的财政政策一直是顺周期的。与其他新兴地区一样，拉美国家往往也是在经济条件好时大手大脚，在经济下滑时捉襟见肘，这些政策会加剧经济周期。拉丁美洲依赖外部融资，在外部资源突然中断时又反复无常，导致这种行为在拉美地区很容易发生。尽管如此，自2009年次金融危机以来，事情可能发生了一些改变。财政限制的关联性减弱了，因而财政政策不再那么顺应周期了，财政规则下的经济表现出更多的反周期行为（Alberola et al., 2015）。如图2-15所示，财政规则下的国家（以波浪线来显示）不如那些没有这些规则的国家（虚线）顺应周期。前者甚至展现出一些逆周期的财政政策的细节，这通常是发达经济体的保留特色。然而，即使在更稳健的财政框架下，它们的财政状况都比金融危机之前要弱，在经济低迷可能持续很长时间或者进一步加深的背景下，对出现反弹的怀疑会继续上升。为应对这场危机，一些拉美国家批准了财政刺激计划，但有关支出的一揽子计划，特别是当前的支出计划，在经济恢复中无法被灵活实施（Celasun et al., 2015; Powell, 2015）。换言之，几乎所有经济体都无法从经济刺激和政策中选择退出策略，这一地区离危机前财政空间的水平还相距甚远。

财政规则的目的在于改善支出结构。一个有偏差的预算必然会造成动荡和公共投资下降，特别是对于大多数新兴地区的基础设施。拉丁美洲也不例外，其投资率（包括公共和私人）远低于新兴亚洲国家，需要缩小与更为发达地区的差距。从这个角度看，退出策略不仅要重构财政空间，而且要发展更加有利于发展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结构（见Carranza, Daude and Melguizo, 2014对拉丁美洲的分析；the Economic Survey of ECLAC, 2015a）。

在秘鲁有一个好的做法就是将非金融部门的赤字上限和目前的支出增长率的上限相结合，从而使公共投资出现显著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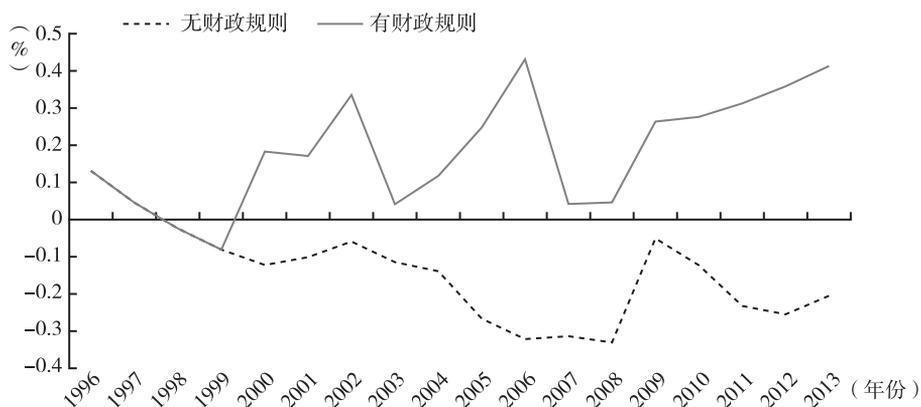


图 2-15 拉丁美洲选定国家的财政态势 (财政波动, 7 年期的逐步回归)

注：拉丁美洲选定国家指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墨西哥、秘鲁和乌拉圭，这几个国家 1990~2013 年的数据可以获得。财政波动是指结构性基本财政平衡对于经济周期的变动。财政态势受到财政条件的控制，在有财政规则（有 FC + FR）和无财政规则（有 FC，无 FR）的国家之间情况有所不同。

资料来源：Alberola, E. et al. (2015), “Fiscal policy and the cycle in Latin America: The role of financial conditions and fiscal rules”, *Banco de España*。

统计链接：<http://dx.doi.org/10.1787/888933291498>。

在对外方面，由于贸易状况不佳大多数国家的经常账户赤字，在 2014 年继续恶化。虽然中美洲国家可以从较低的能源价格中受益，像尼加拉瓜和巴拿马仍然保持该地区最大的经常账户赤字（分别占 GDP 的 8% 和 10%），但是南美洲的商品出口国遭遇了最大的挫折，在巴西、哥伦比亚和秘鲁等国经常账户赤字仅占 GDP 的 5% 左右。像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这样的净能源出口国，随着油价暴跌，也经历了重要的贸易损失。相反，在智利则开始看到一些改进（见图 2-16）。

绝大多数国家的经常账户余额依然主要来自外国直接投资，但是有少数国家，特别是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其经常账户余额来自银行业流动。随着大宗商品周期结束，外国直接投资向初级部门的流动也正在放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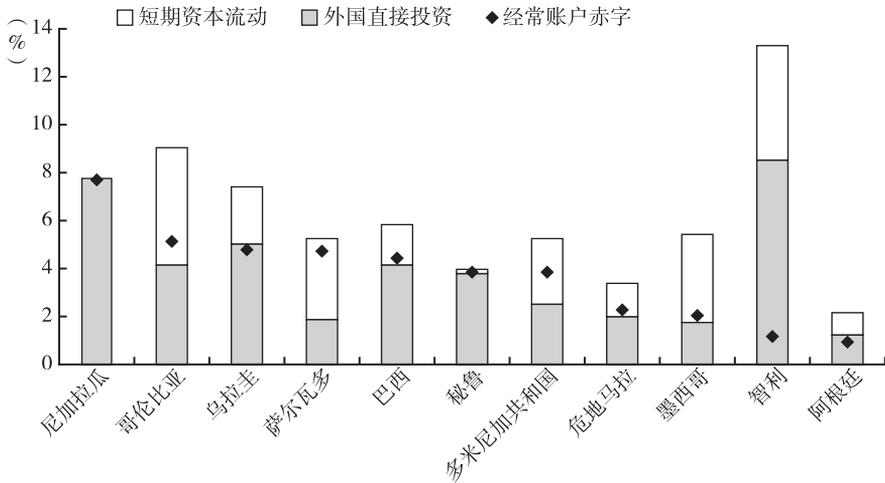


图 2-16 拉丁美洲选定国家的经常账户赤字和资本流动（占 GDP 的百分比，2014 年）

资料来源：OECD/CAF/ECLAC 利用 IMF Balance of Payments statistics 和各国的数据进行计算。
统计链接：<http://dx.doi.org/10.1787/888933291506>。

这种趋势在哥伦比亚、秘鲁和巴西十分明显。在大多数国家，可用的外汇储备应该用于缓冲和防止外部环境的进一步恶化。

未来两到三年内，货币贬值被寄希望于能够帮助支出结构转换，改善经常账户平衡，尽管拉美地区已经不可能像过去十年那样获得巨额的贸易顺差。由于外部融资成本预计将上升，遏制赤字变得非常重要。制度弹性较弱的国家正通过控制外部资产来捍卫它们的货币。在贸易条件持续变化的背景下，这种战略可能更加难以维持，未来需要对货币政策做出某种调整。

私营部门的债务是需要监测的另一个要素。拉丁美洲的私人债务保持着相对较低的水平（见图 2-17）。不过，最近几年，这一水平显然有所上升。一些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可能会因为本国货币贬值而易面临风险。即便是该地区的企业所面临的货币风险覆盖的程度还不明朗（Powell, 2014），但是一些国家货币大幅度贬值之后相关的货币问题并没有上升。因此，拥有美元化债务的公司可能会有一种天然的处理办法（作为出口商）或其他形式的方法（外汇衍生工具或美元资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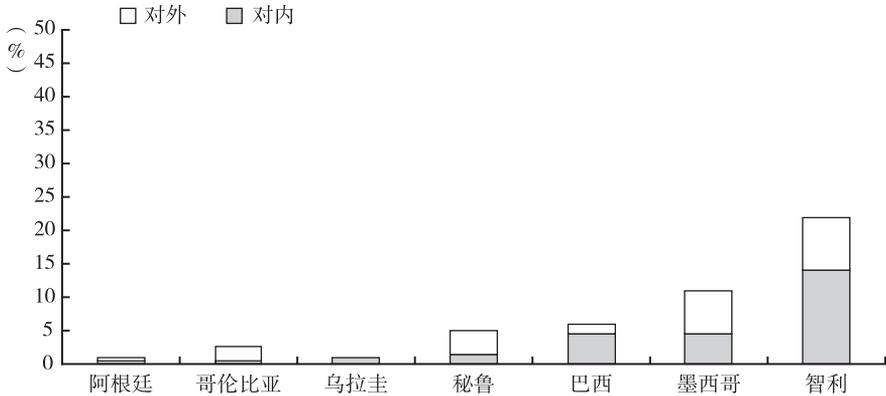


图 2-17 特定拉美国家的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债务证券化
(占 GDP 的百分比, 2013 年)

资料来源: OECD/CAF/ECLAC 根据官方数据计算。

统计链接: <http://dx.doi.org/10.1787/888933291510>。

中国需求对拉美的冲击效应: 无中生有吗?

自 2000 年以来, 中国和拉丁美洲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这个趋势将在未来以新的方式继续下去。正因为如此, 本节将探讨中国的产出带动拉丁美洲产出的波动程度。

中国的增长通过贸易直接影响到拉美国家, 而通过包括商品价格在内的几个变量来产生间接影响。这几个变量从下文所讨论的模型中进行抓取, 这个模型是一个跨地区的全球向量自回归 (global vector autoregressive model), 用以评估拉美国家和本地区外的贸易伙伴 (如欧洲、美国和中国) 之间宏观经济变量的相互关系。关于该模型技术方面的描述见专栏 2.5。

专栏 2.5 拉丁美洲的全球向量自回归模型

全球向量自回归模型对选定的几个拉美国家的主要宏观经济变量进行预测, 并评估全球冲击的影响。在考虑了跨国之间贸易模式的基础上, 本模型



集成考察了国内变量和与之相关联的国际变量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本模型在沿用 Pesaranand Smith（Pesaranand Smith，2006）的研究方法及后来的一些模式（如 Smith and Galesi，2014）的基础上，做了一些额外的改进。

首先，为了控制制度变迁对数据生成过程的可能改变，本模型对数据进行了调整。该方法给最近的制度赋予了更高的权衡，从而能产生比过去更好的预测效果。以这种方式使用历史数据，能够对趋势进行更为合理的预测，这对于拉丁美洲来说至关重要。例如，过去的通货膨胀频发时期可能会对名义变量的趋势和波动带来较深的偏见，显然不适合当前以通货膨胀率低且较稳定为特征的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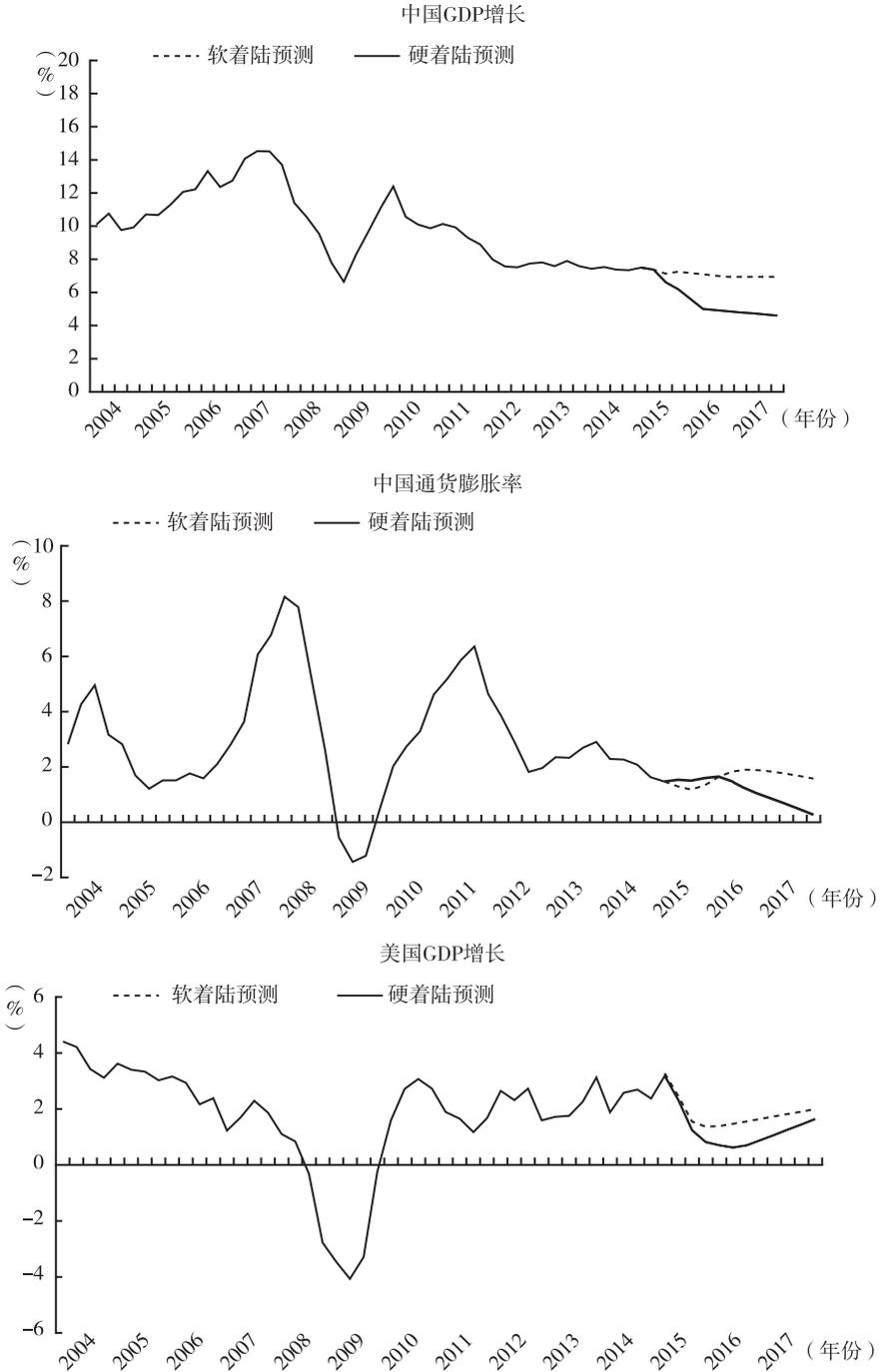
其次，本模型采用了不带误差修正项的一阶回归，这样就允许数据回归到平均值，在一定水平上重建变量的概率。

本模型利用美联储 1979 第 1 季度到 2014 年第 4 季度之间的季度数据，所含变量包括：GDP 增长、通货膨胀、汇率、利率（长期和短期）和商品（能源、原材料和金属）价格。研究对象包括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秘鲁、乌拉圭、委内瑞拉（根据数据的可用性）、美国、欧盟和中国。数据是从哈佛分析、彭博社和各国的统计源获得的。

本节对基准情景下中国的软着陆和硬着陆分别对拉丁美洲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比较分析。在软着陆情形下，中国的增长率在 2016 ~ 2018 年将逐渐下降到 6.7% 左右（Chen and He，2015），而在硬着陆的情形下，中国的增长在 2015 年会下降到 5.5%，2018 年更是会跌落到 4.3%。在设定了中国数据的增长路径的条件后，本模型进行了仿真和比较。结果分别见图 2 - 18 ~ 图 2 - 22。

根据本模型，中国产出的变化确实会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产生重要且持续的影响。在全球效应方面，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会影响发达经济体。在欧洲的影响程度会超过美国，因为美国是一个更加封闭的经济体。在经济增长缓慢和通货膨胀的背景下，发达经济体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向上调整利率，商品价格将会以更快的速度下降。

第二章 拉丁美洲的宏观经济前景





拉丁美洲经济展望（2016）：发展与中国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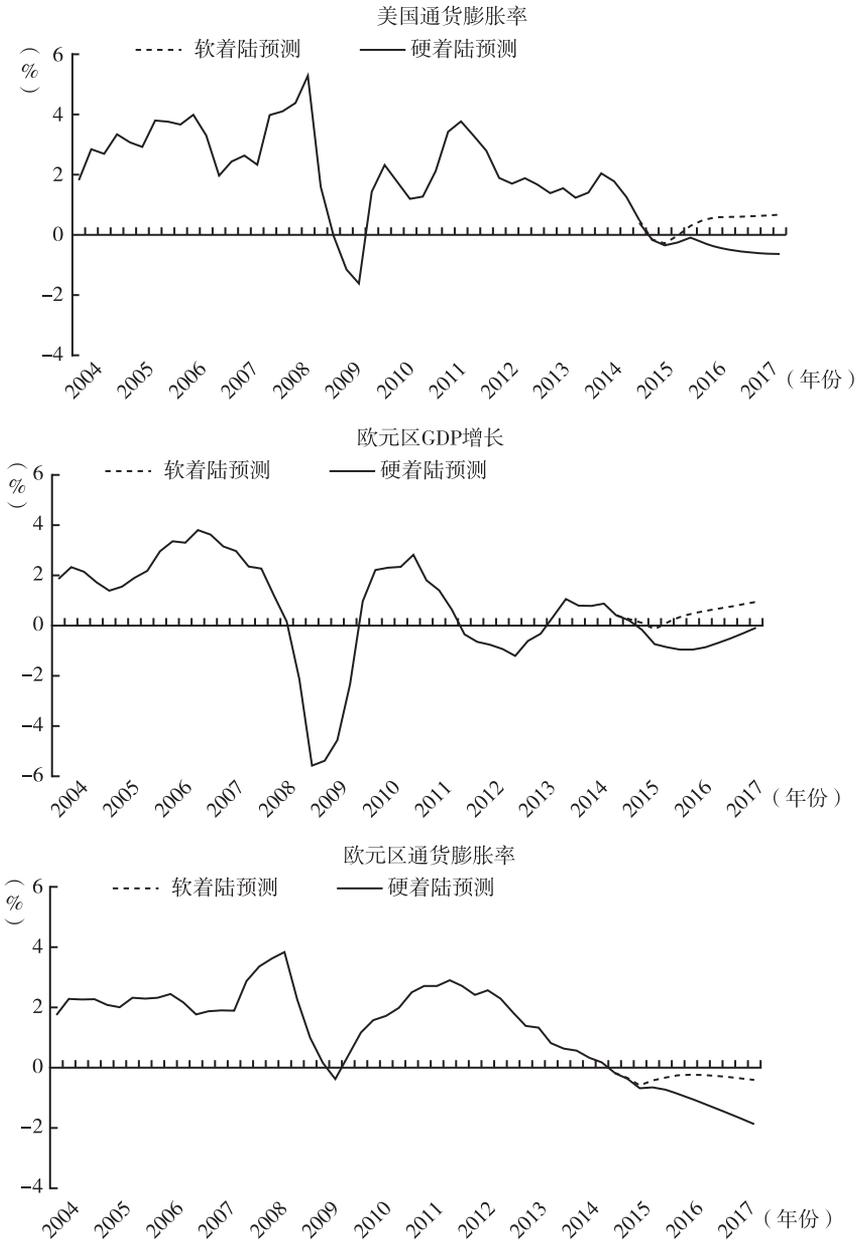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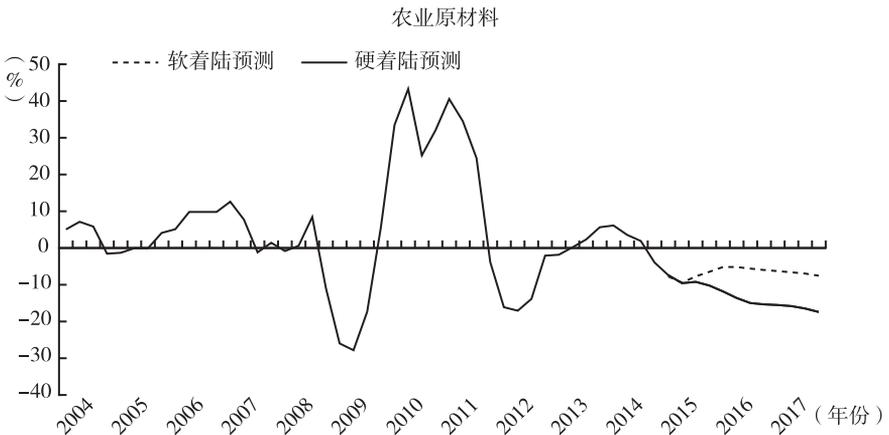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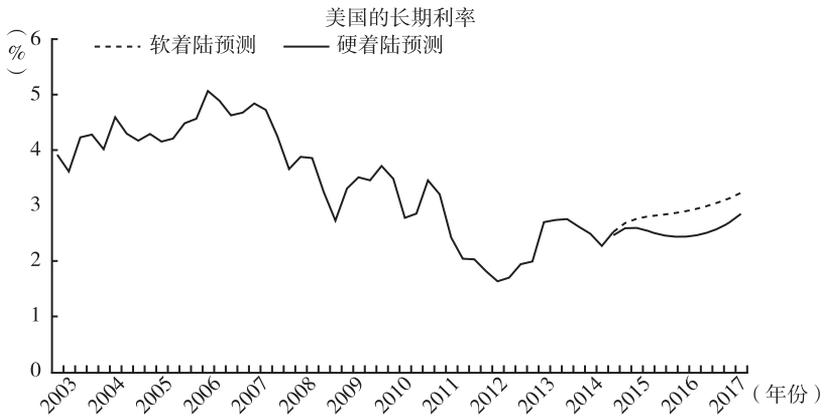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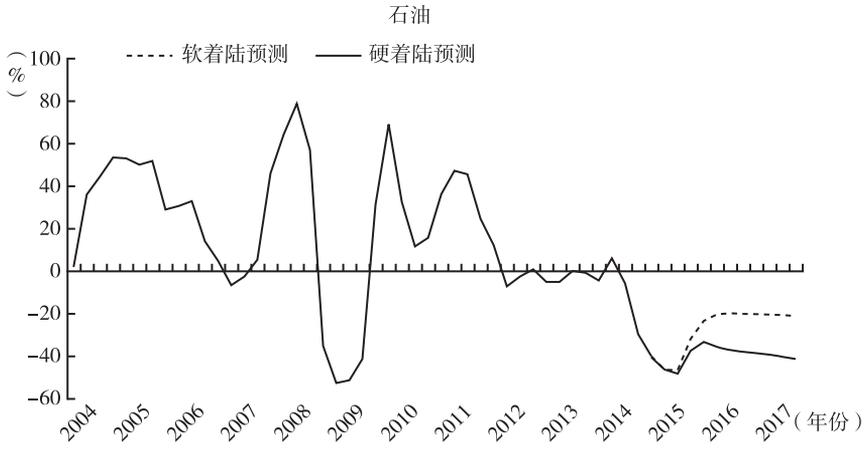


图 2-18 GDP 增长和通货膨胀率：中国的硬着陆和软着陆的比较

资料来源：OECD/CAF/ECLAC 计算。

统计链接：<http://dx.doi.org/10.1787/888933291524>。

第二章 拉丁美洲的宏观经济前景





拉丁美洲经济展望（2016）：发展与中国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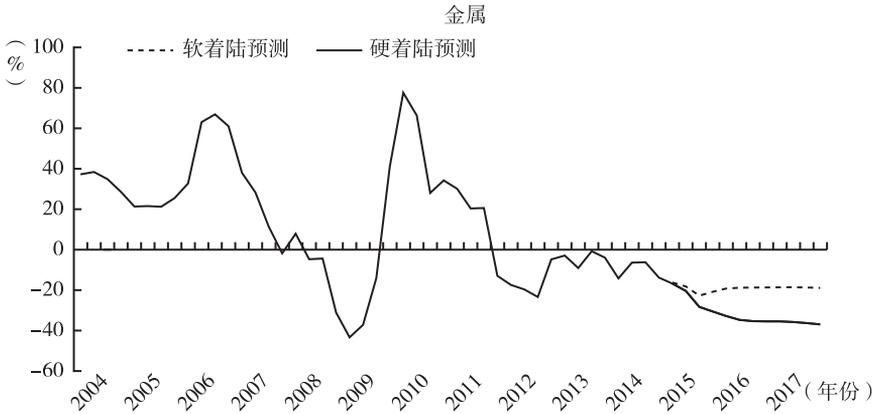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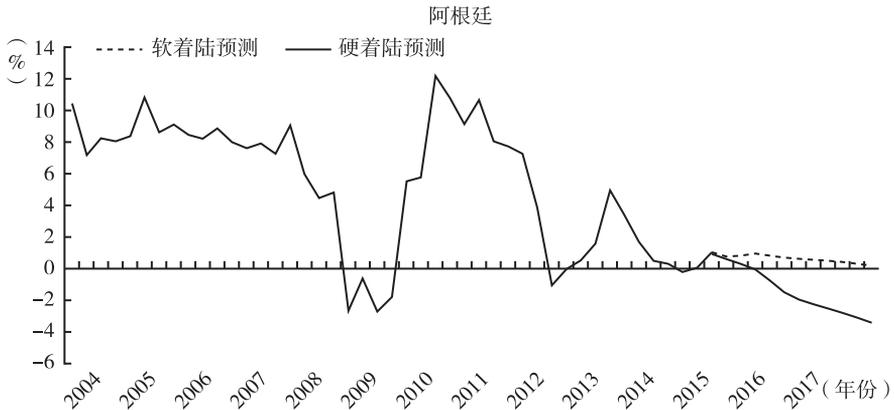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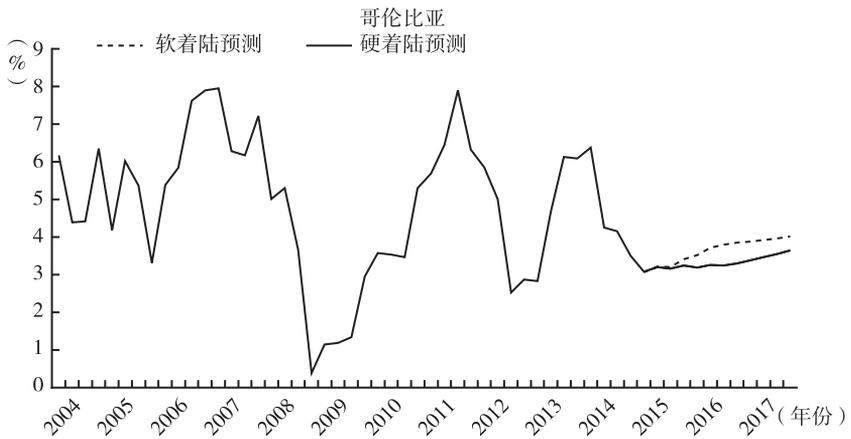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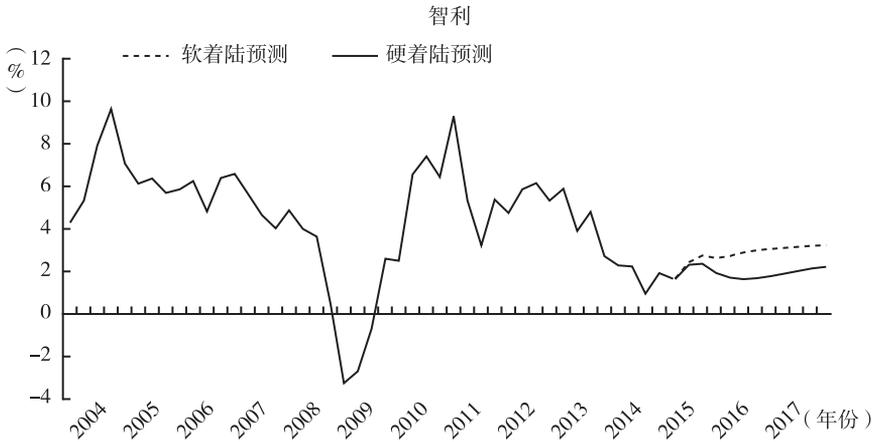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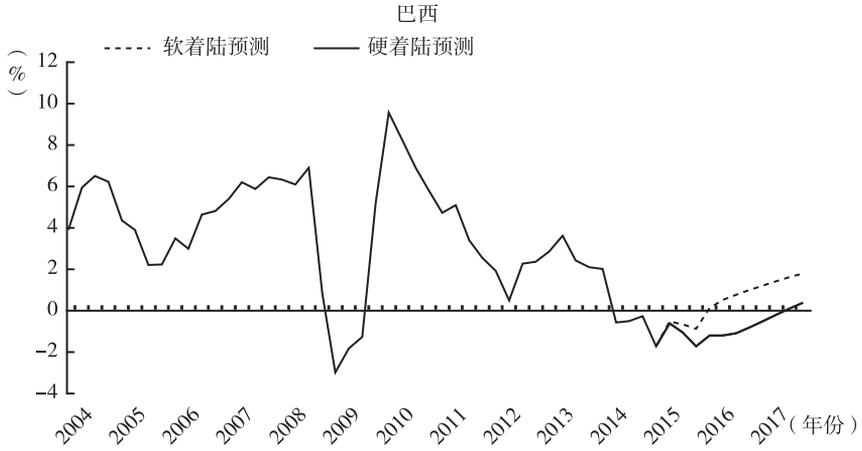
图 2-19 商品价格和利率：中国的硬着陆和软着陆的比较

资料来源：OECD/CAF/ECLAC 计算。

统计链接：<http://dx.doi.org/10.1787/8889332915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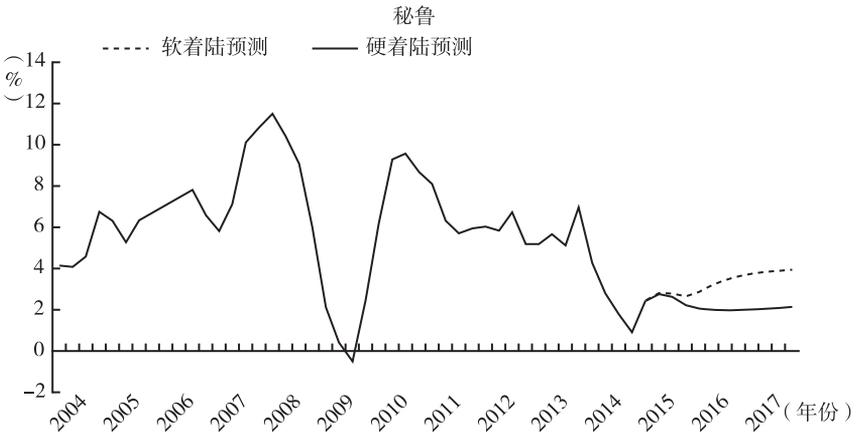


第二章 拉丁美洲的宏观经济前景





拉丁美洲经济展望（2016）：发展与中国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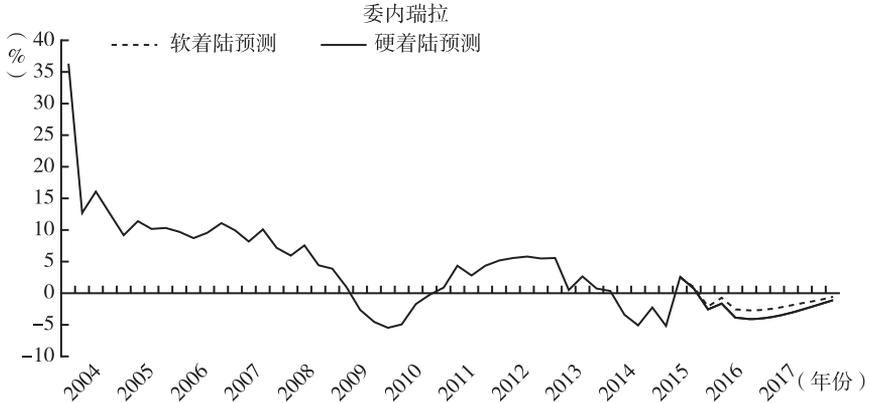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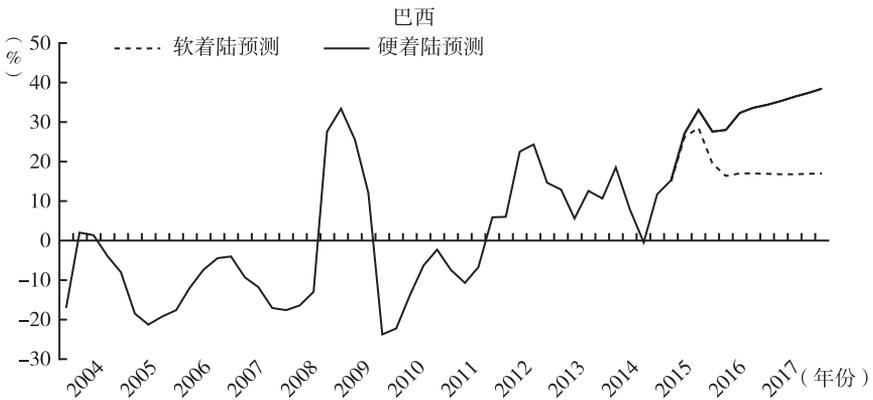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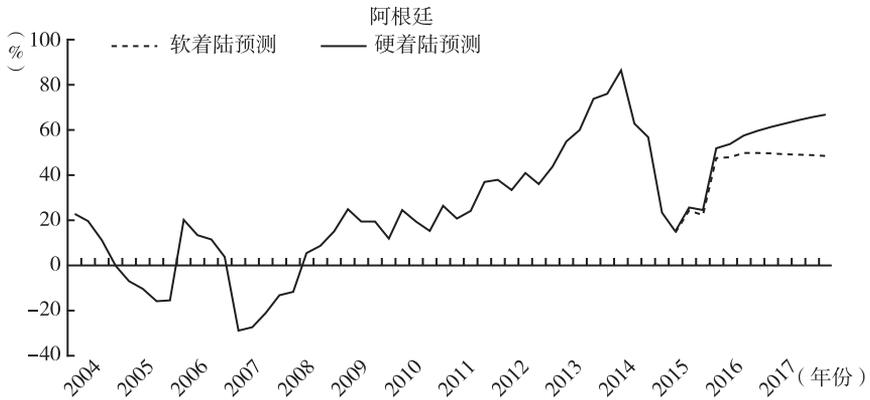


图 2-20 特定拉美国家的 GDP 增长：中国的硬着陆和软着陆的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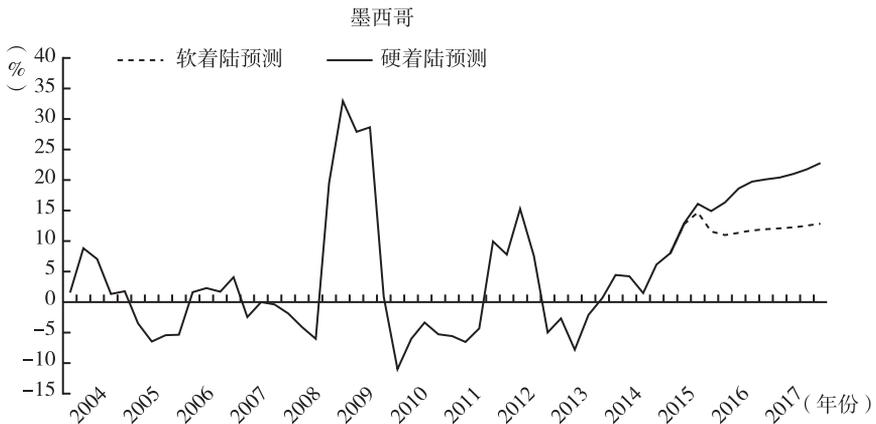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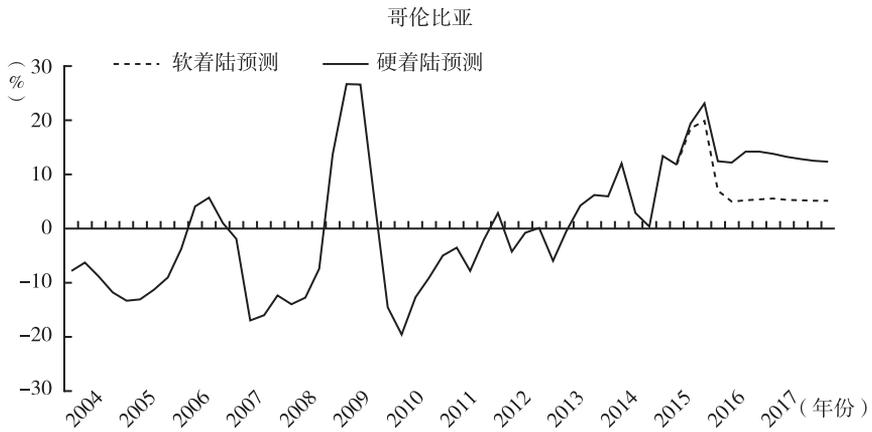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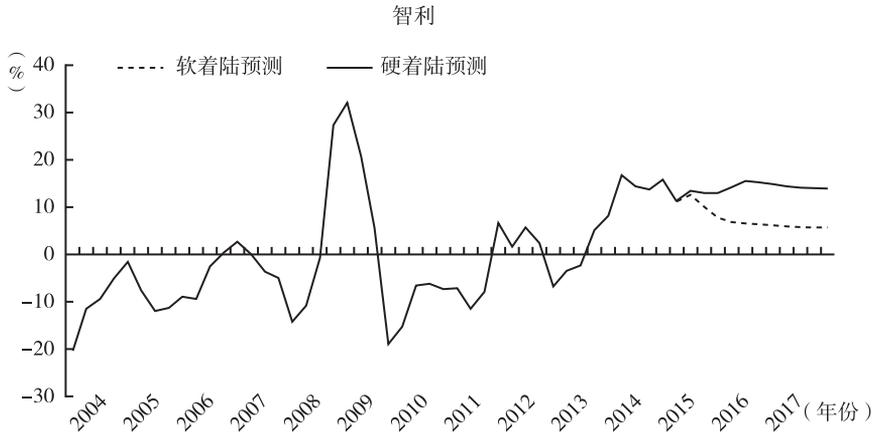
资料来源：OECD/CAF/ECLAC 计算。

统计链接：<http://dx.doi.org/10.1787/888933291540>。





拉丁美洲经济展望（2016）：发展与中国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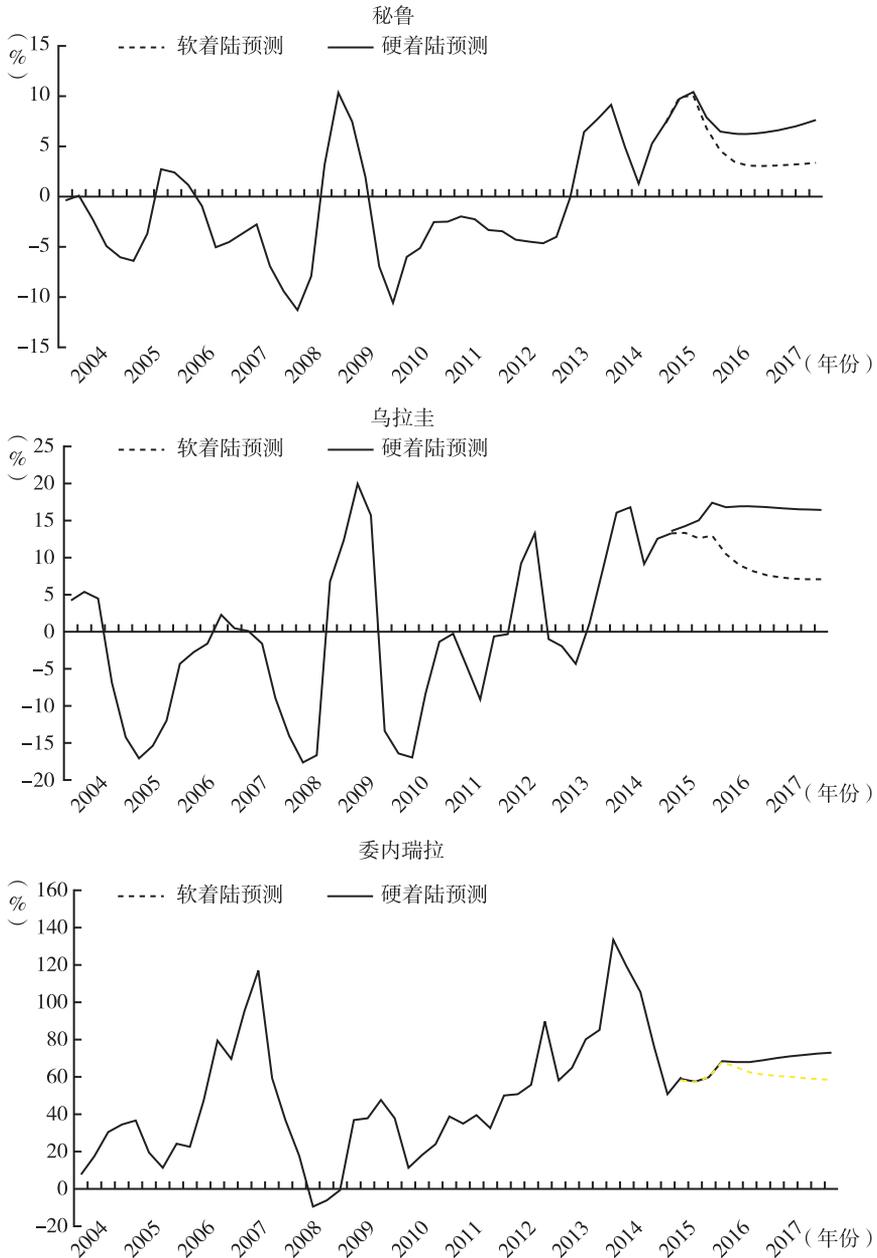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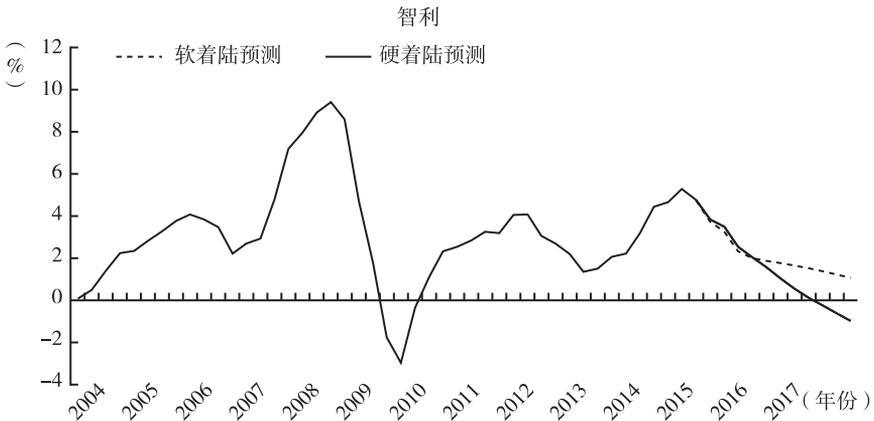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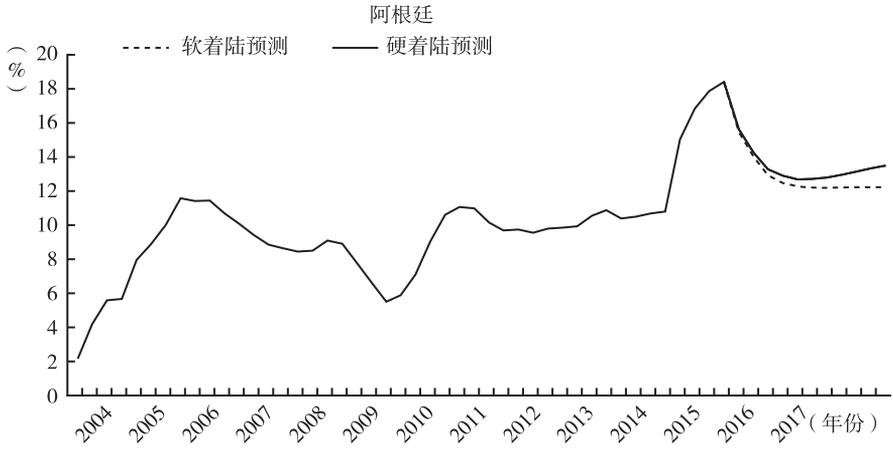
图 2-21 特定拉美国家的汇率：中国的硬着陆和软着陆的比较

资料来源：OECD/CAF/ECLAC 计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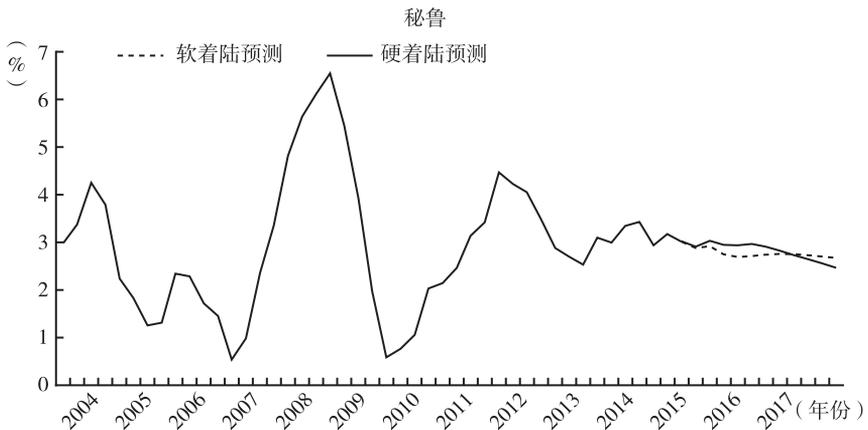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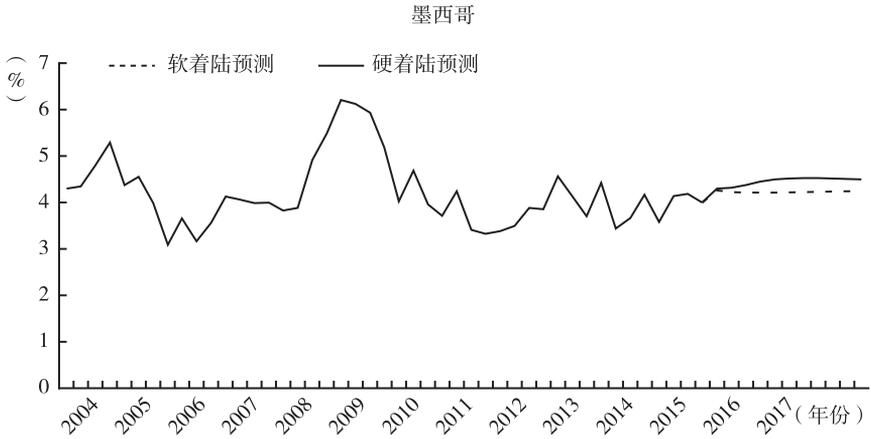
统计链接：<http://dx.doi.org/10.1787/888933291556>。



拉丁美洲经济展望（2016）：发展与中国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



第二章 拉丁美洲的宏观经济前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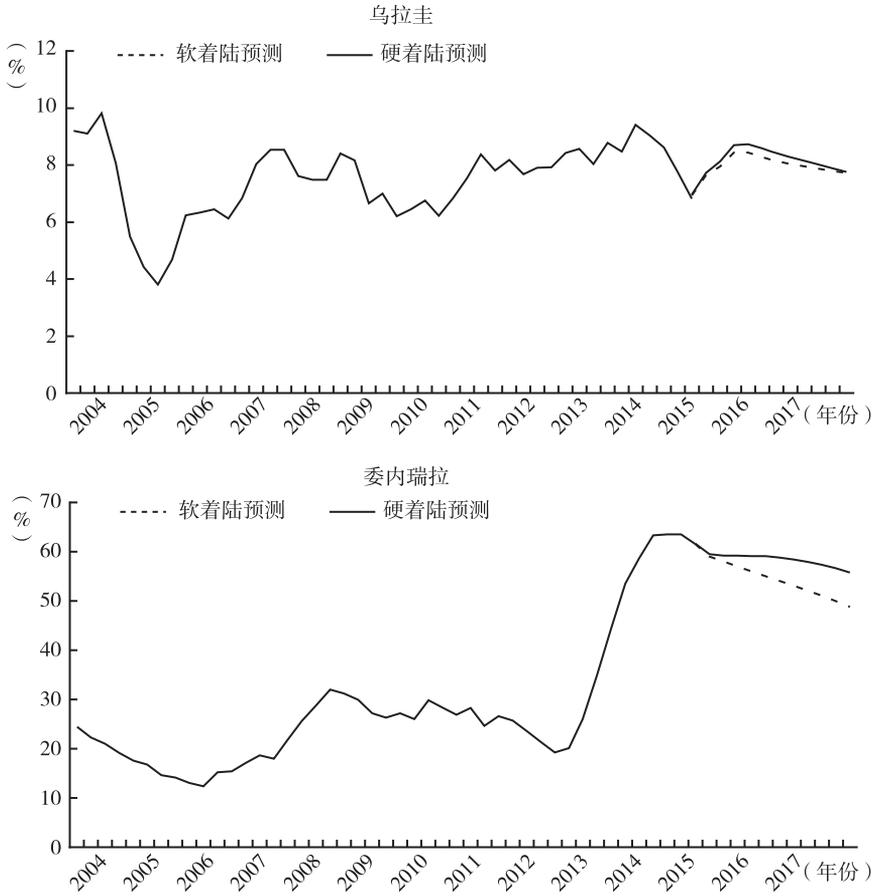


图 2-22 特定拉美国家的通货膨胀：中国的硬着陆和软着陆的比较

资料来源：OECD/CAF/ECLAC 计算。

统计链接：<http://dx.doi.org/10.1787/888933291567>。

这种情景对拉丁美洲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预示着它比发达经济体需要更大的时间来恢复经济，困难也更多。在一些案例中，实证检验表明，拉美的经济增长会停滞，特别是在巴西、阿根廷和委内瑞拉。即使是墨西哥，在这种情况下似乎也好不到哪儿去。当然，这其中还没有考虑政府可能采取刺激增长的政策，而这正是本版的《拉丁美洲经济展望》关注的重点问题。

因此，在“没有政策变化”的情形下，所有的国家的货币都可能会出

现更大程度的贬值，而其中一些国家会比其他国家更加受益。最后，通货膨胀似乎并没有受到明显的影响，这是由于产出的降低抵消了贬值的影响。

短期和超越的行动

在不久的将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可能持续平庸的经济增长。尽管绝对不会在前几年外部冲击的余波中滑向崩溃，但面对国内外的不利因素，要取得进展异常困难（特别是因为大宗商品需求疲软和中国经济的放缓）。因此，政府的重点是必须确保它们的经济能够应对日益恶劣的条件。

短期内，拉美政府必须通过扩展财政空间，运用逆周期的货币政策的管理战略来提高中央银行的信誉，从而重建财政保护盾。如前几版的《拉丁美洲经济展望》所强调的那样，扩大财政空间所需的措施将取决于每个国家的初始条件。在一些国家，包括一些中美洲国家、安第斯国家和墨西哥，当局应该将他们努力的重点放在加强税收负担上（OECD/ECLAC/CIAT/IDB, 2015）。收入结构更为巩固的南美国家的重点应放在抑制当前公共支出的增加、加强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发展自动“稳定器”项目上。与此同时，加勒比地区国家在扩大它们的财政空间时必须处理好公共债务可持续性的经常性问题。拉美国家在积极运用宏观审慎的政策框架和“稳定器”时，需要进行有效沟通。

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干预，低增长所带来的主要挑战将会长期持续下去。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拉美地区潜在的增长率不到3%，低于预期水平，更无法跟2005年前后5%的斐然成绩相比。因此，拉美地区是时候展开一系列雄心勃勃、大胆的改革了，其关键应放在提高生产力和创新、产品多元化、缩小基础设施的差距的政策、人力资本投资，以及创造正规正式创造就业等方面。

近年来，与OECD国家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相比，拉丁美洲国家的生产率一直令人大失所望。提高增长率可以带来更具包容性的增长，减少不平等和贫困。扶贫非常重要，拉丁美洲人口的28%（1.64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ECLAC, 2015a）。要实现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这两大目标的政策往往不



能相容。每一个政府制定改革方案时，其政策应考虑的因素都应包括拉丁美洲的异质性、国内和区域内的贸易联系的地理优势、全球多边贸易关系中的强大而稳定的发展伙伴以及像中国所具备的那种强大购买力等。一个充当积极“规则改变者”的国家将重塑拉丁美洲的外部 and 内部环境。在经历了所谓“财富转移”（OECD, 2010）第一阶段贸易关系的异常活跃之后，中拉关系需要重新进行界定。拉丁美洲的福祉，尤其是在长时期内，将取决于各国政府是否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一机遇，有效地应对所面临的挑战。

参考文献

- Alberola, E. , I. Kataryniuk, A. Melguizo and R. Orozco (2015), “Fiscal policy and the cycle in Latin America: The role of financial conditions and fiscal rules”, *Banco de España Working Paper Series*, forthcoming.
- Bosch, M. , A. Melguizo and C. Pagés (2013), *Better Pensions, Better Jobs: Towards Universal Coverage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Washington, DC., <https://publications.iadb.org/handle/11319/462?locale-attribute=en>.
- Busso, M. , L. Madrigal and C. Pagés (2013), “Productivity and resource misallocation in Latin America,” *The B E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13 (1), pp. 903 – 932.
- Caballero, R. , K. Cowan and J. Kearns (2005), “Fear of sudden stops: Lessons from Australia and Chile”, *Journal of Policy Reform*, 8 (4), pp. 313 – 354.
- Calvo, G. A. and C. M. Reinhart (2002), “Fear of floating”,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7 (2), pp. 379 – 408.
- Carranza, L. , C. Daude and A. Melguizo (2014), “Public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fiscal sustainability in Latin America: Incompatible goals?”,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 41 (1), pp. 29 – 50.
- Celasun, O. , F. Grigoli, K. Honjo, J. Kapsoli, A. Klemm, B. Lissovolik, J. Luksin, M. Moreno-Abadia, J. Pereira, M. Poplawski-Ribeiro, B. Shang and Y. Ustyugova (2015), “Fiscal policy in Latin America: Lessons and legacies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SDN/15/06*,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Chen, C. and J. He (2015), “Improve the quality of growth in the context of new normal”, in S. Liu (ed.), *Outlook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2015 – 2024): Climbing up to the Efficiency Highland*, CITIC Press, Beijing.

ECLAC (2015a), *Economic Survey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Challenges in Boosting the Investment Cycle to Reinvigorate Growth*, UN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Santiago, www.cepal.org/en/publications/38715-economic-survey-latin-america-and-caribbean-2015-challenges-boosting-investment.

ECLAC (2015b), *Fiscal Panorama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2015: Policy Space and Dilemmas*, UN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Santiago, www.cepal.org/en/publications/37747-fiscal-panorama-latin-america-and-caribbean-2015-policy-space-and-dilemmas.

Euromoney (2015), “Rising dollar makes renminbi second-most overvalued currency”, www.euromoney.com/Article/3427487/Rising-dollar-makes-renminbi-second-most-overvalued-currency.html, 13 February.

Garroway, C., B. Hacibedel, H. Reisen and E. Turkisch (2012), “The renminbi and poor-country growth”, *The World Economy*, 35 (3), pp. 273 – 294, Wiley Blackwell,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twec.2012.35.issue-3/issuetoc>.

IIF (2015), IIF Heat Map of EM Vulnerabilities, www.iif.com/publication/heat-map-em-vulnerabilities.

IMF (2015), *World Economic Outlook Updat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July, 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5/01/weodata/index.aspx.

IMF (2013),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Western Hemisphere: Time to Rebuild Policy Spac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www.imf.org/external/pubs/ft/reo/2013/whd/eng/wreo0513.htm.

Levy Yeyati, E., F. Sturzenegger and I. Reggio (2006), “On the endogeneity of exchange rate regimes”, *KSG Working Paper RWP06-047*, www.eco.uc3m.es/temp/09-83-47.pdf.

OECD (2015), *OECD Economic Outlook*,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dx.doi.org/10.1787/eco_outlook-v2015-1-en.

OECD (2010), *Perspectives on Global Development 2010: Shifting Wealth*,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dx.doi.org/10.1787/9789264084728-en>.

OECD/CAF/ECLAC (2014), *Latin American Economic Outlook 2015: Education, Skills and Innovation for Development*,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dx.doi.org/10.1787/leo-2015-en>.

OECD/CAF/ECLAC (2013), *Latin American Economic Outlook 2014: Logistics and Competitiveness for Development*,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dx.doi.org/10.1787/leo-2014-en>.

OECD/ECLAC (2012), *Latin American Economic Outlook 2013: SME Policies for Structural Change*,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dx.doi.org/10.1787/leo-2013-en>.



OECD/ECLAC/CIAT/IDB (2015), *Revenue Statistics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2015*,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dx.doi.org/10.1787/rev_lat-2015-en-fr.

Pesaran, M. H. and R. Smith (2006), “Macroeconomic modelling with a global perspective”, in *The Manchester School*, Vol. 74, Supplement, John Wiley and Sons and 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pp. 24 – 49, also available at www.econ.cam.ac.uk/dae/repec/cam/pdf/cwpe0604.pdf.

Pérez Caldentey, E., D. Titelman and P. Carvallo (2014), “Weak expansions: A distinctive feature of the business cycle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World Economic Review*, 3, pp. 69 – 89.

Powell, A. (ed.) (2015),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Macroeconomic Report. The Labyrinth: How Ca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Navigate the Global Economy*,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Washington, DC.

Powell, A. (ed.) (2014),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Macroeconomic Report. Global Recovery and Monetary Normalization: Escaping a Chronicle Foretold?*,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Washington, DC.

Rodrik, D. (2010), “Making room for China in the world econom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0 (2), pp. 89 – 93.

Ros, J. (2014), *Productividad y crecimiento en América Latina: ¿por qué algunas economías crecen más que otras?* (LC/MEX/L.1145), Mexico City, ECLAC subregional headquarters in Mexico.

Smith, L. V. and A. Galesi (2014), “The GVAR toolbox”, <https://sites.google.com/site/gvarmodelling/gvartoolbox>.

第三章

财富转移、中国“新常态”和拉丁美洲

本章主要分析中国和拉丁美洲在财富转移过程中的作用。第一节讨论在财富转移的初始阶段“财富转移 I”拉丁美洲充当看客时，中国是如何融入全球经济中的。第二节分析“财富转移 II”阶段中一些可以预见的演变，重点关注中国将出现的几个结构性和政策性趋势（例如，人口老龄化、中产阶级的崛起与结构转型的过程）。第三节通过一个判别分析归纳那些逃离出“中等收入陷阱”的不同特征，探讨中国与拉丁美洲在“中等收入陷阱”中的关系。第四节将对一些核心的发现进行总结。

专栏 3.1 财富转移

财富转移指的是世界经济中心的重心从 OECD 国家转移到新兴经济体的过程。这一过程的主要催化剂来源于亚洲经济体的强劲增长，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当然，这一现象已经席卷了其他新兴地区。

资料来源：OECD（2010）。

中国和拉丁美洲在财富转移 I 中的角色

转移财富的初始阶段的显著特征是中国的强劲增长，加大了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快速缩小了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这一趋势建立在中国为了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而实施的强有力政策的基础之上。在这个过



程中，中国已成为向世界其他地区供应制成品的最重要的国家之一，这也验证了其政策是成功的。

对全球增长的贡献

中国的强势增长是财富转移初始阶段的基本特征。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与日俱增，进入 21 世纪以后变得更加重要，在金融危机到来时到达一个新的高度。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每年对全球 GDP 增长的平均贡献度约为 0.4 个百分点，这一比例在 2001 ~ 2008 年跃升为 0.75 个百分点，而在 2009 ~ 2014 年则是进一步提高到 0.8 个百分点。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如果用 GDP 水平来形容则更加让人吃惊：1991 年，在财富转移的初始阶段时，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增加了相当于一个哥伦比亚的 GDP 规模。到了 2001 年，这一贡献达到了阿根廷的 GDP 规模。到了 2005 年，这一贡献等同于阿根廷和智利的 GDP 规模之和，而到了 2013 年，这一贡献相当于玻利维亚、智利和阿根廷三国的 GDP 规模之和（根据 IMF 2015 年数据计算）。中国始终保持着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等主要经济体不一样的特色增长方式，是增长向新地理区位转换的关键因素（Quah, 2011），这也造成世界经济重心的中心向东移动。

与中国的表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拉丁美洲对全球增长的边际贡献增长缓慢。正如图 3-1 归纳的那样，中国和拉美在财富转移的起步阶段对全球的贡献大致相似（例如在 1991 ~ 1995 年的区间内，中国的贡献是 11%，拉美是 8%）。从这个起点起，中国的贡献度逐渐上升，近几年达到了 29% 的最大值。相反，拉丁美洲的贡献度在 2006 ~ 2010 年的增长非常平庸（9%），在 2011 ~ 2015 年更是显著地下降到 6%。特别是在 2010 年以来，拉丁美洲在转移财富中甘陪末座，而亚洲，特别是中国，则主宰了这一进程。

收入收敛的进步

20 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在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收入收敛和中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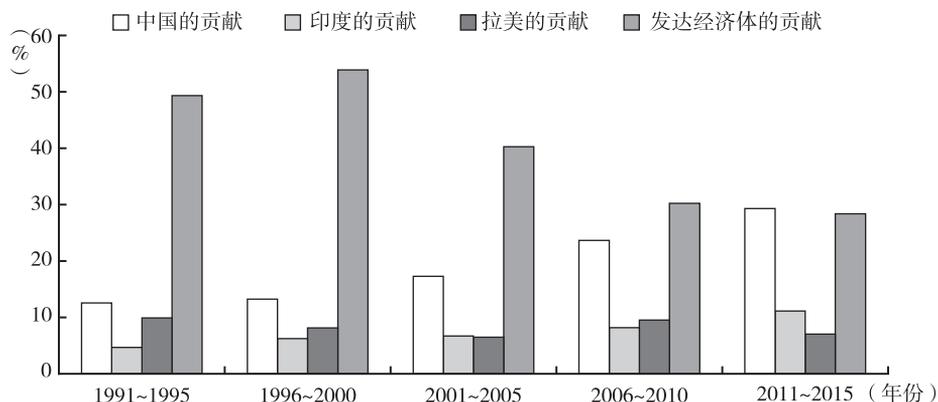


图 3-1 各区域对全球增长的贡献

注：拉美包括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 32 个经济体，发达经济体包括 37 个国家。

资料来源：OECD/CAF/ECLAC 根据 IMF, 2015,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5/01/weodata/index.aspx 计算。

统计链接：<http://dx.doi.org/10.1787/888933291573>。

阶级的崛起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步，不过中产阶级还比较脆弱。中国的人均收入起点很低，但是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大多数新兴世界的经济体。具体来说，中国的人均收入增长了 4 倍以上，从 1995 年 2500 美元一举跃升到 2013 年的 11525 美元^①。这一增长率远高于同一时期的其他主要新兴经济体，如印度（153%）、印度尼西亚（60%）、俄罗斯（95%）或南非（28%），比巴拿马（113%）、多米尼加共和国（90%）、秘鲁（83%）和智利（70%）等在 1995~2013 年增长相对较高的拉丁美洲国家也要高出不少。这种收入收敛的动态被认为是“追赶周期”的早期阶段的显著标志，其特点是强劲的投资积累和经济增长，以及快速的结构变化（见专栏 3.2）。

专栏 3.2 追赶周期和中国新常态

“追赶周期”（Liu, Jia and Zhang, 2015）是用来解释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率如何追赶上发达经济体的分析框架。它与那些现有的建立在工业化国家

^① 根据 2011 年购买力平价（PPP）的恒定国际美元计算。



的经验之上的长周期理论有很大不同，后者包括康德拉捷夫周期（Kondratiev wave）、库兹涅茨波动（Kuznetsswing）、朱格拉周期（Juglarcycle）或者基钦周期（Kitching cycle）（Kwasnicki, 2008；Korotayev and Tsirel, 2010；Solomou, 1988；and Tylecote, 1994）。图 3-2 显示了追赶周期以发达国家增长作为基准的工作原理。发达国家的人均 GDP 每年有大约 2% 的小幅波动，因而发展中国家在人均 GDP 向发达国家的收敛路径中会呈现“倒 U”形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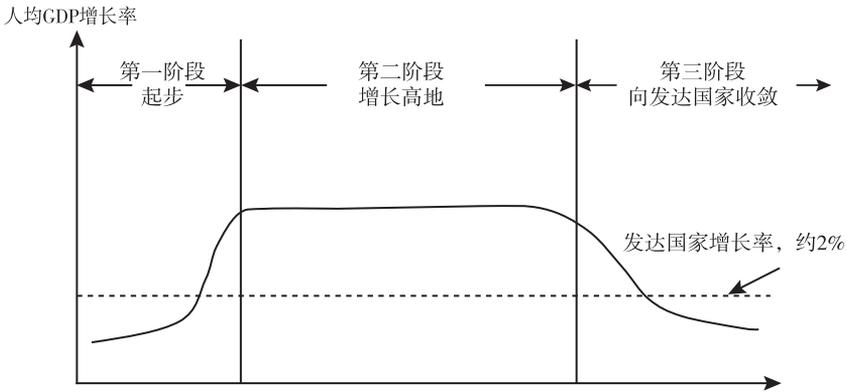


图 3-2 追赶曲线

资料来源：OECD/CAF/ECLAC 计算。

统计链接：<http://dx.doi.org/10.1787/888933291581>。

在追赶周期的第一阶段，发展中经济体从低于发达经济体的增长速度起步。到了第二阶段，发展中经济维持着 20~30 年的超高速增长率。随着收入水平越来越接近先进经济，追赶进程进入第三阶段，经济增长的步伐逐渐放缓下来，向着发达国家收敛。

追赶周期的每一个阶段都有自己独特的特征。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代表一个创造性建设时期，会涌现出许多新行业。在第二阶段，快速的技术进步大大抵消了物质资本回报的递减，从而资本回报率保持在一个相对高且稳定的水平。最后，第三阶段的特点是创造力消亡，投资在总需求中的比例、工业在总产出的比例双双下降，这一阶段进一步发展下去将会是技术进步衰

弱，资本回报递减。这些因素最终将使经济增长率向主要发达经济体收敛。

从追赶周期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新常态本质上处于从第二阶段的增长高峰向第三阶段的过渡时期。在这个过程中，将逐渐实现产品结构的多元化，同时具有更可持续的和更具包容性的增长率（Hu, 2015）。这个转型显然与其他分析，尤其是著名的“回归平均”（“regression to mean”，Pritchett and Summers, 2014）有所区别。

为了缓冲经济增长的着陆，中国必须深化体制和政策改革。第一，需要理顺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和税收结构，从而统一不同地区的公共服务质量的水平。第二，必须对金融机构进行改革，使其更加有效地配置资本，从而更加紧密地联系实体经济。第三，必须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力。第四，调整土地治理，提高效率，实施智能城市化，对征收中受到影响的对象的权益给予公平的补偿。第五，对碎片化的社会保险制度进行整合，以便更有效地配置劳动力。第六，必须降低地方政府债务和不良金融资产所造成的金融风险。

即使在最近几年拉美国家相关的生产率表现有所进步，但从亚洲和拉美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与美国较量的演变过程中可以看出，绝大多数的拉美国家正在节节败退。相比之下，亚洲国家正在缩小差距（ECLAC/EU - LAC Foundation, 2015），特别是中国，差距缩小得最为显著，即使它的生产力水平仍然低于某些拉丁美洲国家（例如墨西哥）。人均收入的进步正在将中国塑造成一个新兴的中产阶级社会。中国在1900~2010年生活在广义上的中等部门中（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每天人均收入在4~50美元，包括中产阶级和弱势群体，Ferreira et al., 2013）的人口比例上升了44.8%，在主要的新兴经济体中是最高的（见图3-3）。在大致的时间段内，在这一比例的增幅上仅次于中国的国家是巴西和秘鲁，达到30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中国的减贫工作也没有落下。在1995~2010年，生活在每天2.5美元的标准之下的人口比例在中国下降了45个百分点，降幅位居全世界第3位，高于拉丁美洲表现最好的国家（例如这一降幅在墨西哥是



24.7 个百分点，秘鲁是 20.7 个百分点，厄瓜多尔是 20.1 个百分点；World Bank, 2014），因此，中国的人口规模和贫困的初始水平较高使得这个国家脱贫的人口数量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脱贫人口的总和（Quah, 2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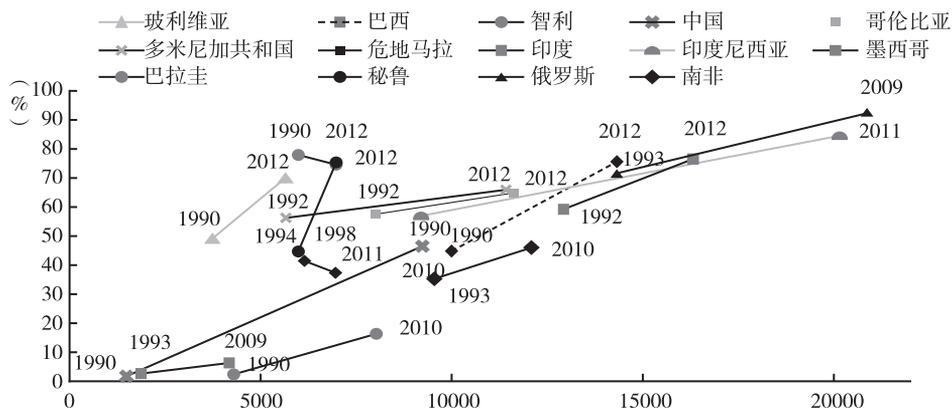


图 3-3 中等部门人口（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收入在 4 ~ 50 美元）对比人均 GDP（2011 年恒定国际美元）

注：人均 GDP 是根据购买力平价的 2011 年恒定国际美元计算的。

资料来源：OECD/CAF/ECLAC 根据 World Bank (2014), *Pov Cal Net database*, <http://iresearch.worldbank.org/PovcalNet/> 和 World Bank (2015a),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database*, <http://data.worldbank.org/products/wdi> 计算。

统计链接：<http://dx.doi.org/10.1787/888933291599>。

融入全球经济

在财富转移过程中，贸易是中国塑造全球经济的基本途径。这个过程的主要特征是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亚洲主要的新兴经济体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融入全球经济。由此，开放经济中的工作人口规模翻了一倍，资本和劳动力之比下降了一半（OECD, 2009）。由于这些非熟练工人的存在，劳动密集型的制成品才会更加便宜，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大行其道。再加上土地和劳动力之比也随之下降，商品出口国，特别是拉丁美洲的商品出口国的贸易条件得到了显著的改善（OECD, 2009）。

财富转移对许多国家的贸易专业化起到了关键性的影响，尤其是在拉

丁美洲。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使其在数目众多的出口国家中具有很强的竞争力^①（见图3-4）。1990~2008年，中国的产业池中新增了58个显性比较优势大于1的出口产业，总数达到了287个，在拥有比较优势的行业数量上排名世界第八位（OECD/CAF/ECLAC, 2013）。在拉丁美洲，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②在这一排名中也前进了几位，哥伦比亚从第54位上升到第45位，哥斯达黎加从第57位上升到第47位。除了这几个正面典型之外，其余的拉丁美洲国家在出口行业的多元化方面进展不顺。在上述排位中，巴西从第26位下降到第35位，阿根廷从第34位下降到第39位，智利从第52位跌至第69位，委内瑞拉从第58位跌落到第107位。这些趋势证实了财富转移造并没有为拉丁美洲促进生产和贸易的多元化提供有利的背景（Moreira, 2006; OECD/CAF/ECLAC, 2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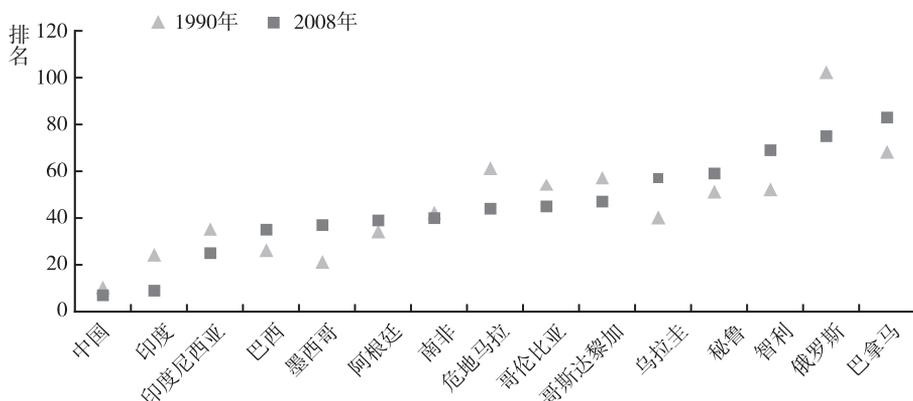


图3-4 特定新兴经济体的出口行业多元化（国家排名，1990年对比2008年）

注：国家的排名根据所拥有的显性比较优势大于1的出口行业的数量来进行排列。

资料来源：OECD/CAF/ECLAC 根据 United Nations (2015a), *United Nations Commodity Trade Statistics database* (Comtrade), <http://comtrade.un.org/> 计算。

统计链接：<http://dx.doi.org/10.1787/888933291607>。

- ① 如果一国的显性比较优势（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RCA）大于1的话，那么就认为该国的出口具有竞争力。显性比较优势的计算采用 Balassa (1977) 给出的方法。
- ② 哥斯达黎加由 68 个行业增加到 128 个行业，哥伦比亚由 73 个行业增加到 133 个行业。



中国政策的维度

中国在生产率和收入向更发达经济体收敛、减少贫困以及成功融入全球经济等方面的成就都离不开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中国非常务实地运用了各种产业政策工具：从临时保护、补贴和控制信贷到鼓励外国投资，再到引导技术转移。此外，中国的政策之间相互协调，追求经济成果最大化。宏观经济政策（财政，货币和汇率政策）一直强调稳定和增长，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使技术和竞争力等领域的努力在微观层面上获益良多。

在对中国的成功进行合理性阐释中，引用最多的是外部性、回报递增和市场失灵等传统理论。也有证据显示“自我发现”始终贯穿于公共和私人利益相关者逐渐发现新的潜力，开发新的产业空间，通过不断的试验和试错来判断制度的适用性和政策工具效率的高低，根据各国的国情而不是套用千篇一律的公式来决定政策的过程之中（Rodrik, 2013; Felipe, Abdon and Kumar, 2012）。最后，通过长期观察形成的证据强有力的表明，公共政策建立起了一个规范的投资和学习市场，引导市场主体在不向市场压力妥协的同时，支持结构转变（Mazzucato, 2013; Cimoli, Dosi and Stiglitz, 2015; 对这一增长模式的先驱性讨论可见 Amsden, 1989）。所有这些解释都强调了市场机制和高度重视发展公共政策之间的协同。

中国的产业政策经历了两个阶段（Lo and Wu, 2014）。1990 年之前，由于国内市场巨大，政策主要是促进消费品行业的扩张。广阔的国内市场有几近无限的（即“刘易斯”式的）劳动供应，特别有利于沿海地区的跨国企业和以廉价的劳动力和恶劣的工作条件（部分由可用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来补偿）为基础的出口企业。国有企业在在这个过程中相形见绌，不但提供的就业机会更少，而且持有的资本存量也在不断减少。第二阶段开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和 21 世纪初，由投资和出口驱动，在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进一步增强（Heilmann and Shih, 2013; Gourdon, Monjon and Poncet, 2015）。在公有制企业专注于抢占经济“制高点”的同时，合资企业在竞争力和扩张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的合资企

业成功地掌握了内在的尖端技术，甚至在一些行业树立了自己的品牌（Ahrens, 2013）。

中国的促增长政策还收获了技术和专家知识。中国企业获得了外国技术（通过许可证和合资企业），在中国制造企业自身特殊优势的基础上打造本国的生产能力，在应用勘探、生产设计和物质产品的研究和开发（R&D）等领域形成了独特的竞争优势。中国企业成功地将大规模的领先技术引入了市场，其中一部分尚未在商业领域推广应用。它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开启了机会之窗。这种战略被称为始以“逆向设计”取代“逆向工程”。这个生产过程的前景广阔，不同的模块和生产阶段之间的联系以及在与其它生产商和供应商的互动学习过程中的联系更为紧密。

财富转移Ⅱ：中国的角色

中国的发展进程将会影响财富转移的新阶段（即财富转移Ⅱ），进一步改变全球经济，尤其是拉丁美洲。如果说财富转移Ⅰ的主要特点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和印度向世界市场的开放这一单一事件的话，那么财富转移Ⅱ将会是一个大型新兴市场国家持续增长以及收入向更发达经济体收敛的长期过程。这个过程会分为几种路径发生：（1）通过技能和技术的积累；（2）中产阶级的增长；（3）增加消费；（4）结构转变（OECD, 2013a）。这些趋势应该会强烈地影响其他经济体的发展前景，其中当然包括拉丁美洲。本报告的第五章将通过分析贸易和投资渠道来探讨财富转移Ⅱ将会如何塑造拉丁美洲的发展。

中国增长引擎的再平衡

中国的经济增长正在从外需转向内需，从投资转向在更加注重消费背景下寻求再平衡。那种高储蓄和高投资的经济模式受各种不同因素的制约已经难以为继。一个经常被提及的因素是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偏好（Blanchard and Giavazzi, 2005）。另一种解释是家庭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下降，有利于企



业储蓄（Huang, Chang and Yang, 2013）。

选取两组特征将中国和一组特定的发达和新兴经济体群体进行对比。首先，正如图 3-5 所示，长期以来，投资占 GDP 的高比重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标志性特征。另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从 1985 年以来投资率持续上升，只是在亚洲金融危机时出现过一个小小的回调。同时，工业部门的附加值占 GDP 的比重在这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发生显著的改变，一直比较接近 45% 的当前值。因此，长期以来中国几乎以最高的工业附加值和最高的投资率著称于世，远远超出同一发展水平上的国家的正常指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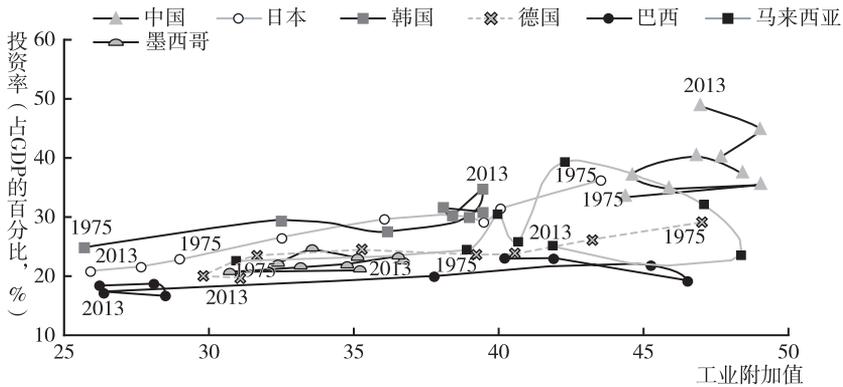


图 3-5 投资率 vs. 工业附加值（占 GDP 的百分比，选定的 OECD 和新兴经济体）

资料来源：OECD/CAF/ECLAC 根据 World Bank (2015a),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database, <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计算。

统计链接：<http://dx.doi.org/10.1787/888933291614>。

这个再平衡过程的最后一个方面应该是与经济增长的自我调节亦步亦趋（见图 3-2）。亚洲发达经济体（如日本和韩国）的经验表明，在再平衡过程中，投资的下降并不能完全被消费的上升所替代（Citigroup, 2012）。此外，投资的形态也会发生变化：私人资本投资的占比——主要受工业金属的使用导向——有望因为众多制造行业的产能过剩而有所回落，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公共投资会相应上升（OECD, 2013a）。

人口老龄化与财富增长联系更加紧密：中国社会的转型

社会经济的变迁已显露端倪，在财富转移Ⅱ阶段将会进一步深入。首先，中国正经历着人口结构的重大变化，人口老龄化率高于替代率。这一趋势主要归因于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生育率下降，还有就是经济发展以后，关于生育的社会文化逐渐规范（Becker and Barro, 1988; Galor and Weil, 1996）。20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上半叶两个时期，生育率下降得尤为强烈，从而使中国的生育率从1965年每个妇女平均生育6个孩子降到目前的1.67个，比OECD国家当前1.74个的平均水平还要低（World Bank, 2015a）。低生育率和快速老龄化的社会将会大大改变中国的人口结构，产生严重的后果。工作适龄人口（在年龄15~64岁）不断减少的态势进一步加剧：2030~2060年，中国将会是工作适龄人口绝对规模减小最厉害的国家之一，足足会减少7个百分点。^①

从1980年开始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如今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消极后果。国家强制堕胎、选择性别终止妊娠、性别比例失衡等因素导致男女自然比例从105:100上升到116:100（United Nations, 2015b）。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人口路径的这一预期，对人口政策实施了部分调整，涉及某些少数民族和农村家庭（*The Guardian*, 2015）。预计会放开更大的生育权，允许二胎，至少是“独生的”父母能够生育二胎（OECD, 2015a）。

图3-6展示了在年龄抚养比方面人口失衡的趋势（年龄抚养比是年龄小于15岁或64岁以上的需要抚养的人口占工作适龄人口的比重）。2015~2030年，中国将会是新兴世界中人口转变最为令人吃惊的国家之一。目前，中国的抚养比由年轻人口驱动，未成年人口的抚养比是25%，老年人口的抚养比是13%。而到2030年，老年人口的抚养比将会首次超过未成年人口抚养比（23.8%:23.4%）。2015~2030年老年人口抚养比中国上升得更厉

^① 在对42个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比较中，Johansson等人发现2030~2060年，在工作人口与老年人口比例下降最快的国家中，中国将排名第八位（Johansson et al., 2012）。



害的也只有韩国了（82%）。到2030年，中国将会是发展中国家中未成年人口抚养比最高，而在老年人口抚养比方面位居第二的国家^①（仅次于俄罗斯）。就总抚养比来看，中国在2060年会达到最大值65%。20世纪中期，中国曾有同样水平的总抚养比，不过那时候是未成年人口相比老年人口占了大头（OECD，2013a）。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特别是印度的情况不同，未成年人口抚养比在预测范围内将保持相对较高水平，从而为未来的经济增长提供充足的劳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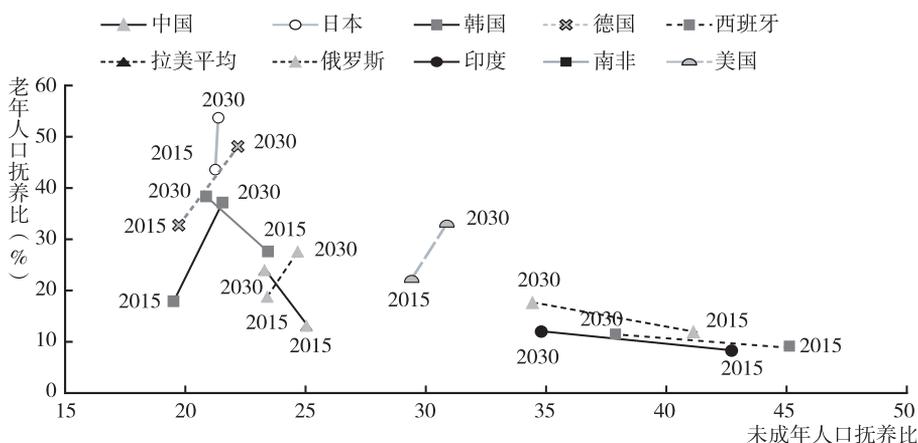


图 3-6 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的抚养比（2015 年和 2030 年）
（特定的 OECD 国家和新兴国家）

注：拉美平均包括下列经济体：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巴拉圭、秘鲁、乌拉圭、委内瑞拉和墨西哥。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 (2012), *Revision of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http://esa.un.org/unpd/wpp/>。

统计链接：<http://dx.doi.org/10.1787/888933291629>。

对中国人口演变的预期催生了两大重要的挑战。第一，在养老金制度尚不完善的情况下，需要为不断增加的老年人口建立一种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模式（Du and Wang, 2010）。第二，在劳动力和资本的贡献度下降的背景下，

^① 到2030年，中国和俄罗斯的老年人对年轻人的抚养比将分别达到1.01和1.12，在新兴世界中最高。

生产率必须与经济增长更加密切关联起来 (OECD, 2013a)。未来中国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新兴的中产阶级不断扩大。^① 即便是在消费增长平淡或者收入分配变化的情况^②下, 预计未来中国的中产阶级的规模在 2015 ~ 2030 年会出现迅猛的增长。中产阶级的出现不仅被视为社会变迁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Tomba, 2004), 而且还是引导消费模式向耐用消费品、卫生、教育和旅游等方面转变的触发器 (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2013)。中产阶级的持续增长将维持中国的经济增长从外需到内需、从投资到消费的再平衡。

最后一个塑造未来中国的趋势是正在进行的城市化进程。城市人口的实际占比在 1990 ~ 2013 年翻了一倍, 从 26% 上升到了 53% (World Bank, 2015a), 到 2030 年预计将会上升到 75%。这一上升意味着往中国的城市人口池中每年增加一个比东京还要大的城市的人口 (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2013)。然而, 城市化进程也并非没有挑战, 尤其是在服务可获性和可持续性方面。超过 2.6 亿的城市居民难以获得全部的基本公共服务。由于中国城市化的高能耗、城市规划和发展中的低效率以及城市人口所承担的环境成本等问题 (世界银行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2014), 可持续发展问题也是值得关注的。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 中国未来的城市化进程预期将遵循“智能城市”新模式。该模型强调提高政府的财政能力以提供足够水平的公共服务; 限制城市的地域扩张, 尽可能增加密度, 以降低基础设施成本; 加强城市规划与治理; 把城市打造成创新孵化器。接下来的改革可能会通过配置城市发展中的资源, 将产业活动转移到更具成本竞争优势的城市, 或者通过减少移民压力和环境退化等一系列措施来促进包容性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2014)。

① 这一趋势预计在未来会持续, 在其他主要的新兴市场中会更加明显。特别是印度, 虽然不比中国富有, 但其中产阶级的规模最早能在 2020 年超过中国 (Kharas, 2010)。

② 例如 Chun 指出, 在“中性增长”的情形下, 收入分布按照 2005 年那样保持不变, 中国毫无疑问会成为一个中产阶级社会 (Chun, 2010)。



中国的结构转型

中国未来变革的另一个维度与其结构转型的过程有关。这个过程具有几大特征，将在下文中进行讨论。

面向高科技产业的多元化

原来在制造业行业中装配运营方面的专业化正在逐渐向生产链的更高附加值环节发展。国内市场规模、提升教育和研发的各种努力，以及以攻克生产链的高端环节为目标定位的政策，正在激发中国在一系列中高端产品上的竞争力（Altenburg, Schmitz and Stamm, 2008）。2010年前后，中国在研发活动方面的支出明显增加（OECD, 2013a），研发密度水平超过GDP的2%，超出欧盟平均水平（OECD, 2015a）。

这些努力正在塑造中国的生产多样化，宛如一台最快且充满生产能力的“蓄电池”。鉴于那些用于生产活动的非流通要素，包括制度禀赋、技能的可用性和质量，以及基础设施在内的能力无法通过交易获得，中国只能开发出足够大或者复杂（即一个更高的指标值）的能力存量，从而在最为复杂的产业中占据比较优势。Hidalgo和Hausmann（2009）提出了“能力指数”^①用以取代制造业在出口中的比重。通过这一指标，可以发现发达经济体的相关能力存量呈稳步下降的态势（见图3-7），这要归因于其他国家也进入了这些行业。著名的“入侵者”案例显示的就是韩国和日本的能力存量大幅度增加。不过，中国还是唯一既增强了生产能力，又强化了作为世界制成品供应者地位的佼佼者。

图3-7所展示的数据证实了传统效用指标（研发支出）和技术成果（专利）^②的数值（研发和开发的支出）。图3-8显示了中国公司正在大规模且持续地增加在研发方面的投资。

① 该指数进行了称名化，所以，值为0意味着一种能力水平等于世界平均值，值为1（-1）是指能力的标准偏差高于（低于）这一平均水平。

② 然而，以中国为例，专利利用率（5%）明显低于发达经济体的水平（OECD, 2015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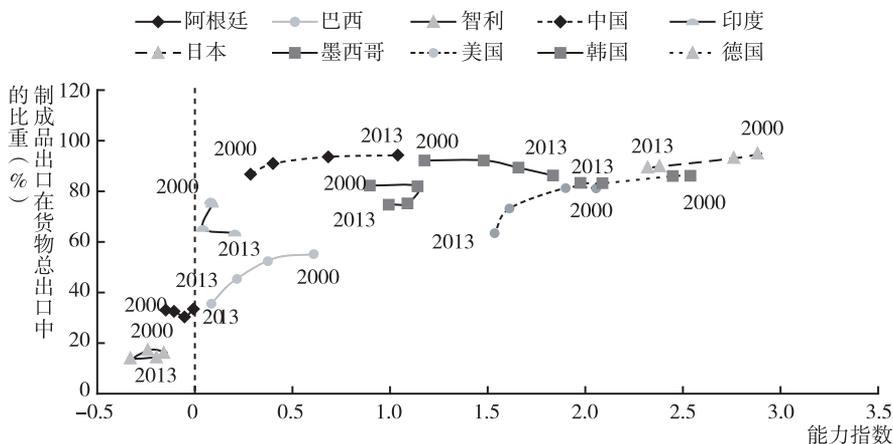


图 3-7 选定经济体的能力指数 vs. 制成品占出口的比重 (2000 ~ 2013 年)

资料来源: OECD/CAF/ECLAC 根据 *Atlas of Economic Complexity* (2015) 和 World Bank (2015a),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database <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12 <http://dx.doi.org/10.1787/888933291631> 计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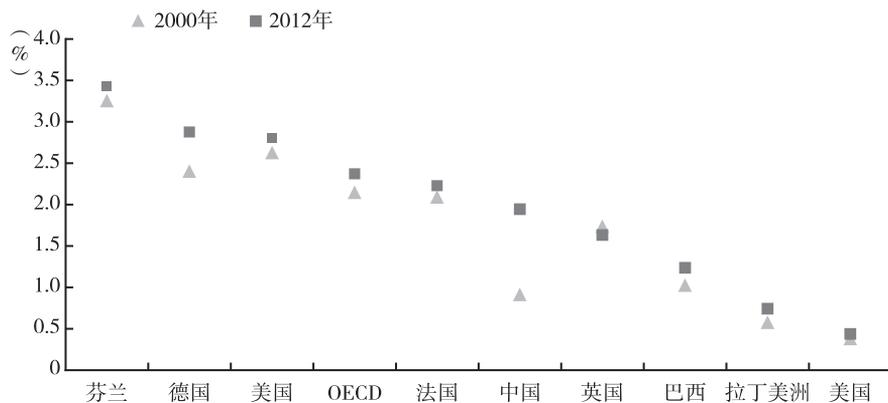


图 3-8 研发支出 (占 GDP 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 World Bank (2015a),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database, <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统计链接: <http://dx.doi.org/10.1787/888933291643>。

中国的政策重点牢牢盯住实现结构转型这一目标。这些政策因素的影响在中国制造业产品附加值的提升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The Economist*, 2015a)。这一趋势从根本上为中国出口组合的进一步多元化创造了更好的条



件，因为在供应链中发挥的作用越广泛，意味着制造业越有竞争力。

最后，政策战略促进了这一过程。2015年3月，中国政府推出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力图在未来的十年内升级中国的制造业（通过连续两个五年规划）。该方案涉及的行业范围十分广泛，包括信息技术、航空航天和航空设备、海事工程设备，铁路设备、节能汽车、电气设备、生物医药、高性能医疗器械和农业设备。这个计划还与以创新、智能技术及其他互联网相关领域（如云计算、大数据）为基础的“互联网+”规划结合在一起。

保持低技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竞争力

生产多元化未来进程的另一个特征就是中国在标准化生产上丧失了比较优势。这一趋势的背后逻辑是，中国正在逼近它的“刘易斯转折点”，即剩余劳动力无法在工资不增加的情况下完成从维持生计的部门（农业）向现代部门的转移。这一论断得到了现有一些证据的支撑，如中国农村劳动力存量越来越少（Cai and Wang, 2008）；进入21世纪以来工资呈不断上升趋势（Zhang, Yang and Wang, 2010）。在这种情况下，保持对劳动力成本最为敏感的行业中的比较优势将越来越困难。

然而，在不放弃保持低技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竞争力的前提下，中国正在追求多元化发展高科技行业。首先，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是与生产率的提高相辅相成的。2007年以来，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11%（*The Economist*, 2015b），在劳动力规模依然庞大的条件下缩小了与发达经济体在全要素生产率上的差距（OECD, 2014a）。如果考虑生产率的诸多要素，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与大多数其他国家相比，还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Ceglowski and Golub, 2012）。更重要的是，中国生产结构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块状分布（即地理上生产要素的非对称分布），在劳动力技术强度较高时会特别引人注目（Lu, Milner and Yu, 2012）。为应对劳动力市场的高度碎片化，保持广大行业中的竞争力，中国出台了多项政策倡议，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丝绸之路基金”，这个400亿美元的基金的目标是连接内陆地区，吸引工

业和金融合作。

工业自动化是另一个应当考虑的因素，它能够帮助中国牢牢控制制造业的标准化和升级过程。中国在自动化的深入和制造业中的机器人技术方面正在取得长足的进步：尽管中国当前的自动化程度远低于发达经济体的制造业，然而，自动化被认为是一个合理的战略，可以尽量减少适龄人口下降带来的冲击影响，提高劳动力成本的竞争力（*Financial Times*, 2015），同时可以发展某些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认识到这些好处后，中国政府为了鼓励这一自动化升级而提供了补贴（Devonshire - Ellis et al., 2014）。结构性激励和政策性激励的结合要求迅速提高自动化和机器人的利用率，如果成功的话，2020年前在中国可以形成全球最大的机器人市场（*The Economist*, 2014）。

所有这些（生产率、块状分布和自动化）都是中国促进结构转型应考虑的因素。这个过程既可以发展高端产业新的比较优势，又可以保持产业和经济活动的坚实基础，标志着中国初步融入世界经济。

发展服务业的比较优势

未来中国生产多元化变革中的最后一个元素将会是服务业多样化。中国的服务业比重稳步增长，2013年已经超过了第二产业的比重（Molnar and Wang, 2015）。截止到2014年，整个经济中的第三产业比重达到48%，相比之下，第二产业比重为42%，农业部门比重仅为9%。此外，生产率也在稳步增长。例如，商业服务的生产率已从1999年的20%这一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上升到2009年的50%以上。然而，服务业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来自国有企业的大量存在，即使是在像建筑和旅游等商业导向性的服务行业中也不例外。

服务业重要性的日益上升在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两个方面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就中间产品来说，像仓储或订单处理等高附加值的物流服务，以及像会计或工程等专业的服务预计将会是生产多样化的新领域。此外，中国将再次确保其在区域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中起主导作用。对于最终产



品，人口转型和收入水平的不断上升也将增加对医疗保健、文化和商业服务的需求（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3）。

这些变化可能会受到政策的额外影响。在传统上服务行业难以像制造业那样得到更多的扶持，导致服务行业相对欠发达（Zhang, 2011）。最近的政策措施正在解决这些需求，特别是距离最近的“五年规划”（2011~2015年），将服务业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这些政策的实施促进了中国完成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型。

中国的发展政策

中国的新发展战略的目标是应对国内、国外新局面，提高增长的质量。在2011~2015年“五年规划”中特别强调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和未来几十年里的重中之重是以更广泛的福利和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生长。

中国新战略的六个主要方向从政策上总结并回答了如何迈向以福利、可持续、增长为目标的发展模式，每个发展方向都有一系列结构性改革予以支撑（见专栏3.3）。第一个方向是政府和私营部门在经济中的适当作用，就构建一个更具竞争力的经济达成共识，尤其是有关企业的进入与退出。重新考虑国有企业的角色，其作用定位于更好地调整公共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合作治理标准。第二个方向是鼓励系统性创新，采用开放性的创新系统。随着中国在研发上的投资日益重要，目标已确定为产品空间与发达经济体的一致。第三个方向是处理经济的绿色化，采用环境标准。21世纪初，这一标准曾被认为削弱了国家的竞争态势。

专栏 3.3 中国的结构改革议程：迈向均衡增长模式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转型一直伴随着大量的结构性改革，其目的就是提高增长的质量，使经济更具弹性和包容性，同时熨平经济突然减速的风险。改革对象有六大战略方向：国有企业、金融行业、财政政策、劳动力流动、教育/技术和农业发展。

2013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改革议程，强

调市场机制和创新的作用，而四中全会聚焦于治理和依法治国的重要性。尽管执行改革的水平喜忧参半，但中国政府已表态要在 2030 年之前完成这些改革。接下来的改革会和本章所描述的趋势有更加紧密的联系。

经济和金融改革

在金融改革领域，中国政府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有竞争力的、健全的金融系统。具体的目标已经确定，即放开利率，改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保证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建立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等等（OECD，2015b）。

竞争改革已经允许非国有实体更多地参与国家出资的项目，放开私人投资，向外国投资者开放某些行业（如贸易和物流、会计、电子商务）。与此同时，创新改革可望能够提高对创业科研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的支持。

财政改革旨在完善向高贫困率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和弱势群体的转移支付机制。在改善转移支付的监管框架之上，将根据人口和经济规模给予城镇更大的管辖权。

社会改革

在城市化和农村发展方面的改革（或叫湖口改革）所设定的目标是帮助符合条件的人口从农村、农业区域向城市中心转移，吸收农民登记成为城镇居民从而能获得城市住房和社会保障，赋予农民转让土地、签订土地使用合同和财产的权利。

在人口改革方面，需要逐步放宽自 1980 年以来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旨在抵消人口老龄化压力所带来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环境改革

环境改革的目的是解决自然资源的供给、需求和稀缺性，包括使用这些资源的环境成本和恢复成本。水、石油、天然气、电力、运输和电信的定价改革也在考虑范围之内（OECD，2014b）。此外，改革还包括建立一个能源、碳排放、废物排放交易系统和水的使用、执行机制，限制一些地区过度使用能源。

尽管这些改革的国内影响在未来 10~15 年后才会更加显现出来，但是这些改革在本章所描述的中国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接下来的三个方向与增加财产、财政可持续性与一体化有关。第四个方向的目标是促进机会平等和扩大社会保障。第五个方向的目标是巩固财政体制，在财政收入潜在减少的背景下，满足未来几十年公共财政的需要。此外，这个方向旨在使国家和地方财政体制更加透明，因为财政风险和负债非常重要；最后是第六个方向，也被称为“走出去战略”，旨在使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融为一体。中国的目标是超越商业融合，参与全球治理机构体系，并在其中扮演利益相关者的积极角色。这反映出中国在创设或参与国际机构、多边机构、多边协议和其他国际平台中有极大的兴趣（见第五章）。

中国、拉丁美洲和中等收入陷阱：一个探索性分析

由于在收入增长方面的惊人表现，中国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之列，同时引发了中国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忧（Woo, 2012; Zhuang, Vandenberg and Huang, 2012）。通过确定大多数上中等收入国家在向高收入国家转型过程中的增长决定因素，本报告将揭示中国和拉丁美洲在这些决定因素方面最大的差异所在，希望对这场争论有所贡献。

专栏 3.4 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许多国家在人均收入达到中等国家水平以后，经济增长陷入长期的放缓状态。也就是说，一些国家经济在早期曾快速增长，之后就遭遇了一个持续的停滞。经济学文献（Eichengreen, Park and Shin, 2011; Aiyar et al., 2013; Felipe, Abdon and Kumar, 2012; Zhuang, Vandenberg and Huang, 2012; OECD, 2013b）把中等收入陷阱的盛行归因于一国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在调整经济增长源方面出现困难。低收入国家的增长源根本上来自从低生产率的经济活动和行业向高生产率的经济活动和行业的劳动力再分配。此外，在国家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以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为基础的经济通常需要新的增长引擎（Kharas and Kohli, 2011）。经济体要成功过渡到那种状态所需满足的一系列要求（即大

量熟练的劳动力、良好的投资率、发达的国家创新体系，以及有利于创业活动的宏观经济和制度环境）难以达到，更别说要协调它们的行动迈向生产性多元化的目标了。

中等收入陷阱：程式化的事实和决定因素

中国和拉丁美洲都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潜在挑战。在中国，三年以上的超高速增长已经让这个国家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之列。而在拉丁美洲，中等收入陷阱似乎是一个老生常谈的概念，困扰该地区一些国家长达 60 年（OECD/CAF/ECLAC, 2014）。拉丁美洲的案例引发了中国是否会重蹈覆辙的思考。

图 3-9A 对中国在中等收入陷阱范围内的进展与一些已进入高收入组的国家或地区过去几十年的状况进行了比较。对中等收入群体上限和下限的界定采用了 Felipe、Abdon 和 Kumar（2012）研究中所定义的阈值，即根据 1990 年恒定美元价格，再调整成购买力平价所计算出来的 2000 ~ 11750 美元。根据这个门槛，中国在 1992 年进入了下中等收入（2000 美元）国家行列。经过快速增长，在 2014 年达到了 10716 美元的水平。换句话说，中国花了 23 年的时间跨越了中等收入范围中的 89%。按照这种势头，中国已经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甚至能够以最快的速度逃离中等收入陷阱。相比之下，韩国和中国台湾用了 27 年跨出中等收入范围，而新加坡和葡萄牙分别用了 39 年和 47 年。

拉美国家在中等收入陷阱的情形显然更加令人触目惊心（见图 3-9B）。只有智利、乌拉圭和阿根廷^①已经或者快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因此，在拉美国家中，以面板 A 中所显示的收入水平起点较高的国家到收入长时期停滞的国家，差异最为显著，值得一提的是阿根廷和委内瑞拉，在 1950 年已经成为上中等收入国家。总体看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对拉丁美洲各国来说已

^① 阿根廷的可用数据只到 2011 年。



被证明是一个难以跨越的挑战。对于拉丁美洲为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的沃土这一话题可以从多种因素出发进行解释，其中较为突出的一点是该地区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基本增长方面碌碌无为（Kharas and Kohli, 2011），或者说该地区的国家要实现结构转型非常困难（Felipe, Abdon and Kumar, 2012; Jankowska, Nagengast and Perea, 2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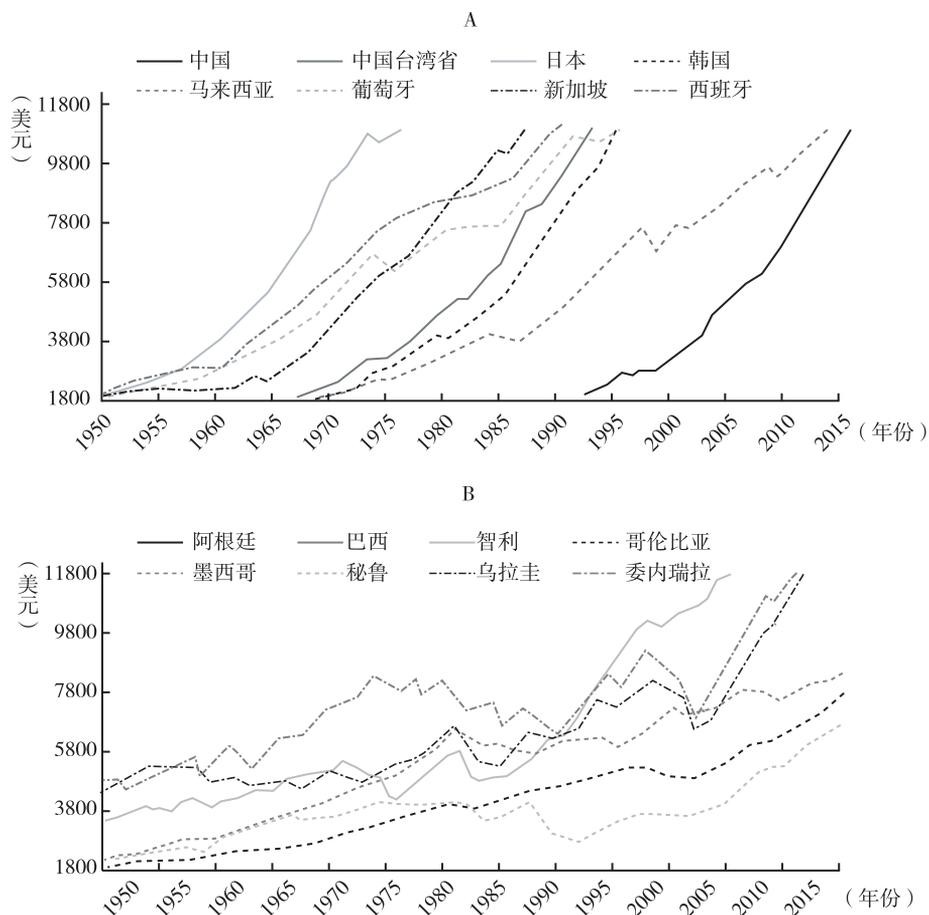


图 3-9 特定国家收入水平

资料来源：OECD/CAF/ECLAC 根据 Felipe, Abdon and Kumar (2012) 计算。数据取自于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2015), 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5/01/weodata/index.aspx 和 Maddison (2010) 数据库 www.ggd.c.net/maddison/。

统计链接：<http://dx.doi.org/10.1787/888933291652>。

有了拉丁美洲的前车之鉴，各方面都指出中国有可能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一些观点认为中国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进行的改革所取得的发展已经进入追赶进程的强弩之末，最近的经济增长已进入中速发展时期（OECD，2013b）。另一些观点则认为，中国目前的人均 GDP 已进入经济增长转向长期放缓的最频繁区间。^①

一些理论性的思考也警告说，中国的经济增长减速的可能性比较明显。第一，公共部门积极参与到经济中，会挤出私营部门，可能对生产力和增长产生有害的影响（Zhuang, Vandenberg and Huang, 2012）。第二，过去几十年来令人惊讶的增长耗费了大量的环境成本，其可持续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发受到质疑（Woo, 2012）。空气污染是最重要的环境问题之一，与之相关的健康成本上升到 GDP 的 3.8%。在中国每年的死亡人口中，有 17% 的人的死因为空气污染（约 160 万人；Rohde and Muller, 2015）。第三，经济发展速度过快，随之极度扩大了收入不平等。这种收入分配模式主要是由技术溢价上升而劳动收入在整个收入中比重下降，尤其是城乡不平等造成的（Zhuang, Vandenberg and huang, 2012）。基尼系数已经从 1990 年的 0.324 上升到 2010 年的 0.42（World Bank, 2015a）。因此，就地域的不平等而言，城乡人均收入的比例在 1978 年和 2011 年之间大幅上涨，即从 2.5 上升到 3.3（OECD, 2015a）。

这种回报的不平等分配已经变得相对不受控制，这要归咎于制度环境缺乏像发达经济体所具有的校准收入分配模式的财政和监管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收入不平等可能会损害结构转型的有效性，侵蚀社会凝聚力，最终会增加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Woo, 2012）。

实证性检验：中国和拉丁美洲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决定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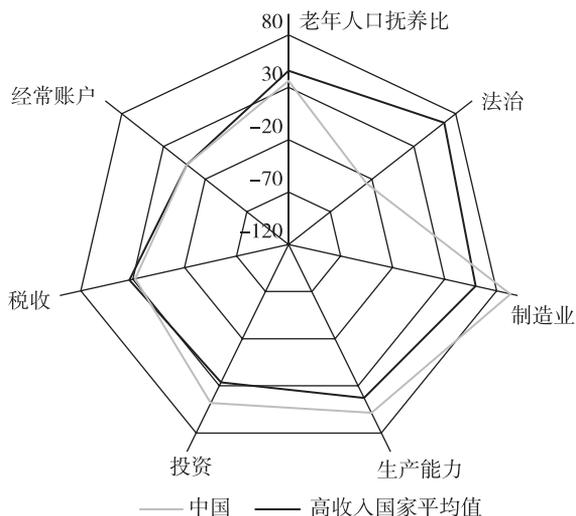
本节挑选出了与中国和拉丁美洲的中等收入陷阱相关的社会经济特征，

^① Eichengreen, Park 和 Shin 确认两种人均收入水平的下滑风险是最高的：11000 美元左右和 15000 美元左右（以 2005 年购买力平价恒定美元计算）。根据这一估计，中国目前的人均收入为 12170 美元（Eichengreen, Park and Shin, 2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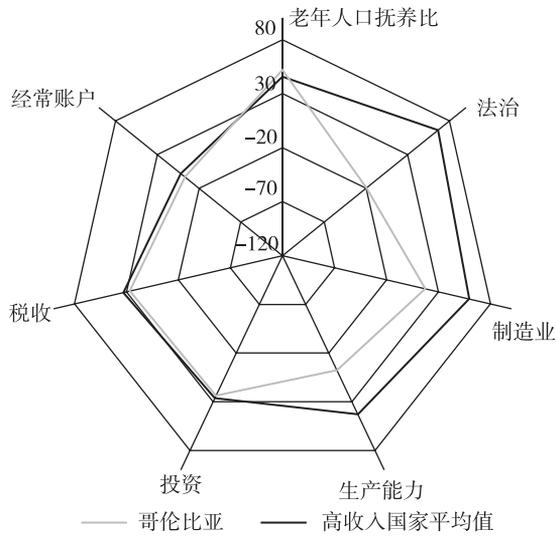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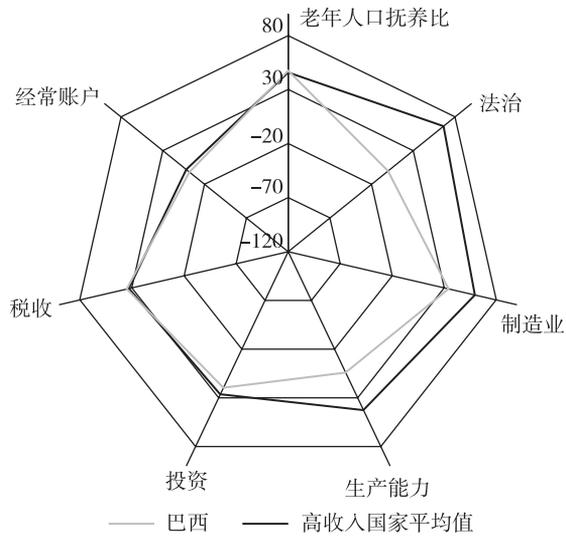
并总结了对决定因素的分析结果。^① 分析表明，当综合考虑各项社会经济指标时，中国应当被归入上中等收入国家。此外，我们的分析也揭示了一些被错误归类的国家，其中三个属于拉丁美洲国家。^②

另一个关键的分析结果发现，法治、生产能力指数和投资率是上中等收入国家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演变成高收入国家“毕业时刻”^③的最好区别变量。通过挑选出这些变量，我们的分析还比较了中国以及拉丁美洲的上中等收入经济体与基本“毕业”国家之间的差距。图3-10显示了中国和拉丁美洲与高收入国家的分歧，特别是在法治相关领域的分歧。^④ 在经济学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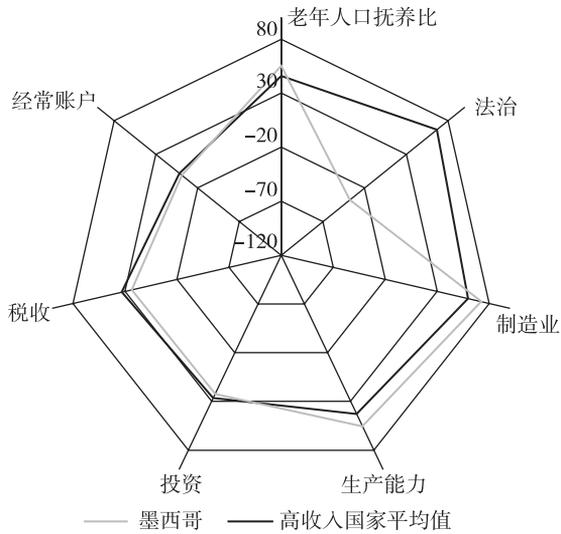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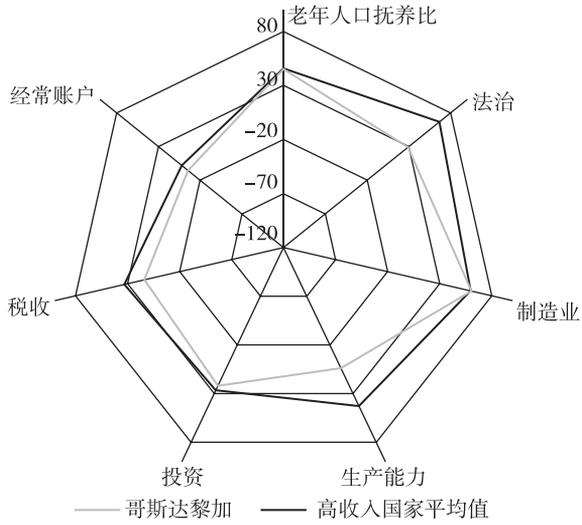
- ① 见 Melguizo and Nieto-Parra (即将出版), “Overcom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in Latin America: The role of skills, infrastructures finance and fiscal policy”, OECD 发展中心工作论文。
- ② 这三个国家是巴拿马、委内瑞拉和巴西。巴拿马和委内瑞拉在我们的分析中是下中等收入国家，但当只计算人均收入时，它们会成为上中等收入国家，巴西的情况与之相反。其他分类错误的国家包括：阿尔及利亚、匈牙利，突尼斯、斯里兰卡和波兰。
- ③ 按照这种方式，关注的重点在于人均收入范围之间相对微小的差异，即在那个时间点上，人均收入达到 11750 美元的国家进化成高收入国家，而很多上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均收入介于 7359 ~ 11393 美元。
- ④ 法治赢得了经营者的信心，规范社会规则的应遵守范围，特别是在合同执行质量、产权、警察和法院，以及降低犯罪和暴力的可能性上（World Bank, 2015b；全球治理指标）。

第三章 财富转移、中国“新常态”和拉丁美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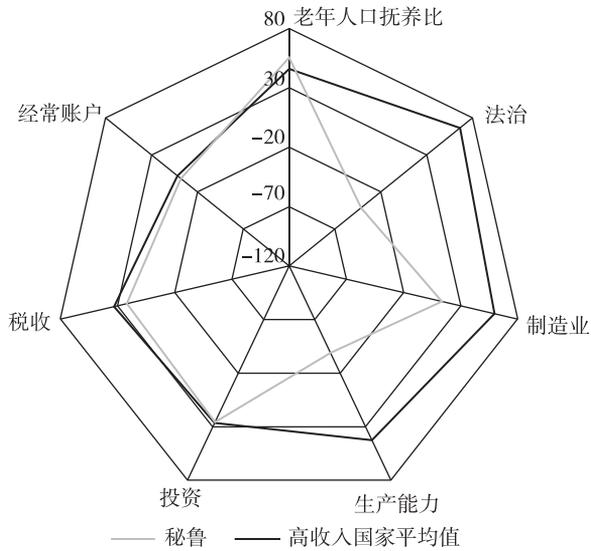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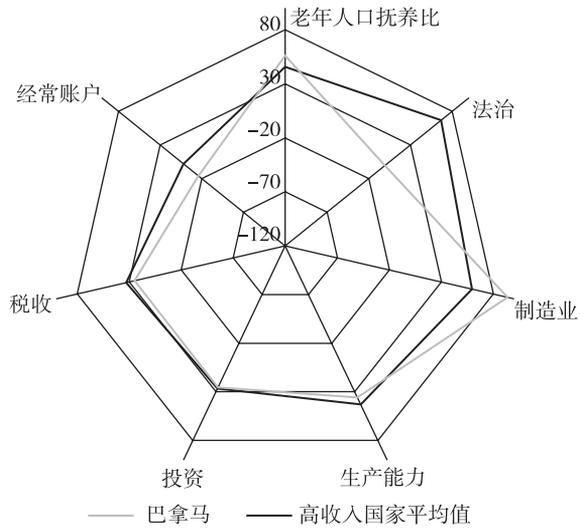




拉丁美洲经济展望（2016）：发展与中国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



第三章 财富转移、中国“新常态”和拉丁美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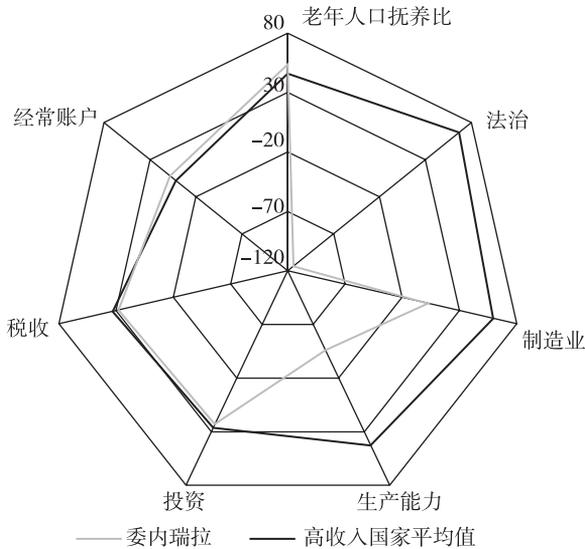


图 3-10 中等收入陷阱的决定因素：中国和拉丁美洲上中等收入国家 vs. 高收入国家平均值

注：生产能力和法治这两个变量起初不是由比率来提取的，因此，他们被转化为一个介于 0（最小值）-100（最大值）的指数。以上拉丁美洲国家是根据数据可获得性来选取的。

资料来源：OECD/CAF/ECLAC 根据 World Bank（2015a），*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http://data.worldbank.org/products/wdi> 计算。

统计链接：<http://dx.doi.org/10.1787/888933291668>。

中，制度指标是因果机制中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包括为个人、财产、执行合同提供安全保障，以及建立对政府、贪腐和逮捕个体的审核（Haggard and Tiede, 2011）。

分析还强调了与生产结构相关的变量之间的差异。中国经济的独特性决定了各项指标基本上都比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要高，特别是在制造业占 GDP 的比重和投资率等方面，因此也预示着中国经济的再平衡指日可待。相比之下，大多数的拉丁美洲国家在制造业比重和生产力等两项指标上的水平要低得多。这一结果预示着在制度和生产结构等都存在巨大差异的背景下，拉丁美洲要逃离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方式与中国有很大的区别。

结 语

中国和拉丁美洲在财富转移过程中都扮演了非常独特的角色。中国经济的超大规模，加上高速、持续的增长率，使其成为财富转移第一阶段的主要动力。因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正经历着社会经济的重大变化，其范围涉及收入收敛、减少贫困和新的中产阶级的兴起。在参与这一全球性大趋势中，拉丁美洲的中等收入家庭的贫困率上升，收入收敛的成效也很平庸，尤其是在促进全球增长方面更是乏善可陈。

中国目前正在经历一系列重大变化，将形成转移财富的一个新阶段，迈向所谓的“财富转移Ⅱ”。这些变化包括增长速度向中高速换挡，消费支撑增长取代投资支撑增长。此外，老年抚养比正在上升，城市化进程加快，中产阶级的比例日益增大，将会通过消费和储蓄产生内需上的重大变化。中国迈向“财富转移Ⅱ”的另一个关键要素是自身的结构转型。在这个过程中，可以预见中国将进一步迈向知识经济，在技能和科技密集型行业的竞争力会更强。

这并不是说，中国未来的发展没有风险。相反，拉丁美洲在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是一个强有力的警示，一旦一个国家已经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将会面临更大的困难，需要改造发展的过程。考虑到与其他国家制度差距较大，尤其是在法治这个国家要规避发展陷阱的非典型领域，中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不容忽视。

拉丁美洲的发展所面临的挑战还没有任何更好的处理办法。相反，在来自亚洲的大宗商品需求式微和中国作为制造强国而崛起的背景下，拉丁美洲在结构转型过程中遇到的麻烦更多。此外，这一章揭示了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缺乏那些成功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所具有的许多结构性特征，尤其是与制度禀赋和生产结构复杂性相关的特征。

结论指出，对于拉丁美洲国家而言，两个领域的政策改革特别迫切，包括：第一，旨在使生产经济多元化从而迈向更多的增值产业和经济活动的政



策；第二，旨在改善制度，尤其是那些与商业环境、腐败与治理相关的制度的政策。

参考文献

Ahrens, N. (2013), “China’s industrial policymaking process”, A Report of the CSIS Hills Program on Governanc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Washington, DC.

Aiyar, S., R. Duval, D. Puy, Y. Wu and L. Zhang (2013), “Growth slowdowns and the middle-income trap”, *IMF Working Paper*, www.imf.org/external/pubs/ft/wp/2013/wp1371.pdf.

Altenburg, T., H. Schmitz and A. Stamm (2008), “Breakthrough? China’s and India’s transition from production to innovation”, *World Development*, Vol. 36/2, pp. 325 – 344, Elsevier, Amsterdam.

Amsden, A. (1989), *Asia’s Next Giant: 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NY.

Atlas of Economic Complexity (2015),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t Harvard University, www.atlas.cid.harvard.edu.

Balassa, B. (1977),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revisited: An analysis of relative export shares of the industrial countries, 1953 – 1971”, *The Manchester School*, 45 (4), pp. 327 – 344.

Becker, G. and R. J. Barro (1988), “A reformulation of the economic theory of fertility”,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03, No. 1, pp. 1 – 25.

Blanchard, O. and F. Giavazzi (2005), “Rebalancing growth in China: A three-handed approach”,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No. 05 – 32, Cambridge, MA, <http://economics.mit.edu/files/1764>.

Cai, F. and M. Wang (2008), “A counterfactual analysis on unlimited surplus labor in rural China”, *China & World Economy*, Vol. 16/1, pp. 51 – 65, <http://iple.cass.cn/upload/2012/06/d20120604145827366.pdf>.

Ceglowski, J. and S. Golub (2012), “Does China still have a labor cost advantage?”, *Global Economy, Journal*, Vol. 12, No. 3, http://repository.brynmawr.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02&context=econ_pubs.

Chun, N. (2010), “Middle class size in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A description of trends in Asia”, *ADB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217, Asian Development Bank,

<http://adb.org/sites/default/files/pub/2010/economics-wp217.pdf>

Cimoli, M., G. Dosi and J. E. Stiglitz (2015), “The rationale for industrial and innovation policy”, *Intereconomics*, Vol. 50, No. 3, May/June, pp. 125 – 155.

Citigroup (2012), “China & emerging markets: China is about to rebalance. How will EMbe affected?”, *Citi GPS: Global Perspectives & Solutions*, July, www.citivelocity.com/citigps/ReportSeries.action?recordId=7.

Devonshire – Ellis, C., M. Zito and E. Ku (2014), “China’s rising manufacturing cost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China Briefing: Business Intelligence from Dezan Shira & Associates*, July 8, 2014, www.china-briefing.com/news/2014/07/08/chinas-rising-manufacturing-costs-challenges-opportunities.html.

Du, Y. and M. Wang (2010), “Demographic ageing and employment in China”, *Employment Working Paper*, No. 57,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Geneva, 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emp/-/-emp_policy/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140841.pdf.

ECLAC/EU – LAC Foundation (2015), “Espacios de diálogo y cooperación productiva: El rol de las pymes”, (“Reinforcing production cooperation and dialogue spaces: The role of SMEs ”), available in Spanish at http://repositorio.cepal.org/bitstream/handle/11362/38233/espaciosdedialogo_es.pdf?sequence=1, available in English at www.cepal.org/en/node/31756.

Eichengreen, B., D. Park and K. Shin (2011), “When fast growing economies slow down: International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China”, *NBER Working Paper*, No. 16919,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www.nber.org/papers/w16919.pdf.

Felipe, J., A. Abdon and U. Kumar (2012), “Track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What is it, who is in it, and why?” *Working Paper*,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of Bard College, Annandale-on-Hudson, NY, www.levyinstitute.org/pubs/wp_715.pdf.

Ferreira, F. G., J. Messina, J. Rigolini, L. – F. López-Calva, M. A. Lugo and R. Vakis (2013), “Economic mobility and the rise of the Latin American middle class”, *World Bank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Studies*,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2012/11/16988965/economic-mobility-rise-latin-american-middle-class>.

Financial Times (2015), “China seeks productivity salvation in robots”, 25 June, www.ft.com/cms/s/3/ebe588d2-1b4e-11e5-8201-cbdb03d71480.html#axzz3kRdPlg9T, (article).

Galor, O. and D. N. Weil (1996), “The gender gap, fertility, and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6, No. 3, pp. 374 – 387.



拉丁美洲经济展望 (2016) : 发展与中国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

Gourdon, J., S. Monjon and S. Poncet (2015), “Trade policy and industrial policy in China: What motivates public authorities to apply restrictions on exports?” *CEPII Working Papers*, April, pp. 11 – 12, www.cepii.fr/PDF_PUB/wp/2015/wp2015-05.pdf.

Haggard, S. and L. Tiede (2011), “The rule of law and economic growth: Where are we?” *World Development*, Vol. 39, No. 5, pp. 673 – 685.

Heilmann, E. and L. Shih (2013), “The rise of industrial policy in China, 1978 – 2012”,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Series*, www.harvard-yenching.org/sites/harvard-yenching.org/files/featurefiles/Sebastian%20Heilmann%20and%20Lea%20Shih_The%20Rise%20of%20Industrial%20Policy%20in%20China%201978-2012.pdf.

Hidalgo, C. A. and R. Hausmann (2009), “The building blocks of economic complexity”,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6/26, pp. 10570 – 10575, www.pnas.org/content/106/26/10570.full.pdf.

Hu, A. (2015), “Embracing China’s ‘new normal’: Why the economy is still on track”,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5-04-20/embracing-chinas-new-normal.

Huang, Y., J. Chang and L. Yang (2013), “Consumption recovery and economic rebalancing in China”, *Asian Economic Papers*, 12, issue 1, pp. 47 – 67.

IMF (April 2015),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5/01/weodata/index.aspx.

Jankowska, A., A. Nagengast and J. R. Perea (2012), “The product space and the middle-income trap: Comparing Asian and Latin American experiences”, *OECD Development Centre Working Papers*, No. 311,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dx.doi.org/10.1787/5k9909j2587g-en>.

Johansson, A., Y. Guillemette, D. Turner, G. Nicoletti, C. Maisonneuve, G. Bousquet and F. Spinelli (2012), “Looking to 2060: Long-term global growth prospects”, *OECD Economic Policy Papers*, OECD, Paris.

Kharas, H. (2010), “The emerging middle clas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orking Paper* No. 285, OECD Development Centre, Paris, www.oecd.org/dev/44457738.pdf.

Kharas, H. and H. Kohli (2011), “What is the middle income trap, why do countries fall into it, and how can it be avoided?”, *Global Journal of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Vol. 3, No. 3, pp. 281 – 289.

Korotayev, A. and S. Tsirel (2010), “A spectral analysis of world GDP dynamics: Kondratieff waves, kuznets swings, juglar and kitching cycles in glob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2008 – 2009 economic crisis”, *The Structure and Dynamics eJournal*, 4 (1), Issue 1, pp. 1 – 55, <http://escholarship.org/uc/item/9jv108xp#page-46>.

Kwasnicki, W. (2008), “Are business cycles inevitable?”, *Munich Personal RePEc Archive*

Paper, No. 17295, https://mpra.ub.uni-muenchen.de/17295/1/MPRA_paper_17295.pdf.

Liu, Peilin, Shen Jia and Xun Zhang (2015), “Catch-up cycle of the developing economies”, *Management World*, No. 5. (in Chinese).

Lo, D. and M. Wu, (2014), “The state and industrial policy in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J. Salazar-Xirinachs, I. Nubler and R. Kozul-Wright (eds.), *Transforming Economies: Making Industrial Policy Work for Growth, Jobs and Development*, pp. 307 – 326, UNCTAD – ILO, Geneva, 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pub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242878.pdf.

Lu, M., C. Milner and Z. Yu (2012), “Regional heterogeneity and China’s trade: Sufficiently lumpy or no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20, No. 2, pp. 415 – 429,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j.1467-9396.2012.01030.x/abstract> Maddison Project (2010), database, www.ggdc.net/maddison.

Mazzucato, M. (2013), *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 Debunking the Public vs. Private Myth in Risk and Innovation*, Anthem, London.

Melguizo and Nieto-Parra (forthcoming), “Overcom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in Latin America: The role of skills, infrastructures finance and fiscal policy”, *OECD Development Centre Working Paper*. Molnar, M. and W. Wang (2015), “A snapshot of China’s service sector”, *OECD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s* 1217,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dx.doi.org/10.1787/5js1j19lhbkl-en>.

Moreira, M. M. (2006), “Fear of China: Is there a future for manufacturing in Latin America?”, IDB Publications, *Occasional Paper*, No. 36,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Washington, DC, <https://publications.iadb.org/bitstream/handle/11319/2359/Fear%20of%20China%3a%20Is%20there%20a%20Future%20for%20Manufacturing%20in%20Latin%20America%3f.pdf?sequence=1>.

OECD (2015a), *All on Board: Making Inclusive Growth Happen in China*, OECD, Paris, www.oecd.org/china/all-on-board-making-inclusive-growth-happen-in-china_EN.pdf.

OECD (2015b), *OECD Economic Surveys: China 2015*,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dx.doi.org/10.1787/eco_surveys-chn-2015-en.

OECD (2014a), *Perspectives on Global Development 2014: Boosting Productivity to Meet the Middle-Income Challenge*,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dx.doi.org/10.1787/persp_glob_dev-2014-en.

OECD (2014b), *China: Structural Reforms for Inclusive Growth*, Better Policies,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dx.doi.org/10.1787/9789264215962-en>.

OECD (2013a), *Perspectives on Global Development 2013: Industrial Policies in a Changing*



拉丁美洲经济展望 (2016) : 发展与中国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

World,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dx.doi.org/10.1787/persp_glob_dev-2013-en.

OECD (2013b),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Avoiding the Middle -Income Trap: Policies for Sustained and Inclusive Growth*, Better Policies,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dx.doi.org/10.1787/9789264207974-en>.

OECD (2010), *Perspectives on Global Development 2010: Shifting Wealth*,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dx.doi.org/10.1787/9789264084728-en>.

OECD (2009), *Latin American Economic Outlook 2010*,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dx.doi.org/10.1787/leo-2010-en>.

OECD/CAF/ECLAC (2014), *Latin American Economic Outlook 2015: Education, Skills and Innovation for Development*,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dx.doi.org/10.1787/leo-2015-en>.

OECD/CAF/ECLAC (2013), *Latin American Economic Outlook 2014: Logistics and Competitiveness for Development*,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dx.doi.org/10.1787/leo-2014-en>.

Quah, D. (2011), "The global economy's shifting centre of gravity", *Global Policy*. Vol. 2, Issue 1, pp.3-9,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j.1758-5899.2010.00066.x/pdf>.

Pritchett, L. and L. H. Summers (2014), "Asiaphoria meets regression to the mean", *NBER Working Paper*, No. 20573, www.frbf.org/economic-research/files/Pritchett-Summers-AEPC2013.pdf.

Rodrik, D. (2013), "Structural change, fundamentals and growth: An overview", *Working Paper*,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www.sss.ias.edu/files/pdfs/Rodrik/Research/Structural-Change-Fundamentals-and-Growth-An-Overview_revised.pdf.

Rohde, R. and R. Muller (2015), "Air pollution in China: Mapping of concentrations and sources", <http://berkeleyearth.org/wp-content/uploads/2015/08/China-Air-Quality-Paper-July-2015.pdf>.

Solomou, S. (1988), *Phases of Economic Growth, 1850 - 1973: Kondratieff Waves and Kuznets Swing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New York.

The Economist (2015a), "Global manufacturing: Made in China?", 14 March, www.economist.com/news/leaders/21646204-asias-dominance-manufacturing-will-endure-will-make-development-harder-others-made (article).

The Economist (2015b), "The future of factory Asia: A tightening grip", 14 March, www.economist.com/news/briefing/21646180-rising-chinese-wages-will-only-strengthen-asia-hold-manufacturing-tightening-grip (article).

The Economist (2014), "China's next great leap", 24 August, <http://glookahead.economist.com/chinasnext-great-leap/> (blog).

第三章 财富转移、中国“新常态”和拉丁美洲

The Guardian (2015), “China may bring in ‘two-child policy’ to tackle demographic timebomb”, 23 July, 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5/jul/23/china-may-adopt-two-child-policy-this-year-demographic-timebomb-looms (article).

Tomba, L. (2004), “Creating an urban middle class: Social engineering in Beijing”, *The China Journal*, No. 51, January, pp. 1-26.

Tylecote, A. (1994), “Long wave, long cycles, and long swings”,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28 (2), pp. 477-488.

United Nations (2015a), United Nations Commodity Trade Statistics Database (Comtrade), <http://comtrade.un.org/>.

United Nations (2015b),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New York, NY, <http://esa.un.org/unpd/wpp/DataQuery/>.

United Nations (2012),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2 Revision*,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New York, NY.

Woo, W. T. (2012), “China meets the middle-income trap: The large potholes in the road to catching up”,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 Vol. 10, Issue 4, pp. 313-336.

World Bank (2015a),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database, <http://data.worldbank.org/products/wdi>.

World Bank (2015b), *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database, <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wide-governance-indicators>.

World Bank (2014), PovCalNet Database, <http://iresearch.worldbank.org/PovcalNet/>.

World Bank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P. R. China (2014), *Urban China: Toward Efficient,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www.worldbank.org/en/country/china/publication/urban-china-toward-efficient-inclusive-sustainableurbanization.

World Bank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P. R. China (2013), *China 2030: Building a Modern, Harmonious, and Creative Society*,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2013/03/17494829/china-2030-building-modern-harmonious-creative-society>.

Zhang, X., J. Yang and S. Wang (2010), “China has reached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IFPRI Discussion Paper*, No. 000977,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http://ebrary.ifpri.org/utils/getfile/collection/p15738coll2/id/1737/filename/1738.pdf>.

Zhang, Y. (2011), “Zhuanxing yu tuqi: Quanzhou shiyexiade Zhongguo fuwu jingji”,



拉丁美洲经济展望（2016）：发展与中国的新型伙伴关系

（“Transformation and take-off: China's service economy in the new era of globalization”），*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Beijing.

Zhuang, J., P. Vandenberg and Y. Huang (2012), *Growing Beyond the Low-Cost Advantage: How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an Avoid the Middle-Income Trap*, Asian Development Bank, Mandaluyong City, Philippines, <http://adb.org/sites/default/files/pub/2012/growing-beyond-prc-avoid-middle-incometrap.pdf>.

第四章

中拉贸易的趋势和机遇

近期的商业繁荣现象十分有利于拉丁美洲的初级产品出口商，导致对中国的出口集中在少数几类商品，这与其对世界的出口形成鲜明对比。与此同时，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总量也呈现大幅度增长。进口产品的进入在一些市场中对本地区制造业造成的竞争压力不断加大。进口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一些情况下，从中国进口的产品的增长为企业提供了更为有效的中间消耗品，促进了地区的竞争力和生产率；通过全球价值链，中间产品贸易在拉美和中国两个地区呈现大幅度增长。尽管如此，这一动态似乎正在发生改变。2000~2014年的最近15年间，拉美与中国的贸易值增长了20倍，而在同一时期其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值只提升了3倍，但是近年来由于中国需求放缓，中拉贸易逐渐放缓，这就预示着拉美要重新评估和中国的贸易往来给该地区带来的机遇，比如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以及带来的多元化方面的挑战等。为了增加利润，拉美国家可以深化区域价值链来利用好各种全球性的机遇，尤其是在服务行业进行强力整合。

双边贸易的低增长将持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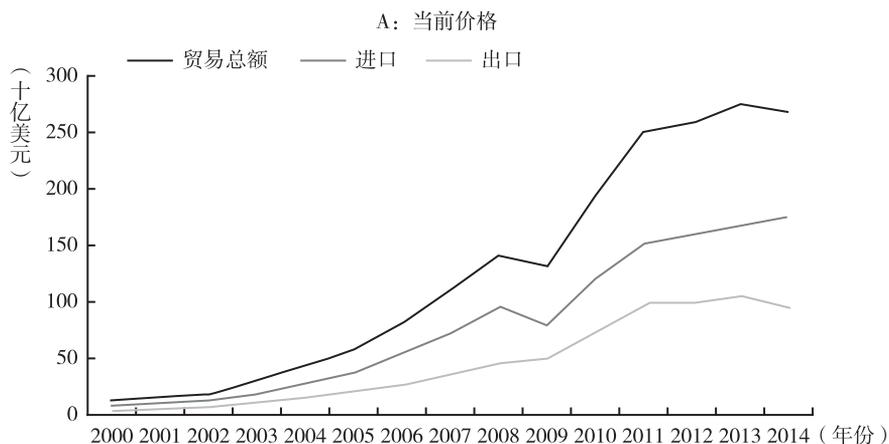
与2013年相比，2014年中国和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的货物贸易额减少了2%，这是自2009年来首次下跌，主要归咎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对中国的出口额下降了（约10%），不过从中国的进口额增长了3%，弥补了一



部分下跌空间（见图 4-1A）。2014 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出口到中国的贸易额的降幅要比向世界其他国家（2%）的出口要多得多。事实上，2014 年是 21 世纪以来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对中国出口的第一次下滑，尽管在 2009 年和 2013 年对其他国家的出口出现了下跌，但当时对中国的出口仍呈上升趋势。

2014 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对中国出口额的下降反映了中国对原材料需求的减弱。在能掌握到信息的拉美 16 个国家中，对中国出口价值下降的国家达到 13 个，它们的出口总额占该地区对中国总出口额的 94%。2012 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略有放缓，从投资和出口驱动转变为消费驱动，减少了对原材料的需求，而这恰恰是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对中国出口的主体成分。

中国需求的下降导致了初级产品价格的下跌，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 2014 年拉美出口额下跌的原因。当以恒定价格来测量贸易流量时，拉美对中国的出口从 2000 年到 2014 年呈现一个上升的趋势，2014 年增长率甚至达到 1%（见图 4-1B）。这低估了初级产品价格对出口额的影响，揭示了出口额上涨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出口商品价格的提高，而不在于贸易量的增长。2014 年出口量相对于 2012 年和 2013 年上涨了 10%，这表明中国需求的下降同样显著地影响了拉美地区的出口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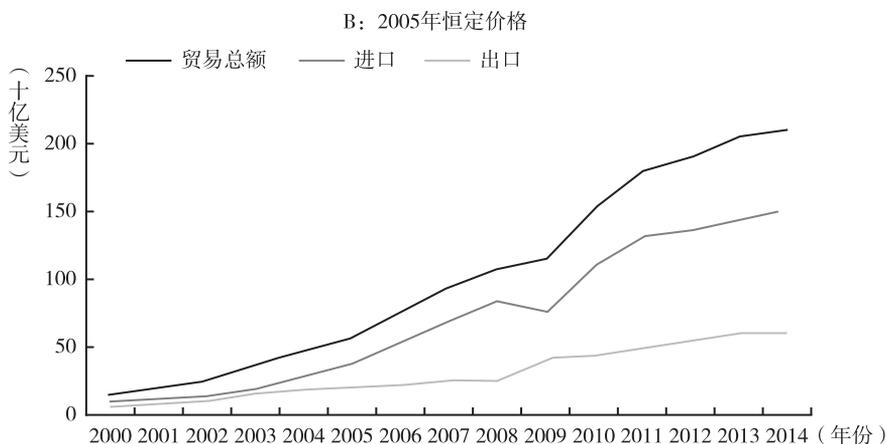


图 4-1 2000 ~ 2014 年拉美和中国的贸易值

注：2014 年的数据来自以下 16 个国家的官方渠道：阿根廷、委内瑞拉、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墨西哥、巴拿马、巴拉圭、秘鲁、玻利维亚和乌拉圭。

资料来源：OECD/CAF/ECLAC 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商贸统计数据库）计算，<http://comtrade.un.org/>。

统计链接：<http://dx.doi.org/10.1787/888933302971>。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主要来自墨西哥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对中国也一直保持着稳定的贸易逆差，但南美大多数国家和中国保持着相对的贸易平衡。总之，拉美和加勒比整个区域在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初级产品和制造业上与中国保持贸易顺差。相反，在其他制造业上，拉美整个地区和所有次区域与中国都存在贸易逆差。

鉴于未来几年无论对中国还是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GDP 增速放缓的预测，双边贸易很难达到过去 15 年的增长速度。2000 ~ 2013 年，中国和拉美及加勒比地区之间的贸易额增长了 22 倍，平均年增长率为 27%，而这一时期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和世界其他区域的贸易额增长了 3 倍，年增长率为 9%。然而，最近 10 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对中国的贸易有所削弱，2011 ~ 2013 年年增长率只有 5%，2014 年还降低了 2%。如果双边贸易在未来几年能保持 2013 年的增速（6%），那么在 2023 ~ 2024 年贸易额将达到 5000 亿美元。



这是在 2015 年 1 月《中国—拉美加勒比共同体 2015 ~ 2019 年合作规划》上提出的未来 10 年要实现的目标。

拉美与中国贸易的高速增长率造成了 初级产品出口的大量集中

当前中国是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第二大进口来源地，以及该地区第三大出口目的地（Comtrade, 2015; World Bank, 2015）。2000 ~ 2014 年，中国在拉美地区进口的比例从 2% 上升到 16%，与此同时，出口份额从 1% 上升到 9%，在 2013 年达到 10%。因此，2014 年，中国和欧盟地区在拉美和加勒比的贸易中的比例大致相等（分别为 12.4% 和 12.5%）。尽管欧盟是除美国之外该地区的第二大出口市场，但从 2010 年开始，中国已经取代欧盟成为除美国之外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第二大进口国。拉美地区已经成了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2010 年，拉美地区吸收了 3% 的中国出口总额，同年中国 2% 的进口商品来自拉美，到了 2014 年，这两项数值分别达到 6% 和 7%。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出口到中国的产品范围比出口到其他国家更窄得多。2013 年，初级产品占据了拉美向中国出口的 73%，占向世界其他国家出口的 41%。相反，低、中、高端科技产业和制造业只占拉美向中国出口的 6%，而占其向世界其他国家的出口比例为 42%。尽管如此，进口方面却呈现完全相反的现象：2013 年拉美地区从中国进口的低、高、中端科技产业和制造业占 91%，而从世界其他国家进口的比例则占 69%（见图 4-2）。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和中国贸易显然是产业内的：以原材料换取制造业。出口到中国的产品集中在少数几个类别的初级产品之上。但是，2000 ~ 2013 年，从该地区出口到中国的产品数量几乎翻了一倍，从 2000 年占区域内出口产品的 26% 上升到 2013 年的 53%。尽管如此，两大市场之间产品数量上的差距从国家层面上看显得尤为突出。除巴西和墨西哥外，这种差异性在拉美其他国家几乎在 8 ~ 35 倍波动。不仅如此，2013 年，该地区出口到中国出口总额的 75% 集中在五类初级产品，而在 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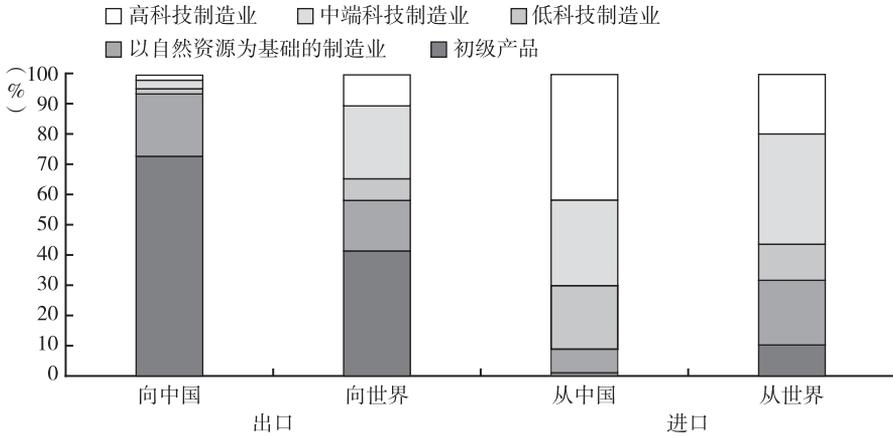


图 4-2 2013 年拉丁美洲对中国及世界的科技密度结构

注：产品五大类别的定义是根据 Lall (2000) 的研究中对技术范围的数值来计算的。

资料来源：OECD/CAF/ECLAC 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商贸统计数据库）计算，<http://comtrade.un.org/>。

统计链接：<http://dx.doi.org/10.1787/888933302986>。

年这一比例仅为 47%，从那时起拉美开始对中国输出大量的初级产品（见图 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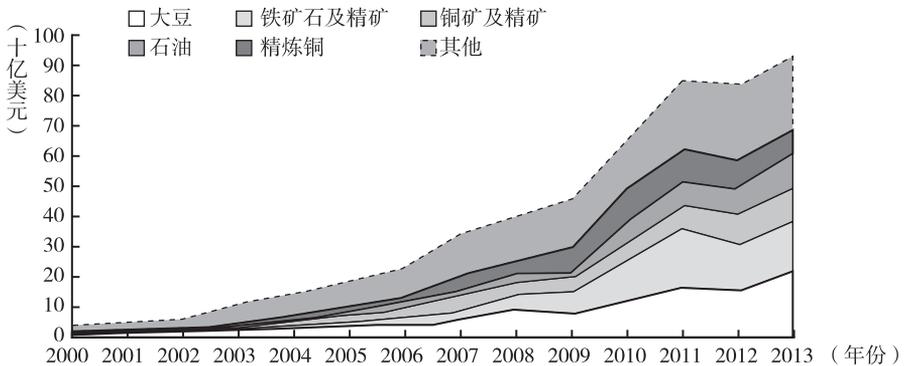


图 4-3 2000 ~ 2013 年拉丁美洲出口到中国的产品

资料来源：OECD/CAF/ECLAC 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商贸统计数据库）计算，<http://comtrade.un.org/>。

统计链接：<http://dx.doi.org/10.1787/888933302990>。



2013年，拉美及加勒比地区所有国家（除墨西哥外）出口到中国的产品中，五类主要产品占了总额的80%以上，其中绝大部分是初级产品。产品出口量最大的为石油、铁矿石、铜（各种形式）、大豆、鱼粉、废旧钢铁，木材和糖类。除豆制品外，由拉美出口到中国的农产品和工农业产品尽管在过去的十年已经有所增加，但仍然很少。同样的状况在制造业方面也存在（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除外）。

中国和拉丁美洲贸易的扩大以及这两地区的贸易流对当地的就业和岗位创造起到了重要作用。相比向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出口，拉美地区向中国出口的产品更多集中在初级产品上，使在对中国的出口贸易所创造的就业岗位在整个出口中占比较低，因此和中国贸易交往对就业造成的直接影响取决于出口行业中就业的增加和一些与中国进口存在竞争的行业中就业的减少二者之间的相对平衡。这个结果在各个国家存在异质性，取决于与中国的贸易的具体状态（见专栏4.1）。

专栏 4.1 与中国的贸易模式对拉美就业的影响

拉美和中国贸易的扩大对就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创造就业率方面，贸易量和贸易模式同等重要。因此这一商业关系的状态是决定贸易扩张在拉美劳动力市场上的影响的重要因素。

拉美对中国的出口在创造就业方面的影响比较有限，主要是由于拉美的出口集中在初级产品上，尤其是那些开采的自然资源，因为这一类的出口产品所创造的就业比农业或制造业类更少（Ray et al., 2015）。因此，和其他贸易伙伴相比，拉美地区出口到中国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就要少很多，而且只集中在少数几个行业和部门。最近的证据表明，和该地区其他出口相比，出口到中国的产品中，每100万美元创造的就业概率将比其他国家少20%（Ray et al., 2015）。2012年，每100万美元的出口额产生了56个工作岗位，但当年对中国出口同样的金额只产生了44个就业岗位。而在2002年，出口到中国的每100万美元能产生67个就业岗位，可以看出，这一数值近年来有了明显的下降，这说明拉美出口到中国的产品中初级产品的比重在不

断上升 (Ray et al. , 2015)。

在就业方面对每个国家造成的具体影响取决于这个国家对中国的进出口的具体构成 (World Bank, 2015)。数据表明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是有所不同的。在阿根廷和巴西, 和中国的贸易对他们国家的矿业和农业部门的就业产生了积极影响, 弥补了一部分制造业就业率的下降。因此, 这两国的总就业率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准确地说, 是从制造业转移到了农业和矿业, 从非正规经济变为正规经济 (Artuc, Lederman y Rojas, 2015)。

对巴西的进一步研究表明, 与中国贸易对次区域的就业方面起着决定性的影响。该地区在就业方面受中国需求的冲击 (比如初级产品的需求) 最为强烈, 尽管创造的就业岗位非常有限, 但是工作岗位的质量得到提升, 正规就业比例也上升使一大批人有了正式的工作, 同时农业部门和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部门产生了大量的劳动力。在一些受供给冲击影响大的区域 (如中国进口制造业), 劳动力在技能岗位的比例相对来说有所下降, 在不进行交易部门的非技能岗位, 劳动力的比例有所上升 (Costa, Garred y Pessoa, 2014)。

在墨西哥, 由于和中国进行贸易而衍生的就业岗位大体来说是比较消极的, 这主要是由于制造业在经济中的占比很大, 而农业和矿业增加的就业量不足以弥补制造业方面由于中国进口竞争所带来的劳动力的下降。因此就业需求上升, 很多劳动力纷纷从制造业转移到农业和矿业 (Artu, Lederman y Rojas, 2015)。

拉美和中国的商业关系对拉美各个国家造成的就业影响尽管情况各异, 但总的说来比较有限, 主要是由于以下两点因素: 一是劳动密度较低的初级产品相对集中的出口; 二是从中国进口的制造业产品的竞争。如果不改变贸易模式,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在向中国出口商品这一环节中所产生的就业机会依然很少。尽管如此, 中国经济模式正处于转型阶段, 可以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就业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在制定政策行动时应该予以考虑。

资料来源: Ray et al. (2015); Costa, Garred y Pessoa (2014); Artuc, Lederman y Rojas (2015), World Bank, (2015)。



农产品贸易的潜力与日俱增^①

近年来，拉美国家越来越多地把中国作为农产品出口目的地。出口到中国的农产品占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农产品总出口的比重从1990年的1.1%上升到2000年的2.5%，2013年达到了13.2%（见图4-4）。如此快速增长使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在农业贸易方面对中国保持较大的贸易顺差，而且这种顺差规模还在不断上升。从2000年开始，农产品出口价值年均增长27%，到2013年达到了274亿美元，其进口值年均增长15%，同年达到15亿美元，因此，2013年拉美地区对中国保持了260亿美元的农业贸易顺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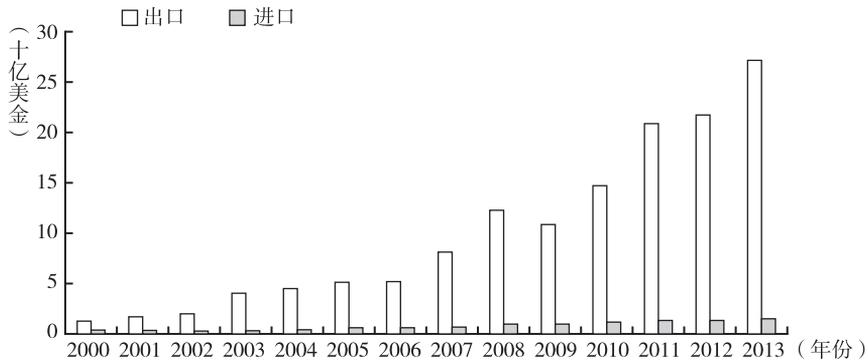


图4-4 2000~2013年拉丁美洲和中国的农业贸易

资料来源：OECD/CAF/ECLAC 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计算，<http://comtrade.un.org/>。

统计链接：<http://dx.doi.org/10.1787/888933303006>。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作为中国农产品供应商的重要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在中国农产品和农牧业的进口中所占比例从2000年的16%上升到2013年的28%。这一数据已经与美国和加拿大总和持平，是东南亚国家联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主要竞争对手所占比重的2倍多（见图4-5）。

^① 本节中农产品是按照世贸组织农业协定的分类来进行定义的，包括初级产品、农产品、酒类饮品以及皮革、毛纺、丝绸类和棉纺类等其他制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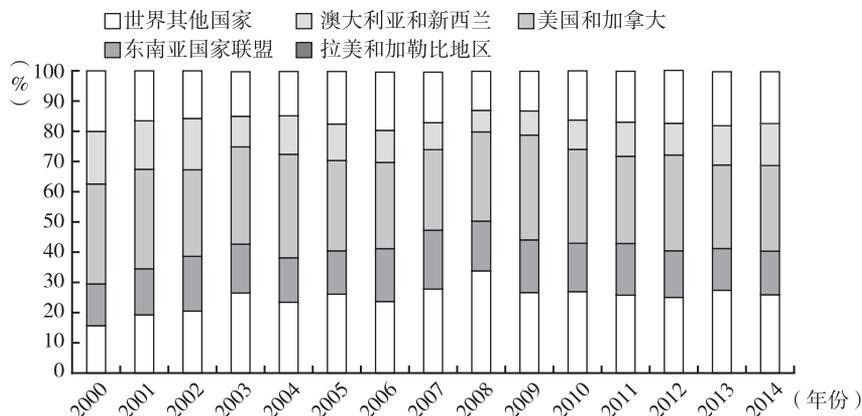


图 4-5 2000 ~ 2014 年中国进口农产品中贸易伙伴的参与情况

资料来源：OECD/CAF/ECLAC 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计算，<http://comtrade.un.org/>。

统计链接：<http://dx.doi.org/10.1787/888933303018>。

未来几年，拉美地区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良好态势有可能保持下去。与总体贸易不同，拉美地区对中国的农业贸易额近几年并没有放缓，在 2013 年还增长了 25%。这是由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加快，中产阶级不断扩大，中国面临着养活庞大人口的挑战。这个趋势将和我们在第五章中所解释的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预示着中国在质量更高的食品方面的需求将会剧增——这将为拉美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创造一系列机会，甚至使出口组合多元化。考虑到中国农产品行业在满足这一需求方面存在巨大的缺口，而一些拉美企业在成功打入大多数需求市场后，会提升自身在粮食的生产和销售方面的能力，那么它们在扩大对中国出口新产品或已有产品方面可谓顺理成章。

尽管拉美出口到中国的农产品具有坚实的基础，但是产品来源国和产品种类的集中限制了这一地区的当前利益。从国家范围看，在销往中国的农产品中，来自巴西的占了 75%，如果加上来自阿根廷、乌拉圭和智利的农产品，总份额几乎接近 100%（见图 4-6A）。巴西是继美国之后中国的第二大农产品供应商，所供农产品占中国 2013 年农产品进



拉丁美洲经济展望（2016）：发展与中国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

口总额的 20%。从产品层次上看，出口到中国的农产品高度集中，仅在 2013 年，大豆的出口额就占了 77%，如果加上其他四种最重要的出口产品，出口总额达到了 90%（见图 4-6B）。除大豆油外加工类产品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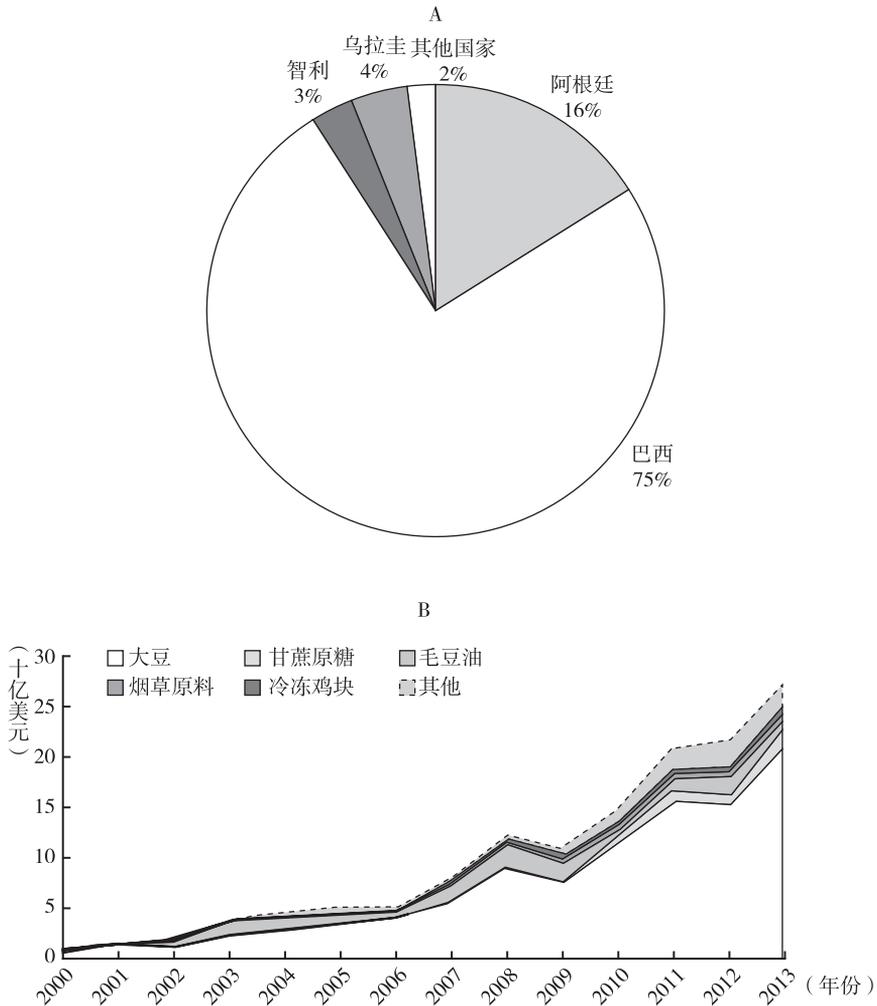


图 4-6 拉丁美洲出口到中国的农产品构成

资料来源：OECD/CAF/ECLAC 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计算，<http://comtrade.un.org/>。

统计链接：<http://dx.doi.org/10.1787/888933303025>。

出口到中国的产品中所占的比重最低，2013 年仅占农产品出口总额的 4%。

中国从全世界进口的农产品集中度要比从拉美地区进口的小得多。中国从世界上进口的 10 种主要产品中 60% 是农产品。大豆是中国从拉美地区乃至全世界进口最多的农产品，占中国农产品进口总量的 34%，占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进口农产品的 77%，这表明拉美地区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多元化机遇方兴未艾。现在，出口加工类产品往往会受到很多限制，主要是由于加工类产品、食品工业的初级产品的进出口关税很重。对于一些食品半成品，有时关税要征收其名义价值的 20%，这比制造业的关税要高得多（OMC，2012）。和从拉美地区进口的农产品一样，中国从世界其他国家进口的农产品中很少有加工类产品，但这一需求很有可能在未来几年会有所改变（见第五章中国对农产品的需求预测）。

原产自中国制造业的进口产品及其对 区域竞争力产生的影响

从中国进口的需求快速增长，给当地的生产者造成了较强的竞争压力。具体来说，就是那些制造业较为夯实的国家会担心中国的商品将极大影响它们本国的生产和就业，并且威胁到它们的制造业产品向第三方市场出口，从而加剧该地区经济的“去工业化”过程。实际上，自 2000 年以来，中国产品出口到拉美市场的增速的确非常惊人：该地区来自中国的进口比重从 2000 年的 2.3% 增长到 2013 年的接近 16%。在 2000 年的时候中国还没有进入拉美地区任何一个国家进口来源地的前三甲，而现在对于该地区的所有主要国家来说，中国都是第一或第二进口来源国。在所有的制造行业，来自中国的进口增速比该地区来自世界其他国家的进口增速要快得多。当然，这种增长过程主要发生在 21 世纪的前十年，从 2010 年开始，从中国进口制造产品的速度已经放缓，增长率更接近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进口增长率。



专栏 4.2 进口渗透的预计

从行业来看，从中国进口工业制成品的数额增长^①并不一定代表它在拉美市场竞争力的扩展。为了证实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对国内生产造成了影响，还有必要评估它的渗透率。渗透率是指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在表观消费量中所占的比例。拉美八个国家（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墨西哥、秘鲁及乌拉圭）的表观消费量计算公式为：

$$AC_{it}^k = NS_{it}^k + M_{it}^k - X_{it}^k \quad (1)$$

其中： AC = 表观消费量； NS = 国家发行量； M = 进口； X = 出口； k = 部门； i = 国家； t = 年份。10 个宏观工业部门在 2000 年、2005 年、2012 年的国家产量是由 2015 年版的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业统计数据库提供的（ONUDI, INDSTAT2）。补充数据来自加拉经委会 LA - KLEMS 项目、中央银行和国家投入——产出数据。进出口数据来自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作为进口产品竞争力的衡量方法，从中国进口的产品表观消费比例计算公式为：

$$I_t^k = \frac{M_{it}^k}{AC_{it}^k} * 100 \quad (2)$$

其中： I_t^k = 中国进口产品的表观消费数据。

结果表明：2000 ~ 2012 年，从中国进口的产品的渗透率在所有国家都逐步增长（见图 4 - 7）。巴西拥有拉美地区最大的制造业基地，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在国内制造业的消费中比例最低（3%）。在其他 7 个国家，中国进口商品的渗透率在 2014 年超过了 5%，其中受到较大影响的国家有智利、厄瓜多尔、墨西哥、乌拉圭和哥伦比亚。

资料来源：OECD/CAF/ECLAC 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数据（2015），INDSTAT2 -

① 该分析有一个重要的附加说明，即认为中国产品是本地最终产品的完美替代品，不过，这些进口产品的一部分是作为本地生产的中间消耗品。如果在所分析的时间段内，来自中国的中间产品的数量很多的话，那么对进口竞争的测算将被高估。

2015年版,第3.2次修订,ISIC, www.unido.org/en/resources/statistics/statistical-databases/indstat2-2015-edition.html; ECLAC, LA-KLEMS (2015), www.cepal.org/cgi-bin/getprod.asp?xml=/la-klems/noticias/paginas/4/40294/P40294.xml&xsl=/la-klems/tpl-i/p18f-st.xsl&base=/la-klems/tpl-i/top-bottom.xsl; 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商贸统计数据库), <http://comtrade.un.org/>以及各国中央银行。

自2000年以来,中国商品的竞争力主要是在纺织、服装行业、计算机行业、机械电子等领域有所增强。在10个宏观部门中,纺织和服装业在中国进口商品表观消费量中所占的比例比较高。例如,对于纺织品和服装行业,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在智利的表观消费量中的比重由2000年的23%增长到了2011年的65%,在哥伦比亚由2000年的3%上升到了2012年的19%,在乌拉圭由2000年的8%增加到2010年的20%。在计算机、电子机械行业,中国进口产品的渗透率在2000~2011年经历了神话般的增长。智利由23%增长到2011年的41%;哥伦比亚由3%增长到34%,秘鲁从1%增长到36%,墨西哥从1%增长到28%等。

2000年以来,中国产品的进口渗透率在各个国家各个行业都在不断增长。然而,这种增长并不意味着损害了拉美的国内生产,因为更廉价的中国产品仅仅是代替了从其他国家进口产品的渠道,因而有必要比较一下中国进口商品和来自其他国家进口商品的渗透率。事实上,从制造业表观消费比例来看,从中国进口和从世界其他国家进口的商品,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见图4-7)。从中国进口的渗透率在所有国家都有所增长,而从世界总进口的渗透率仅仅在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有所上升,在其他国家,总进口渗透率是相当稳定的,甚至是有所下降的,比如墨西哥。因此,对于这些国家,中国进口商品渗透率上升只是弥补了世界国家进口产品渗透率下降的事实而已。

行业分析表明,纺织和服装行业最受中国产品的竞争影响。在智利,中国进口商品很明显地替代了本国产品,该国2011年全球进口渗透率几乎达到90%。而在巴西、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等其他国家,尽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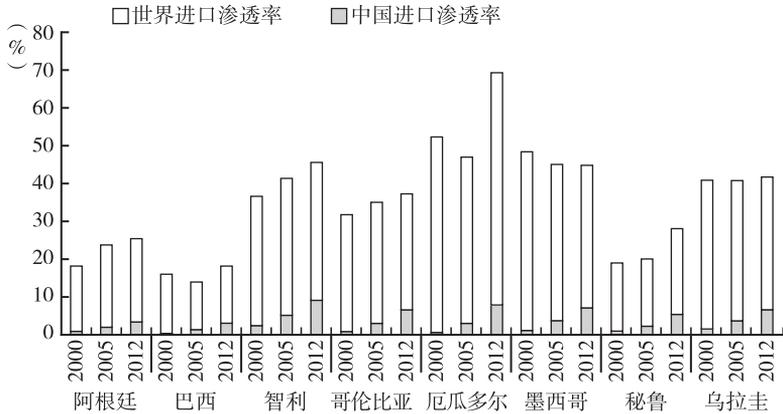


图 4-7 在选定年份和国家从中国和世界的进口在制造业中的渗透率
(占表观消费的百分比)

注：各国可获得的数据最近可到的年份为：智利、墨西哥、秘鲁（2011）；乌拉圭（2010）；阿根廷（2009）；厄瓜多尔（2008）。

资料来源：OECD/CAF/ECLAC 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业统计数据库（2015），INDSTAT2 - 2015 年版，第 3.2 次修订，ISIC，<http://www.unido.org/en/resources/statistics/statistical-databases/indstat2-2015-edition.html>；联合国（2015），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http://comtrade.un.org/>；ECLAC LA - KLEMS（2015），<http://www.cepal.org/cgi-bin/getprod.asp?xml=/la-klms/noticias/paginas/4/40294/P40294.xml&xsl=/la-klms/tpl-i/p18f-st.xsl&base=/la-klms/tpl-i/top-bottom.xslcountries>，以及各国中央银行。

统计链接：<http://dx.doi.org/10.1787/888933303031>。

范围较小，但也存在类似的情况，中国进口渗透率的上升带来的结果是世界进口渗透率指标的上升。不过，在计算机行业、电子和机械行业情况有所不同，2000 ~ 2005 年，世界进口产品渗透率在所有行业都在上升，甚至比中国进口产品渗透率还要高。从 2005 年开始，尽管中国表观消费额增加，却没有一个国家的世界进口渗透率因此得到相应的上升。由此推断出，在该行业内从中国进口的上升是替代了对其他国家的进口。^①

① 应该指出，2 位分类的工业行业世界进口渗透率的稳定将会掩盖住某些更加分散的次部门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对本地产品的替代，抵消其他国家其他次行业的本国产品的增长。可借由于数据的限制无法进行更详细的分析。

第三方市场的竞争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一些贸易限制被取消，中国出口商品得以进入前所未有的发达国家的市场和行业，结果加剧了拉美国家出口第三方市场的贸易竞争。至今为止，已有多种方法衡量了双方贸易竞争的程度。^①几乎所有的研究都表明，中国的贸易扩张在过去十年对拉美向第三方市场的出口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②各国影响根据国家和行业有一定的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纺织、服装）、高工资行业和部分制造业等部门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López-Córdova, Micco and Molina, 2007; Moreira, 2007）。

通过计算拉美地区制造业在最主要的出口目标市场（包括美国和拉美内部市场）中销售比例的变化可以分析出竞争状况。2002年，中国占美国的制造业进口比例超越了墨西哥。从2004年起，中国占美国的进口比例超越了整个拉美地区（见图4-8A）。此外，2000~2010年，当拉美国家在很多行业失去竞争力的时候，中国却在所有产品的市场份额中都有所上升。

拉美在纺织和服装行业份额的减少主要是由于该行业中国份额的增加。在美国的纺织和服装行业的进口中，中国产品的比例从2000年的22%增加到2010年的48%，与此同时，整个拉美地区的份额从23.1%下降到11.7%。在其他领域，拉美市场的份额并没有减少，但来自中国进口的增长已经超过了拉美地区。这可能表明，来自中国的相关产品挤出了拉美地区的同类产品。这种情况在木材、纸张、橡胶、塑料、基本金属和机械设备等领域尤为明显。在机械设备领域，在美国的进口产品中，来自中国的比例由2000年的9%上升到2010年的32%，与此同时，拉美地区在该项指标上只从15%上涨到18%。

① 这些方法包括贸易流动的引力模型、替代品灵活性评估，以及市场份额分析（Jenkins, 2008a）。

② Lederman, Olarreaga 和 Soloaga 通过对比发现，即使如第三章中所论述的，拉美国家在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上依旧非常孱弱，但由于生产网络的建立，中国出口产生了积极的影响（Lederman, Olarreaga and Soloaga, 2007）。



尽管中国到拉美的出口异常火爆，从2000年2%的比例上升到了2014年的16%，但是截止到2010年，拉美从美国进口的费用远在区域内部贸易之上（见图4-8B）。因此，从2000年到2010年，中国进口取代了美国制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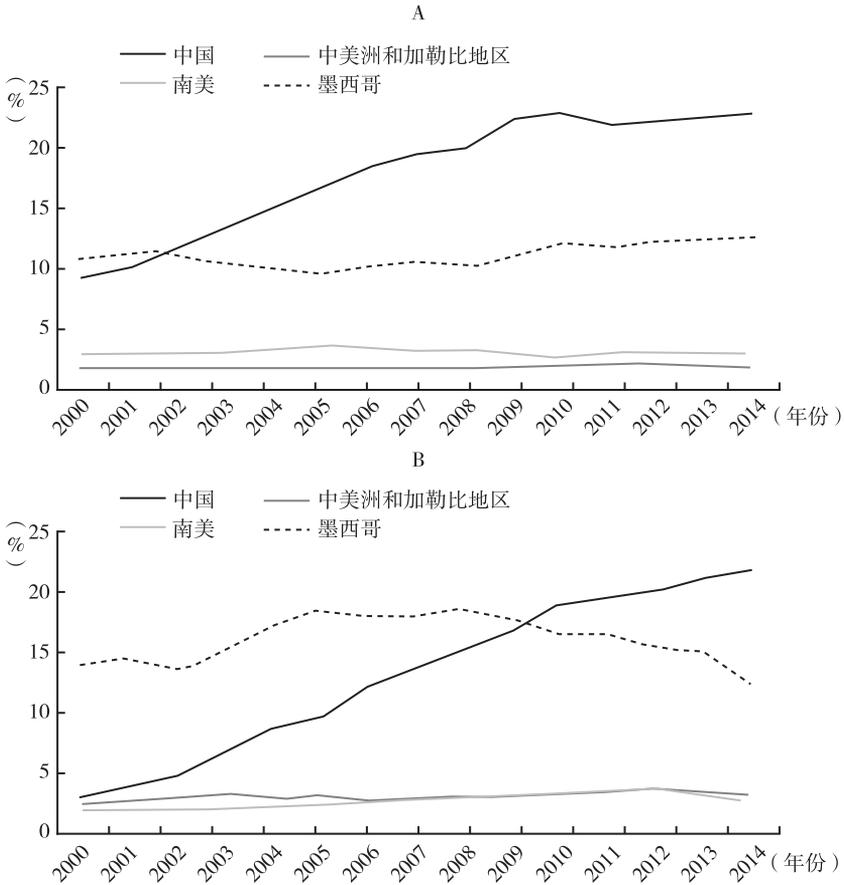


图4-8 2000~2014年美国 and 拉丁美洲的进口市场比例

注：33个拉美国家为：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巴哈马、巴巴多斯、伯利兹、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古巴、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格拉纳达、危地马拉、圭亚那、海地、洪都拉斯、牙买加、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马、巴拉圭、秘鲁、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苏里南、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乌拉圭、委内瑞拉。

资料来源：OECD/CAF/ECLAC 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计算，<http://comtrade.un.org/>。

统计链接：<http://dx.doi.org/10.1787/888933303046>。

超过了从拉美地区内其他国家的进口。在一些部门，从中国进口的增长速度比从拉美其他国家进口的增长速度快得多，尤其是橡胶和塑料制品、非金属矿物和机器设备。中国产品在拉美市场中占有率最高的是纺织品和服装行业，从2000年的7%上升到2010年的37%，同一时期来自拉美其他国家的商品的市场占有率一直稳定在15%。2010~2014年中国在所有产品领域的份额都有所增加，同期，整个拉美地区自产产品的比例由18%下降到14%。在这种情况下，南美国家受到的影响最大，因为它们所有制造业的比例都下降了。

拉丁美洲和中国出口在第三方市场的某些领域的贸易竞争显而易见。为了便于了解拉美产品所面临的潜在竞争，引入了出口相似度指数，如相似性系数（CC）和专业化系数（OCDE，2007）。这些指标用于比较两国的出口结构并计算它们的重合率。通过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对于拉美在第三方市场出口的潜在威胁比较低（BID，2004；OCDE，2007）。但是，这种方法无法抓取中国经济规模的影响，因此，在预估竞争对手的出口威胁意义方面，这些指标很有可能无法正确反映竞争效应（Jenkins，2008b）。

要衡量贸易竞争，我们必须考虑到中国经济规模的影响。要分析拉美国家与中国的竞争效应，最适合的指标便是竞争威胁指数（IAC）。该指标可以观察到中国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商品所占的百分比，特别是在那些在一定时期内中国产品的出口增长率高于世界出口的行业（见图4-9）。通过该指标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首先，一些拉美国家，像墨西哥，它们在过去的十年面临着比预期更激烈的竞争。平均而言，有45%的出口产品增长率低于中国同类出口组合的增长率。其次，该指标呈现下降的趋势，反映了相对于中国而言，拉美产品的竞争力在第三方市场正在下降。尽管如此，拉美经济的整体环境还是比中美洲国家的经济要乐观（见专栏4.3）。

专栏 4.3 中美洲与中国：发展前景

中美洲依旧是拉丁美洲最贫穷的次区域，许多中美洲国家非常依赖初级产品的出口。但不同于拉美其他初级产品出口国，中美洲国家没有从中国对初级商品的大量需求中受益。Avendaño 和 Dayton-Johnson 研究了这些国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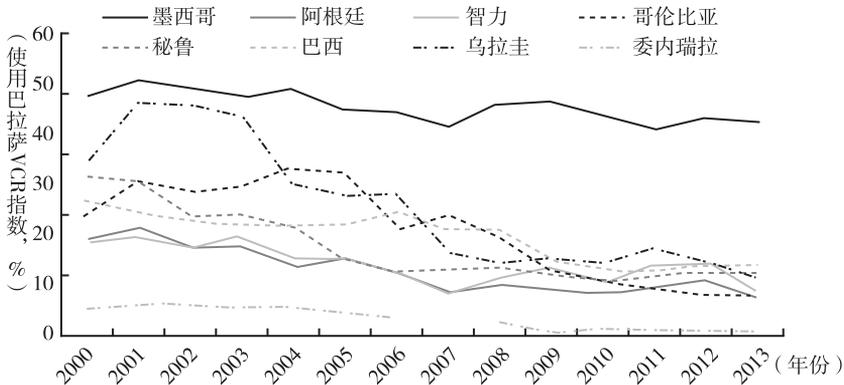


图 4-9 2000 ~ 2013 年拉美各国竞争威胁指数的波动

注：竞争威胁指数用来测试在 2000 ~ 2012 年中国的增速超过了全球出口增速的行业（按照国际贸易标准的 4 位分类，第 3 修订版进行分类）所占百分比。

资料来源：OECD/CAF/ECLAC 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计算，<http://comtrade.un.org/>。

统计链接：<http://dx.doi.org/10.1787/888933303059>。

商业结构和投资量，他们发现这些国家和中国产品在第三方市场（如墨西哥）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同时又缺乏与中国需求的互补性（不同于阿根廷或智利）（Avendaño and Dayton-Johnson, 2015）。在出口方面，中美洲国家仍然高度依赖美国市场，而且外商直接投资和外资援助的规模较小。虽然该次区域对美国的依赖有所下降，但是大多数国家已与美国签订了优惠贸易协定，出口模式已经从农业转移到了组装产业，在一些国家如哥斯达黎加，向美国和中国输出一些复杂的制造业产品。中国对中美洲有三重影响：一是中美洲出口的产品不在中国主要的进口产品组合中；二是对于那些碳氢化合物进口国家来说，石油和天然气潜在价格略高；三是在美国市场竞争不断加剧。这些使中美洲次地区的前景一片黯淡。

在贸易方面，官方援助对中美洲的发展（ODA）的重要程度已经下降，尽管一些国家（尼加拉瓜、萨尔瓦多）仍然强烈依赖于美国和西班牙的官方援助。尽管加勒比地区的一些国家已经从中国援助中受益，但是这些国家所接受的中国发展援助的组合数据不详。有两个国家例外：古巴是拉美地区

最早接受中国援助的国家（从1960年开始）；哥斯达黎加在近几年和中国加强了联系。这些援助的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社会项目、培训，以及提供技术合作和人道主义项目。

鉴于中美洲和中国台湾的关系，中美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日益复杂。当前在与中国台湾还保持着“邦交”关系的22个国家中的12个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所有国家除了巴拉圭，都是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非常小的经济体。在此背景下，为这个次区域定位为面向外部伙伴的战略区域，能够提高这些国家在当前的双边贸易中有限的谈判能力。尽管如此，中国这个因素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美洲发展战略的关键任务。

资料来源：Avendaño, R., Dayton-Johnson (2015)。

来自国际和国内贸易数据之间的差异性促使学者利用第二手资料来衡量拉丁美洲国家的竞争威胁水平。美国市场中竞争威胁指数的计算刻画了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对中国出口贸易竞争的另一种景象。在美国的市场中竞争威胁指数（ICTUM）地被持续地报道出来，包括加工厂的进口、免税区的出口，以及加工区的出口。图4-10表明中美洲国家在某些行业的贸易竞争不太乐观。

专栏 4.4 美国市场中商业竞争的测定：以墨西哥和巴西为例

作为测量贸易竞争的一种替代性方法，通常采用美国从中国进口数据来测算修正性显性比较优势（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这一方法仅限于美国市场。同时考虑中国对美国出口的比重。2014年所有商品的修正性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均在1以下。对那些2014年的修正性显性比较优势比2002年还低的商品，说明威胁正在减弱，因此可以将它们排除在外。

对于其他产品，将巴西和墨西哥作为典型案例国家，计算每一类产品在总出口中的百分比，重点放在那些出口到美国占比在75%以上的产品。该分析比较了从中国、巴西、墨西哥出口到美国市场的变化。

结果显示，在巴西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中，建筑行业和电力设备是最受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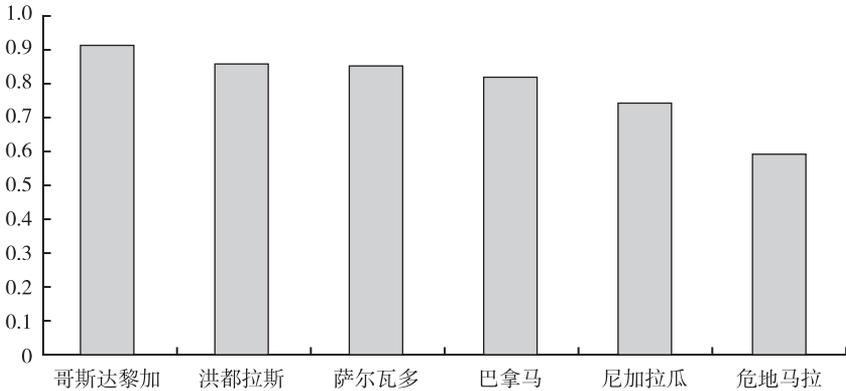


图 4-10 2013 年美国市场竞争威胁指数：中国 vs. 中美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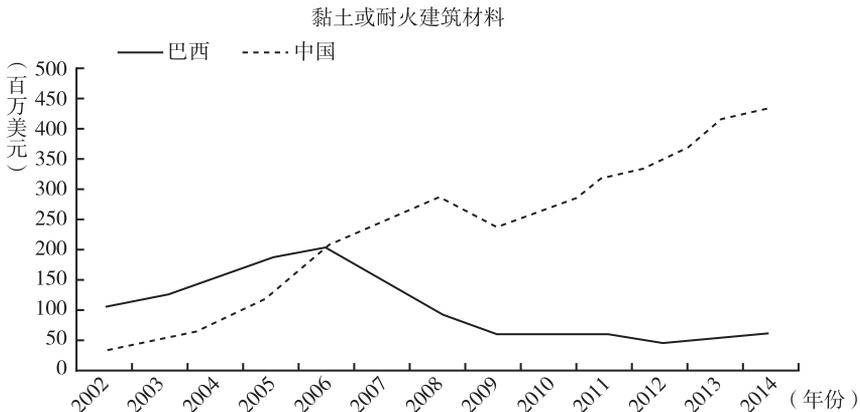
注：美国市场中的竞争威胁指数是用来计算 2004 ~ 2013 年中国的增长速度超过美国的行业（按照美国人口普查局的 2 位数分类法）所占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OECD/CAF/ECLAC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和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数据（2014）计算。

统计链接：<http://dx.doi.org/10.1787/888933303068>。

胁的行业。对于这一类行业商品，出口呈现大幅度下滑。虽然没有发现任何因果关系，在 2002 ~ 2014 年，相对于中国，巴西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力在上述产品中有所下降。

再如墨西哥，美国市场中最受威胁的项目是电子设备和纺织品。墨西哥的这些出口项目与中国有相同的趋势，但是墨西哥的相对竞争力在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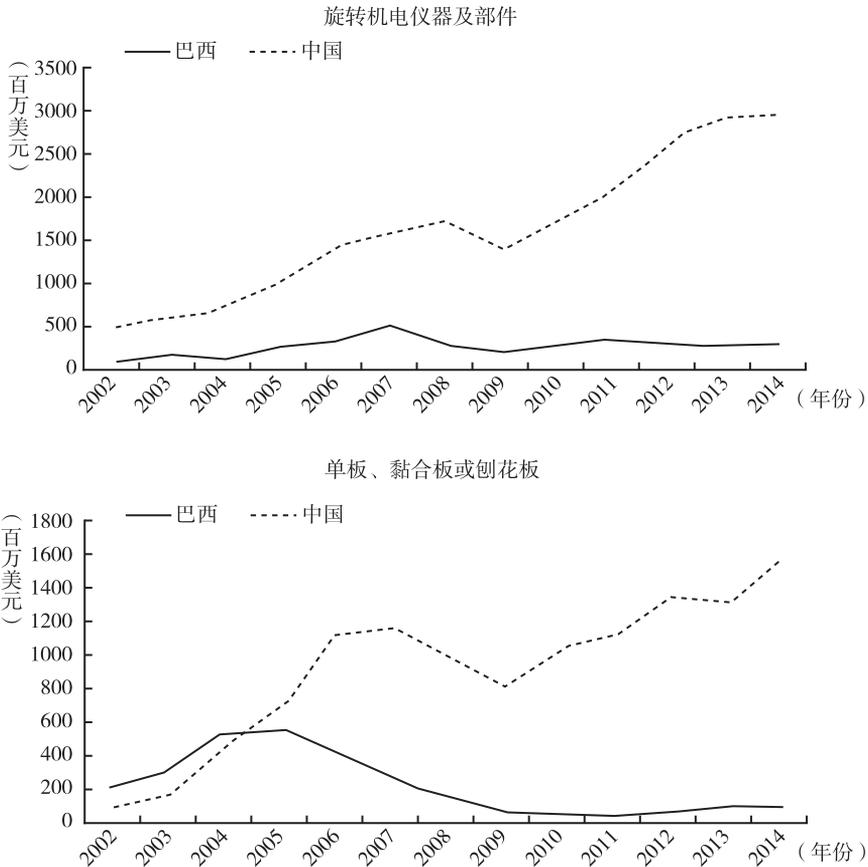


图 4-11 巴西和中国在特定产业上对美国的出口

资料来源：OECD/CAF/ECLAC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和国际贸易委员会（2014）的数据计算。

统计链接：<http://dx.doi.org/10.1787/888933303076>。

但是，从中国进口产品在推动拉美地区竞争力和生产力方面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有关贸易附加值（TiVA）的数据表明，来自中国的中间产品物美价廉，中国在工业附加值中外资参与程度每年都在上升，与拉美地区出口的增长具有非常显著的正相关性，尤其是在巴西、阿根廷、智利、哥斯达黎加等国家。这种竞争力的促进效应在农业部门、中高端科技产业、传统服务行业以及其他领域都得到了极大的体现。尽管因果联系方面的证据还不



拉丁美洲经济展望（2016）：发展与中国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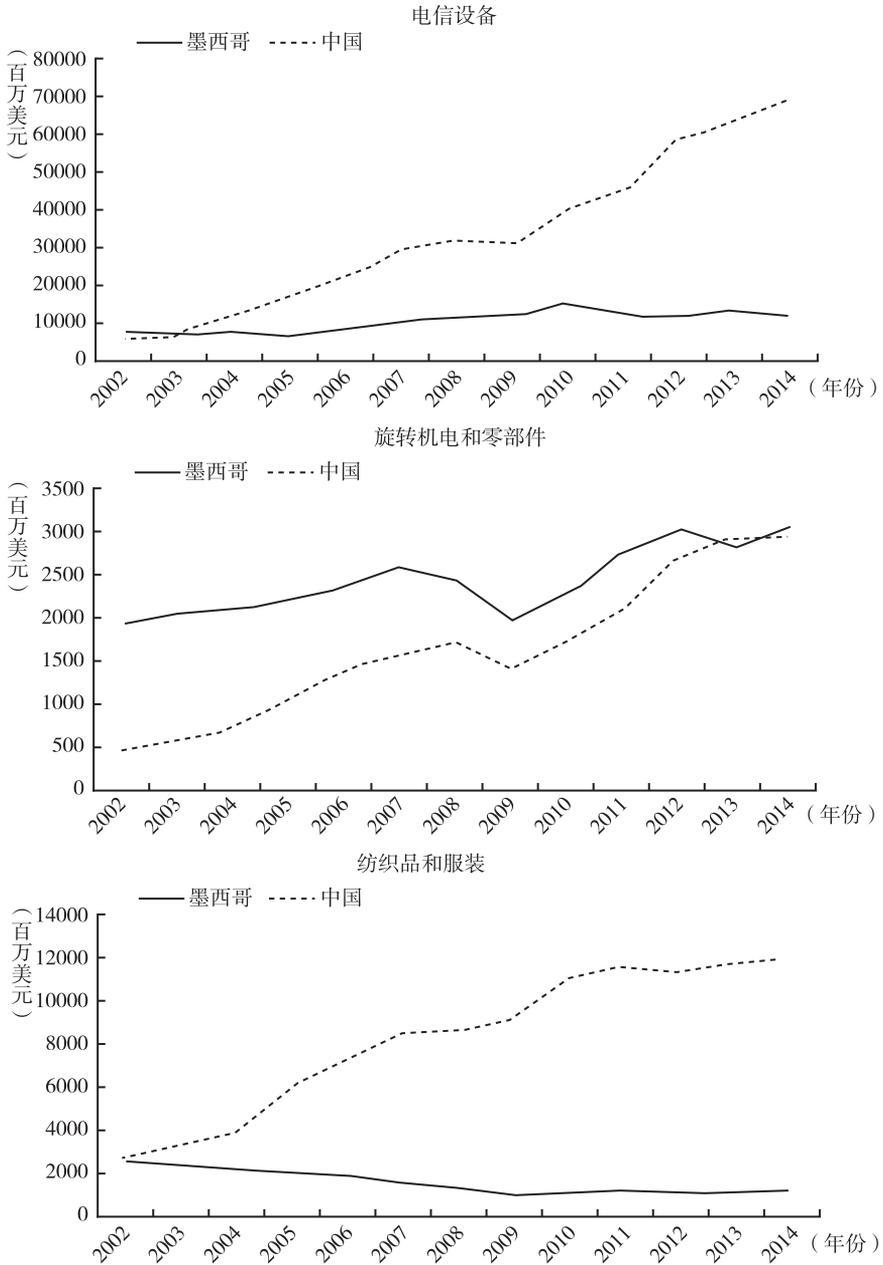


图 4-12 墨西哥和中国在特定产业上对美国的出口

资料来源：OECD/CAF/ECLAC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和国际贸易委员会（2014）的数据计算。
统计链接：<http://dx.doi.org/10.1787/888933303080>。

充足，却表明了中国进口产品在对拉美地区的产品出口方面发挥着一定的作用，这对某些行业的出口和生产部门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中国和拉美之间的全球和双边联系

以下各节从贸易附加值的角度分析了拉美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流量。计算每个生产阶段的附加值有助于测算各国在国际贸易中获取更大的收益，而且能追踪附加值在最终需求和消费中的比例，以及能够进一步融入地区和全球价值链。

以中国市场最终需求和消费为导向的出口

对中国和拉美之间的贸易联系的分析认为，每个地区的附加值都是融入相互的最终需求之内的，而出口也正是融入目标国的价值链之内的。这些市场双边贸易关系中互补的成分可以给双方市场提供有关中国发生变化方面的重要贸易信息，这是因为中国是价值链的积极参与方，正在努力进行经济再平衡，其作为目标市场也很重要。

鉴于中国的市场规模，拉美在服务于中国国内最终需求的供应链参与对分析双边贸易关系十分重要。这一元素在中国和拉美地区的贸易关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其增长潜力也预示着未来的重要性会继续扩大。融入中国最终消费的拉美附加值与融入中国总出口的拉美附加值之间的比例从2000年的1.5上升到了2011年的接近于2。中国的终端需求为拉美提供了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机会，正如第二章和第五章中所提及的，在很大程度上将影响其未来经济的发展。

融入中国最终消费的拉美附加值的比例（按照行业来源计算）最高的几个行业按降序排列依次为：农业、矿业、服务业。^①因而中国在这些行业

^① “能源产业”的产出要用于最终产品和最终服务的生产。最终需求或者出口行业的产品注定要用于最终需求和总出口。



中的需求变动会强烈影响中国从拉美地区的进口。从国家层面上看，很有可能创造各种各样的新机遇。在服务于中国最终需求的出口与中国总出口之间的比例最高的两个国家是巴西和阿根廷，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两个国家在农业方面的专业化。巴西的矿业和服务业在出口附加值上的比例也很高，哥伦比亚和墨西哥尽管不如巴西和阿根廷，但在矿业和服务业的附加值也很高。附加值比例最低的国家是哥斯达黎加和智利，这是因为它们的制造业（包括碱金属行业）在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尽管已经从2000年的2%上升到了2011年的6%，但是拉美在中国最终需求中的外国附加值的参与比例是很低的，亚洲是创造中国最终需求的进口附加值的主要区域，2011年占了37%，其次是世界其他区域，占比30%。拉美地区的附加值贡献很大程度上集中在巴西，2011年占总额的55%（之后是智利、墨西哥和阿根廷，分别为18%、13%和8%）。

在中国内需行业中，外国附加值比例最高的是中高端、高端科技产业和采矿业，比例较低的是农业、中低端、低端科技产业和服务业。该比例和每个行业的开放程度密切相关，这不仅体现在最终产品的贸易阶段，而且体现在最终产品生产的中间产品贸易阶段。因此，只要中国在这些领域降低关税和法规壁垒，外国附加值比例较低的那些部门将来可能会开发出未有的新产品，创造新机遇。这对拉美地区至关重要，因为不管是按照最终需求行业还是行业来源来分类，该地区的农业和服务业在最终需求中的外国附加值比例最高，高科技产业最低。

农业是拉美在满足中国最终需求上较世界其他地区具有更强的比较优势的部门（见图4-13）。因而，该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从农业部门日益上升的开放度、中国的经济再平衡以及对食品质量更高的要求中极大受益。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第五章中进行阐述。就拉美国家在中国的农业最终需求上的附加值分配问题上，巴西占比最高，为66%，之后是阿根廷、智利和墨西哥，分别为21%、7%和5%。因此，巴西和阿根廷最容易受到贸易政策变化和中国农业政策变化的直接冲击。

鉴于未来拉美在中国经济再平衡中的重要性，拉美在中国最终需求的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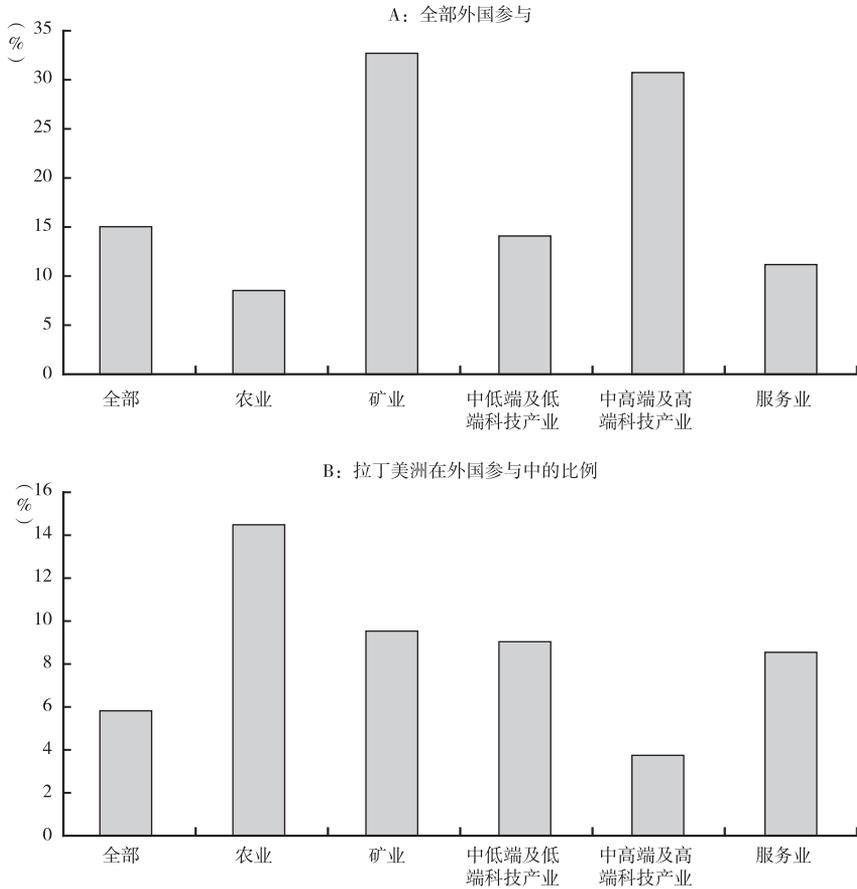


图 4-13 2011 年外国附加值在中国各产业终端需求的比例分配

资料来源：OECD/CAF/ECLAC 根据 2015 年 OECD/WTO 的贸易附加值数据（OECD/WTO, 2015）计算。

统计链接：<http://dx.doi.org/10.1787/888933303094>。

附加值问题上应该把眼光放远一点，这点非常重要。更多的行业加入满足中国最终需求的附加值的统一模式中来，但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农业在与最终需求相关的消费中的占比会更高。农业在最终消费中的重要性的上升所产生的后果将视拉美各国在附加值的分配比例而确定。根据附加值的这种分配方式，巴西占比最高，为 60%，之后是阿根廷（13%），智利（12%）和墨西哥（11%）。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现实转换

全球价值链是各个国家各个阶段产品生产和服务的总和，在最近几十年，由于运输成本降低、信息通信技术和自由贸易的实现已经改变了世界的生产和贸易格局。全球价值链主要由跨国公司主导，其贸易量占据了世界贸易总量的80%（AfDB/OECD/UNDP/UNECA，2013），其结果是中间产品的贸易流通变得越来越重要。

这种生产重组在参与价值链的同时给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现在，一个国家可以专注于产业链中的某项特定任务或特定细节的生产，而不是从零开始构建整条供应链。这使新兴产业可以通过一定的接入点参与到跨国公司的市场销售和分销渠道之中（Baldwin，2012）。全球价值链或区域价值链中出现新的环境，也许意味着出口多元化的机会（BID，2014）。全球价值链也会带来一定风险，由于要不断适应变化的市场环境和买家的严格要求，价值链中的贸易变得更不稳定。此外，那些对时间非常敏感的业务需要相应的物流基础设施、专业化服务和快速的海关管理跟进。如果缺乏这些因素，相应的国家和区域参入全球价值链就会受限制。

生产地域化使贸易活动的衡量标准变得更为复杂。中间产品在最终包装重组之前往往跨越许多国际边界，这产生了贸易数据的重复统计，降低了全球价值链贸易的准确性。要解决双重计算问题，可以采用区域间或国家间的投入—产出表，从附加值角度来正确计算国际贸易流量。投入—产出表着重于国与国之间的生产连接点，把外国附加值和本国附加值区分开来。此外，这种方法可以用来分析服务部门所起的作用，因为服务部门在全球价值链贸易中扮演了日益重要的角色（Duran y Zaclivever，2013）。

本节主要分析拉美和中国加入全球价值链后的总体趋势。具体来说，就是探讨两个区域之间的双边生产联系，研究全球价值链如何给拉美国家带来出口多元化方面的真正机会——尤其是在服务领域，同时分析中国加入全球价值链

是否会给拉美地区提供比其他地区更多的机会。^①最后，研究如何从与中国的贸易中获取最大利益的同时，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以及抓住多元化的机遇。

拉丁美洲融入区域和全球价值链的进程缓慢

区域一体化在地区间的差别非常大，与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贸易的水平差异、经济专业化程度以及贸易互补性密切相关。北美、亚洲和欧洲通过中间产品的贸易使一体化的程度保持在很高水平，而像南亚这样的区域一体化则依靠最终产品。中东和北非、西非和中非，以及东南亚在价值链上的一体化水平已经超越了本地区范围。地区之间中转贸易的动态似乎正在发生改变。最新的证据表明，北美和欧盟正在失去作为发展中国家中间产出来源地的重要地位，而国家间的关系比如非洲、拉丁美洲、中亚和东亚正得到加强（Kowalski et al. , 2015）。

除墨西哥外，几乎所有的拉美国家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活动边缘。全球价值链，就如中转贸易动态和外商直接投资量数据所显示，主要地集中在三个区域中心：北美圈、亚洲圈和欧洲圈（BID, 2014）。2000~2011年，这些地区的中间产品贸易量以年平均增长率为7.8%的速度急剧增长。这些贸易的相当部分是在地区之内发生的。除墨西哥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高度融入了北美自由贸易区之外，地区内贸易在拉美无论是占比还是中间产品和终端产品的增长率都很低，尽管最终产品的一体化程度相当高（见图4-14）。和其他地区相比，拉美地区间的一体化水平还比较低，这说明当前促进区域一体化所做的努力仍有局限性。此外，一体化水平低，中间产品比终端产品的一体化水平低，显示了拉美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份额十分有限，尤其是缺少区域价值链。

^① 该分析是基于OECD/WTO贸易附加值数据库基础之上的。2015年版包含了61个国家的数据以及1个“世界其他地区”在1995年、2000年、2005年、2008年、2009年、2010年和2011年的投入—产出表。2015年版包含了6个拉美国家——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的数据信息。更多信息请咨询<http://www.oecd.org/sti/ind/measuringtradeinvalueaddedanoecd-wtojointinitiative.ht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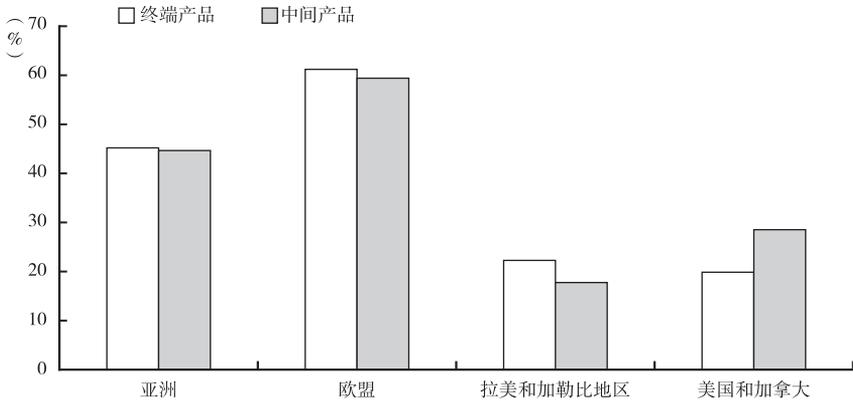


图 4-14 2011 年特定的地区内中间产品和终端产品的区域内贸易的比例

资料来源：OECD/CAF/ECLAC 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计算，<http://comtrade.un.org/>。

统计链接：<http://dx.doi.org/10.1787/888933303101>。

全球价值链的参与指数已经成为各个国家融入区域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的一项标准。这些数据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后向联系和前向联系（Bohn et al., 2015）。二者都是以占出口总量的比例来计算的，前者的占比要更高一些。总的来说，在一些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比较高的国家、国内的大市场通常后向联系的比例更低、前向联系范围更广，因为它们有更多的能力进行自给自足（OCDE, 2013）。此外，最新研究表明，后向联系更多地与产品多元化、生产力上涨以及积极的结构性变化密切相关（Rieländer y Traore, 2015；AfDB/OCDE/PNUD/CEPA, 2013）。因此，如果一个国家处于价值链的初始位置（上游），作为初级消耗品的供应者，提供的机遇与那些处于价值链更前端的国家（下游）不同，因为这些国家通常需要整合最终产品。

最新的一项分析全球价值链的主要推动力量的研究，强调了外生因素的重要影响（如与德国、日本、美国制造业的距离，国内生产总值中制造业的比例以及市场的规模），并与相关的政策因素进行比较（Kowalski et al., 2015）。与制造业中心的距离对中间产品的来源地的负面影响比最终产品的

贸易要强烈得多。在拉美四个大国中（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只有墨西哥由于其特殊的结构特点，达到了预期的一体化水平。分析表明，许多拉美国家在参与全球价值链中面临许多具体的困难，比如在零散性产业的专业化水平比制造业要弱很多，再如和制造业中心的距离、基础设施和物流方面遇到了瓶颈，等等。

拉美国家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比欧盟地区和亚洲明显要低很多，这要归咎于其全球价值链参与中的后向联系较少（见图4-15）^①。2011年，外资附加值占拉美（六国）的总出口比例为20%，与此同时，这一比例在欧盟和亚洲均为30%左右。拉美后向联系水平受墨西哥的影响很大，其在北美自由贸易区一体化程度很高（尤其是和美国在汽车领域和电子领域的贸易）。如果除去墨西哥，拉美地区的后向联系占总出口的比例会降至13%。

全球价值链前向联系的地理结构也表明拉美区域内一体化的水平相当低。从总体水平上看（六国），2011年，区域附加值在拉美销往第三国的出口中只占9%。不过，在国家 and 行业间存在很大的差异（见图4-18A）。阿根廷和哥伦比亚前向联系比例相对较大（2011年分别为17%和14%），但墨西哥占比就小很多（2011年为3%）。在行业分布方面，中高端和高端科技产业比其他产业前向联系的比重要高。中国的前向联系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2011年为40%，其后是欧盟，为20%），因为中国和“亚洲工厂”关系密切。

尽管如此，区域间的附加值在国家间存在的巨大异质性还是主要归因于结构问题，比如制造业在出口产品中的比例和市场规模等。那些市场大国以

① 我们以贸易附加值数据库中的六个拉美国家（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作为该地区的代表。2011年，这些国家占据了拉美地区71%的人口，76%的国内生产总值，78%的贸易总额和67%的区域内贸易。拉美其他国家放进了“世界其他国家”内，这样会低估区域一体化的程度。拉美六国的贸易几乎占了世界其他国家的一半（2000年是55%，2011年是48%）（Comtrade, 2015），这表明如果附加值贸易能够跟上总贸易流的话，那么拉美区域内贸易将被普遍低估。但是，这六个国家的一体化水平不一。就国家水平来看，一体化程度最为被低估的是哥斯达黎加和哥伦比亚，低估较少的是阿根廷和巴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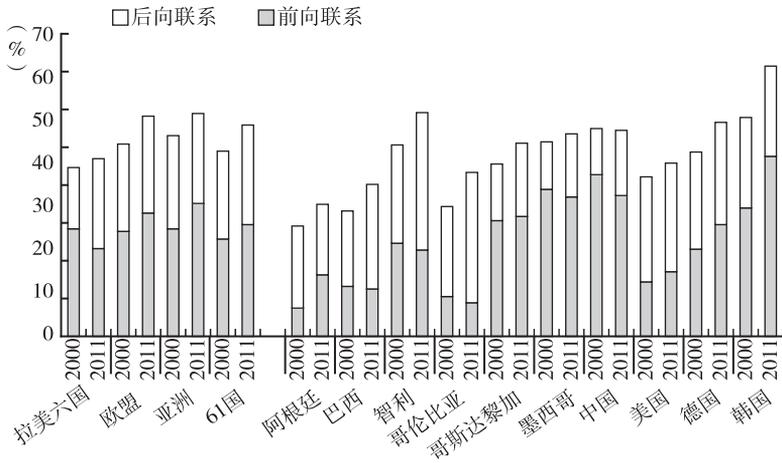


图 4-15 2000 年、2011 年特定国家和地区全球价值链中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比例

注：区域指标是通过每个国家提供的数据来计算的。

资料来源：OECD/CAF/ECLAC 根据 2015 年 OECD/WTO 的贸易附加值数据（OECD/WTO, 2015）计算。

统计链接：<http://dx.doi.org/10.1787/888933303111>。

及在农业、矿业和服务业等领域专业化程度高的国家，后向联系水平比较低（因为不需要从海外进口很多的中间消耗品），前向联系水平更高，就是说它们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上游位置，巴西、哥伦比亚和智利就是这种情况。相比之下，那些制造业一体化程度高的国家，比如墨西哥和哥斯达黎加，后向联系水平更高（2011 年占总出口的比例分别约为 32% 和 28%），这是因为制造业在生产的更高阶段往往是比较零散的。阿根廷的情况比较特殊，它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水平都很低。^① 中国尽管市场大，后向联系水平却很高（2011 年占总出口 32%）。

2000 ~ 2011 年，全球价值链的参与指标上升，明显呈现产品的国际分割不断加剧的总体趋势（见图 4-15）。本报告中所考察的大多数国家在这一时期的总体参与指数（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的总和）都在上升。韩国是

① 欧盟和亚洲同样表现出了更多的异质性，一些小国后向联系的水平很高。

唯一由后向联系的上升所驱动的国家（2011年约占总出口值的42%）。中国的总体参与指数几乎保持不变，不过后向联系程度显著降低（从37%降到32%），而与此同时前向联系比例升高（几乎从11%上升到16%）。至于拉美国家，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和墨西哥前向联系比例增幅较大，后向联系比例下降，阿根廷则恰恰相反。

拉美国家一体化的方向和程度^①

拉美国家在地区之内或者和他们的贸易伙伴之间的一体化程度不一。不同区域的中间出口构成显示了各个国家之间明显的差异性，这些差异性都反应在全球价值链的不同嵌入成分上（见图4-16A）^②。巴西和智利对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联系特别紧密，把这些区域作为矿产品（巴西）和贱金属（智利）等最主要产品的中间出口目的国。^③ 这些产品从巴西和智利出口到美国、加拿大和欧盟的比例非常高。

在阿根廷，中间产品出口主要集中在农业和食品，主要销往拉美其他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不过向中国的农产品中间出口上所占的比例也很高。出口到美国和加拿大的主要中间产品为贱金属和矿产，而出口到欧盟的大部分中间产品为农产品和食品。

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墨西哥与美国和欧盟的部分地区的一体化程度很高。哥伦比亚中间出口产品主要为矿产，大多销往美国，美国同时也是墨西哥主要的出口目的国，集中在汽车和电子行业。哥斯达黎加的中间出口产品主要为电子行业，主要目标市场是中国，其次是美国（和欧盟一样，同

① 一体化的程度是通过分析中间产品和服务的贸易来进行测量，也可以通过来自第三国、最终销往第三国的产出的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来进行测量。

② 贸易附加值数据库中的国家集群分为六大地区：（1）拉丁美洲（六国）；（2）除墨西哥以外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也就是说，美国和加拿大）；（3）欧盟（27国）；（4）中国；（5）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文莱、柬埔寨、中国台北、中国香港、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和（6）世界其他地区（贸易附加值数据库中包含的所有其他国家）。

③ 2011年出口到亚洲贸易国的出口量分别占巴西和智利中间出口总额的37%和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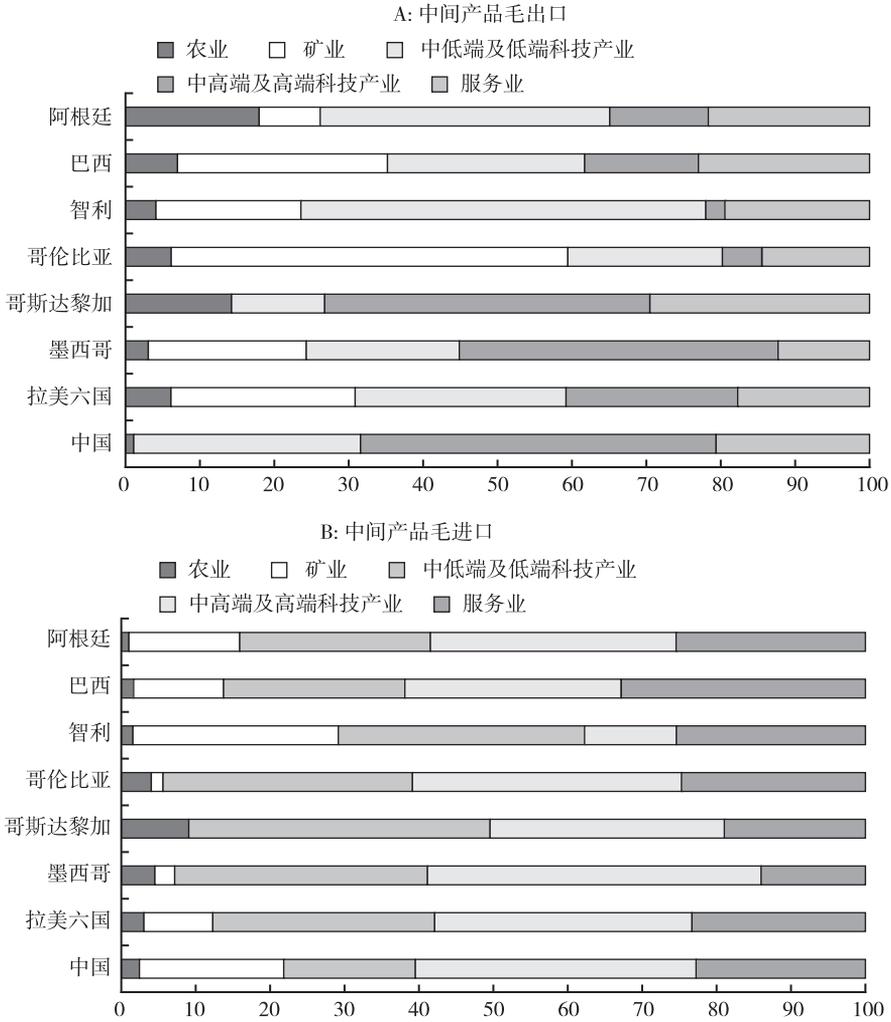


图 4-16 2011 年拉丁美洲和中国的中间产品贸易（按行业区分）

资料来源：OECD/CAF/ECLAC 根据 2015 年 OECD/WTO 的贸易附加值数据（OECD/WTO, 2015）计算。

统计链接：<http://dx.doi.org/10.1787/888933303124>。

时也是农产品的主要目的国)。

在拉美区域内，值得一提的是阿根廷和巴西的中间贸易，反映出南方共同市场的一体化程度。2011 年，阿根廷的中高端、高端科技等中间产品的

三分之一及其他中间产品的一大部分（尤其是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矿业和制造业）都来自巴西。不过，巴西的中间产品出口的主要目的地却不是阿根廷，而是美国和欧盟。这两个地区对于拉美六国来说是重要的中间产品来源地，墨西哥、哥斯达黎加的中间产品来自美国的比例较高，哥伦比亚的比例较低。拉美很大比例的中间产品来自中国，尤其是高科技产品。^① 数据库中包含的拉美六国从2000年起中间进口产品来自中国的比例刚开始的时候很低，近几年不断上升。

产品出口中的后向联系比例，也就是外资在总出口的比例，很大程度上依赖每个经济体的贸易专业化程度。在拉丁美洲（六国），后向联系大部分聚集在中高端和高端科技产业上（2011年占总量的58%，相当于12%的毛出口额）。其中主要的来源是美国和亚洲，一小部分来自拉美地区内部（见图4-17）。但是，国与国之间又有很大差别。对于阿根廷来说，后向联系主要集中在中低端、低端科技，而在水资在拉美的中高端、高端科技产业的出口占的比例很高（2011年分别为28%和36%）。除了中高端和高端科技产业外，阿根廷向世界其他国家出口的主要产品的比例比拉美整体水平要高（尤其是农业和矿业）。中国对阿根廷的出口外资附加值只有6%，在中高端和高端科技的出口占比约为8%，尽管自2000年以来这两项指标都有显著增长（分别为1.4%和1.6%）。

墨西哥和哥斯达黎加的后向联系主要集中在中高端科技和高科技产业（2011年分别为80%和60%），主要来源于美国。但是，从中国到墨西哥的后向联系的增长显著，尤其是在同一领域（从2000年的1.3%上升到2011年的接近15%）。巴西和哥伦比亚的后向联系比例比其他拉美四国要低，来自中国的后向联系的比例也在提高。

拉美六国在前向联系的水平和构成上差异显著（见图4-18）。作为总出口额的比例，前向联系倾向于在以自然资源为特色的国家中的比例较高，比如在智利、哥伦比亚和巴西（2011年分别为32%，30%和24%），而在

^① 除哥斯达黎加外，中国是2011年拉美国家主要的高科技中间产品进口国，占总额的40%。



拉丁美洲经济展望（2016）：发展与中国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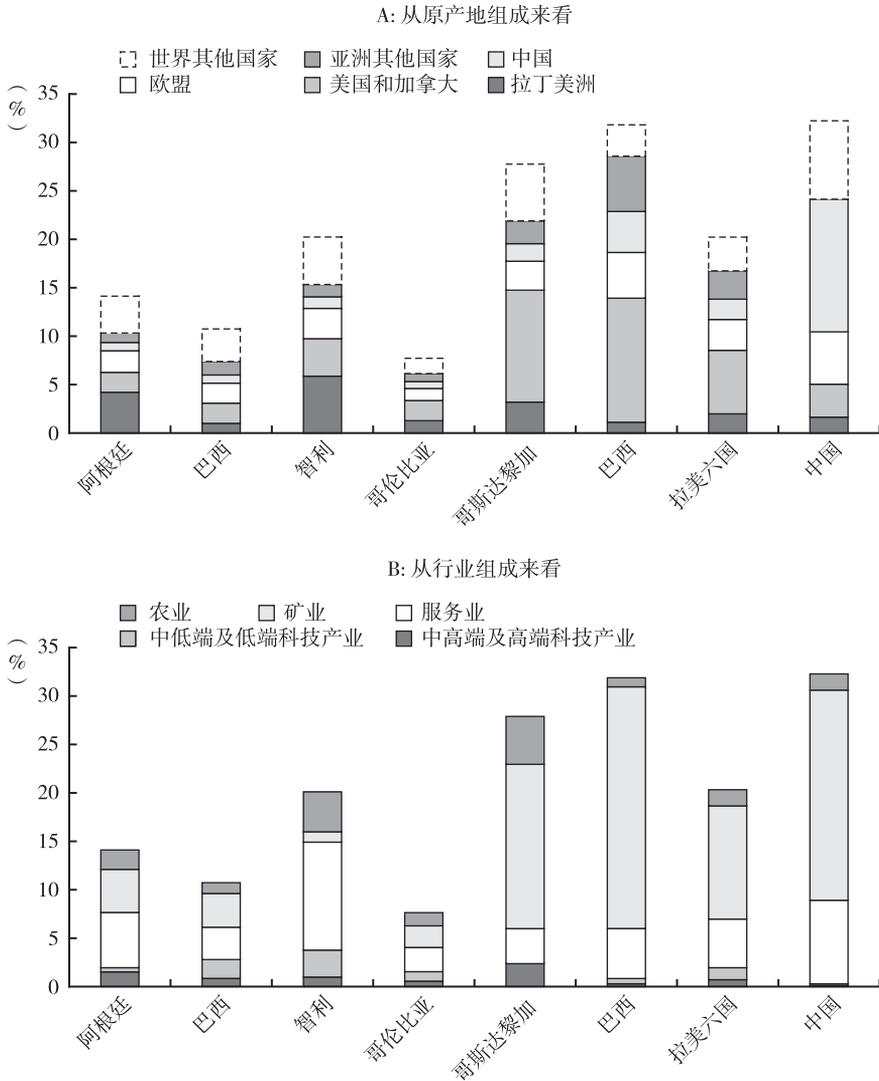


图 4-17 2011 年拉丁美洲和中国全球价值链中后向联系的比例

资料来源：OECD/CAF/ECLAC 根据 2015 年 OECD/WTO 的贸易附加值数据（OECD/WTO, 2015）计算。

统计链接：<http://dx.doi.org/10.1787/888933303138>。

不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制造业国家中的比例更低一些，比如在墨西哥和哥斯达黎加（2011 年分别为 15% 和 17%）。然而，前向联系的专业化比例高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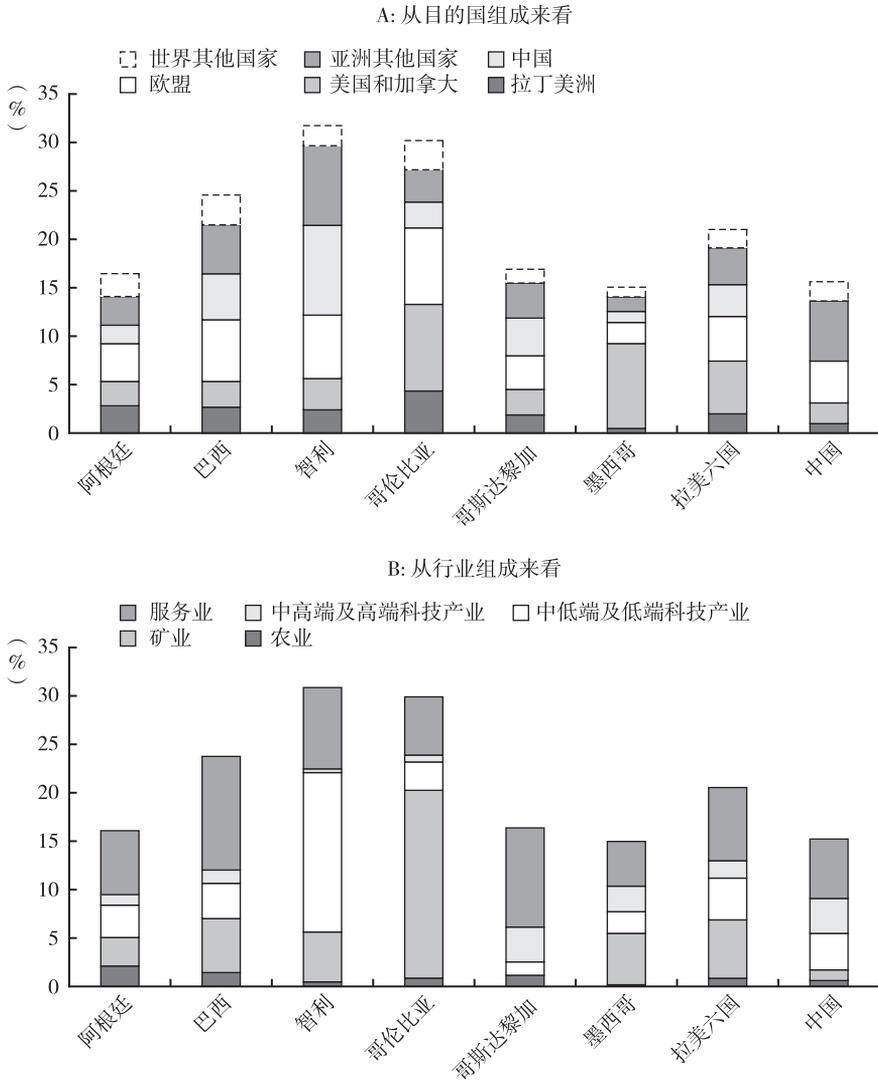


图 4-18 2011 年拉丁美洲和中国全球价值链前向联系的比例

资料来源：OECD/CAF/ECLAC 根据 2015 年 OECD/WTO 的贸易附加值数据（OECD/WTO, 2015）计算。

统计链接：<http://dx.doi.org/10.1787/888933303140>。

一定意味着前向联系的水平高，比如阿根廷（该比例在 2011 年仅占毛出口额的 16.4%）。从这些结果可以推断出，前向联系的级别程度对国内市场规



模的依赖较低。

各个行业的前向联系组成部分比例因各国而异。阿根廷、巴西和哥斯达黎加的服务行业的前向联系比例最高。^① 其中，商业服务和传统的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以及运输和存储）占主要部分。矿产业在哥伦比亚的前向联系占主导地位，在墨西哥中次之，在巴西中的比例也很重要。在智利，中低端和低端科技的制造业（基于自然资源基础之上）在前向联系中占比最高，特别是贱金属。

中国和拉美的价值链联系

总体而言，拉丁美洲和中国之间的中间贸易的联系正在快速增强，但各国之间有明显的区别。尽管从 2000 年开始一直呈显著增长，但是拉美六国并不是中国最重要的中间产品出口目的地，而拉美作为中国的中间产品进口的比重也非常低（农产品除外）。在拉美不断增长但有限的一体化过程中，各国与中国在后向联系的水平也有显著的差别。巴西是拉美地区向中国出口最多的国家，2011 年占到出口附加值的一半。智利几乎占出口附加值的 1/4 多；墨西哥、阿根廷、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占剩余部分的 26%（见图 4-19）。

拉丁美洲出口产品占中国总进口的比例比中国出口占拉丁美洲总进口的比例要高。这种模式在所有产品中都是如此。拉美向中国的出口在拉美总出口中的比例是拉美出口在中国总出口产品所占比例的两倍多。中国前向联系中约 6% 是由拉美占据的（也就是说，全部中国产品出口到第三国附加值的 6%），与此同时拉美对中国的前向联系占该地区 16%（也就是说，拉美向第三国出口的区域附加值中 16% 由中国的出口占据），在 2000 年，这一比例分别约为 3% 和 5%。正如之前所说的，中国的前向联系主要集中在亚洲，而拉美的前向联系则分布于不同区域（本地区内占比较低）。

^① 巴西和哥斯达黎加在服务行业的前向联系比例高于拉美地区平均水平（2011 年占总毛出口额的比重分别为 11.7% 和 10.2%，而拉美的平均值为 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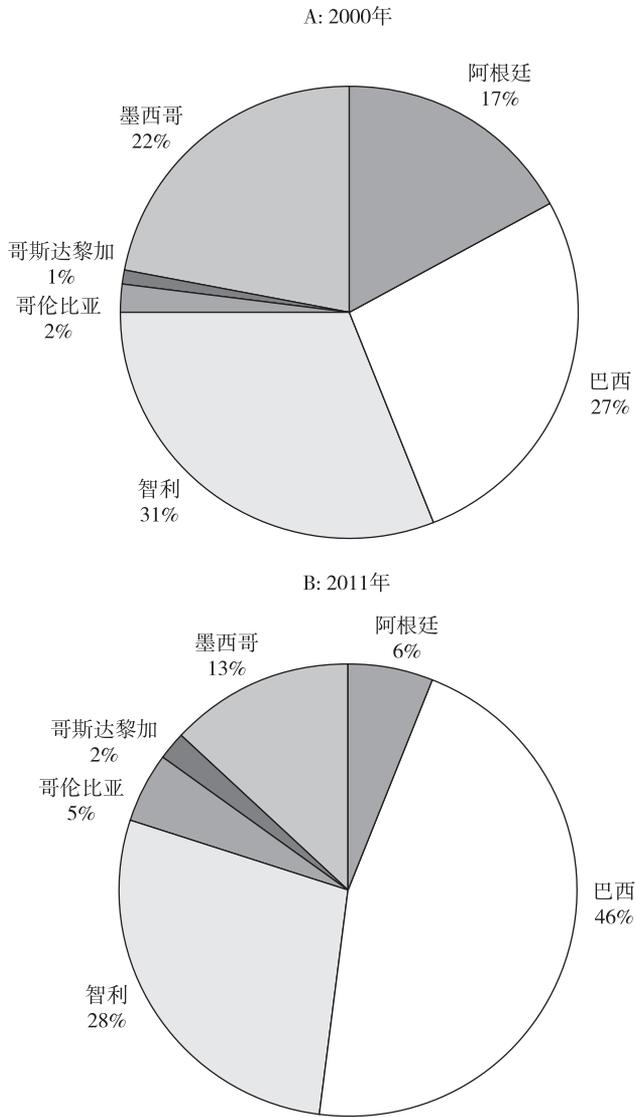


图 4-19 2000 年、2011 年中国和拉丁美洲每个国家
后向联系部分比例

资料来源：OECD/CAF/ECLAC 根据 2015 年 OECD/WTO 的
贸易附加值数据（OECD/WTO, 2015）计算。

统计链接：<http://dx.doi.org/10.1787/888933303153>。



因此，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全球价值链中的比例甚至比该地区内部还要高（见图4-20）。这显示出了提高拉美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性，并且应提高与中国的价值链中的附加值。从企业层面的视角，尤其是从拉美地区的“干中学”的视角来看，推动拉美地区的这一进程是非常合适的（见专栏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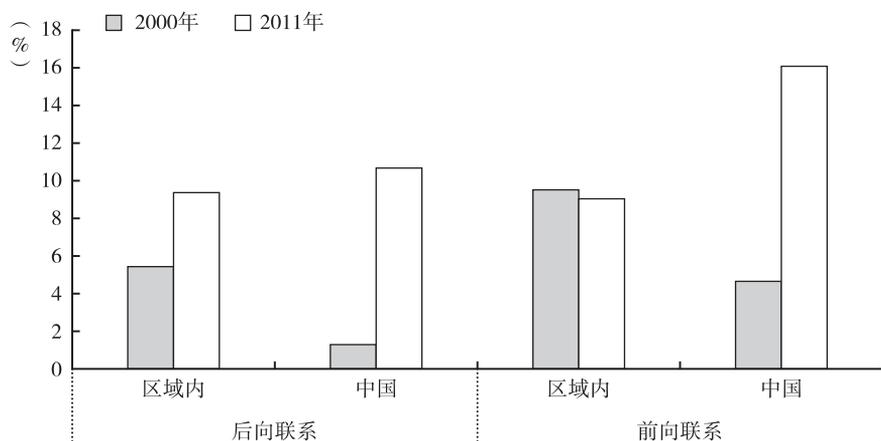


图4-20 2000年、2011年全球价值链中拉美区域和中国在拉美地区中的比例

资料来源：OECD/CAF/ECLAC 根据 2015 年 OECD/WTO 的贸易附加值数据（OECD/WTO, 2015）计算。

统计链接：<http://dx.doi.org/10.1787/888933303166>。

专栏 4.5 生产链接国际化参与程度：一些案例的经验教训^①

拉美与中国的生产联系主要建立在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密集型产业的出口纸上。比如 2011 年 OECD/WTO 的贸易附加值数据（见图 4-21）显示了拉美一些国家出口到中国的农业、矿业和贱金属等中间产品占总出口额的比重（一个单纯的国际产品联系指数）。该比例在墨西哥中的比重为 46%，在其他国家中都超过了 60%。拉美和中国之间这种以自然资源或集约利用型产品为基础的生产联系模式和亚洲其他国家相似的。事实上，这些数据反映了

^① 该专栏是 Juan Blyde 从美洲开发银行（2014）的材料中挑选编制的。

几十年来拉美国家参与国际生产网络的传统格局：主要充当原材料和基础消耗品的供应商，大部分国家不能借势最近生产分工的浪潮，之前在一个国家加工生产的产品在现在可以由很多国家联合生产。

尽管以原材料换取制成品的贸易在拉美和中国的贸易关系中占主导地位，不过生产的国际分工的日益增强，可以让很多拉美国家参与之前难以进入的一些供应链的环节。问题是需要哪些因素以提高拉美加入这些全球性生产网络的可能性。一些国家的研究分析结论富有见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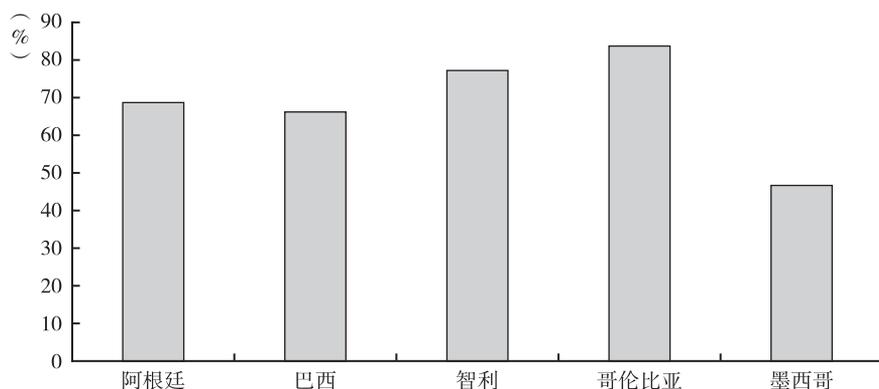


图 4-21 作为中间产品出口到中国的农业、矿业和基础金属的比例

资料来源：OECD/CAF/ECLAC 根据 2015 年 OECD/WTO 的贸易附加值数据（OECD/WTO, 2015）计算。

统计链接：<http://dx.doi.org/10.1787/888933303170>。

作为 IBD（2014）出版的研究项目成果的一部分，本项案例研究选取了拉美五个国家中成功嵌入全球价值链的 10 家公司。^① 它们的供应链没有集中在亚洲国家。然而，从这些案例中吸取的教训可以广泛应用于一般意义上的生产联系，包括与亚洲的联系。尽管每个案例有自己的特殊性，但在参与这些供应链的公司中发现了一些它们相似的特性。其中两点涉及挑战性因素和政策影响，显得尤为重要。

① 研究案例是从以下国家和行业中选取的：阿根廷的鞋类和汽车配件、巴西的航空业和咖啡、哥伦比亚食品行业、哥斯达黎加的软件和电子，以及墨西哥的信息服务和航空业。



（1）之前的国际市场或经验概况

本案例中所观察到的最为普遍的相似之处就是之前存在的国际业务经验。一般来说，经理、CEO 或企业所有者早已和国际实践和（或）市场有所接触，有时甚至在公司成立之前。这揭露了进入全球生产网络时一个常见的挑战性因素：信息的匮乏。总的来说，在全球价值链中，卖方要使其的产品适应买方的需求，与此同时买方要把这些信息传送给卖方，使卖方能够生产出规范的产品。换句话说，供应链中的买卖双方需要进行大量的信息匹配。信息的匮乏可以很容易使潜在供应商边缘化，并且使买方最终仅仅依赖于少数的知名供应商。国际实践的披露便于信息的获得，这也是在我们分析的成功案例中过去的国际经验广为传播的原因。

哪种类型的政策能够用于解决信息鸿沟的问题呢？一般来说，政府应该为供应链之间的主体的信息交流创造有利的环境，应该出台相应的策略使潜在的出口商能和国际上成功的公司搭上牵连。同时，政府可以组织国际采购商和当前职工或退休员工之间的活动交流，以填补信息空白。另一种措施便是组织当地企业参观国际设备。可以通过获取认证资质来填补一部分信息的缺失。国际企业往往是根据他们在各自的供应链中达到的相对应标准来判断供应商的潜质，公共部门可以帮助或推动当地建立认证机构或者是质量商号的管理。

（2）企业利用资源和同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本案例的研究表明，拉美成功的供应商通常很少依靠自身的力量，而是与同行相互合作来加入国际生产网络。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许多拉美企业的另一个特征：缺乏满足全球买方要求的标准的相应能力。因此，成功的案例企业倾向于与其他企业合作利用资源，尤其是在获取特定的能力，应对常见的壁垒，分担像参加国际这样的活动成本等方面。

这说明潜在的公共参与的另一种可行方法是建立企业合作机制，比如企业协会。由于现有的一些企业协会比较薄弱或者是以创收为目的，因此当共同利益超越了行业界限时，政府可以支持一些想要完善自身机构的组织或者帮助它们建立一些新的协会。

政府还可以支持公司合并，以此来补充其能力。政府出台的兼并和收购方案可以刺激企业的成长，也可以使它们更迅速地掌握相关技能。最后，数据表明，在一些情况下，拉美的供应商需要从邻国进口高质量的原材料作为补充生产。利用其他国家供应商的技能和能力作为供应商相关技能的补充意味着本国的贸易保护水平很低。

应对上述问题的措施应成为宏观议程的一部分，与应对该地区其他常见的挑战同步进行，比如基础设施的缺乏、缺少合适的交通和物流等。

资料来源：BID，2014。

与中国的全球价值链给拉美国家的多样化提供了新的机遇吗？

拉美向中国的出口产品总的来说主要集中在大宗商品上。在这种情况下，加入全球价值链的一个重要的收益在于获得参与价值链新环节和出口多元化的机会（BID，2014）。最新的研究考察了亚洲和非洲地区的加工中间产品的贸易动态，发现通过价值链把握多元化的机遇实现了贸易利润率的增长。这也反映出出口到已有的市场中的同样产品的质量得到提高，即使是出口到新市场中的老产品某些方面也初现端倪。到目前为止，唯一例外的区域是西非和中非，因为那里新产品的出口存活率非常低（Kowalski et al.，2015）。不过，现有的价值链究竟可以给拉美国家的多元化提供什么样的新机遇，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利用贸易价值链的数据可以从行业水平上分析，拉美出口到中国的外国附加值的比重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化。尽管34个行业数据水平标准有其各自的局限性，却能够提供行业之间相关的集中度或多元化的分析视角，还能够提供对服务业动态进行直接比较的难能可贵的机会。

拉美的矿产行业出口的中间产品的优势地位正在上升，也是对中国出口最强的部门。图4-22展示了2000年和2011年拉美中间产品出口的目的的构成情况。在这段时期拉美出口到中国的矿产中间产品翻了3倍，与此同时制造业、服务业和农业的比例有所降低。这种格局表明，从中间产品贸易



拉丁美洲经济展望（2016）：发展与中国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

的总体水平可以管窥出口的大致情况。中国是唯一一个矿业占中间进口比例最大而制造业占中间产品出口最高的国家。而且在这段时期内，中间产品在向中国出口的矿产品中的比例一直上升，到 2011 年，这一比例至少达到 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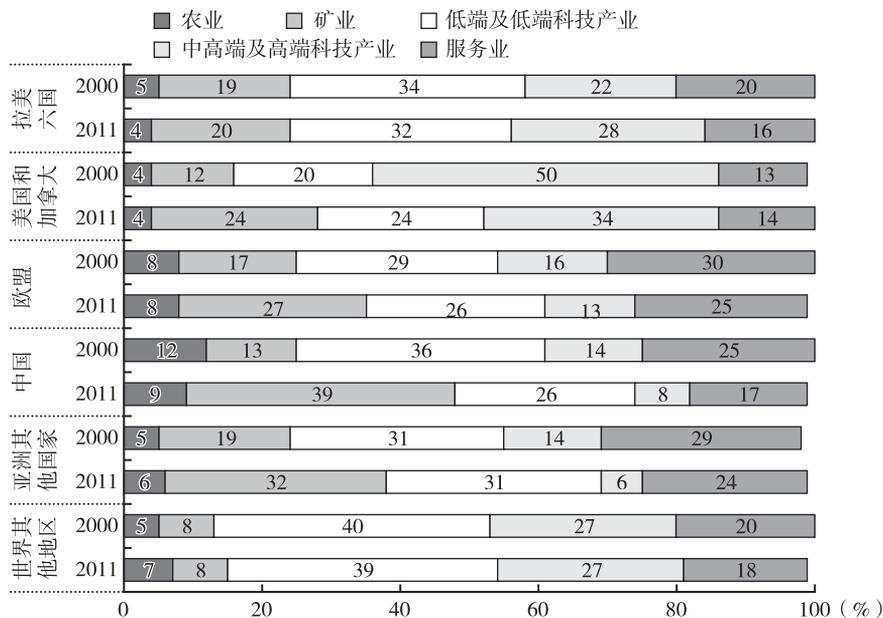


图 4-22 2000 年、2011 年按照目的地和广义部分构成区分的拉美中间产品的出口

资料来源：OECD/CAF/ECLAC 根据 2015 年 OECD/WTO 的贸易附加值数据（OECD/WTO, 2015）计算。

统计链接：<http://dx.doi.org/10.1787/888933303184>。

在拉美农业中间产品出口的目的地中，中国所占的比例最高，达到了 9%，其次是欧盟和世界其他地区，分别为 8% 和 7%。2000~2011 年，所有目的地在农业的比例相对稳定，中国下降比例最快（从 12% 下降到 9%），世界其他地区的增长是最快的（从 5% 到 7%）。在拉美服务业中间产品的出口目的地中，比例最高的区域依次为欧盟、亚洲其他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依次为 25%、24% 和 18%。所有目的地在服务业的比例——除了美国和加拿大之外（这两国则出现略微上升，从 13% 上升到了 14%）——都在下降，下

降最快的目的地是中国（从 25% 下降到 17%）。

从行业角度就近分析拉美对中国后向联系，可以发现拉美所有国家的矿产品和贱金属的规模集中模式都在加强。2011 年，智利占中国进口的矿产品和贱金属的 60% 以上，与此同时服务业的比重从 35% 下降到 24%。墨西哥占中国进口的矿产品和贱金属的比例有了大幅度的增长，与此同时，电子信息产业和服务业在 2000 ~ 2011 年分别从 9% 下降到 5%、55% 下降到 34%。阿根廷占中国进口的农产品和矿产品的比重上升，服务业比例下降。哥伦比亚在 2000 ~ 2011 年期间出口到中国的矿产品和贱金属的附加值几乎翻了一番，服务业却从 13% 下降到 9%。

但是，就哥斯达黎加和巴西的后向联系的进程看，影响更加明显。在巴西，尽管矿业的比例有了大幅度的增长，服务行业批发和零售的比例也略微增加，研发和企业服务部门对中国的出口中保持着稳定的巴西特色的附加值。哥斯达黎加的情况则截然不同，原材料和农产品对中国出口的比例有所下降。与此相反，电子信息类产品的比例大约保持在 10% 左右，而服务业，尤其是商业服务的比例在 2000 ~ 2011 年略有上升。不过，哥斯达黎加的情况在拉美地区是个特例。

服务贸易的动态

在制造业竞争不断加剧以及最新的大宗商品出口压力不断上升的背景下，服务业出口的不断增长给多元化提供了更多的互补渠道。2011 年，服务业占拉美总出口的 21% 尽管该比例比起其他地区如欧盟、亚洲、美国和加拿大要低，和中国比较接近（23%），但其增长潜力依然非常乐观。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是指服务业的前向联系占总出口的比重。智利、巴西和哥斯达黎加等国的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比预计的平均值要高，这在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受到其他行业的结构性因素影响比预计的要低的情况下，非常令人振奋（Kowalski et al., 2015）。

与制造业一样，参与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驱动因素在与当前的产业中心的距离方面的依赖性不强，而是更多依赖于投资政策（Kowalski et al.,



2015)。服务行业和投资之间的关系，具体地说是与外商直接投资的联系，更多地体现在贸易—投资—服务的纽带中（见专栏 4.6）。在拉美，很多服务领域相对开放的投资环境赋予了该地区一定的优势。此外，拉美和美国及欧盟市场的相似性和时区兼容性形成了另一个支撑因素。一些拉美国家（包括智利、哥斯达黎加和乌拉圭）在信息技术之类的服务业方面已经展现了强大的出口动态。根据 AT Kearney 2014 年的全球服务业区位指数，拉美八个国家入围世界 51 个对后台办公活动最具有吸引力的国家之列（AT Kearney, 2014）。

专栏 4.6 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之间的纽带

传统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历来都被认为是可以相互替代的。然而，从 90 年代开始，随着全球价值链的传播，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已经成为重要的补充部分。由于生产地域分散，产品的贸易已经和国际生产设备、技术培训、企业长期业务关系以及联系生产过程和交付给终端市场的最终产品等的必要服务紧密地交织在一起（Baldwin, 2011）。这种新的关系便是贸易—投资—服务纽带，表明贸易、金融以及全球经济服务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不断加剧。2011 年跨国公司掌控的全球生产网络占世界贸易的五分之四。此外，UNCTAD（2013 年）发现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和全球价值链的参与之间有着密切的相互关系，

利用 Dun & Bradstreet (D&B) 世界数据库，美洲开发银行（2014）记录了跨国总公司和它的子公司世界范围内的网络。分析显示，大部分的母公司和他们的外国子公司都设在高收入国家。大多数的供应链都带有区域内性质，北美、欧洲和亚洲的价值链分别位于美国、德国和日本。而且，该分析还显示，非洲和拉美大多数国家处于这一生产网络之外。这一数据与该区域中间产品在国际贸易中较低的参与率相吻合，显示出外国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之间的纽带关系（见图 4-23）。

2008~2012 年，中国从拉丁美洲进口的初级产品和中国在拉美地区原材料产品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密切联系印证了外商直接投资和贸易之

间的相互性。在这一时间段内，大部分的外商直接投资是通过合并和收购进行的，尤其是在石油和天然气行业（70%）（Ray et al. , 2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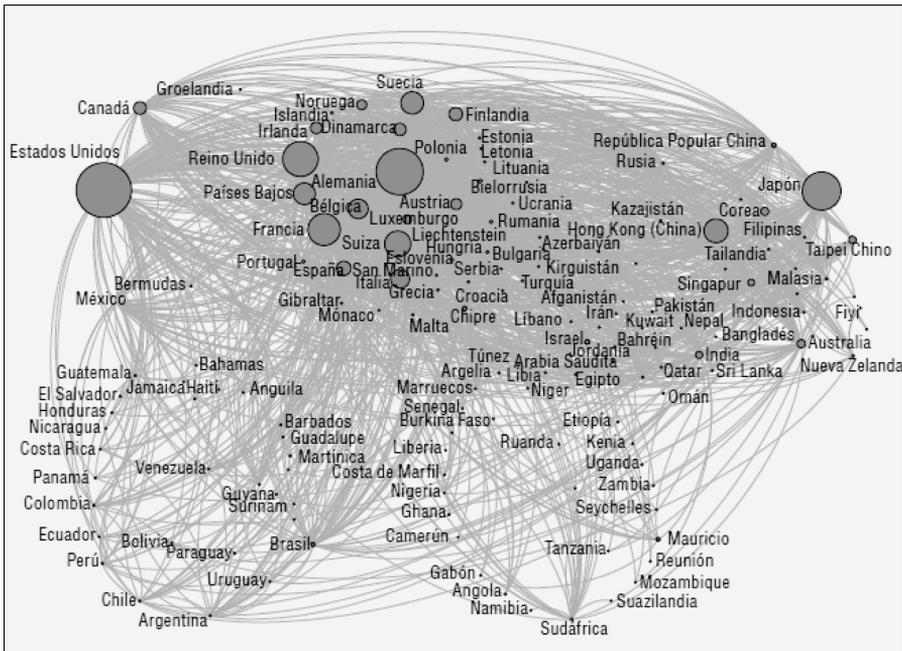


图 4-23 全球范围内外国直接投资管辖下的总公司网络

注：线条的密度显示了母国内子公司的数量以及和东道国之间相应的关系。每个国家圆圈的大小表示该国总公司在其他国家拥有子公司的数量。

资料来源：美洲开发银行（2014）。

统计链接：<http://dx.doi.org/10.1787/888933303192>。

资料来源：Ray et al. (2015); Baldwin (2011); UNCTAD (2013); 美洲开发银行 (2014)。

对拉美国家中间服务的需求大多数来自美国和加拿大市场（34%）（见图 4-24），其他地区各占 10% 左右。总的来说，2000~2011 年，拉丁美洲出口的中间服务年均增长 9%。巴西增长率最高，2000~2011 年，在拉美本地区内的中间服务的出口比例从 24% 增长到了 39%，相反，墨西哥市场份



额在同时期大幅降低，从 47% 降到 28%。贸易价值链数据库的其他国家中，阿根廷是比例第三高的国家，智利排第四，哥伦比亚排第五，哥斯达黎加的比例最小。就整个拉美而言，对中国的出口增长最快，其次是拉丁美洲、亚洲其他区域及世界其他区域。从行业水平上看，拉美地区增长最快的是计算机和研发类行业，尤其是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两国。而智利、巴西和墨西哥等国的传统服务业（运输，批发和零售）增长最快，在阿根廷则是金融中介行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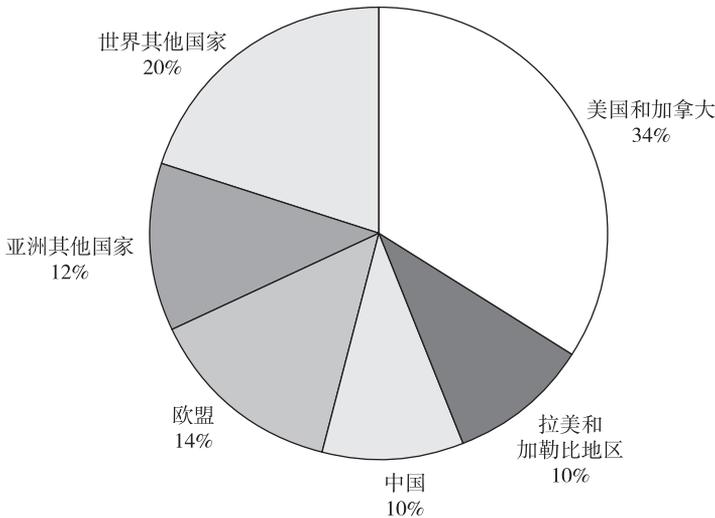


图 4-24 2011 年拉美中间服务业的总出口的目的地

资料来源：OECD/CAF/ECLAC 根据 2015 年 OECD/WTO 的贸易附加值数据（OECD/WTO，2015）计算。

统计链接：<http://dx.doi.org/10.1787/888933303205>。

如果按部门分类，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中间服务业的出口有 74% 主要集中在传统服务业，高于比世界平均水平。但商业服务、信息产业和研发类的行业增长很快，占了拉美地区中间服务出口的 12%，略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这种模式在大多数国家中都差不多，只有两个国家例外。一个是巴西，其计算机和研发类产品的比例占了中间产品出口的 22%。另一个是哥斯达黎加，传统服务的比例上升到 49%，计算机和研发类的产品的比例上升到

31%。这两个国家的计算机和研发类产品的出口比例都很高。哥斯达黎加的传统服务业的比例较低。

尽管中国的中间服务的需求增长显著，但多元化的机会仍然有限。所有拉美国家对中国的中间服务的出口往往集中在传统的服务行业，比如存储和分销，这是初级产品出口附带的重要组成部分（见图 4-25）。在我们所考察的所有拉美国家中，出口到中国的信息服务和研发类产品的比例比世界大多数其他国家要低。这一趋势在巴西和哥斯达黎加尤为明显，这两国对中国的中间贸易出口的比例分别为 3% 和 5%，而出口到世界其他国家的分别为 22% 和 31%。造成这些与传统服务相偏离的现象的一种合理的解释是中国对服务贸易的限制较多。根据 OECD 服务贸易限制性指数分析，中国在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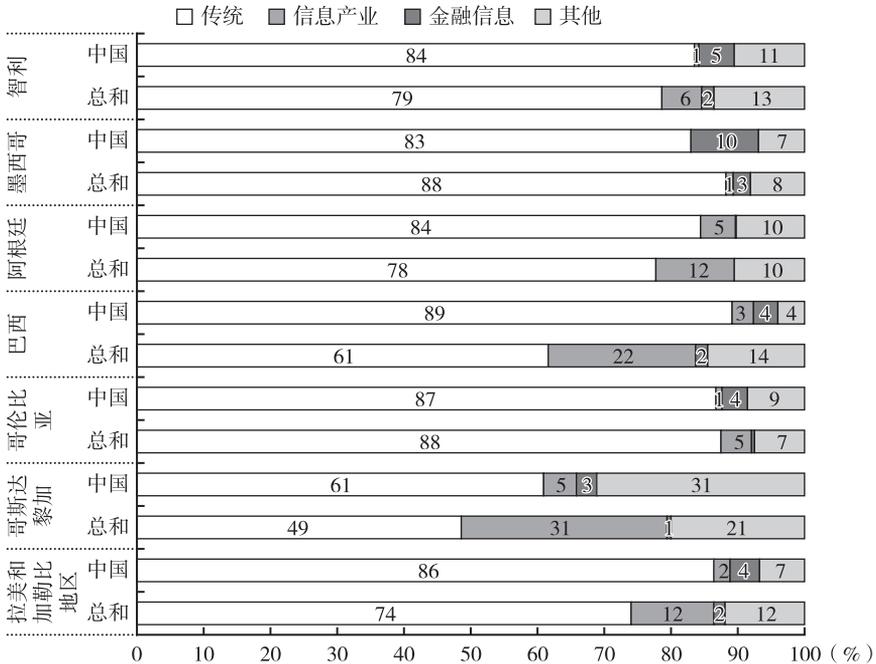


图 4-25 2011 年拉美向中国和世界的中间服务总出口的行业分布

资料来源：OECD/CAF/ECLAC 根据 2015 年 OECD/WTO 的贸易附加值数据（OECD/WTO, 2015）计算。

统计链接：<http://dx.doi.org/10.1787/888933303211>。



主要行业上的得分都比世界平均水平要高，尤其是在外资进入方面更是诸多限制，包括外商直接投资行业限制、资本转移、跨国兼并和收购、对临时供应商的劳动力测试以及进入公共采购市场的限制等（OECD，2015）。这些限制性措施可以解释和亚洲其他国家相比，拉美的服务行业出口商可能在中国市场遇到了一些问题。

与一般的中间服务不同，拉美的计算机和研发类服务主要出口欧盟和亚洲其他国家（见图4-26）。在该行业，三个主要目的地的出口分配是相当均匀的，按重要性排列依次为：欧盟、亚洲其他区域、美国和加拿大。2000~2011年，增长比例最大的出口目的地依次为亚洲其他区域、美国和加拿大。拉丁美洲、亚洲其他区域和欧盟的服务贸易中信息服务和研发类的比例比平均值要高，但是在中国却呈现相反的情况。因此，拉美要扩大在知识密集型领域的活动，和亚洲国家或欧盟国家进行更加紧密的一体化是非常有利的。这一动态显示了服务业为多元化和扩大区域一体化另辟蹊径。欧盟和亚洲其他国家为拉美国家在信息服务和研发领域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而美国、加拿大和中国则在其他行业提供机会。由于出口到中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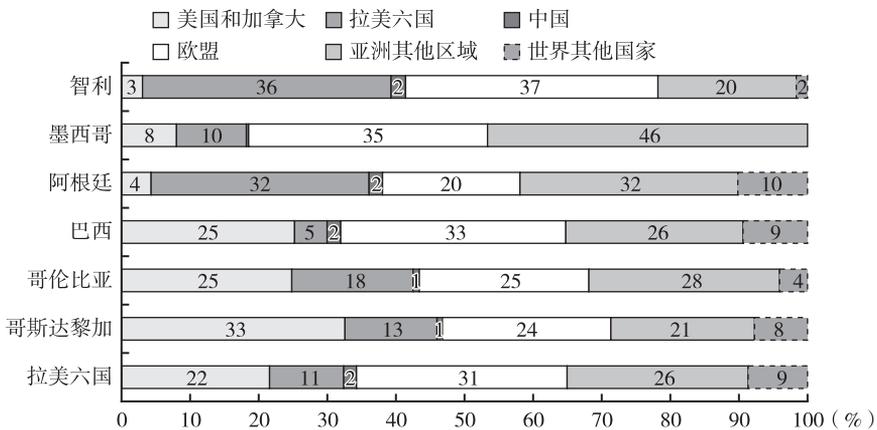


图4-26 2011年拉美在计算机和研发类产品的出口

资料来源：OECD/CAF/ECLAC 根据 2015 年 OECD/WTO 的贸易附加值数据（OECD/WTO，2015）计算。

统计链接：<http://dx.doi.org/10.1787/888933303222>。

服务贸易趋向于传统服务业，这将会抵消拉美地区和其他地区进一步整合的战略。

拉美和中国的投资和贸易协议

近15年来，从2004年的《智利—韩国自由贸易协定》到2013年的《哥斯达黎加—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拉美跨越太平洋，与亚洲签订了大量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同样，中国也利用自由贸易协定来深化贸易一体化，自2000年以来签订了14项自由贸易协定，2014年底又有5项进入谈判阶段。中国和拉美国家签订了三份双边协议，三个国家分别为：智利（2006）、秘鲁（2009年协议签订，2010年起生效）以及哥斯达黎加（2011）。相反，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等国则采取了更具防御性的策略，增加了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措施，包括反倾销措施、许可证要求或补充认证等（Wise, 2015; Sica y Belén Lico, 2015）。至于中美洲，美国仍旧是其主要的出口目的国，和中国的关系仍然处于早期阶段（见专栏4.7）^①。

专栏4.7 拉美国家和中国的自由贸易协定

自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的数量迅速上升。2002年和东南亚联盟签署了自由贸易框架协议（文莱、缅甸、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从那时起，中国和三个拉美国家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智利（2006），秘鲁（2009年协议签订，2010年起生效），以及哥斯达黎加（2011）。在中国方面，在2008年发表的第一份对拉丁美洲政策白皮书中阐明了签署自由贸易

^① 和中国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对农产品出口产生了积极影响。智利的情况尤为明显，因为该国和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时间最长。智利出口到中国的农产品占其出口到世界的农产品中的比例从2006年的1.2%上升到2013年的7.8%，智利出口的农产品数量也大幅上升，占世界的农产品出口比重从2006年的11.2%上升到2013年的17.2%。而在哥斯达黎加和秘鲁，影响却不太明显。



协定的动机。^① 首先，中国与智利、秘鲁的自由贸易协定已经直接表明它缺乏铜矿资源、铁矿资源及其他矿物质。其次，《中国—哥斯达黎加自由贸易协定》显示了中国想在这个大多数国家仍旧承认台湾的次区域里推动“一个中国”的共识。2007年6月1日，哥斯达黎加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三个小型的开放经济体因而从一批希望出口产品到中国的拉美国家中捷足先登，并且吸引到中国投资。与过去二十年中主要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不同，中国与拉美三国所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是南南合作的“典范”。在拉美地区内，发展中国家之间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例如：“安第斯共同体”和“南方共同市场”）在大多数情况下却令人大失所望。

但是，和该地区内部所签订的南南协议不同，上述拉美三国与中国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更接近于世界贸易组织的21世纪的标准及其贸易新议程（服务、投资和知识产权）。虽然推动这些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动因各不相同，但结果仍属于世界贸易组织框架。

把这三个自由贸易协定进行比较，可以反映一段时间内双方可以学习的曲线部分。《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协定》是这三国之中最为简略的（见表4-1），这是因为智利之前和美国已经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包含了投资、服务、知识产权和政府采购等领域，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一些人称之为一个“全新的时代”。之后中国分别与秘鲁和哥斯达黎加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在内容中包括了投资和竞争性政策的章节，这是2006年《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协定》中所没有的。秘鲁和哥斯达黎加在和中国谈判之前和美国也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开启了新的“时代”。因此学习曲线可以分为两部分：和中国方面，共同探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使之逐步适应世贸组织协议标准；在拉美国家方面，和美国在世贸组织的框架下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之后，使之进一步接近中国市场，为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扩展和服务贸易打下了法治基础。

^① 见中国政府发布的《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政策文件》（北京：中国政府，2008），http://english.gov.cn/official/2008-11/05/content_1140347.htm。

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国家，智利和中国之间有些轻描淡写，而秘鲁和哥斯达黎加则吸取智利的经验教训，在协议的范围上更广、更为深入，2012年智利和中国签署了《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协定》的投资补充性条款。政府采购仍然排除在条款之外，因为中国有大量的国有企业涉及外商直接投资，因此中国不愿意就此问题展开谈判。尽管如此，中国加入自由贸易协定仍然挑战了现有的关于发展中国家能在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桌上能达成多少成果的假设和预期。

由于美国和中国在创建所偏爱的区域一体化网络、掌握替代性进程的主动权和控制会员资格等方面展开较量，这使其他国家要在这个一体化演变过程中确定自己的位置。至于拉丁美洲，由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现已包括了智利、墨西哥和秘鲁（还有加拿大、澳大利亚、文莱、日本、马来西亚、新西兰、新加坡和越南）。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也正排队加入这一条约。

在亚洲，最近一个由中国牵头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RCEP) 包括了东盟、澳大利亚、中国、印度、日本、韩国和新西兰（这些国家都和东盟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尽管同时参加《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和《区域综合经济伙伴关系》会冒着“意大利面碗” (spaghetti bowl) 的风险，但是成为双料会员（澳大利亚、文莱、日本、马来西亚、新西兰，新加坡和越南）能享受明显的益处。由于分别和美国、中国分别单独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智利、哥斯达黎加和秘鲁是拉美少数几个可以享受世界大国市场优势的国家，尽管它们不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成员国。这些全球经济中的小型、开放“价格接受者”也借此使自己处于占尽优势、令人艳羡的地位。

表 4-1 中国—拉美国家自由贸易协定

自由贸易协定	发展水平	关税自由化	包含服务业	投资协定	竞争政策	知识产权
中国—智利	南—南	较快	部分	无	无	超标准
中国—秘鲁	南—南	较快	部分	标准	标准	超标准
中国—哥斯达黎加	南—南	较快	部分	标准	标准	超标准

资料来源：Wignaraja, Ramizo y Burmeister (2013)。



拉美三国（智利、秘鲁和哥斯达黎加）和中国签署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已经生效，有助于出口组合更加多元化。因此，这些国家进入中国市场，特别是第一个与中国签署协定的智利，所要支付的关税比“最惠国待遇”规定的还要低得多。此外，通常要等上几年的卫生市场许可证也能够很快地办下来。自由贸易协定可以使这些国家的出口更加多元化，尤其是出口到中国的产品数量占出口到世界产品的比例上升很快。这一趋势在智利最为明显，该比例由2006年的8.8%上升到2014年的24.6%。在秘鲁，该比例由2010年的15.4%上升到2014年的18.3%。哥斯达黎加和中国在近期才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时间太短，这一比例的变化还不太明显。

除了双边贸易协议之外，中国在多边和诸边场合的参与程度日渐上升。从2011年起中国就是世贸组织成员，和一些国家的贸易和投资也得到了显著的增长。中国还积极参与了另外一些贸易平台，如南方共同市场（2012年加入）、太平洋联盟（2013年加入）以及最近的“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2014）。

中国和南方市场之间的谈判已经开始，但主要还是通过双边途径。中国和南方共同市场（包括阿根廷、巴西、巴拉圭、乌拉圭和委内瑞拉）之间为了建立自由贸易区也举行了一系列非正式协商，与单个南方共同市场国家也进行了双边合作协议的谈判。例如，2015年2月阿根廷和中国签署的合作协议便是双边共同努力的结果（见专栏4.8）。

专栏 4.8 中国和南方共同市场：整体和双边谈判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中国陆续与绝大多数南方共同市场^①成员国（除巴拉圭依旧和中国台北保持“邦交”关系）恢复了外交关系，双边贸易迅速增长，中国成为南方共同市场最大的贸易伙伴。

^① 南方共同市场一般包括阿根廷、巴西、巴拉圭、乌拉圭和委内瑞拉。虽然玻利维亚最近加入了南方共同市场，成为正式成员，但其加入协议书并没有被每个成员国的国会批准。

中国和不同的拉美国家，包括南方共同市场的成员国进行贸易谈判主要有三大工具：自由贸易协定、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以及双边协定（包括避免双重征税、信息和技术合作、资金、基础设施等）。

自由贸易协定

南方共同市场与中国的双边贸易增长不是在正式的贸易协议规则下实现的，因为集团中没有一个国家和中国签订过自由贸易协定。这与和中国签订协议的拉美三国形成对比：智利（和中国香港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哥斯达黎加和秘鲁。哥伦比亚也启动了和中国的自由贸易协定，这使太平洋联盟四个国家中的三个都和中国这个亚洲国家签订了协定。南方共同市场和中国的自由贸易协定面临着许多障碍。首先就是在外交层面，因为巴拉圭与中国尚未建交。此外，近几年巴西和阿根廷实施工业和商业政策，同样限制了对中国的贸易开放程度。中国也积极运用贸易保护措施来应对针对它的贸易壁垒。

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

南方共同市场的一些成员已经着手和中国签订投资协定，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阿根廷和乌拉圭与中国签订的协定就已经生效。这些贸易协议都是双边性质的，并没有和南方共同市场的其他成员国进行单独谈判。拉美其他国家在贸易工具的应用上比南方共同市场要活跃得多，也反映出这些国家努力以不同的模式加强和中国的融合。

双边协定

自由贸易协定缺失、与中国投资协定的数量有限，使外交渠道在合作中仍占据首要位置。这促使中国和拉美国家签订了各种形式的协定，涵盖了各种主题。由于拉美经济最近不景气和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一些协定在特定国家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根据这些协议，巴西、阿根廷和委内瑞拉与中国达成了特殊战略伙伴关系。

由于南方共同市场就中国提出的多元化倡议无法形成统一的意见，以上这些要素将会继续发挥作用。南方共同市场无法采取一致行动，既有巴拉圭和中国的外交现状的原因，也跟缺乏统一的区域性战略有关，这对于中国来



说是有利的，但可能会对区域发展有一定影响。因为上文提到的优惠协定，就其影响而言，更需要区域性谈判，而非双边谈判。

资料来源：Latin America-Asia Pacific Observatory（2015）。

作为太平洋联盟的观察员国，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在未来会更加紧密。2011年，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和秘鲁成立了“太平洋联盟”，追求区域一体化。如今该联盟有30个成员国，中国在2013年成为观察员国。迄今为止，中国的作用还非常有限，因为只能参与一部分活动（比如管理协调等）。尽管中国还没有正式参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但是中国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已经成为美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势必会对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走势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北美自由贸易进程已经放缓，墨西哥已经从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的位置上跌落下来（Dussel-Peters y Gallagher, 2013）。

近年来，中国和美国分别领衔退出新的伙伴关系和吸顶，这为加强区域合作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由美国领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通过在知识产权和国有企业商业运作等领域的谈判，正在进一步加强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联系。该组织包括12个国家，智利、墨西哥和秘鲁在其中。作为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的反制之道，中国引领了“区域经济伙伴关系”（包括16个国家），旨在促进东亚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两个协定平行竞争的后果将会产生反一体化的负面影响，不立于加强一体化和自由贸易化。

为了发展服务业，近年来中国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各种协定中，对拉美地区产生了潜在的影响。包括欧盟和美国在内的24个世贸组织成员国达成了“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目标在于改善和扩大世界范围内的服务贸易。“国际服务贸易协定”的参与国占全球服务贸易的70%，其中8个来自拉美地区^①。中国至今还没有正式加入该协议，不过在2014年中期表达了

^① 加入服务贸易协定的拉美国家有：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墨西哥、巴拿马、巴拉圭、秘鲁和乌拉圭。

加入谈判的意愿，并且得到了欧盟的支持。

和中国签署的双边投资协议可以在未来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这一工具在拉美和中国之间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目前为止已签订 12 项协定）。这些协定大多是在 2000 年前签署的，墨西哥和哥伦比亚与中国的投资协定是在 2008 年签署的。鉴于生产分工的全球化趋势，企业不仅要追求进入更多的市场，更重要生产的有利条件，在这一背景下，投资协定被广泛地运用于提高外国投资者的标准上。中国在这方面也不甘落后，迄今为止，已经签署了 108 项双边投资协议。这些条款通常包括反歧视、公平公正性、投资者安全、征用保护以及资金转移等措施。

抓住利益，降低风险

出口多样化对拉美地区而言是一个迫切的挑战。拉美地区在过去 10 ~ 15 年与中国的贸易繁荣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尤其是那些初级产品出口国。即使如此，但是近年来出口结构高度集中已经越来越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这一趋势阻碍了该地区迈向多元化、知识密集型的、社会化的以及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和出口结构。

时势呼唤拉美国内部以及与中国进一步加强前瞻性、战略性的一体化进程。战略重点包括：（1）继续抓住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的机遇，尽可能使产品数量多样化，特别是具有较高附加值的加工产品。自由贸易协定可为这一目标提供新的机会，但必须辅之以其他政策。区域内的贸易协议使出口的平均值达到了 33%，而区域外伙伴的贸易这一比例只有 10%（Kowalski et al., 2015）。此外，为了促进多样化，最近的证据表明，区域内的贸易出口存活率要比区域和区域之间的比例高。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平均而言，只有三分之一的出口在三年之后能继续保持活跃状态，表明新的出口活动仍然面临着风险（Kowalski et al., 2015）。因此，区域内的贸易为“边学边做”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机会，可以在超越区域水平的基础上提高出口的竞争力。（2）在更多的服务密集型产业中开拓新的机会。（3）深化区域内的一体化，加大合作力度。区域一体化对于支持制造业活动尤为重要，因为这



些中间供应模式往往对距离非常敏感。（4）通过改善法律框架来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以及资金来源多样化等手段填补基础设施的缺口。（5）贯彻生产发展政策来激励创新，提高技能和竞争力，实施产业集群政策，优化财政资源，夯实出口基础。（6）提升拉美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使高附加值的拉美出口产品和服务可以抓住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带来的新的商业机会。（7）着重落实《2015～2019 中国—拉美加勒比共同体合作规划》中有关基础设施的投资、双边直接投资和贸易便利化的各项措施，进一步深化区域一体和出口产品多元化。

第五章将简要阐述未来几十年拉美和中国的伙伴关系前景对拉美的意义，并且深入探讨一体化中的前瞻性、战略性的问题。

参考文献

AfDB/OECD/UNDP/UNECA (2013), *African Economic Outlook 2013: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Natural Resources*,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dx.doi.org/10.1787/aeo-2013-en>.

Artuc, E., D. Lederman and D. Rojas (2015), “The rise of China and labor market adjustments in Latin America”,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7155*, World Bank Group, Washington, DC.

AT Kearney (2014), “The 2014 A. T. Kearney Global Services Location Index”, www.atkearney.com/research-studies/global-services-location-index, Chicago, IL.

Avendano, R. and J. Dayton-Johnson (2015), “Central America, China and the US: What prospects for development?”, *Pacific Affairs*, Vol. 88, No. 4, December.

Baldwin, R. (2012), “Global supply chains: Why they emerged, why they matter, and where they are going”,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EPR)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No. 9103*.

Baldwin, R. (2011), “21st century regionalism: Filling the gap between 21st century trade and 20th century trade rules”, *Staff Working Papers*, Economic Research and Statistics Division,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Geneva, www.wto.org/english/res_e/reser_e/ersd201108_e.pdf.

Belén Lico, M. and D. Sica (2014). “Los desafíos que plantea China a América Latina:

Un análisis desde el marco del Protocolo de adhesión a la OMC”, *Boletín Informativo Technit* 344, Mayo-Agosto 2014, www10.iadb.org/intal/intalcdi/PE/2014/14707.pdf.

Bohn, T. et al. (2015), “Integration into global value chains: A guide to data sources and indicators”, *OECD Trade Policy Papers*, OECD, Paris.

Chinese Government (2008), “China’s Policy Paper o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Chinese Government, Beijing, http://english.gov.cn/official/2008-11/05/content_1140347.htm.

Costa, F., J. Garred and J. P. Pessoa (2014), “Winners and losers from a commodities-for-manufacture trade boom”, *CEP Discussion Paper*, No. 1269, Centre for Economic Performanc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London.

Duran L., J. and D. Zaclicever (2013),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en las cadenas internacionales devalor”, *Serie de Comercio Internacional*, No. 124, ECLAC, Santiago.

Dussel-Peters, E. and K. Gallagher (2013), “El huésped no invitado del TLCAN: China y la desintegración del comercio en América del Norte”, *Revista de la Cepal* 110, August.

ECLAC LA – KLEMS (2015), www.cepal.org/cgi-bin/getprod.asp?xml=/la-klems/noticias/paginas/4/40294/P40294.xml&xsl=/la-klems/tpl-i/p18f-st.xsl&base=/la-klems/tpl-i/top-bottom.xsl.

IDB (2014), “Synchronized Factories: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in the era of global value chains”, Special Report on Integration and Trade,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Springer, Washington, DC, <http://link.springer.com/book/10.1007%2F978-3-319-09991-0>.

IDB (2004). “The emergence of China: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IDB China Task Force*, Washington, DC, http://ctrc.sice.oas.org/geograph/caribbean/China_idb.pdf.

Jenkins, R. (2008a), “China’s global growth and Latin American exports”, *UNU – WIDER Research Paper*, No. 2008/104,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Helsinki.

Jenkins, R. (2008b), “Measuring the competitive threat from China for other southern exporters”, *The World Economy*, Vol. 31/10, pp. 1351 – 1366.

Kowalski, P., J. L. Gonzalez, A. Ragoussis and C. Ugarte (2015), “Participa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global value chains: Implications for trade and trade-related policies”, *OECD Trade Policy Papers*, No. 179,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dx.doi.org/10.1787/5js331fw0xxn-en>.

Lall, S. (2000), “The technological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of developing country manufactured exports, 1985 – 1998”, *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28, No. 3, pp. 337 – 369, www3.queh.ox.ac.uk/pdf/quehwp/quehwp44.pdf.



拉丁美洲经济展望 (2016) : 发展与中国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

Latin America-Asia Pacific Observatory (2015), www.observatorioasiapacifico.org/OBSExternalUI/pages/public/home.jsf;jsessionid=E9E4802A2D9FA7F6FB5C552D43A050F9.

Lederman, D., M. Olarreaga and I. Soloaga (2007), “The growth of India and China in world trade: Opportunity or threat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4320*.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López-Cordóva, E., A. Micco and D. Molina (2007). “Competing with the dragon: Latin American and Chinese Exports to the US Market”, in J. Santiso (ed.), *The Visible Hand of China in Latin America*, Development Centre Studies,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dx.doi.org/10.1787/9789264028388-en>.

Moreira, M. (2007), “Fear of China: Is there a future for manufacturing in Latin America?”, *World Development*, Vol. 35, No. 3., pp. 355 – 376, <http://ssrn.com/abstract=964280>.

OECD (2015), “OECD Services Trade Restrictiveness Index”, OECD, Paris, www.oecd.org/trade/stri.

OECD, (2013), “Implications of global value chains for trade, investment, development and jobs”, Prepared for the G – 20 Leaders Summit Saint Petersburg, September, www.oecd.org/trade/G20-Global-Value-Chains-2013.pdf.

OECD (2007), *Latin American Economic Outlook 2008*,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dx.doi.org/10.1787/leo-2008-en>.

OECD/WTO (2015), Trade in Value-Added (TiVA) (database), www.oecd.org/industry/ind/measuringtradeinvalue-addedanoecd-wtojointinitiative.htm.

Ray, R., K. P. Gallagher, A. Lopez and C. Sanborn (2015), *China in Latin America: Lessons for South-South Cooper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Initiative, Boston University, Centro de Investigación para la Transformación, Tufts University and Universidad del Pacífico, Boston, www.bu.edu/pardeeschool/files/2014/12/Working-Group-Final-Report.pdf.

Rieländer J. and B. Traoré (2015), “Explaining diversification in exports across higher manufacturing content-what is the role of commodities?”, *Working Paper*, No. 327, OECD Development Centre, Paris.

Santiso, J. (ed.) (2007), *The Visible Hand of China in Latin America*, Development Centre Studies,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dx.doi.org/10.1787/9789264028388-en>.

UNCTAD (2013),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3. Global Value Chains: Investment and Trade for Development*,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and Geneva.

UNIDO (2015), *INDSTAT2 – 2015 Edition* at the 2 – digit level of ISIC Revision 3, www.unido.org/en/resources/statistics/statistical-databases/indstat2-2015-edition.html.

United Nations (2015), United Nations Commodity Trade Statistics Database

(Comtrade), <http://comtrade.un.org/>.

US Census Bureau, Foreign Trade (2014), www.census.gov/foreign-trade/index.html.

Wignaraja, G., D. Ramizo and L. Burmeister (2013), “Assessing liberalization and deep integration in FTAs: A study of Asian-Latin American FTAs”, *Journal of East 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17: 4 (2013), Annexes 1 and 2, pp. 408 – 411.

Wise, C. (2015) “Playing both sides of the Pacific: Latin America’s free trade agreements (FTAs) with China”, *Pacific Affairs* (forthcoming).

World Bank (2015), *Latin America and the Rising South*, Changing World, Changing Priorities,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WTO (2012), *Trade Policy Review: China*,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Geneva, www.wto.org/english/tratop_e/tpr_e/tp364_e.htm.

第五章

拉丁美洲—中国伙伴关系的 发展趋势和前景

本章根据中国发展战略模式的变化，主要分析了拉美地区与中国关系的发展趋势。基于对中国转型所带来的潜在的传递渠道以及引发的贸易、金融和机构性挑战等方面的分析，本章指出了拉美为最大限度地利用与中国的伙伴关系而应做出的战略和政策回应。

拉丁美洲面临的结构性挑战和未来之路

拉丁美洲必须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创造更加平等和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尽管面临长期的挑战，但是拉丁美洲有足够的工具和能力来克服现在及未来的挑战。作为本书的最后一章，我们将总结前面已经分析过的该地区面临的障碍，进一步深入分析中拉关系中的主要通道（即前进的方向），最后总结可以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各项政策和措施。

与 OECD 国家和其他新兴国家相比，拉美的生产率增长缓慢。大多数拉美国家和最发达的国家之间的生产率差距仍在扩大，但是与不少亚洲国家之间的差距在减小。正如第三章所述，大部分拉美国家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只有少数国家成功突围。因此，一些国家的目标是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另一些国家的目标则是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是因为一些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虽然已经得到改善，但并没有实现真正的生产转型。拉丁美洲国家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才能追赶发达国家的经济，确保完全参与到全球经济中。

持续的结构挑战

多元化和转型升级是拉美国家生产结构面临的两大挑战。一些国家的第一产业，具体地说是农业和矿业，虽然短期受益，但是从长远看不具有可持续性，影响了该地区的生产率。与此同时，拉美国家过于集中出口低精密度产品，无力提高出口复杂性水平，从而无法增加附加值。

拉丁美洲必须改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结构化改革，加快一体化进程。在拉丁美洲，57%的出口产品都是易腐的、物流密集型产品，是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3倍。昂贵的运输费用严重限制了区域一体化进程。区域内贸易份额仅有27%，而欧盟的区域内贸易份额为63%，亚洲为52%。拉丁美洲需要建设更好的公路、铁路、港口、机场和其他关键的物流基础设施（OECD/CAF/ECLAC，2013）。

拉丁美洲要参与到世界财富的转移过程中，就必须提高人口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由于人力资本的短缺，拉美地区面临严重的经营危机的企业数量是南亚的3倍、亚太地区的13倍（OECD/CAF/CEPAL，2014），尤其是汽车行业和机械行业。必须加强职业教育和培训，加强高等教育机构和私有部门之间的联系。推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与创新同时进行。教育和竞争力不仅应该被视为经济增长的动力，还应被视为推动社会包容和更加公平的动力。

必须制定每个国家以及整个区域的生产力发展政策（PDP）。改善多元化和转型升级的前景，意味着要发展拉美地区的能力存量，包括非交易能力、制度的质量、物质和人力资本。只有改善这些条件，并建立统一的法制框架，才能帮助该地区应对主要的结构挑战。

中国经济新常态给拉丁美洲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人们已经提出很多关于中国的经济新常态将如何影响日益复杂的中拉关系的问题。中国的新发展模式是为了响应更加可持续增长的需求，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中国的经济再平衡的特点是：消费在经济中的作用日益增强；重点关注高附加值的行业；发展教育和技术体系来支持生产结



构的变化；逐渐加大服务业的比重；更加积极参与到全球治理的平台当中。随着中国采取新的政策和措施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这将给拉丁美洲带来新的挑战 and 机遇，必须在未来的发展战略中予以应对。

考虑到拉美地区面临的长期挑战，本章将探讨中国经济新常态对拉美经济体产生影响的传导机制。首先，根据在第二章中已经探讨过的中国发展模式的主要趋势，本章将确定在此背景下可能影响拉丁美洲的主要因素。其次，本章将提出适当的政策，使拉美国家不但能少受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不利影响，而且能加强和中国的联系，扩大增长机遇。具体地说，表现在四个方面：金融、技术、法制框架和伙伴关系——包括区域内伙伴关系、区域外和全球伙伴关系。

确定中国经济新常态对拉美的贸易影响

第二章和第三章讨论了中国新常态意味着的诸多变化，并指出，中国正在从一个依赖出口和投资的经济体转变成一个以消费拉动增长的经济体，这个过程将对新兴经济体造成显著的影响（Drummond and Liu, 2013；IMF, 2014）。这些影响会产生优势，也会带来潜在的威胁。由于严重依赖初级产品的出口，拉美国家将无法幸免于中国转型的影响。随着中国的需求正逐步从投资和初级产品转到服务和高附加值产品上，以满足国内的消费需求，拉丁美洲的出口将受到影响。经济结构性变化，不可避免地造成中国经济增长减速和投资减少。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资本回报率的自然下降，引发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从而导致资源从投资转向消费的重新配置。这些潜在的趋势一直伴随着政策改革，加快了投资向消费转变的步伐。2011年推出的税制改革、以养老金改革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利率的自由化等一系列改革都是为了增加消费，扫除降低资金成本所面临的各种障碍。

中国的再平衡和拉丁美洲的出口

本章将评估中国从投资驱动型经济向消费驱动型经济转变的结构再平衡

所造成的影响，以及拉美的出口与中国未来的投资路径之间的联系，以深化对这一影响及应对政策措施的认识。为此，我们将考察再平衡的以下两个维度：一个是中国投资回落对投入的影响，尤其是金属矿产；另一个是消费增长和结构调整及其对拉丁美洲出口需求，特别是粮食出口需求的影响。由于拉美国家的出口产品具有高异质性，中国的再平衡进程可能对不同国家造成不同的影响，因此，拉美需要通过不同的反应机制来应对中国的再平衡进程。

本部分将在利用建模得出中国投资最终回落的结果的基础上，讨论中国的再平衡对拉丁美洲的出口产生的潜在影响。为了更好地了解可能产生的影响，特别是由中国投资下降造成的影响，本节使用了聚类分析和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方法（见附录）。在这个研究方法中，我们根据拉美不同国家与中国的接触程度将它们分组，然后建立 1994 ~ 2013 年 18 个国家的固定效应模型，计算中国的投资水平与拉美国家的出口之间的关系，区分每个聚类的影响差异（Drummond and Liu, 2013）。最后，根据对中国到 2030 年的经济增长预测，我们预测了拉美出口模式的两种情境：第一种情境假定稳步推行改革，而且不出现较大的动荡，第二种情境是假定中国投资增长率出现快速的、显著的回落（Chen and He, 2015；World Bank – DRC, 2013）。为了区别拉美出口可能遭受的不同的冲击，我们把拉美出口国分成五个群组：农业出口国（阿根廷、巴西、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拉圭和乌拉圭），化石燃料出口国（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金属和矿石出口国（秘鲁、智利），工业制成品出口国（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墨西哥）和商业服务出口国（巴拿马）。

结果表明，中国国内投资和拉美国家出口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见附表 5. A1 - 2）。但这种关系因不同国家而异。智利和秘鲁组成的群组对中国投资水平最为敏感，因为其对于自然资源采掘业（金、铜）的依存度及与中国市场的接触程度很高（出口到中国的比例分别达到 23% 和 16%）^①。

① 结果也显示中国的影响不仅通过出口的规模，而且还通过价格来形成（Drummond and Liu, 2013）。经济复杂度指数（Economic Complexity Index, ECI）与出口呈显著的负相关性，意味着在过去二十年里拉丁美洲的出口集中在低技术含量的产品上。



2030年中国—拉美出口情况预测

中国从投资驱动型经济转向消费驱动型经济，必然意味着经济增长放缓。我们在建模时使用了两种对中国经济到2030年的假设，以了解可能产生的结构性变化：正常速度转型（基准情境）和高速转型（低投资情境）^①。本检验假设拉丁美洲对中国的出口在2030年之前一直保持不变。

虽然两种情境都反映中国经济增长和投资率会出现下降，但是在高速过渡或低投资情境中，中国年均GDP增长率下降的程度要低于预期，尤其是在2021~2030年。这两种情境都设定这样的假设：中国经济不会遭遇特殊的外部或内部动荡，但是中国从一个投资驱动型的中等收入国家过渡到消费驱动型的高收入国家存在不同的转型路径。

表5-1显示了在不考虑消费结构调整的前提下拉美国家1990~2030年出口的年均增长率（按群组划分）。对未来的预测是基于基准情境。2001~2010年大宗商品出口繁荣体现在群组3（智利和秘鲁），其金属和矿石出口年均增长率达到令人惊叹的16.3%，群组2（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的化石燃料出口年均增长率达到15.8%。表5-1也显示，在两种情况下，伴随着中国经济增速和投资的放缓，在未来20年中（2011~2030年），所有国家都将经历出口增长的放缓期（相对于2001~2010年）。总的来说，最近20年（1990~2010年），拉美出口增长率在7.5%和16.3%之间，但是预计2021~2030年，出口增长率会大幅降低，回落至2%~3%。

到2030年，在基准情境和低投资情境下，不同群组间的平均差别可能增大。这显示了不同的群组对于中国变化的敏感度（见图5-1）。金属和矿石出口国群组面临的中国投资放缓的风险更大。基准情境和低投资情境两者之间的年均出口增长率之差将近2个百分点^②。两种情境对化石燃料出口国群组的出口增长率的影响不如前者明显，只相差1个百分点。然而，如果对

① 中国的数据基于“中国2030”（China 2030）（World Bank-DRC, 2013）的分析情境。

② 对于每种情境，出口指数（2013年设为100）是通过计算出口的平均增长速度而得出的。

表 5-1 在基准情境下不同群组国家的出口增长率

单位：%

群组	国家	时期			
		1990~2000年	2001~2010年	2011~2020年	2021~2030年
农业	阿根廷、巴西、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拉圭和乌拉圭	8.8	11.6	3.8	2.0
商业服务	巴拿马	7.9	9.6	9.8	2.0
矿业	秘鲁、智利	8.2	16.3	5.8	2.8
工业制成品	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墨西哥	15.2	5.2	4.0	1.6
化石燃料	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	7.5	15.8	6.1	2.7

资料来源：OECD/CAF/CEPAL 计算。1990~2013 年的数据来自世界发展指数（世界银行），<http://data.worldbank.org/products/wdi>；2014~2030 年的预测根据固定国家效应模型得出 [见 Avendano, Obach and Perea (forthcoming), “China’s rebalancing: What scenarios for Latin American exports?”]。

比 2000~2010 年的数据，我们发现，金属和矿石出口国群组与化石燃料出口国群组的出口增长率显著降低。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工业制成品和服务业出口国家的出口增长率与 2000~2010 年相比，却只有非常小的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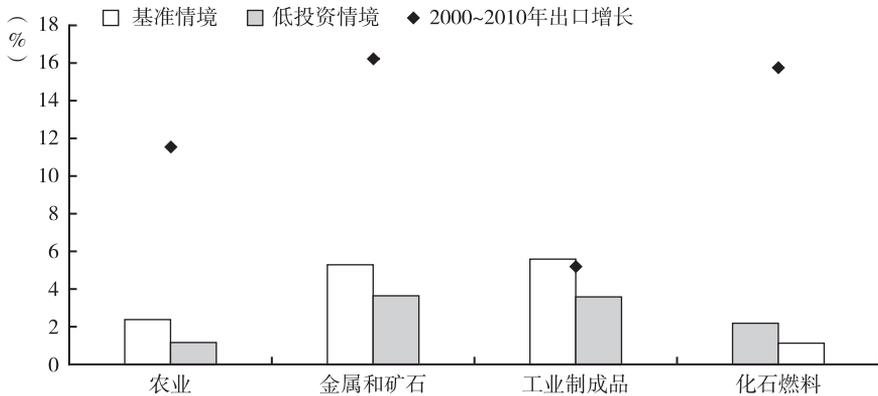


图 5-1 对不同群组国家的出口增长率预测 (2014~2030 年)
(出口比重的年均增长率)

资料来源：OECD/CAF/CEPAL 利用 Avendano, Obach and Perea (forthcoming), “China’s rebalancing: What scenarios for Latin American exports?” 的预测进行计算。

统计链接：<http://dx.doi.org/10.1787/888933303236>。



功能升级（例如，开展价值链中的新活动）可能会降低中国再平衡进程对自然资源输出国造成的波动。此外，价值链中的功能升级可以使公司增加附加值，如进行研发、产品设计、物流或营销。此外，功能升级能够使公司从产品的价值链下游往上游移动，也能使它们跳到相关产业（或与其他公司结成联盟）。在矿业行业中，次产业包括从机械工程服务业到运输业的各种产业。在这一章的政策部分，我们提供了具体实例来说明企业产能和国家战略应如何调整，以应对具体部门增长放缓所带来的挑战。

中国的食品消费模式变化及对拉丁美洲的溢出影响

中国只有全球 7% 的耕地和 6% 的水资源，但是必须养活占世界 19% 的人口。2004 年，中国成为粮食净进口国，从此之后，农业部门的贸易赤字不断增长。正如第三章介绍的那样，中国正在经历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产阶级正在崛起。2014 年中国的城镇人口达到 7.58 亿人（占总人口的 54%）。预计到 2050 年，中国的城镇人口将增长 39%，达到 10.5 亿（占总人口的 76%）（联合国，2012）。中产阶级（定义为每天支出在 10 美元到 100 美元之间的家庭）在 2012 年的人数是 2.47 亿（占总人口的 18%），预计到 2020 年将达到 6.07 亿（占总人口 44%）（Burkitt and Davis, 2012）。

经济和人口结构的剧烈变化表明，拉美的农业和农渔业前途光明，能够实现对中国出口的多元化，特别是考虑到中国人已经开始改变生活方式和食品消费的偏好。城市人口收入的增加会改变饮食结构，需要高蛋白、加工的、预制的食物和具有较高质量、高安全性的食物或具有特殊性能的食物（见专栏 5.1）。这种现象对中国的生产能力、贸易渠道、监管环境和安全风险带来了挑战，同时也为拉美的贸易伙伴创造了巨大的商机。为了满足这种新的需求，中国正在加强与食品供应链上的外国合作伙伴的联系。拉丁美洲凭借其巨大的自然资源和水资源，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能够成为中国所需的营养丰富的、安全的、优质的食品的首要供应商之一。

专栏 5.1 2040 年中国食品市场展望

2011 年 11 月美国谷物理事会发布的研究成果《食品 2040：东亚食品和农

业的未来》中对东亚地区未来三十年的食品市场趋势进行了分析，确定了东亚市场今后发展的六大趋势。现总结如下，其中重点关注对中国的具体影响。

1. 东亚将成为生物科学领域的世界领导者。鉴于东亚庞大的人口和有限的耕地面积之间的差距，这一趋势极大地反映了提高农民收入的要求。尤其是中国，已经在生物技术上投入巨资，并支持转基因食品的发展。正在进行的和未来的研究将越来越多地集中于开发对气候变化影响具有更大抗耐性的作物品种。

2. 中国消费者的行为对农业和全球粮食市场具有强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力体现在几个方面：鉴于中国不断增强的实力和地位，中国将在世界范围内重新定义农渔业、生物技术、食品加工、物流和食品贸易。中国将继续通过在发展中地区租赁或者购买土地来扩大在海外生产食品的比例，生产成果将出口到中国，以确保粮食安全。

3. 亚洲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要求越来越严格。2040年，东亚的食品价值的很大一部分包括提供食品安全信息、核实食品质量和可追溯性的能力。符合这些标准的食品将获得相当大的价格优势。然而，在这方面中国食品行业还比较落后。中国已经打开了进口食品的大门。一个重要的成功案例就是阿根廷 San Cor 牛奶公司的配方婴儿奶粉已经从2013年1月开始出口到中国。

4. 东亚为具有特殊性能的食品生产提供重要机会。东亚具有食物保健的悠久传统，加上中国人口的老齡化，这为“功能性食品”生产开辟了广阔的空间。这些功能性食品，除了营养特性之外，还包含能够促进健康、减少患病危险的生物成分。

5. 亚洲人口将越来越多地外出吃饭。这种趋势在日本尤为明显，原因多样，其中之一便是，非婚的人数增多，晚婚的也多。还有就是家庭人口规模减小、更多的妇女参与工作以及西式快餐连锁店的渗透。中国在未来几十年可能也会经历类似的路径，这意味着，总体上来看，食材零售市场会萎缩，而预制食品市场会兴隆。此外，采用新技术和新方法生产、保存甚至运送食品都会迎来新的机遇。

6. 亚洲食品市场将会更加分化。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东亚食品市场将出现“超级分化和小众化”这一趋势。基于东亚的人口增长、人们日益增



加的工资和更复杂的口味，他们将会要求扩大特殊食品的种类。这将产生多个通过品牌、风格、营养价值、种植方式或烹调方式细分的食品市场。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美国谷物理事会（2011）《食品 2040：东亚食品和农业的未来》整理。

统计链接：www.usdajapan.org/en/food2040/Food%202040%20Fact%20Sheet%20English.pdf。

中国食物消费模式也从小麦大米类转向动物蛋白类，即达到营养转型的第二阶段（World Bank, 2015b）。中国对富含蛋白质的食物（以牲畜为主）的巨大需求，远远超出国内的产能。此外，对动物蛋白日益增长的需求将增加家畜的谷物消费，这进一步增加了对农业用地需求的压力。由于城市化进程导致耕地逐渐减少，土地日益荒漠化，加上更多的土地被用于种植具有更高价格的水果和蔬菜（Moreira, 2014），中国用于谷物种植的土地和水资源非常有限。随着人们对动物蛋白需求的增加，牲畜消费的谷物生产却没能得到改善。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像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巴西和阿根廷等肉类、奶制品和蔬菜出口商来说，前景一片光明。

多种情境都表明中国的饮食结构正在朝占比更多的肉类和油籽摄入转型（见图 5-2）。OECD 对中国和其他主要经济体关于消费、进口、土地使用和其他方面的长期趋势（Von Lampe et al., 2014; Von Lampe, 2015）进行了研究，结果为拉美出口的机遇提供了更多论据。总的来说，该模型表明，中国的小麦和稻谷总热量摄取比例将减少 2 个百分点，而肉类在消费中的比例将增加 0.5 到 1 个百分点。与基准国家中和中国有类似的消费路径的日本和韩国相比，中国的牛肉和鱼的人均消费量落后。这表明中国将大量增加进口各种产品。2014 年，中国人均每年的牛肉消费量只有 3.4 千克，而日本和韩国是 8 千克左右。中国鱼类产品的人均消费量是 36.4 千克，而日本和韩国平均为 52.3 千克（见图 5-3）。对这些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表明，拉丁美洲的牲畜水产品、油籽出口商和生产商将在未来处于有利的地位，可以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为拉丁美洲建立一个食品机遇指数

拉丁美洲出口商需要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的经济和人口结构的变化所带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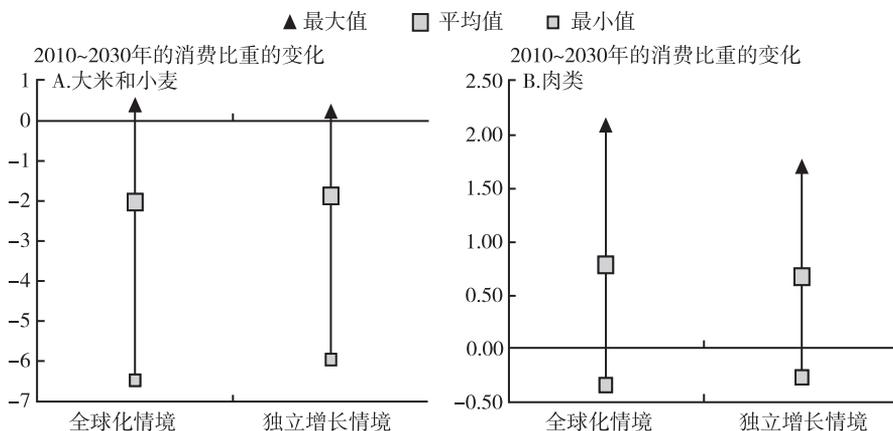


图 5-2 中国农产品消费比例的变化预测 (2010 ~ 2030 年)

注：基于 2010 年数据。竖线代表卡路里摄入量比例的绝对变化。

资料来源：Von Lampe (2015), “Alternative futures for global food and agriculture: Developing robust strategies”, OECD Joint Working Party on Agriculture and Trade, TAD/TC/CA/WP (2015) 1/FINAL。

统计链接：<http://dx.doi.org/10.1787/888933303246>。

的新的消费者需求和前景。根据 OECD - FAO 农业展望 (2015 ~ 2024 年) (OECD/FAO, 2015), 中国不仅对牛肉和鱼的需求不断增长, 而且对糖、家禽、油和蔬菜等产品的需求也将不断增长。表 5-2 显示, 在未来十年, 中国的人均糖、家禽和羊肉消费量将增加 20% 以上, 而对鱼、植物油、蔬菜和水果、生鲜乳制品、牛肉的需求将增长 10% ~ 20%。相反, 主食作物, 如大米和小麦的人均消费将降低。

“食品机遇指数”通过抓取 12 种出口商品的潜在效应, 来反映有关新兴消费趋势对拉美粮食出口国带来的潜在机遇。这 12 种出口产品如表 5-2 所示 (糖、家禽、羊肉、鱼、植物油、蔬菜和水果、生鲜乳制品、牛肉和小牛肉、谷物粗粮、猪肉、大米和小麦)。这 12 种产品从 2014 年至 2024 年的增长速度在该指数^①中被标准化。

① 每种产品均对应标准国际贸易分类 (SITC)。每个国家的这一指数的加权平均值是根据 2013 年相应产品在总出口中的比重计算得出的。图 5-4 根据 2013 年拉美 18 个国家的出口, 描绘出这一指数值分布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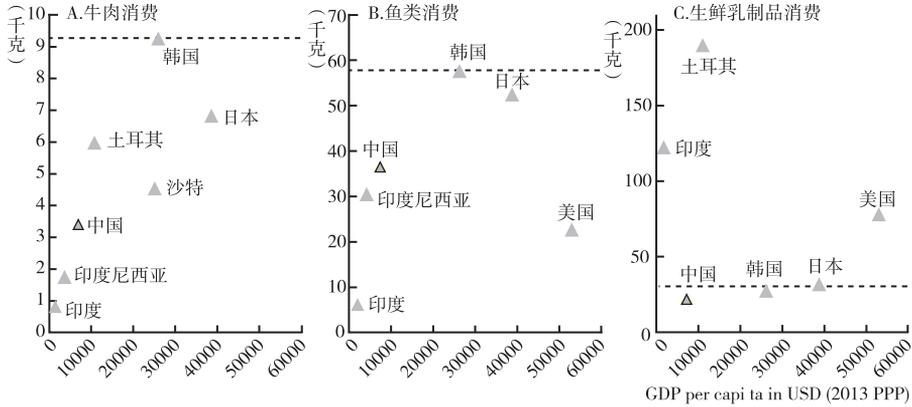


图 5-3 中国人均牛肉、鱼和生鲜乳制品的消费（2014 ~ 2024 年）

注：水平线代表部分亚洲国家中的最高消费水平以及未来该产品社会需求的潜在增长率。

资料来源：Datos de Perspectivas Agrícolas 2014 - 2023 de la OCDE/FAO (2014), http://dx.doi.org/10.1787/agr_outlook-2014-en-y-FMI (2015), World Economic Outlook 2015: Uneven Growth; Short- and Long-Term Factors, 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5/01。

统计链接：<http://dx.doi.org/10.1787/888933303250>。

表 5-2 中国人均食品消费现状与预测（2014 ~ 2024 年）

产品	人均消费量(千克)			2014 ~ 2024 年增长率 (%)
	2014 年	2020 年	2024 年	
糖	11.9	14.1	15.5	29.9
家禽	11.4	13.2	14.1	23.7
羊肉	2.8	3.2	3.4	21.3
鱼	38.0	43.1	44.8	17.6
植物油	22.8	25.0	26.3	15.0
蔬菜和水果	224.5		256.8	14.4
生鲜乳制品	23.6	25.1	26.8	13.5
牛肉和小牛肉	3.6	3.8	4.1	11.5
谷物粗粮	11.3	11.8	12.2	8.1
猪肉	32.0	33.0	33.4	4.5
大米	76.3	75.1	75.0	-1.7
小麦	65.0	61.8	60.2	-7.44

注：蔬菜和水果的消费基于 Von Lampe (2015), “Alternative futures for global food and agriculture: Developing robust strategies”, OECD Joint Working Party on Agriculture and Trade。

资料来源：OECD/FAO (2015), Agricultural Outlook 2015 - 2024, <http://www.agri-outlook.or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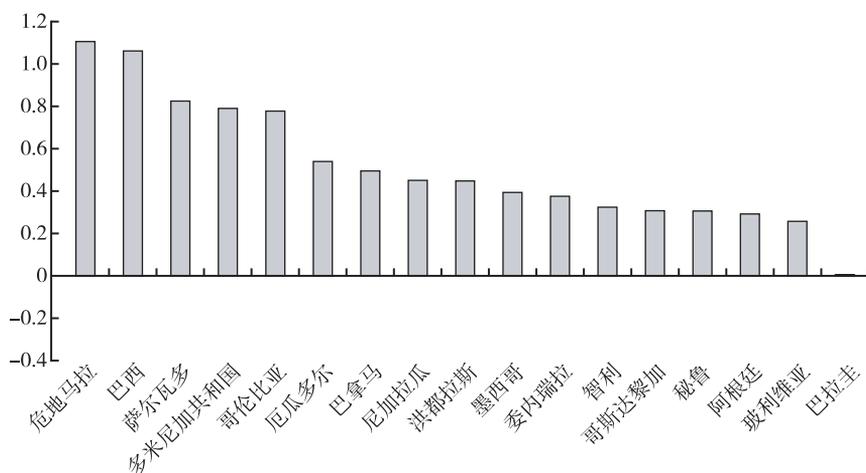


图 5-4 基于中国需求量的拉美食品机遇指数

注：平均加权指数在 -2.4 和 2.1 之间；除了洪都拉斯和委内瑞拉的数据，2013 年的数据来源于 SITC 第四版。洪都拉斯可用的最近的数据是 2012 年数据，委内瑞拉可用的最近一年的数据是 2013 年数据，但是来源于 SITC 第三版。

资料来源：OECD/CAF/CEPAL 的计算基于联合国（2015），United Nations Commodity Trade Statistics Database（Comtrade），<http://comtrade.un.org/>和 OCDE/FAO 的 Agricultural Outlook 2014-2023（2014），http://dx.doi.org/10.1787/agr_outlook-2014-en。

统计链接：<http://dx.doi.org/10.1787/888933303262>。

在满足中国未来十年的粮食需求上，危地马拉和巴西的前景最好。甘蔗是能够发展与中国未来的贸易关系的关键产品。巴西的甘蔗在 2013 年占出口总额的 7%，危地马拉的甘蔗占出口总额的 13%。其他相关产品有危地马拉的棕榈油和巴西的牛肉。萨尔瓦多、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哥伦比亚也是三个糖类出口国。它们还可以出口其他产品：金枪鱼和大西洋鲑鱼（萨尔瓦多），鳄梨和芒果（多米尼加共和国）和牛肉（哥伦比亚）。在未来十年，这些产品都有助于这些国家加快发展与中国的贸易关系。

未来几年，玻利维亚在满足中国粮食需求面前无所作为，因为玻利维亚的大多数出口产品是未磨的谷物，在中国的需求增长的速度不快。作为藜麦的生产者和出口国，玻利维亚可以满足中国和国际上对藜麦日益增长的需



求。这可能是一个小众市场，因为藜麦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是为数不多的植物粮食，含有完整的蛋白质种类），缺少面筋，并具有很高的纤维含量（如上面提到的，亚洲不断增长的对“健康”食品的需求是其消费增长潮流的一部分）。高度依赖牛肉出口的巴拉圭和乌拉圭，正如表 5-2 所示，在 2014~2024 年可能会有 11.5% 的增长。它们准备提高牛肉产品贸易额。现在，如果肉类出口国的产品（包括家禽和羊）能够实现多元化，那将有利于对中国的出口。

对不在群组国家的食品机遇指数的研究显示，扩大某些群组国家的出口大有可为。在第四章中已经提到，初级产品出口国可以利用与中国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促进出口。在智利，鲑鱼养殖业是一个公认的成熟行业，可以供应国际市场，因此，与中国发展鲑鱼贸易将是很自然的一步。在秘鲁，扇贝行业（双壳软体动物）也很有前景。虽然这个产业规模较小，但是秘鲁的扇贝生产商对中国的出口在 2012 就增长了 300% 之多。

要想利用食品消费变化趋势所带来的优势，并且避免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拉美各国政府应实施更加积极的政策，帮助企业占据生产链中附加值最集中的位置。一些食品出口国的产品正是中国需求旺盛的产品，其中包括具有附加值的初级产品（肉、鱼、蔬菜和水果），它们正在努力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在第四章中，我们已经分析了中国对拉美出口繁荣期对拉美的间接影响。首先，影响了拉美厂家的竞争力。中国出口到拉丁美洲的产品与当地生产者的产品展开竞争。不过，这种影响是适度的。其次，影响涉及拉美贸易的第三方市场。中国的竞争威胁指数（IAC）一直高于预期（Jenkins, 2008; Dussel Peters and Gallagher, 2013; Avendano, Reisen and Santiso, 2008; Santiso, 2007），这种情况还会继续。事实上，中国在过去十年中的扩张对拉美出口到第三国市场产生了不利影响，这种在不同国家和不同行业中的不利影响强度各异。

最后，中国对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一直是积极而适度的。近期初级产品价格周期（从 2003 年起）在多大程度上受中国影响仍然是一个有争议

的问题，中国的需求能否带来原材料的未来繁荣，目前尚不十分明确。学者们提出了各种研究方法，来评估中国的需求对商品价格的影响。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方法就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中国效应”（Jenkins, 2011）^①。用这种方法来估计，中国对全球商品价格的影响小于10%。总体而言，在21世纪前十年，中国的附加需求主要影响了矿物、矿石和金属的价格（平均价格上涨了10%~25%），其次是食品，最后是在较小程度上影响了石油、森林产品和肉类的价格（Jenkins, 2011）。

总体来说，原料的净出口国是从最近大宗商品繁荣中获益最多的国家，但这种趋势正在发生变化。根据每个国家的进口或出口情况，“中国效应”让拉美国家或多或少都能获益。总的来说，在2002~2009年，受益最多的国家是矿产出口国，如秘鲁和玻利维亚，其次是石油出口国，如委内瑞拉和墨西哥。“中国效应”对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和巴拿马）不利，因为更高的出口价格被进口价格的上涨抵消了（Avendanoy Dayton-Johnson, 2015）。当前，由于原材料价格稳定在较低水平，这一趋势似乎得到扭转。正如在过去几十年里，这些原材料的价格在未来十年的变动将决定中国需求的净效应。

结构转型和竞争力

国内可用技术的扩展和升级目前是而且将继续是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转型的主要基础。尽管和OECD国家仍有较大差距，但是中国各个级别的受教育的机会都在显著增加，特别是在学前教育、中等和高等教育方面。此外，中国正在采取措施，提高教育质量，让教育与劳动力市场连接起来，预计这将在未来几年中占据主导地位。中国从世界工厂华丽转变成创新领导者，其政策的重点就是竞争力，因此，中国的竞争力在中长期内预计将进一步得到提升。

提高教育质量和竞争力，使中国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和克服“中等收入

^① 考虑到中国对大宗商品需求的增长与世界其他国家同步的情况，在评估中国方面对价格的影响时，可以采用不同的商品。显然，在评估中国对价格的影响时，必须考虑拉丁美洲出口的每一项大宗商品的全球供应弹性的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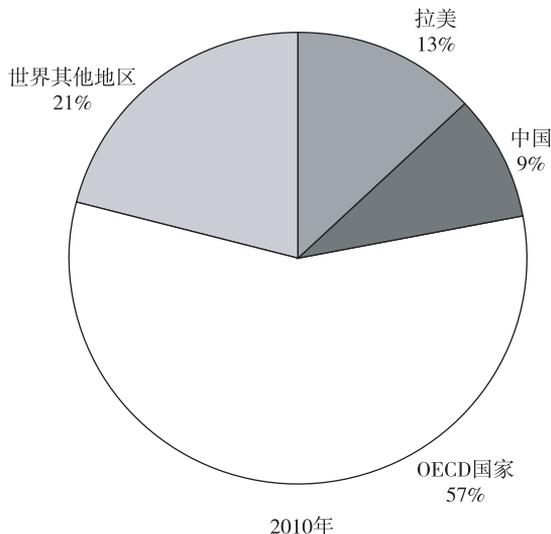


陷阱”等方面均超越了拉丁美洲。由于缺乏新的改革政策，拉美可能会受到中国基于竞争力转型的较大影响，会面临强有力的竞争，尤其是在关键的生产性和多元化发展领域。然而，中国的转型也可能为拉美带来新的机会，因此，拉美地区应该准备好迎接中国转型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本部分将讨论以人力资本（教育和竞争力）的强劲增长和先进的经济模式为基础的中国在全球化和一体化中如何影响拉美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以及如何克服“中等收入陷阱”。

拉美对全球人才的贡献停滞：全球财富转移中的竞争力维度

中国重视教育和竞争力。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而拉丁美洲在全球人才库中的权重下降。在未来的全球财富转移过程中，新兴国家将在全球经济中占据更重要的地位。全球财富转移取决于各个经济体的投资和增强竞争力的能力，这将提升创新能力，带来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在这方面，中国在未来几年正准备成为竞争力储备雄厚的经济强国，在2020年和2030年，将分别为全球人才库提供20%和23%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见图5-5）。而拉丁美洲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在全球人才库中所占的比重预计将下降至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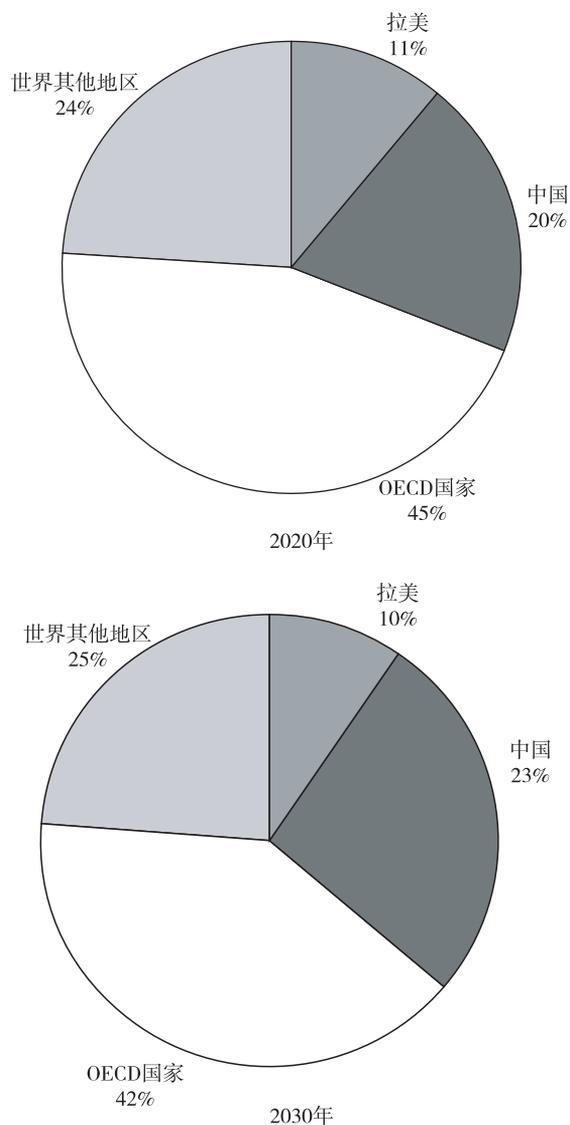


图 5-5 2010 ~ 2030 年不同地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 (25 岁以上) 在全球人才库中所占的比重

注：由于缺少数据，图中不包括印度。

资料来源：OECD/CAF/ECLAC 根据世界银行（2015a）计算，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and 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 <http://www.uis.unesco.org/Pages/default.aspx>。

统计链接：<http://dx.doi.org/10.1787/888933303270>。



目前的趋势是：中国将成为世界上受过高等教育人口最多的国家。相比于拉丁美洲，中国的劳动力量多质好。中国强调知识和竞争力，因此，在基准情境下，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在2020年将达到1.25亿，而拉丁美洲到2030年，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只有9000万。

这些预测^①表明，在这种情况下，根据中拉最近几年的大学生毕业人数的变化（见图5-6），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的增加速度比拉美要快得多。在加速毕业的情境下，中国具有大专以上文凭的劳动力增长得也会更快，而中拉之间的差距也将继续扩大，尽管目前中国和拉美的大学毕业生数目之差仍较小。基于这些假设，在基准情境下，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总量到2030年将达到总人数的21%，与目前澳大利亚的水平相近；而在加速毕业的情境下，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总量到2030年将达到总人数的26%，与目前的德国相近。在基准情境下，拉丁美洲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占总人口的19%左右，与目前奥地利的水平相近；而在加速毕业的情境下，拉丁美洲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占总人口的21%左右，与目前澳大利亚的水平相近。所有这一切都可能对拉丁美洲产生强劲的影响。中国将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更多高附加值的环节，将有能力生产更加精密的产品和创新型产品，提供更加精细的服务和创新型服务。而拉丁美洲可能在这些领域面临更大的困境，只能生产附加值更低的产品，处于生产链的低端。

除了竞争力提升之外，拉丁美洲和中国共同面临的问题是：质量、相关性及适应经济的竞争力可用性。虽然中国和拉美目前的竞争力池都在扩张，但是问题是中拉是否都具备将知识和竞争力的提升转换成生产力的提升和生

^① 图5-6显示了2013~2030年两种情境下中国和拉丁美洲年龄在25岁以上、受过高等教育的预计人数。该项预测以2010年（或者以可获得数据的最近年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存量）为基础，利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司的数据进行计算，然后假设每年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流量）的两种不同路径：i）基准情境假定到2030年之前，每年的流量呈线性增长（也就是说到2030年之前每年的流量等于2013年高等教育的毕业人数）；ii）高毕业率情境假设到2030年之前各国的流量的增长率呈递减趋势：此间 $t=1$ ，增长率等于可以获得数据的最近5年的年均增长率（AAGR），然后每年的增长率为 $(AAGR)^{1/t}$ ，其中 t 是每一个年份与参考年份（2013）年之间的差值（例如，2013年时 $t=1$ ，2014年时 $t=2$ ，…，2030年时 $t=18$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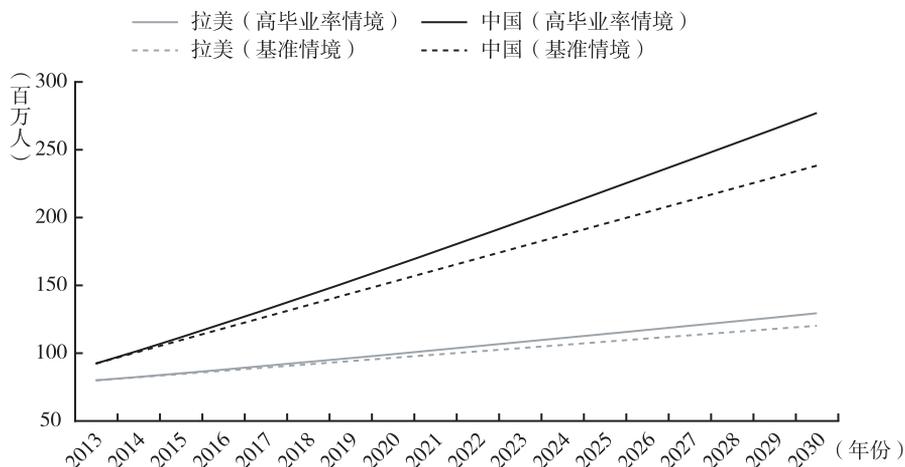


图 5-6 中国和拉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预测 (2013 ~ 2030 年)

资料来源: OECD/CAF/ECLAC 根据 World Bank (2015a) 计算,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and 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 www.uis.unesco.org/Pages/default.aspx。

统计链接: <http://dx.doi.org/10.1787/888933291987>。

产力的创新以及经济的整体发展的能力。因此,教育的质量、知识和竞争力、根据知识门类的劳动力分配情况、竞争力的供给和需求相互契合,都是非常关键的因素。

在质量方面,中国的教育体系的表现要优于拉美和很多 OECD 国家。如 OECD 的 PISA (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表明:中国中学生的学习能力比拉丁美洲的中学生要强 (见图 5-7)。

中国学生的知识与竞争力比拉美学生更加均衡,学生更加均匀地分布在不同的学科领域。而且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STEM) 专业的毕业生所占比例较高。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通常被视为与先进的生产系统需求直接相关的教育学科,可以促进创新和提高生产率。在中国,几乎一半的学生更喜欢学习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这与拉美学生集中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法律和教育学科 (见图 5-8) 有很大不同。这可能对未来产生影响,因为中国不断增长的知识竞争力,会培养出大量具有大专以上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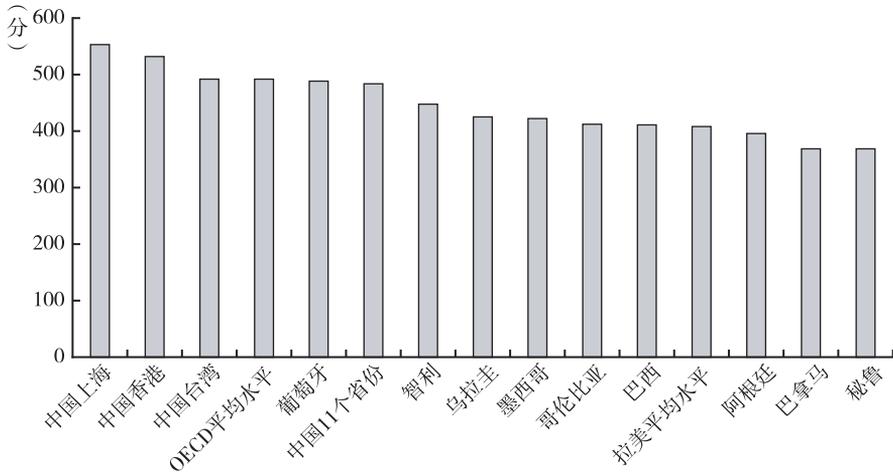


图 5-7 中国和拉美的中等教育质量：PISA 阅读考试成绩

注：根据阅读成绩对国家和省份进行排名。除了“中国上海”和“中国 11 个省份之外”，其他都包括职业中学。中国的样本取自 1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北京市房山区、天津、海南、河北、湖北、江苏、吉林、宁夏、四川、云南和浙江）。为了覆盖中国 11 个地区的成绩，中国采用 PISA 2009 年的数据，除此之外其他地区采用 PISA 2012 年的数据。

资料来源：PISA 数据库和 OECD (2015a)，www.oecd.org/pisa/。

统计链接：<http://dx.doi.org/10.1787/888933291998>。

凭的劳动力，他们将推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创新。与之相反，拉丁美洲不仅会缺少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的人才，而且学科领域的不平衡会导致工人的技术和经济需求之间不匹配。

拉美地区的雇主在用工时会比中国雇主遇到更多的困难。拉美地区用工难度大闻名于世（OECD/CAF/CEPAL, 2014；Melguizo and Perea, 2015）（见图 5-9）。有证据表明，中国也面临这方面的困难，但是难度低于全球和拉美的平均水平：22% 的中国企业认为填补空缺职位有困难，而世界平均水平是 38%，拉美地区的平均水平略高于 50%（Manpower Group, 2015）。这表明，相较于拉丁美洲，中国的知识竞争力的需求和供给之间匹配得更好。然而，这种均衡可能会掩盖劳动力可用类型和经济所需要的竞争力之间的矛盾。中国和拉美似乎都特别需要具备软性竞争力和技术能力的劳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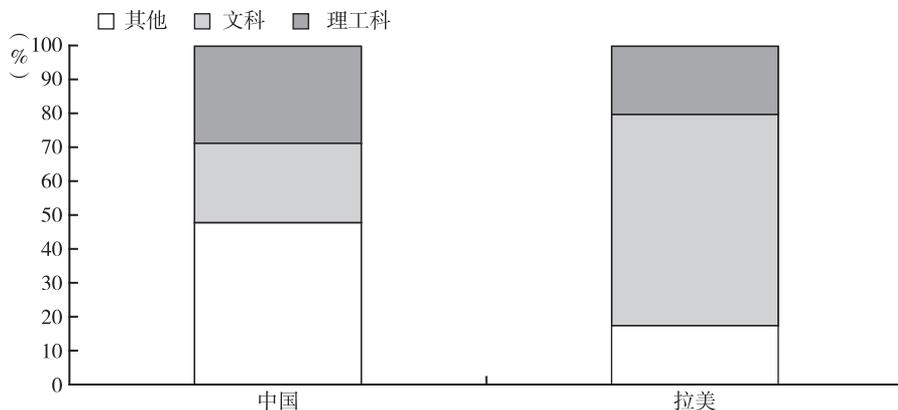


图 5-8 中国和拉美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的专业分布

资料来源：OECD/CAF/ECLAC calculations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 (www.stats.gov.cn/english/) 以及世界银行教育统计数据库 (<http://datatopics.worldbank.org/education/>) 的有关数据计算。
统计链接：<http://dx.doi.org/10.1787/888933292007>。

在中国大学毕业生“我的职业竞争力”的调查中发现，软性竞争力是学生求职最重要的竞争力 (OECD, 2015b)。与此类似，拉美地区的雇主也认为更难找到具有软性竞争力和技术能力的工人。竞争力缺口在这两个地区都存在，随着经济结构更加完善和成熟，这种缺口会更加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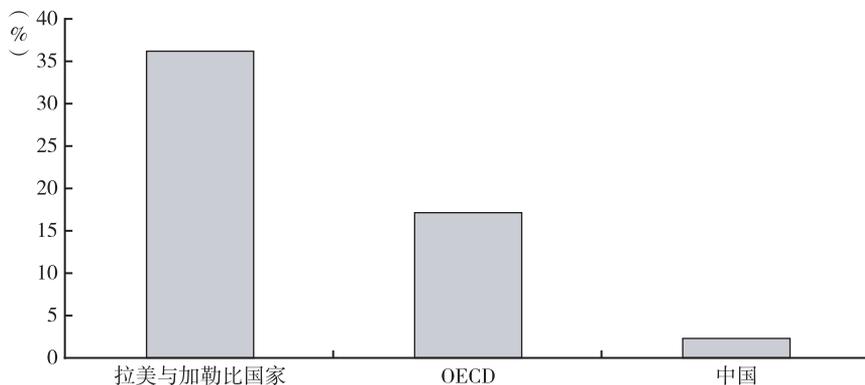


图 5-9 竞争力缺口：企业用工难 (2006 ~ 2009 年)

资料来源：World Bank Enterprise Surveys, <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enterprise-surveys>。
统计链接：<http://dx.doi.org/10.1787/888933292011>。



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比拉美国家更有潜力成为以知识竞争力为基础的快速生长的国家，更有能力扩大人力资本，为经济转型培养高竞争力劳动力。

拉美确保比较优势的挑战更大，在价值链的许多环节与中国的竞争将进一步加剧。中国将成为更发达的国家，提供具有更高附加值的服务和制成品。同时，中国将保持在更多的标准制造业中的竞争力。中国可能扩大有效竞争的领域，从而使拉丁美洲难以保持自己的比较优势。当然，中国的转型也可能为拉丁美洲创造机会，这些机会是：高质量的服务，高附加值的自然资源出口，或者更加注重新的经济需求。

竞争力对于从技术变革中获益来说至关重要，这些技术变革将改变工作性质。技术进步是中国和拉丁美洲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重点。这两个地区似乎都处在同一个发展阶段，其中，旧的经济驱动引擎如劳动力要素的积累已经不足以维持经济发展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劳动力成本上升，其需要新的经济增长引擎。技术变革，特别是先进的生产工艺技术的应用，对于提高生产率来说至关重要。

中国在技术进步方面领先于拉丁美洲。除了传统的研发指标之外，中国正在占领新的技术进步高地。近年来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取得了显著进步。随着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改进生产工艺，显著提高生产率，其有望成为增长的强大动力。中国在这一领域领先于拉丁美洲，2013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机器人最大的市场（IFR，2014）。在拉丁美洲，只有墨西哥和巴西脱颖而出顺应了这一发展趋势。2013年，墨西哥的机器人购买量增加了30%，而巴西尽管机器人购买量下降，但在2013年仍购买了大约1300台机器人（IFR，2014）。

快速的技术发展可能给拉丁美洲带来挑战，由于生产自动化或机器人化可能对经济产生强烈冲击，对拉美地区尤其如此。因为在拉美，贫困、不平等、非正规就业和新兴的中产阶级的脆弱性可能会因为自动化和机器人取代低竞争力工人而变得更加严重。同时，拉美地区对高科技产品，特别是数字

化的产品的需求可能会扩大，对中、低端科技产品的需求急剧萎缩。这种情况在中国和拉丁美洲都可能发生。在不平等情况严重的地区，竞争力需求的变化将导致更大的贫富差距。此外，科技可能扰乱劳动力市场，从而直接影响脆弱的新兴中产阶级，使他们重新陷入贫困之中。最后，科技使效率低下的市场更加难以生存：它将对非正规部门产生直接的影响，而拉丁美洲低学历劳动力、低竞争力的非正规部门特别庞大。

庞大的非正规就业使拉丁美洲面临竞争力的重大挑战。非正规就业是拉美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特征之一，因而会增加竞争力造成的挑战的复杂性和影响力。新技术可能会造成非正规部门的工人大量失业。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工人的竞争力得不到显著提高，那么正规部门很难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此外，以上所述的拉美地区的竞争力缺口只是基于对正规部门的观察，如果加入非正规部门，那么竞争力缺口将更大（OECD/CAF/CEPAL，2014）。因此，必须制定措施来应对竞争力带来的挑战，改善非正规就业的规模。

一般来说，拉丁美洲的正规就业率很低。被研究的 19 个拉美国家中，只有 45% 的工人（15 ~ 64 岁）拥有社会保障（Bosch, Melguizo and Page, 2013; OECD/IDB/World Bank, 2014）。换句话说，大约 130 万工人不参与任何社会保障制度，因此当他们失业、生病或退休之后，会非常脆弱。

正规就业水平低和一系列社会经济特征有关。教育水平对参与养老金计划的可能性有重大影响。教育程度越高，参与养老金计划的可能性越大。在拉美地区，受过 8 年或 8 年以下教育的工人中，只有 22% 参与养老金计划。而受过 9 ~ 13 年教育的工人中，有 42% 参与养老金计划，受过 14 年以上教育的工人中，有 68% 参与养老金计划。在研究过的 19 个拉美国家中，女性参加养老金计划的比例是 56%，而男性是 83%（OECD 国家，女性平均是 62%，男性是 80%）。家庭收入水平的差异也会影响就业的正规性。所有拉美国家中，收入最高的 1/5 的工人参与养老金计划的比例最高，为 80% ~ 98%。



金融和投资渠道：贷款和企业国际化

随着中国企业的金融一体化和国际化的进程加快，过去十年间中拉之间的融资渠道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中国对拉美提供的贷款已成为拉美外部融资的最重要来源，超过已经在该地区扎根的国际金融机构。此外，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已经从传统行业如采矿业转移并扩大到多个行业，包括电信、环保技术和银行业。这些趋势表明，我们必须重新评估这两个地区之间的金融和投资联系。

中国再平衡的过程意味着国内投资将大量萎缩，这有利于资金向其他地区流出。根据预测，中国和拉美之间投资存量在 2025 年将达到 2500 亿美元，大大超过 10 年前的投资存量 990 亿美元。在未来几十年，中国由于吸收国内投资的能力有限，将不得不为其过剩的储蓄寻找新的出路，因此，海外投资和融资将会增加。此外，中国的基础设施、电信和服务公司的剩余产能都将会转移到国外市场，比如拉丁美洲^①。作为资本的净出口国（自 2014 年以来），中国在为拉美其他部门提供资金和技术方面的作用可能更加重要。

拉丁美洲的国际融资：中国贷款的作用^②

如果说在财富转移的第一阶段中贸易渠道最为重要，那么在财富转移的第二阶段，金融渠道将是关键途径。本节将考察中国对拉美的融资作用，研究中国贷款成为拉丁美洲传统的融资工具（例如，债券市场和国际金融机构）的过程。此外，我们将着重从发行人（特别是中国的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资本的成本、期限和贷款条件的角度，研究中国对拉美

① 中国增加对拉美的投资承诺是通过不同的贸易与合作协定来实现的，其中包括巴西的 Corredor Ferroviario Bioceánico Central，秘鲁的 Ilo 港口，香港尼加拉瓜运河发展集团（HKND）的尼加拉瓜运河建设项目以及建立产业合作特别基金。

② 本节是由 Margaret Myers（美洲对话组织）整理起草的。中国贷款的数据来自 Gallagher 和 Myers（2014），“China-Latin America Finance Database”，Washington: Inter-American Dialogue。其他金融贷款方的信息来自各自的年报和 Dealogic（2015）。

贷款的结构。

中国对拉美的贷款是互补性的，而不是替代性的。中国的贷款主要提供给资本市场准入成本高、国际金融机构贷款数额非常有限的国家。此外，中国偏向于资助少数的特殊行业（如基础设施、能源和采矿业），这有别于传统的国际金融机构贷款。传统的国际金融机构的贷款涵盖更加广泛的活动和部门。未来中国在拉美金融体系和国际金融市场中的维稳作用值得继续深入探讨。

拉美国家的资金来源通常与不同的政策目标挂钩。在拉丁美洲，三类关键的行为体决定国际融资的准入：国际金融市场、国际金融机构（如拉丁美洲开发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以及国外公共金融机构（IFP），如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同时，国际金融市场有两个组成部分：银行体系和债券市场。一般情况下，在资本市场发行债券没有特定的政策目标。但是，债券的价格受发行国的信用风险影响。国际金融机构的情况则相反，贷款往往与具体的政策挂钩，此外，还通常附带为各国政府在制定改革政策时提供技术援助。最后，国外公共金融机构的贷款，无论是开发银行还是其他机构的贷款，都与该国的具体项目或公司捆绑。中国的银行并不向贷款接受国政府强加任何政治条件，但是要求它们采购中国的设备、用在中国的企业身上，或者附加石油销售协议。中国的融资也设置一系列的环境准则，但是这些环境准则并不受西方同类准则的制约。

虽然资金的主要来源仍是债券市场，一些拉美经济体的双边贷款近年来仍有所增加。和中高收入国家类似，拉美国家大约 60% 的融资来自债券市场，双边贷款约占全部国际融资存量的 8%。这个比例自 2005 年起就一直保持稳定（见图 5-10），不过，在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等国，双边贷款的比例在最近几年大大增加。例如，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厄瓜多尔的双边贷款的比重在 2005 ~ 2013 年分别增长了 12 ~ 16 个百分点。

中国融资的作用从 20 世纪末才开始凸显，这一趋势一直在加强，中国



拉丁美洲经济展望（2016）：发展与中国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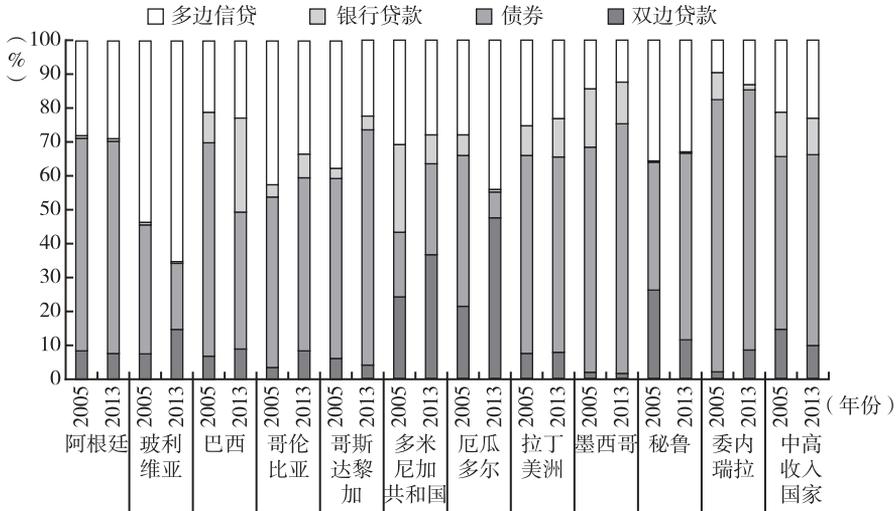


图 5-10 拉丁美洲和中高收入国家在国际市场中的融资来源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国际债务统计，<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ata/reports.aspx?source=International%20Debt%20Statistics>。

统计链接：<http://dx.doi.org/10.1787/888933292029>。

逐渐变成了一些拉美国家的主要融资来源国^①。据估计，在 2010 年、2011 年和 2014 年，中国的贷款是双边和多边贷款等国际融资的主要形式（见图 5-11）。在 2010 年，中国的融资在以下两个项目中尤其重要：首先，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为委内瑞拉经济与社会发展银行（BANDES）和委内瑞拉国有天然气和石油公司（PDVSA）提供了 200 亿美元贷款，资助与石油生产有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其次，阿根廷政府申请了 100 亿美元的中国贷款，以更新铁路系统。2014 年，中国对拉美的贷款超过 220 亿美元，

① 中国贷款与其他金融渠道的对比并不那么简单，数据的出入很大。资本市场的数据来源于不同的渠道（Datastream, World Bank, IFS IMF, BIS, Dealogic），包括发行数量、原发性和次级债券利差、承销费和到期日等信息。国际金融机构的贷款特点可从年报中获取，某些双边信贷来源于国家公共银行（比如美国进出口银行）。为了考察中国对拉美的贷款，研究者努力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可比性（Gallagher and Myers, 2014），以便提供贷款规模、发行人、用途和借款人等有用信息，这样与拉美的其他金融渠道就有了可比性。

较上年增长 71%^①。2014 年和 2015 年，据称中国在拉美新增数十亿美元的授信，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是主要的金主，除此之外，中国的一些商业银行也在拉美增加了业务^②（Gallagher, Irwin and Koleski, 2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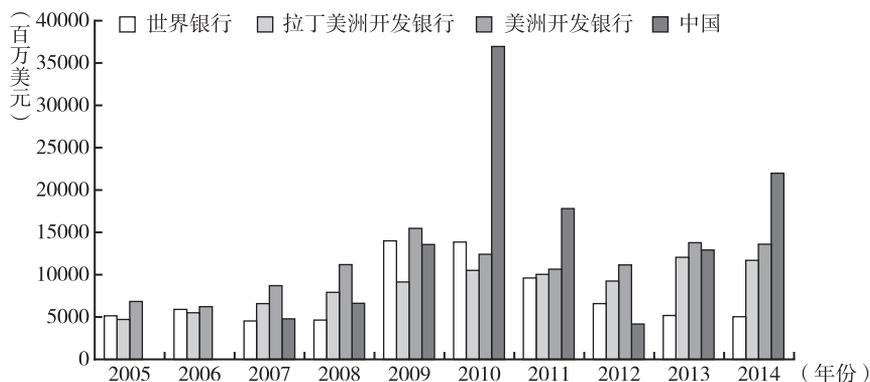


图 5-11 拉美的贷款：双边和多边贷款

注：中国的贷款包括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贷款。世界银行贷款是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国际开发协会的贷款承诺。拉丁美洲开发银行的贷款是指贷款承诺，美洲开发银行的数据包括贷款和批准的担保。

资料来源：OECD/CAF/ECLAC 根据各家机构的年报（拉丁美洲开发银行、美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以及 Gallagher 和 Myers (2014) (www.thedialogue.org/map_list/) 有关中国的数据计算。

统计链接：<http://dx.doi.org/10.1787/888933292035>。

中国的融资对传统上由传统国际金融机构（IFI）提供贷款的经济部门和国家形成了补充。与传统的国际金融机构不同，中国对拉美的贷款集中在基础设施、能源和采矿业。2014 年，中国的银行提供的所有融资业务都涉及以上所述部门。相反，国际金融机构——包括拉丁美洲开发银行，美洲开发银

① 相比之下，2012 年，中国的银行只发行了 350 亿美元的新债券，为 2005 年中国开始向拉美地区扩大贷款以来的最低。

② 2014 年，在中国对拉美的贷款中，中国进出口银行占 48.2%，国家开发银行占 30.7%，其余为各家商业银行，如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2013 年，中国央行（中国人民银行）首次发放贷款，与美洲开发银行建立一项共同基金。



行和世界银行——提供的贷款，60%以上投向了金融市场、教育、卫生、环境和公共管理领域（例如，政府现代化、宪政和正义国家）。应该指出的是，中国的贷款集中在那些历来不能获得大量双边和多边融资的国家。接受中国资助最多的国家是阿根廷、巴西、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它们在2005~2014年接受的贷款占中国对拉美贷款总额的近91%^①。委内瑞拉是最活跃的借款方，自2005年起，已接受中国563亿美元贷款，占中国对拉美贷款的47%。其次是巴西（19%）和阿根廷（16%）。国际金融机构在拉美的业务操作各不相同。在2014年，拉丁美洲开发银行的贷款有90%投向南美，而美洲开发银行资助的项目有70%以上集中在巴西、墨西哥和秘鲁。总体而言，中国的贷款和传统的多边融资在拉美地区的国家覆盖面方面是互补关系。

从中国借贷的国家在国际金融市场融资的成本很高，所以中国的资金集中在具有较高风险的国家（以全球资本市场的传统风险测评方法衡量）。这些国家的主权债券息差更高（见图5-12），平均为680个基点，而拉美其他国家的主权债券息差只有225个基点。

与大宗商品挂钩的贷款正在增加，降低了中国贷款的违约风险。目前，近15%的中国对拉美的贷款都包含了与大宗商品挂钩的条款，尤其是对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的贷款。中国用贷款换取石油和采购中国设备，以减少借款方的贷款成本，否则借款方可能无法偿债。以石油换取贷款的贷款协议一般包括一份贷款协议和一份石油销售协议，涉及双方的国有银行和国家石油公司。中国的银行为石油出口国提供贷款，石油公司则承诺在贷款期内，以市场价格向中国出口石油。中国石油企业按市场价格购买石油，并将购油款存入它们在中国国有银行的账户中。

中国的银行的融资成本并不比国际金融机构低。虽然很难对融资成本进行比较，但是中国的贷款利率与国际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相当或甚至高出后者。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贷款条件比世界银行更加严格，息差也比世界银行更高。相反，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贷款利率通常比美国进出口银行的利率低

^① 更多信息可浏览中国—拉美金融数据库，www.thedialogue.org/map_li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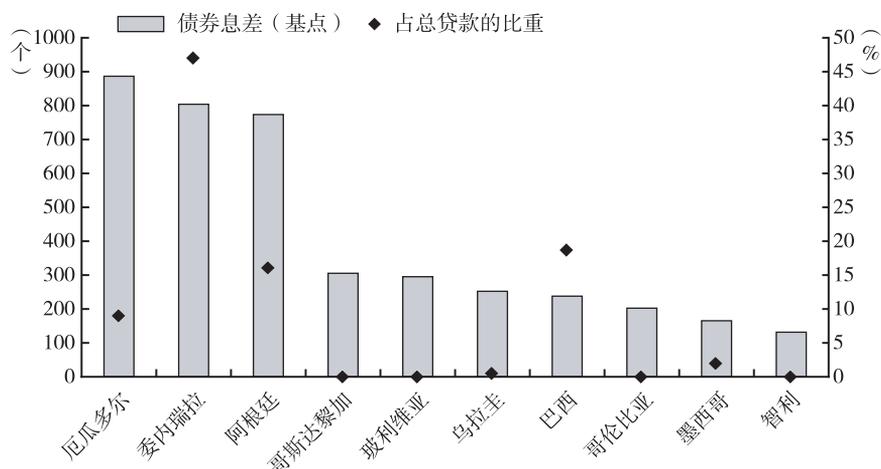


图 5-12 拉美债券息差和中国的贷款 (2005 ~ 2014 年平均)

注：玻利维亚的主权债券息差的可用数据是 2013 年以后的，巴哈马、圭亚那、洪都拉斯和牙买加的息差数据不可获得。

资料来源：Thomson Reuters, <http://thomsonreuters.com/en.html> and Gallagher and Myers (2014), www.thedialogue.org/map_list/。

统计链接：<http://dx.doi.org/10.1787/888933292049>。

(Gallagher, Irwin and Koleski, 2012)。另外，根据 2013 年厄瓜多尔的公共外债统计公报的信息，中国的贷款利率与国际金融机构和区域性的开发银行大致持平。

不过，中国借贷成本仍比资本市场的借款成本低，而且国家间的歧视（从违约风险的角度）也没债券市场那么严重。2008 ~ 2014 年，大部分情况下，在拉美国家中，债券的到期收益率（中国发放贷款之日）比支付给中国的银行的利率更高（见图 5-13）。这也反映出，违约风险高的国家，在债券市场中的融资成本非常高。此外，中国的银行对不同的拉美国家没有太大歧视。实际上，在债券市场中债券的到期收益率标准差（中国发放贷款之日）是中国的银行的贷款利率标准差的 1.8 倍。不管贷款是否与大宗商品挂钩，这一点都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在拉美金融业中的存在引发其在拉美金融体系中的角色问题。随着中国对拉美的贷款规模越来越大，贷款成本对主权债券的影响可能会受到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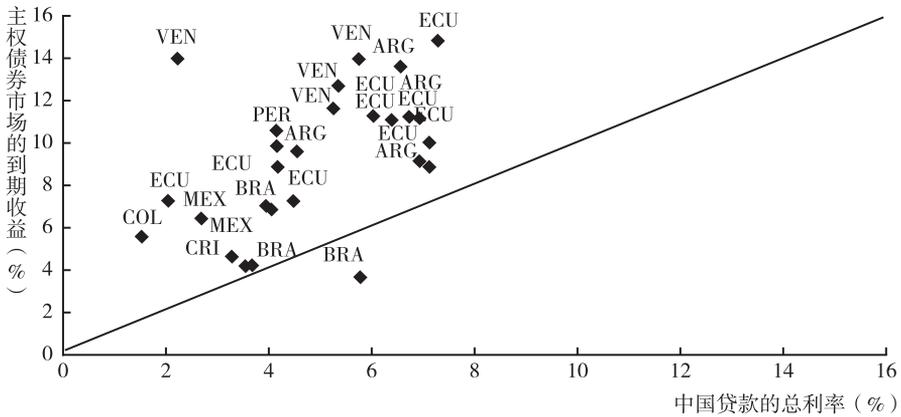


图 5-13 2008 ~ 2014 年拉丁美洲融资成本：中国的贷款 vs. 主权债务

注：主权债券市场的融资成本是根据 JP 摩根精简的到期收益来计算的。ECU 指厄瓜多尔，VEN 指委内瑞拉，ARG 指阿根廷，GRI 指哥斯达黎加，BRA 指巴西，COL 指哥伦比亚，MEX 指墨西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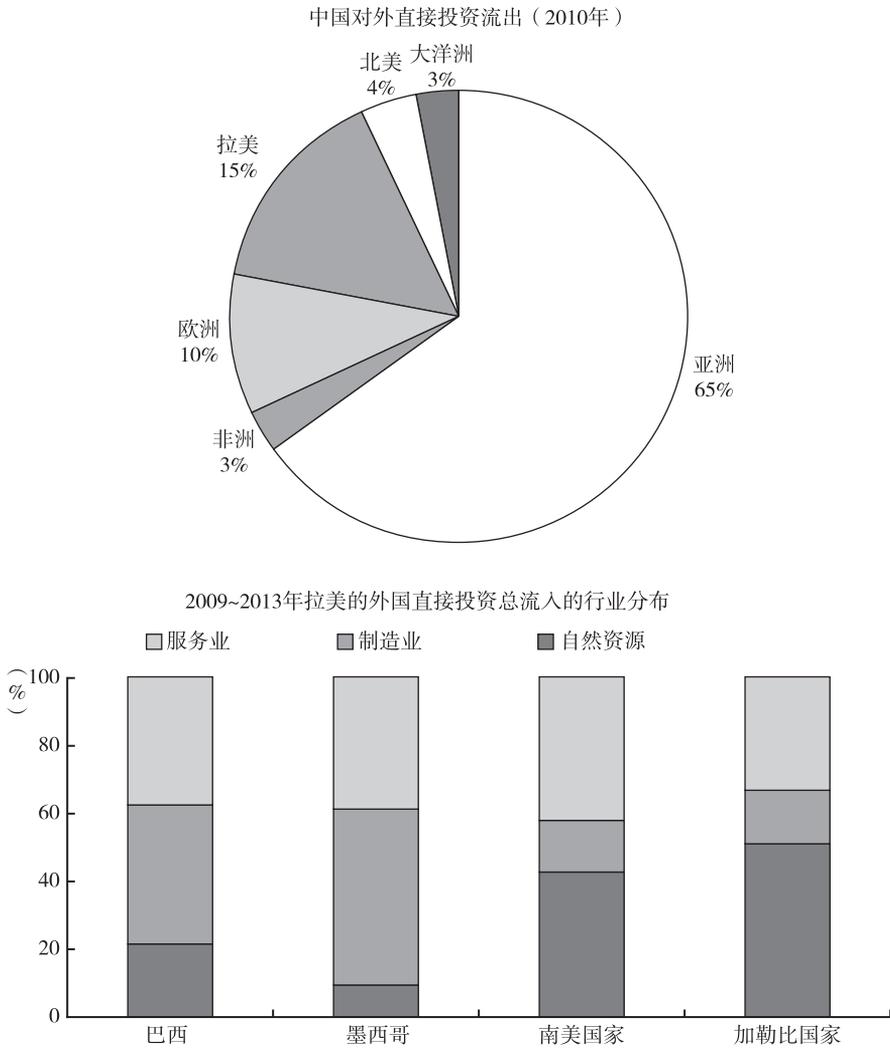
资料来源：Thomson Reuters <http://thomsonreuters.com/en.html> 和 Gallagher and Myers (2014), www.thedialogue.org/map_list/。

统计链接：<http://dx.doi.org/10.1787/888933292058>。

疑。在基准情境下，由于中国的贷款无法与传统资本市场上的融资做直接比较，绘制收益率曲线十分困难。另外，由于拉美不同国家的违约风险不同，债券的价格更加分化（见图 5-12 和图 5-13）。中国贷款对拉美地区的资本重新配置会起到一个信号作用。

外国直接投资和中国企业的国际化

除了中国对拉美的贷款之外，最近几年中国对拉美的外国直接投资也非常重要。2008 年金融危机后，拉美国家吸收了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并非仅有中国一家。不过，2014 年，拉美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总流入（1530 亿美元）比 2013 年下降了 16%。南美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采掘业和自然资源行业（即在智利、哥伦比亚和秘鲁的采矿业，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的石油行业），巴西和委内瑞拉的制造业（如汽车和电子产品）和服务业也吸引了外国直接投资。一般情况下，服务业，特别是电信、金融服务、能源分销和零售贸易，能够吸引相对较多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见图 5-14）。



**图 5-14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出 (2010 年) 和
拉丁美洲外国直接投资流入 (2009 ~ 2013 年)**

注：南美国家有阿根廷、玻利维亚、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乌拉圭，加勒比国家有多米尼加共和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资料来源：OECD/CAF/ECLAC 根据各国的数据和中国国家统计局（www.stats.gov.cn/enGliSH/）的数据计算。

统计链接：<http://dx.doi.org/10.1787/888933292064>。



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出量居世界第三位，与美国和欧盟（3480亿美元）并驾齐驱。然而，中国对拉美的外国直接投资（见图5-14）与其他地区相比，仍然相对较低。部分是由于中国商务部收集到的官方数据不全。近年来，在统计中国对拉美的外国直接投资额时必须考虑三个重要因素：首先，有不少企业通过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和其他金融中心对拉美进行投资。2011年，中国香港、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的投资（CEPAL，2013）合计占中国对拉美投资总存量的比重为79%。其次，一些拉美国家统计外国直接投资额的来源国，这使得计算中国对拉直接投资更加困难。最后，通过境外控股子公司进行投资很常见。例如，中国在巴西最重要的投资之一是中石化收购雷普索尔巴西公司40%的股权（超过70亿美元），但因为中石化的子公司位于卢森堡，所以被计入为卢森堡的外国直接投资。尽管数据有限，现有的资料表明，中国公司已经参与到一些拉美国家的核心部门，如中国在巴西的投资领域已经涵盖制造业和电力行业。

表 5-3 拉丁美洲：2014 年大型合并或收购案

序号	公司	来源国	收购的资产	资产所在地	收购方所在地	行业	总金额 (百万美元)
1	中国五矿及其合作伙伴	中国	邦巴斯铜矿项目	秘鲁	瑞士	采矿	7005
2	荷兰皇家壳牌	荷兰	液化天然气项目	秘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西班牙	西班牙	石油	4100
3	西班牙天然气公司	西班牙	通用电力公司(54%)	智利	智利	电力	3300
4	桑坦德银行	西班牙	巴西桑坦德银行(14%)	巴西	巴西	金融	3199
5	中石油	中国	巴西能源比率公司	秘鲁	巴西	石油	2600
6	PPG 工业	美国	Consorcio Comex SA	墨西哥	墨西哥	基础设施	2300
7	伦丁矿业公司	加拿大	Candelaria 铜矿(80%)	智利	美国	采矿	1800

续表

序号	公司	来源国	收购的资产	资产所在地	收购方所在地	行业	总金额 (百万美元)
8	普洛斯公司	新加坡	34 个工业物业	巴西	巴西	房地产	1368
9	合作银行	智利	Helm 银行	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	银行	1320
10	Millicom 公司	瑞典	麦德林公共公司的电话业务 (50%)	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	通信	1300
11	欧卫通信	法国	墨西哥卫星公司	墨西哥	墨西哥	通信	1142
12	American Tower Corp	美国	巴西基塔公司	巴西	巴西	通信	1012
13	Mubadala and Trafigura Beheer	阿联酋和荷兰	Porto Sudeste 铁矿石港口 (MMX) (65%)	巴西	巴西	基础设施	971
14	布鲁克菲尔德资产管理	美国	VLI 公司 (27%)	巴西	巴西	交通	845
15	Celsia 公司	哥伦比亚	7 个发电厂	哥斯达黎加和巴拿马	法国	电力	840
16	培生集团	英国	Multi 集团	巴西	巴西	教育	829
17	三井	日本	Jirau 水电站 (20%)	巴西	法国	电力	750
18	合众集团	瑞士	Fernaca 公司	墨西哥	美国	基础设施	750
19	沃尔格林和 KKR	美国	Farmacias Ahumada 公司	智利和墨西哥	墨西哥	商业	740
20	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	工商银行 (72%)	巴西	巴西	银行	725

资料来源: ECLAC (2015a),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http://repositorio.cepal.org/bitstream/handle/11362/38215/S1500534_en.pdf?sequence=4。

按部门分析: 基础设施、绿色能源和土地

中长期内拉丁美洲对基础设施有着迫切的需求。中国的融资和投资已成为帮助该地区改善基础设施的重要资金来源。如果拉美缩小与其他中等收入



国家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差距，经济增长率将提高 2 个百分点（Calderón and Servén, 2010）。为了满足 2006 ~ 2020 年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拉美国家每年应投入 GDP 的 5.2%，若想达到某些亚洲经济体（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基础设施水平，则需要投入 GDP 的 7.9%（Perrotti and Sánchez, 2011）。这些资金将被用于新的基础设施项目（52%）和维护开销（48%）。然而，在 2012 年，基础设施方面的公共和私人投资连 GDP 的 3.5% 都没有达到（CAF, 2015；CEPAL, 2014）^①。

另外，由于拉丁美洲的高度城市化（其人口的 80% 集中在城市），预计到 2050 年拉美城市化水平将达到 90%（OECD/ITF, 2013）。通过模拟运输量、运输模式和二氧化碳排放量，能够预测城市化带来的巨大变化和采取行动的空间。在基准情境中，按照现有的主要趋势，拉丁美洲城市交通将快速增长，到 2030 年将翻番，与旅客运输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到 2030 年将增长 150%。在城市扩张的情境中，考虑到拉丁美洲的道路基础设施和公共交通模式的发展，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增长 3.1 ~ 3.6 倍。

中国正在高速地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在未来几年，中国的基础设施将继续延伸到海外。在十二五规划期间（2011 ~ 2015 年），基础设施行业对于支持可持续发展的增长模式转型至关重要，顺利的话，中国将减少对出口行业的依赖，而更多地依赖国内市场。中国已经开始逐步出口与基础设施相关的服务（见专栏 5.2），确立基础设施资金提供方的地位。

专栏 5.2 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在亚洲和欧洲的基础设施模式

作为十三五规划（2016 ~ 2020 年）的一部分，中国在 2013 年推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统称为“一带一路”。这是中国政府一个雄心勃勃的项目，旨在将中国的基础设施网延伸至海外，从东南亚一直延伸到欧洲。该计划的重点是将公路和铁路、管道和其他基础设施从中

^① 这是对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危地马拉、墨西哥和乌拉圭的平均投资值。

国中部连通到亚洲和欧洲，还将在东南亚、非洲东部和地中海沿海建设港口和海上项目（Kennedy and Parker; 2015）。

丝绸之路涵盖的地区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约占中国出口的33%、进口的20%（United Nations, 2015）。这些国家与中国的贸易有不同的专业化模式，贸易方式的多元化体现在对中国出口的初级产品的比例方面（中亚70%，中东和北非60%，其他地区5%以下）。丝绸之路中的不同区块在供应链中的位置不同，这为中东和欧盟提供了加快融入包括中国在内的供应链和推动一体化进程的潜在机遇。

“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外国直接投资占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33%，这显得非常重要，而外国直接投资创造的工作岗位中有46%是来自“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的贡献。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项目的推动，中国加大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基础设施的投资，推动了贸易一体化，潜在地增加了中国面向这些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入，进一步加深双方的外国直接投资联系。

资料来源：Kennedy and Parker（2015），“Building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http://csis.org/publication/buildingchinas-one-belt-one-road>。

中国对拉美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集中在巴西和秘鲁。许多中国公司已经签订了基础设施建设合同，这是不计入外商直接投资的，一般与中国的银行融资挂钩。比如，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为阿根廷提供21亿美元贷款，来建造一个支持农业活动的铁路项目。两洋铁路目前处于讨论过程中，这涉及建设一条连接两大洋的长达3500公里的铁路线。

中国与拉美在电信领域的合作自21世纪初就已经开展。中国电信品牌已经逐步进入拉美市场。两家大公司——华为和中兴，对拉美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另外还有上海贝尔阿尔卡特股份公司和大唐集团等。巴西在拉美电信网络部署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华为已经进入拉美14个国家，成为该地区的电信基础设施的核心部分，并在中美洲拥有相当大的市场份额，特别是在市场营销和技术援助中（Ellis, 2014）。中国通信企业根据其在中国市场的经验，为拉美提供技术支持。中国的电信公司最初的目标市场是墨西



哥、巴西和阿根廷等这样的大市场，而现在也进入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尼加拉瓜和古巴这些相对较小的市场中。它们的服务范围一开始是移动电话和调制解调器，现在已经为当地主要的电信运营商提供更复杂的电信网络。

中国还进入了拉美电力市场，中国企业不仅提供传统的电力供应服务，还提供了可替代能源的供应服务，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已经有所斩获（Ellis, 2014）。2010年，中国企业收购巴西七家电厂和 Iberdrola 在巴西的子公司，显示出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兴趣。另外，中国在拉美兴修水电设施，在投资和劳务输出方面占据重要地位。国家电网和中水电在阿根廷、巴西、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都有水电项目（Ellis, 2014）。

中国企业正在充当拉丁美洲绿色技术的供应商的角色。近年来，中国在风能和太阳能供应领域的份额增加。阿根廷、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都已与中国的风机制造商签署了创新可持续能源方案合同。其中的一些项目，如巴西的风机项目，由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提供资金。每个项目的投资额是 50 亿 ~ 500 亿美元（Ellis, 2014）。智利是中国风机企业进入拉美的关键切入点，中国企业投资 9 亿美元在阿塔卡马沙漠建造了一座产能为 300 兆瓦的光伏电站，该项目既满足了中国的光伏板过剩产能“走出去”需求，又满足了智利的能源多元化的需求。截至 2013 年，智利已经进口了约 40 亿美元的光伏板，占其总库存量的一半（Borregaard et al., 2015），中国与墨西哥（锡那罗亚州和杜兰戈州）、哥斯达黎加也签署了金额较小的相关协议。

除了基础设施和绿色能源，中国对拉美农业领域的直接投资专注于购买土地，也参与了一些农业产业供应链的建设。尽管现在普遍认为，中国自 2015 年 6 月以来便系统地收购拉美土地，但是中国企业至今购买或租用的用于种植业的土地只有 70000 公顷多一点（Myers and Jie, 2015）。即使算上大宗采购，中国收购的土地还不到拉美可耕地面积的 0.2%^①。此外，中国农业部对于农业投资的指导方针是在生产、加工、物流上加强投资，而不是

^① 作者根据 Myers 和 Jie (2015) 计算。

征地。例如，中粮集团在智利进行葡萄酒投资，旨在收购外国公司，以确保大豆、小麦和糖等初级产品的供应。参与购买/租赁拉美土地的中国公司有小型的民营企业（鹏欣和浙江福地），也有大型国有企业（中粮集团、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融资和投资的视角：行业和国家的目标以及多元化

2005 ~ 2014 年，中国给予拉丁美洲的融资约有 80% 用于基础设施，其中大约 45% 用于包括公路、铁路、火车、地铁和机场在内的交通基础设施项目，而能源项目只占 20% 左右。中国已资助（部分或全部）了水坝、管道和/或风机的建设。电信部门占中国给予拉丁美洲的融资总额的 7% 左右。剩余部分的投资用于初级产品，特别是中国铝业在秘鲁的铜矿公司（约 9%），以及企业经营和营运资金管理的部门（Gallagher and Myers, 2014）。一些贷款的条件就是项目中应涉及中国基础设施企业。

展望未来，中国在拉美的融资会呈现几种不同的情境。国家和行业是中国融资策略的中心（见表 5-4）。第一种情境是：当前中国融资集中的国家和经济部门，特别集中在较难获得国际资本市场融资的国家及部门，大部分投资都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其他情境则是：中国对拉美融资将更加多元化，这不仅体现在不同行业中，也体现在地域范围中。

表 5-4 中国对拉美融资的不同情境（分部门和国家）

			国家				多元化的 额外的国家
			传统的				
			阿根廷	巴西	厄瓜多尔	委内瑞拉	
行业	目标	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能源和通信)	情境 1(当前)				情境 2(基准情境)
		采矿业					
	多元化	科学和技术创新	情境 3(新行业)				情境 4(新行业和新国家)
		绿色能源					
		信息技术					

资料来源：OECD/CAF/ECLAC 整理。



目前的情境（情境1）预设：中国将继续为特定的国家提供贷款，放贷的经济部门也将集中于目前的经济部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贷款将继续流向国际信贷成本高的、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的国家，这些国家的中国债务将积累至百亿美元。

在第一种情境下，中国的融资起到了反周期的作用，但效果不确定。中国的融资让那些高风险国家获得资金建设基础设施和自然资源行业。这些贷款作为替代性融资的来源，与其他资金来源相比，是反周期的。与主权债券息差类似，国际金融机构双边贷款与 OECD 发布的出口信贷的国别风险^①呈正相关。然而，从中国获取资金并不一定能解决该国宏观经济的挑战或消除国际投资者对该国的负面看法。事实上，因为中国的贷款并非与改善该国的宏观经济环境直接相关，如果这些国家实施不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其效果将会被外国资金恶化。

在其他情境中最有可能发生的是情境2，因为中国已宣布将对传统行业加大投资。这样，根据中国高层领导人在2014年和2015年访问拉美地区时做出的声明，中国将对拉美其他国家提高信贷额度。2014年中国做了以下重要声明：“中国将正式提供100亿美元的专项贷款，用于中国—拉美的基础设施建设，在此基础上，中国将提高专项贷款上限至200亿美元。中国还将向该地区提供优惠贷款100亿美元，承诺投资50亿美元，全面启动中拉合作基金。”^② 李克强总理在拉美之行期间还建议由中国企业建设横穿安第斯山脉的两洋铁路（Hornby and Schipani，2015）。

在这个情境下，中国的商业银行进入拉美，有助于中国的投资组合多元化发展，为拉美其他国家提供贷款。为了减少在一些国家的风险，中国的银行可以扩大投资的地理组合。新的贷款人，如商业银行（或者中国工商银行和其他银行），会更加注重投资回报率，可能会为融资成本较低的国家提供贷款。在此背景下，银行的放贷政策将注重投资多元化，减少风险。中国

^① 参见 www.oecd.org/tad/xcred/ for more details.

^② 参见 www.fmprc.gov.cn/mfa_eng/topics_665678/xjpxcxjzgjldrldlchwdlxbagtwrnlgbjxgsfwbexzlldrhwt1176650.shtml.

的贷款还将继续集中在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和电信领域。在第二种情境下，可能会要求加强对中国投资的监管和提高透明度。由于某些国家改善了基础设施监管和机制框架（OECD/CAF/CEPAL，2013；EIU，2014），中国的贷款在透明度和竞争力方面应遵循更高的标准。

在情境3中，中国融资的部门将更加多元化，但主要集中在某些国家。这种情境不太可能，因为中国的投资将继续关注这些国家的自然资源和采掘业。

只有推动投资地域多元化，中国才可能对其他部门进行投资（情境4）。中国最近的声明也表达了投资部门对实现更加多元化投资的兴趣。中国提出了“3×3”的政策建议：共建物流、电力、信息三大通道，实行企业、社会、政府三者良性互动。这种合作将得到300亿美元专项资金的支持，以提高企业的产能。此外，中国的银行（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希望在各个领域分散投资。多渠道的信贷额度可以为新的国家和部门提供资金。

由于有些行业受外国直接投资影响，所以融资贷款的基准情境（情境2）与情境3不同。根据2015年中拉论坛的官方声明，目前从中国获得融资的国家和新的国家（如智利、秘鲁）都可以获得中国的直接投资。正如中拉“1+3+6”合作新框架^①所述，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将不仅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而且将投资农业、制造业、科技创新、信息技术领域。

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新角色

“走出去”战略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支柱之一，包括参与众多政治和经济平台，继续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与过去几十年不同，拉美已经成为中国

^① “1”是“一个规划”，即以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目标。“3”是地区合作的“三大引擎”，即贸易、投资、金融合作。“6”是“六大领域”，即以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制造业、科技创新、信息技术为合作重点。



最重要的伙伴之一。这给双方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本节着眼于分析中国与拉美在过去几年建立的贸易和金融联系，研究中拉贸易在全球经济中日益提高的地位。同时，本节将整理中拉之间签订的双边和多边协定情况，以及中国在全球议程中的作用。

中拉贸易和投资关系

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和投资协定已经成为中国和拉丁美洲之间重要的政策工具。正如第四章指出的，自由贸易协定和双边投资协定已经成为中国巩固贸易一体化和投资的重点工具。同时，正如前文所述，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强。中国积极参与多边平台（自2001年起加入WTO）和多边机制（2012年以来，中国与南方共同市场进一步加强经济、贸易合作，2013年中国成为太平洋联盟的观察国，中国宣布加入服务贸易协定谈判），体现了中国加强与其他地区联系的意愿。

中国参与新的贸易和投资促进平台，给拉丁美洲带来了一系列挑战。中国继续与拉美进行合作需要一个支持谈判的协调机制。双边谈判对某些国家或市场有利，而对其他国家不利。现有的区域平台对于协调机制的建设很重要，但是，目前拉美整体的区域战略是不存在的。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拉丁美洲应该充分利用两个区域集团，加强区域协调。如果拉美地区的最终目标是制定具有完全包容性的区域一体化议程，那么，区域集团，如南方共同市场、拉美一体化协会和太平洋联盟可以在确定不同领域的政策中发挥主导作用，其中包括监管协同。拉美国家应该推动建立统一协调的共同体，同时，为了能在与中国的谈判中取得议价能力，拉美地区必须找到共同点，发出团结一致的声音。

中国在全球金融领域的重要性

自从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提出了通过一系列有关重组全球金融体系的重要倡议，包括金融互助和投资、人民币的国际化（Gao and Yu, 2011）。人民币的国际化还没有被接受，因为中国政府尚未准备好完全开放资本项

目，短期内人民币完全可兑换性（在货币国际化方面的要求）几乎不可能实现。不过，中国的金融区域一体化在清迈倡议的基础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①。

随着双边贷款显著增加，中国已与多边开发银行开展了合作^②。1986年，中国加入亚洲开发银行，2009年加入美洲开发银行，加强与亚洲和拉美的联系。另一个重要的举措是在2014年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在中国主导下，21个亚洲国家签署协议，建立了一家资助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的银行。九个月后，即2015年7月，中国与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金砖五国）合作成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总部设在上海。上述所有例子均反映了中国实现全球一体化的努力。在拉丁美洲，中国宣布将建设拉美第一家人民币清算行，总部设在中国，初始资金为1.89亿美元，目的在于推动人民币的使用。中国积极参与到多个金融平台，表明了中国与新兴经济体包括拉丁美洲在内发展长期合作关系的愿意（见专栏5.3）。

专栏 5.3 中国和拉美加勒比共同体以及未来合作

2014年，中国与拉共体（CELAC）共同宣布建立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并设立中拉论坛。中国提出了中拉合作中的多项优先领域：

- 贸易与投资：在未来十年内，提升中国和拉共体之间的贸易额至5000亿美元，提高双边投资存量至2500亿美元。
- 中小企业：鼓励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合作，帮助它们融入全球价值链。
- 充分利用中拉合作基金：包括中拉基础设施专项贷款，用中国提供的贷款和其他资金来支持中拉之间的重点合作项目。
- 基础设施：促进基础设施的发展，如运输领域（包括港口、公路和

① 东盟及中日韩货币互换机制旨在帮助这些国家成功管理区域内的短期流动性问题，为其他国际金融安排的工作提供便利。

② 中国的国际援助体系集中在官方发展援助和出口信贷，大部分资金来自出口信贷工具，对拉美的意义不大。



拉丁美洲经济展望（2016）：发展与中国的新型伙伴关系

仓储设施)、商业物流、信息和通信技术(包括宽带、广播和电视)、农业、能源和电力,以及住房和城市发展。

- **能源和自然资源:** 促进中国与拉美各国之间更密切的能源合作,并探索举办中国和拉共体能源和矿产资源论坛的可能性。

- **工业、科学与技术、航空和航天工业:** 探索联合建设工业园区、科技园区、经济特区和和高新技术园区的计划。

- **教育和培训人力资源:** 落实教育和科研部门、单位之前制定的交流、研究计划。中方将在 2016~2019 年向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提供 6000 个政府奖学金名额、6000 个赴华培训名额以及 400 个在职硕士名额。

这种前所未有的合作伙伴关系为拉美作为一个整体与中国加强联系提供了机会。它为拉美制定基础设施、能源和自然资源、生产力和教育政策领域的区域协调战略(而不是单个国家的战略)提供了时间和平台。这可能有助于改善区域内以及与中国的协同效应。中国将拉共体作为发展中拉关系的首选,因此,拉共体需要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每一个国家都应以积极合作的态度与中国开展合作。

资料来源: CELAC (2015),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y China: Hacia una Nueva Era de Cooperación Económica*, http://repositorio.cepal.org/bitstream/handle/11362/38196/S1500389_es.pdf, 以及崔守军(中国人民大学拉美研究中心)的研究。

拉丁美洲的环境挑战: 未来协议的关键

环境退化是一个全球性的威胁。中国与拉美之间的贸易关系也面临环境问题的挑战。拉丁美洲对中国出口的产品主要是农产品和矿产品,这两个部门是环境密集型部门,并且与拉美对世界其他地区出口的产品相比,这两个部门创造的就业机会少,对环境的影响大。2009~2012年,拉美向中国每出口 100 万美元(按 2002 年价格)创造 44~47 个直接就业机会,而同期,拉美向世界其他地区每出口 100 美元,创造 54~56 个直接就业机会。与拉美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相比,拉美对中国的出口排放更多温室气体,消耗

更多水资源（见图 5-15）（Ray et al., 2015）。此外，环境恶化往往导致受影响的社区发生社会动荡（Ray et al., 2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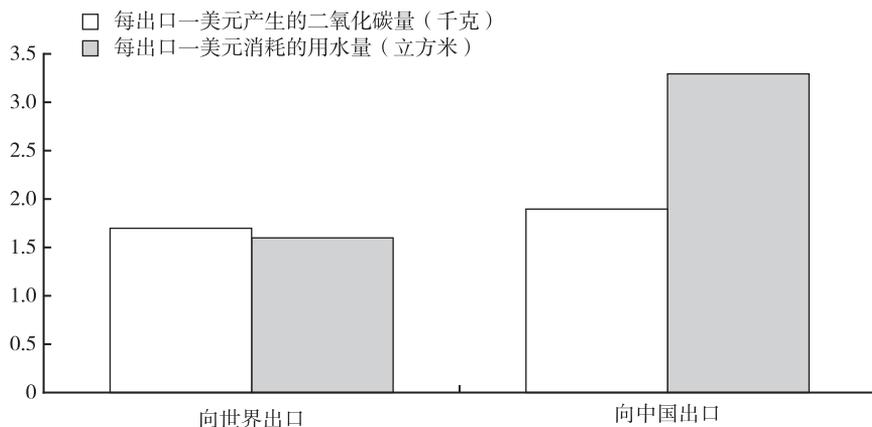


图 5-15 拉丁美洲对中国出口和对世界出口的环境影响

资料来源：Ray et al., (2015), *China in Latin America: Lessons for South-South Cooper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ww.bu.edu/pardeeschool/files/2015/04/Working-Group-Final-Report-Pages1.pdf。

统计链接：<http://dx.doi.org/10.1787/888933292079>。

为了应对环境恶化，拉丁美洲和中国都已经制定了针对外来投资的环保标准。公民社会在企业 and 政府问责方面在一些拉美国家发布这些标准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Ray et al., 2015）。中国商务部还公布了《对外投资合作环境保护指南》。另外，中国与拉美签署的三个自由贸易协定也都包括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条款，中国也在不断推出对外投资环保新政策，突出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长期应对政策：中国和拉美的的发展路径

在中国的转型和财富转移的第二阶段，拉美面临的国际环境不断变化。拉丁美洲的应对策略必须围绕三个主要目标：多元化、完善和整合。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拉美必须在以下三个基本方面有所行动。



- (1) 创造条件，让中国的融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减小基础设施差距；
- (2) 利用中国的经济“新常态”（例如，再平衡，消费模式改变，对教育和竞争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带来的机遇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政策；
- (3) 真正落实区域战略，借助传统因素，不仅通过降低关税壁垒和运输成本，还应该重视竞争、知识产权、资格的认可等方面可能妨碍一体化进程的法律，来促进区域一体化；

为使拉丁美洲实现这些目标，也为使中国能够从日益重要的中拉关系中获得最大收益，中拉双方都必须为一个强大的、持久的、牢固的、互惠互利的伙伴关系奠定坚实的基础。

减小基础设施差距

为了使中国对拉美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的资金运用更加高效，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各国政府必须继续改进其法律框架。中国对拉美地区的融资在过去十年中大幅增加，并且主要集中在矿业和基础设施行业，尽管中国已经帮助拉美各国减小基础设施差距，但是拉美自身还得再接再厉。如前所述，为了满足基础建设领域的基本需求，到2020年，拉丁美洲应该每年投入国内生产总值的5.2%以上（Perrotti and Sánchez, 2011）。但是现在，拉美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5%，还远远达不到要求（CAF, 2015；CEPAL, 2014）。

增加对拉美交通、能源和电信等领域的基础设施投资是中国投资多元化发展的关键举措。在2005~2014年，拉丁美洲获得的融资总额的80%用于基础设施部门，其中约45%用于交通基础设施，20%以上用于能源部门。阿根廷和厄瓜多尔的例子是典型的。中国的银行给这两个国家的贷款分别超过200万美元和8000万美元，用于改善阿根廷和厄瓜多尔的铁路系统。

拉美各国政府应该改善法律框架，以便吸引更多的中国投资。各国都有规范外国投资的法律，但是，一些国家的外国投资法才颁布不久，因此，外国投资法有可能与中国未来对拉美的投资联系起来。由于一些国家最近改善了法律框架（OECD/CAF/CEPAL, 2013），中国未来的贷款和投资应遵循更

高要求的透明度原则和竞争原则。中国遵守这些原则的意愿很明显，因为中国最近颁布了若干规范对外投资的准则，确保对外投资遵守东道国的法规，特别是环保方面的规定（中国商务部，2013）。

实现生产性发展的政策

行业政策

完善国家生产性的政策是国家发展议程的应有之义。一些国家最近制定了生产性发展政策（PDP），不仅涉及政策的范围（水平和垂直），还包括了政府干预的类型（政府干预或市场干预）。目前基于产业集群的生产性发展政策的目的是增强创新能力，提高竞争力和更加高效地利用资金等（Crespi, Fernández-Arias and Stein, 2014; OECD, 2013）。许多农业生产性发展政策的目的是通过上述渠道，实现农业增长，促进价值链的延伸（产品设计、物流和市场营销）。

矿业公司必须攀升到价值链上游，发展其他产业。

为了增加附加值，拉美的矿业公司应该采取更积极主动的策略，参与到与矿业相关的行业中，包括物流、基础设施和与服务有关的行业。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公司在石油和矿业领域完成多笔收购，从而奠定了中国投资在拉美长期存在的基础。这可能成为拉美企业攀升到价值链上游的障碍，因为中国企业不仅投资采矿项目，而且投资了服务业和相关行业。例如，由中国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投资的厄瓜多尔米拉多铜矿项目（5年14亿美元的投资），还包括玻利瓦尔港港口设施的建设。在巴西，中国洪桥集团正在建设一条长400多公里的运输管道，将矿石从米纳斯吉拉斯州的一个矿山运往大西洋沿岸，并将建设工作委托给中国的承包商（Ellis, 2014）。这个案例说明，通过为当地创造就业来实现乘数效应已经不可能了，拉美可能错过了参与价值链中其他活动的机会，因此，拉美深陷原料供给国的泥潭。

不过也有积极的经验。在智利，民营企业必和必拓与智利国家铜业公司，在智利生产促进局的支持下，通过实施世界级矿业供应商计划，促进产业集群中的本地产业的技术能力的提高。世界级矿业供应商计划的目标是为



本地供应商提供知识密集型的解决方案、服务和技术，来刺激出口（Gana and Meller, 2015）。

采矿业可以从生产性发展政策中受益。横向政策需要更大的共识，因为横向政策让各国政府专注于一个共同部门，而不是各个特定的行业。如果外国直接投资大量流入的拉美国家希望加强与当地企业的联系，以提高它们的生产率，那么，最好制定一个横向政策，可以对外国和当地企业合营的项目进行税收减免或给予补贴。

农业和食品生产是一个有前途的行业，因为中国人的需求越来越大，但价值链至关重要。

为了顺应食品消费不断增长的趋势，减少原材料价格的波动，拉美农业企业应该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策略，在产品中加入不同类型的服务，将自己置于价值链中附加值较高的位置。上文已经提到中国食品消费的变化趋势，这为拉美出口具有更高附加值的产品提供了契机。一些国家已经开始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比如，乌拉圭政府和肉类生产商已经成功实施了电子可追溯平台，这个电子平台已经成为产品差异化的重要因素，使乌拉圭的肉类在全球食品价值链中拥有较高的附加值。

智利使用集成化和简化的生产和分销网络，可以在几天时间内将产品运往日本和美国。智利已经成为不同类型的浆果的主要出口国。哥伦比亚的50万小规模咖啡生产商的生产活动也已经延伸到价值链的不同环节（包括研发、营销、品牌和分销），创造了咖啡高端市场。此外，哥伦比亚的花卉生产商通过垂直整合，提供具有更高品质的产品。鉴于美国的运输和分销障碍，哥伦比亚的花卉生产商与美国企业成立合资企业，负责花卉的装卸、卸载，并将花卉存储在冷冻室（Crespi, Fernández-Arias and Stein, 2014）。在阿根廷，泛美能源公司（PAE）（中海油与英国石油公司的合资公司）在地方政府和地方组织的支持下，出台了“圣豪尔赫海湾中小企业计划”（SMEs of Golfo San Jorge），以提高当地小企业的技术水平，将其纳入泛美能源公司的供应链（Ray et al., 2015）。这些例子说明，要想在像中国这样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大市场中蓬勃发展，拉美的企业和政府必须制定创造性的政策，

增加本国产品的附加值。这些以实现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倡议能够得到生产力发展政策的支持。

产品的价值不仅仅集中在价值链的初始阶段，研发和产品设计也能创造价值，然后可以再扩展到营销和物流领域（OECD，2014）。如果拉美农业公司想使最终产品到达中国消费者手中，应该在中国消费者中提升国家和品牌的认知度。智利的 Viña Concha Toro 酒业公司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例子。自 2001 年以来，该公司在广告中投入巨资，来提高人们对其品牌的认知度。它深入中国市场，与当地的经销商建立了稳固的销售网络。另一个例子是阿根廷 CIDETER 基金会，这是农业机械领域的中小企业协会，协会成员还包括大学、技术学院和当地政府部门。为了进入外国市场，CIDETER 在南非建立了试验田，展示阿根廷的农业机械，并将阿根廷农业机械按照当地农业生态条件进行改良（Crespi, Fernández-Arias and Stein, 2014）。拉美各国政府可以提供公共产品，帮助企业巩固在出口市场上营销策略，比如成立促进出口的机构。

拉美政府可以鼓励中国企业投资拉美制造业网络中的某些领域。例如，鼓励中国制造企业与当地供应商合作，对拉美的汽车和电子等行业加大投资，这可以巩固区域价值链，提高区域内贸易水平。

拉美政府应该推动第三产业企业的发展，鼓励并扩大企业的服务范围，以回应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新机会。这会产生显著的乘数效应。企业的服务范围包括为中国的跨国公司的全球网络提供外政外包和 24 小时客服服务。中国老龄化人口是一个不可小瞧的潜在市场。尽管许多服务是家庭服务（植根于中国），但是还有其他很多服务可以提供，如专门针对老年人的需求而设计的旅游套餐。另外，还有针对老年人的娱乐、建筑、城市规划、环境管理、医疗服务以及旅游、运输和物流服务等其他传统服务。特别是旅游业，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近年来，拉丁美洲到中国的旅客（25.1 万名）和中国到拉丁美洲的旅客（33.4 万名）数量有所增加（WTO，2015），但是这不到中国旅游规模的 1%。拉美方面应该重新审视一下签证限制和复杂的移民手续，使区域和全球交流更顺畅。

中国的转型将为拉美高附加值的商品和服务供应商提供商业机会。高附



加值的产品要求拉美出口商通过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中国。近距离接触终端消费者，可以更快速地响应消费者的需求。对拉美政府而言，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任务。拉美跨国公司的早期开拓经验，以及首批进入中国市场的公司的经验都是有用的。2013年成立的上海自由贸易区就是拉美公司进入中国的一个机会（ECLAC, 2015b）。

学习中国欧盟商会和中国美国商会的案例，在中国建立区域贸易和投资促进中心可以帮助拉美对中国的出口变得更加多元化，可以监测中拉贸易中潜在的贸易投资壁垒，与中国商务部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开展更密切的合作（ECLAC, 2015b）。

必须制定支持面向商业行业就业的教育和培训投资计划，以及推动初级产品贸易的政策。现有证据表明，对中国的出口创造的相关就业机会很少，因为贸易主要集中在第一产业。拉美对中国出口每一美元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少于拉美向美国和欧盟出口创造的就业岗位（只与区域贸易相近）（Ray et al., 2015）。更重要的是，拉美对中国的出口带来的就业岗位的72%都是低竞争力的工作，而南方共同市场的贸易带来的就业岗位的33%是低竞争力的工作（Kupfer et al., 2013）。因此，生产性发展政策应该包括增加中拉贸易中中高质量就业岗位的政策。

竞争力

面对中国的转型，必须提升拉美的竞争力

如前所述，提升竞争力对拉美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通过提高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系统的入学率，来提高国民能力和教育质量，仍然是中国经济再平衡过程中的核心内容之一，拉丁美洲会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在此背景下，基于提升竞争力的政策应该集中在三个方面。

必须加强职业教育和培训，加强高等教育机构和私营部门之间的联系。随着中国国民竞争力的拓展和改进，拉美的竞争力质量成为一个日益重要的问题。到2030年，中国的熟练劳动力的规模将大幅超越拉丁美洲。为了使拉美具备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当的竞争力，拉丁美洲必须利用新出现的机

遇，提高国民竞争力和教育培训系统的质量。这不仅涉及传统教育方式，也涉及整个职业生涯中的培训和在工作场所提升员工竞争力的计划机制（OECD/CAF/CEPAL，2014）。一些公司在墨西哥的大众汽车培训中心等制定员工培训计划，以迎接挑战。一些著名企业中普遍存在竞争力不足问题：如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PEMEX），近日表示要用具有更高竞争力的员工取代占员工总数的1/3的员工（约5万名）。提高教育质量和竞争力意味着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高质量的就业机会，以及减少非正规经济的规模。

利用高等教育的投资，加上激励政策，来提高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的入学率，有助于拉美各国应对未来的需求。拉丁美洲的竞争力集中在非生产应用领域。将资源集中到生产应用领域是拉美必须优先发展的议题。此外，教育政策应向创造就业机会的领域和部门倾斜。在中国，一半的大学生就读理工科专业，但是在拉美，这一比例只有1/5。为帮助人们树立理工科专业与潜在就业机会挂钩的意识而制定的方案和政策，还必须配合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政策，这样才能鼓励学生就读理工科专业。拉美出台了一些项目，提供理工科专业的“回报”信息，例如智利的“我的未来”项目和秘鲁的“你的职业生涯”项目。此外，还必须建立相关机制，来调整竞争力需求和供给关系。比如，智利的矿业竞争力理事会（Consejo de Competencias Mineras）对未来矿业需求进行了预测，并制定了矿业行业从业资格的框架。这些机制对拉美各个行业是否能够适应和应对中国再平衡带来的挑战至关重要。

制定和建立信息科学和计算机科学专业的方案和机构，包括技术工程和信息技术，能够培养基于高科技的知识经济所需要的人才。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具有高竞争力的，能够管理生产、经营和技术进步的劳动力储备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在生产过程中通过机器人技术，加入越来越多的技术含量。而拉美在这方面比较落后。机器人技术可以极大地提高生产率。虽然这意味着对就业机会的破坏，特别是影响中低竞争力工人的就业，但同时，也创造了高竞争力就业机会。培养具有适应技术变革、易于参与到基础变革进程中的能力的人才，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劳动力市场重组过程获得平衡。所有这一切都强调，必须将信息技术能力和其他拉美地区所缺的并且无



法用机器代替的软竞争力整合到学习课程中。

拉美政府必须出台以上三个领域的系列政策，包括教育和培训的可获取性政策，解决生产领域的劳动力问题，如地域局限、职业生涯周期、性别和家庭环境等。巴西的“创新”项目就是一个既能说明地域需求也能说明职业生涯周期的很好例证。圣保罗州很多砍甘蔗的农民由于机械化技术的普及，失去或即将失去工作。通过该项目，他们得到培训，可以适应自己的工作环境中的技术变革。该项目培训的4500名以上的工人，熟悉了能够提高生产率的新技术，具备了该州急缺的其他竞争力或新工作需要的竞争力。

拉美一体化议程的进展

鉴于中国与拉美的关系处在不断变化当中，促进拉丁美洲一体化，无论是从区域内还是区域外的角度来看，都是至关重要的。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新的贸易和投资平台中，拉美国家之间必须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与各个贸易合作伙伴达成共识。

区域内市场的发展可以成为促进生产多元化的有效策略。单边和多边贸易机制、拉丁美洲次区域一体化，以及最近签订的越来越多的自由贸易协定让贸易自由化变成了可能。拉丁美洲1990年的贸易开放程度为33%，2011年提高到了48%（OECD，2013）。同时，区域内贸易表明，不同的区块之间（南方共同市场和安第斯共同体）有潜在的互补性。与拉美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相比，区域内贸易具有更高的附加值（Baumann，2008）。此外，区域内贸易主要是制造业产品，而且有较长的出口生存时间（出口存活率），能够让拉美国家在参与全球竞争之前获得更多的“做中学”的机会。这对于促进区域层面的多元化非常重要。区域一体化对于提高制造部门的一体化程度来说是个关键因素。因为在供应投入品时，制造部门的一体化程度往往对距离很敏感（Kowalski et al.，2015）。最后，加强区域内的资源流动可以改善生产总值高度集中在七个最大的经济体中的分布不平衡现象。

拉丁美洲必须为一体化战略付出更多努力，巩固和促进服务业出口的多元化。尽管中国进口的仍然是传统服务业产品，但是随着中国与欧盟和其他

亚洲国家的一体化程度加深，中国能向拉丁美洲出口更多知识密集型服务，如信息通信技术服务和研发，提供更多的机会。由于服务的价值链对距离的敏感性不强，而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开放程度的敏感性较强，因此，拉丁美洲可以更好地利用相关政策和人力资本，抓住服务链中的机遇（López, Niembro and Ramos, 2014）。

在以上背景下，必须制定一项真正的区域议程。中国若愿意加强与拉美的联系，需要建立一个协调机制，来推动中拉对话的成功进行。经验表明，虽然双边协定对某些国家和市场有利，但是可能对其他国家造成负面影响。为了在未来获得更强的议价能力，拉美地区必须求同存异，对外一致发声。现有的平台——南方共同市场和太平洋联盟，可以帮助拉美建立一个协调机制，制定对中国的策略。区域层面的协调战略和对策可以提高拉美的谈判地位。目前，拉美区域一体化的议程集中在消除贸易壁垒上，包括运输费用和关税，但是与中国的谈判需要一个更广泛的议程，各国政府应该作为一个整体，主动解决决定拉美各国之间关系的问题，例如，太平洋联盟和南方共同市场之间的融会议程（ECLAC, 2015b）。

拉丁美洲必须制定具有凝聚力的、严格的法律框架。必须解决拉丁美洲的法律框架的一致性问题，目的有两个：减少破坏区域一体化的法律壁垒，以及促进拉美对中国战略的共同回应。拉美若想作为一个整体与中国进行谈判，建立对话机制，就必须在服务、投资、政府采购、知识产权、竞争原则和法律透明度方面出台现代的制度，这不仅有助于协调区域内的法律法规，而且可以在诸如电信和金融服务等领域引进改革。要想融入全球价值链，必须出台全面的措施，规范货物、服务、资本、人员和知识的流动（Armony, 2012）。要想通过区域平台实现法律框架一体化，拉美国家应自觉成为生产共享计划中的一分子。鉴于法律壁垒制造了服务行业的大量壁垒，因此服务业的价值链一体化显得尤为重要。

制定完善的环境领域的法律框架也非常重要。中国对采掘业投资导致环境恶化，拉美必须保护那些被环境恶化影响的土地、社区和原住民的生存方式，必须建立或巩固以下方面的法律框架。



- 加强监测和评估机制；
- 各个部委制定关于采矿项目的批准标准和法律；
- 制定明确的协商议程，以解决当地公民的社会关切（包括国际劳工组织关于独立国家土著和部落民族的第 169 号公约，15 个拉美国家签署了该公约）；
- 提高透明度，监督内部和外部问责制。

以上每个法律框架在与中国政府的谈判和合作中都将发挥重要作用。这些监管框架的宗旨是帮助公共和私人投资者遵守环保准则。因此需要创建和维护数据门户网站以及其他信息交流工具，让中国投资者（及其他投资者）熟悉现行法规（Ray et al.，2015）。

法律框架还应包括国际标准。中国对商品需求的增长，以及中国在拉丁美洲投资和合作工具的爆炸性增加（外国直接投资、经济特区），使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出口领域的现有标准和认证（ISO 证书、EC 证书、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

在建立或巩固法律框架时，拉美政府还必须寻求限制性法规和预防性法规之间的平衡。防止环境退化对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特别是对采掘业至关重要，但限制性规定可能会抑制投资或限制投资。例如，法律的限制性程度，特别是在服务业方面，会影响部门的竞争力。尽管哥伦比亚对服务业的限制较少，列入服务贸易限制性指数（STRI）的所有部门都低于 OECD 的平均水平，而其他国家，如巴西，限制性水平较高，所有部门限制性指数都超过 OECD 的平均水平^①。拉美国家可以优先考虑增强服务市场的竞争力，尤其是增强价值链中的关键部门，如邮政和快递服务、电信等部门的竞争力。这些服务对于提高物流效率和降低企业成本非常关键，对于加快区域一体化进程，提升粮食和其他物流密集型的初级产品、对时间敏感度较高的工

^① 从行业水平来看，拉美地区信息可用性限制水平最高的国家是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和墨西哥，限制最多的是广播、快递和交通运输服务。智利和墨西哥对电信和交通运输商的投资限制要高于 OECD 平均水平。有关服务贸易限制性指数和所有参与国家的介绍可参见 www.oecd.org/trade/stri。

业制成品生产的竞争力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至于具体服务业的价值链，低水平的投资障碍，以及对外资进入设置的门槛较低，对于吸引投资非常重要。增加人员流动、加强专业服务市场如法律、会计和工程的一体化，要求各国对外国资格予以认可，并放宽限制执业权的授权制度。

强化区域一体化也可通过提高贸易便利化程度和简化海关程序得以实现。货物通关的速度和效率是影响竞争力和贸易成本的关键因素。OECD 的贸易便利化指标显示，拉美地区的贸易便利化指标与世界平均水平持平，但在预先裁定领域、内部合作（全国各边境机构之间的内部合作）、外部合作（与邻国和第三国的合作）、治理和公正性（海关结构和职权、问责制、伦理原则）方面得分较低^①。在提升区域竞争力时，必须推动海关手续的现代化发展，增强区域连通性。

拉丁美洲和中国可以从强大的伙伴关系中互惠互利，共谋发展

世事在变。中国的转型为拉美带来了许多挑战和新机遇。这些挑战和机遇都应纳入拉美的发展战略中，通过全方位的升级、多元化、一体化，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更加深入、更趋紧密的区域内和区域外的合作可以促进这些目标的实现，并为建立强大的、长期的伙伴关系打下坚实基础。因此，中国理解拉丁美洲发展面临的挑战尤为重要。建立合作渠道的愿望应该超越双边对话机制，将其升级成结构性的整体对话机制。最后，中拉合作必须超越当前的议程，应该通过法律机制，融入环境和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议程，使之成为双方整体合作的核心要素。

参考文献

Ariel C. Armony, (ed.) (2012), *Setting the Agenda: Asia and Latin America in the 21st*

^① 参见 www.oecd.org/trade/facilitation。



Century, University of Miami Center for Latin American Studies Publications.

Avendano, R. and J. Dayton-Johnson (2015), “Central America, China and the US: What prospects for development?”, *Pacific Affairs*, Vol. 88, No. 4, December.

Avendano, R., J. Obach and J. R. Perea (forthcoming), “China’s rebalancing: What scenarios for Latin American exports?” *Working Paper*, OECD Development Centre, Paris.

Avendano, R., H. Reisen and J. Santiso (2008), “The Macro Management of Commodity Booms: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s Response to Asian Demand”, *OECD Development Centre Working Papers*, No. 270,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dx.doi.org/10.1787/240356635678>.

Baumann, R. (2008), “Integration in Latin America: Trends and challenge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United Nations, Brazil, www.cepal.org/publicaciones/xml/2/32312/LCBRSR190RenatoBaumannIntegration.pdf.

Borregaard, N., A. Dufey, M. Ruiz-Tagle and S. Sinclair (2015, forthcoming), “Chinese incidence on the Chilean solar power sector”, *BU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Initiative Working Paper 2015 - 5*, Boston.

Bosch, M., A. Melguizo and C. Pagés (2013), *Better Pensions, Better Jobs: Towards Universal Coverage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Washington D. C. Burkitt, L. and B. Davis (2012), “Chasing China’s shopper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14 June, www.wsj.com/articles/SB10001424052702303444204577460693377819420.

CAF (2014), “Infraestructura para el desarrollo integral de América Latina”, (“Infrastructure for the integral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IDEAL 2014*, CAF Banco de Desarrollo de América Latina. Calderón, C. and L. Servén (2010), “Infrastructure in Latin America”,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5317*,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CELAC (2015),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y China: Hacia una Nueva Era de Cooperación Económica*, Community of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States, http://repositorio.cepal.org/bitstream/handle/11362/38196/S1500389_es.pdf.

Chen, Changsheng and Jianwu He (2015),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growth in the context of new normal”, in *Outlook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2015 - 2024): Climbing up to the Efficiency Highland*, edited by Liu, Shijin, CITIC Press, Beijing.

Crespi, G., E. Fernández-Arias and E. Stein, (eds.) (2014), *Rethinking Productive Development. Sound Policies and Institutions for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Washington, <https://publications.iadb.org/bitstream/handle/11319/6633/Rethinking%20Productive%20Development%3a%20Sound%20Policies%20and%20Institutions%20for%20Economic%20Transformation.pdf?sequence=1>.

Dealogic database (2015), www.dealogic.com/.

Drummond, P. and E. X. Liu (2013), “Africa’s rising exposure to China: How large are

spillovers through trad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king Paper*, Africa Department, www.imf.org/external/pubs/ft/wp/2013/wp13250.pdf.

Dussel Peters, E. and K. P. Gallagher (2013), “NAFTA’s uninvited guest: China and the disintegration of North American trade” *CEPAL review* 110.

ECLAC (2015a),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United Nations-ECLAC, Santiago, http://repositorio.cepal.org/bitstream/handle/11362/38215/S1500534_en.pdf?sequence=4.

ECLAC (2015b),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and China: Towards a New Era in Economic Cooperation*, United Nations-ECLAC, Santiago, http://repositorio.cepal.org/bitstream/handle/11362/38197/S1500388_en.pdf?sequence=1.

ECLAC (2014), “Economic infrastructure gap and investment in Latin America database 1980 – 2012”, EII – LAC – DB, *FAL Bulletin* No. 332.

ECLAC (2013), “Summit on the Global Agenda”, Abu Dhabi, 18 – 20 November.

EIU (2014), “The 2014 Infrascopes: Evaluating the environment for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New York, NY, www.eiu.com/public/topical_report.aspx?campaignid=Infrascopes2014.

Ellis, R. E. (2014), *China on the Ground in Latin America: Challenges for the Chinese and Impact on the Region*, Palgrave Macmillan, New York, NY.

Gallagher K. P., A. Irwin and K. Koleski (2012), “The new banks in town: Chinese finance in Latin America”, *Inter-American Dialogue Report*, Washington, DC., <http://ase.tufts.edu/gdae/Pubs/rp/GallagherChineseFinanceLatinAmerica.pdf>.

Gallagher, K. P. and M. Myers (2014), “China-Latin America finance database”, *Inter-American Dialogue*, Washington, DC., www.thedialogue.org/map_list/.

Gana, J. and P. Meller (2015), “El cobre chileno como plataforma de innovación tecnológica”, (“Chilean copper as a platform f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ocumento Corporación de Estudios para Latinoamérica (CIEPLAN) y Banco de Desarrollo de América Latina (CAF).

Gao, H. and Y. Yu (2011),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the renminbi”, *BIS Papers*, 61, www.bis.org/publ/bppdf/bispap61i.pdf.

Hornby L. and A. Schipani (2015), “China tilts towards liberal Latin American economies”, *Financial Times*, 11 May.

IMF (2015), *World Economic Outlook 2015: Uneven Growth; Short- and Long-Term Factors*, 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5/01/.

IMF (2014), “World economic outlook: recovery strengthens, remains uneven”, *World Economic Financial Survey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4/01/pdf/text.pdf.



IFR (2014), *World Robotics 2014: Industrial Robotics*,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Robotics, Frankfurt.

Jenkins, R. (2011), “The ‘China effect’ on commodity prices and Latin American export earnings,” *CEPAL Review* 103, <http://hdl.handle.net/11362/11471>.

Jenkins, R. (2008), “Measuring the competitive threat from China for other southern exporters”, *The World Economy*, Vol. 31, No. 10, pp. 1351 – 1366.

Kennedy, S. and D. Parker (2015). “Building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http://csis.org/publication/building-chinas-one-belt-one-road>.

Kowalski, P., J. L. Gonzalez, A. Ragoussi and C. Ugarte (2015), “Participa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Global Value Chains: Implications for Trade and Trade-Related Policies”, *OECD Trade Policy Papers*, No. 179,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dx.doi.org/10.1787/5js331fw0xxn-en>.

Kupfer, D., M. Castilho, E. Dweck and M. Nicoll (2013), “Diferentes parceiros, diferentes padrões: comércio e mercado de trabalho do Brasil nos anos 2000”, (“Various partners, different patterns: trade and Brazil’s job market in the years 2000”), *CEPAL Serie Comercio Internacional* No. 118, <http://hdl.handle.net/11362/4345>.

López, A., A. Niembro and D. Ramos (2014), “Latin America’s competitive position in knowledge intensive services trade”, *CEPAL Review* 113, <http://hdl.handle.net/11362/37417>.

Milligan, G. W. and M. C. Cooper. (1985), “An examination of procedures for determining the number of clusters in a dataset”, *Psychometrika*, Vol. 50, pp. 159 – 179.

MOFCOM, (Ministry of Commerce, China) (2013), “Guidelines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Foreign Investment and Cooperation”, <http://pfbcbcfp.org/docs/news/avril-mai-13/RDP12-Mars-2013/DCC-Guidelines%20for%20Environmental%20Protection%20for%20foreign%20investment-MOFCOMENV%20Min.pdf>.

Moreira, M. (2014), “China’s new development model: Impacts on Latin America”, Presentation at Red Mercosur – BID – UBA Conference: China’s New Development Model: Impacts on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25 – 26 March 2014, Facultad de Ciencias Económicas, Universidad de Buenos Aires (UBA).

Myers, M. and G. Jie (2015), “China’s agricultural investment in Latin America: A critical assessment”, *The Dialogue, Leadership for Latin America*, www.thedialogue.org/wp-content/uploads/2015/06/Chinas-Agricultural-Investment-in-Latin-America.pdf.

OECD (2015a), *Revenue Statistics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2015*,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dx.doi.org/10.1787/rev_lat-2015-en-fr.

OECD (2015b), *OECD Economic Surveys: China 2015*, OECD Publishing, Paris,

第五章 拉丁美洲—中国伙伴关系的发展趋势和前景

http://dx.doi.org/10.1787/eco_surveys-chn-2015-en.

OECD (2014), “Policy challenges for the next 50 years”, *OECD Economic Policy Paper*, OECD Publishing, Paris, www.oecd.org/economy/Policy-challenges-for-the-next-fifty-years.pdf.

OECD (2013), *Perspectives on Global Development 2013: Industrial Policies in a Changing World*,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dx.doi.org/10.1787/persp_glob_dev-2013-en.

OECD/CAF/ECLAC (2014), *Latin American Economic Outlook 2015: Education, Skills and Innovation for Development*,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dx.doi.org/10.1787/leo-2015-en>.

OECD/CAF/ECLAC (2013), *Latin American Economic Outlook 2014, Logistics and Competitiveness for Development*,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dx.doi.org/10.1787/leo-2014-en>.

OECD/FAO (2015), *OECD – FAO Agricultural Outlook 2015*,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dx.doi.org/10.1787/agr_outlook-2015-en.

OECD/FAO (2014), *OECD – FAO Agricultural Outlook 2014*,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dx.doi.org/10.1787/agr_outlook-2014-en.

OECD/IDB/The World Bank (2014), *Pensions at a Glance: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dx.doi.org/10.1787/pension_glance-2014-en.

OECD/ITF (2013), *ITF Transport Outlook 2013: Funding Transport*, OECD Publishing, Paris/ITF, ParisCedex 17, <http://dx.doi.org/10.1787/9789282103937-en>.

Perrotti, D. and R. J. Sánchez (2011), “La brecha de infraestructura en América Latina”, “The infrastructure gap in Latin America” *Serie Recursos Naturales e Infraestructura*, No. 153, ECLAC, Santiago, http://repositorio.cepal.org/bitstream/handle/11362/6357/S110095_es.pdf?sequence=1.

Ray, R. K. P. Gallagher, A. López and C. Sanborn (eds.), (2015), *China in Latin America: Lessons for South-South Cooper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Initiative, Boston University, [online] www.bu.edu/pardeeschool/files/2015/04/Working-Group-Final-Report-Pages1.pdf.

Santiso, J. (ed.) (2007), *The Visible Hand of China in Latin America*, Development Centre Studies,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dx.doi.org/10.1787/9789264028388-en>.

United Nations (2015), United Nations Commodity Trade Statistics Database (Comtrade), <http://comtrade.un.org/>.

United Nations (2012),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The 2014 Revision, Highlights* (ST/ESA/SER.A/352), New York, Population Division 2014 [online] <http://esa.un.org/unpd/wup/Highlights/WUP2014-Highlights.pdf>.



拉丁美洲经济展望（2016）：发展与中国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

UNWTO (2015), *Compendium of Tourism Statistics, Data 2009 – 2013*, 2015 Edition, United Nations World Tourism Organisation, Madrid, <http://pub.unwto.org/epages/Store.sf/?ObjectPath=/Shops/Infoshop/Products/1564/SubProducts/1564-1>.

US Grains Council (2011), *Food 2040: The Futur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in East Asia*, Washington, DC, www.usdajapan.org/en/food2040/Food%202040%20Fact%20Sheet%20English.pdf.

Von Lampe, M. (2015), “Alternative futures for global food and agriculture: Developing robust strategies”, OECD Joint Working Party on Agriculture and Trade, TAD/TC/CA/WP (2015) 1/FINAL.

Von Lampe, M. et al. (2014), “Why do global long-term scenarios for agriculture differ? An overview of the AgMIP Global Economic Model Intercomparison”, *Agricultural Economics*, Vol. 45, Issue 1. pp. 3 – 20.

World Bank (2015a),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and 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 <http://www.uis.unesco.org/Pages/default.aspx>.

World Bank (2015b), *Latin America and the Rising South, Changing World, Changing Priorities*, WorldBank,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DRC (2013), “China 2030: Building a modern, harmonious, and creative society”, The World Bank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of the State Council,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附件 5. A1 中国再平衡和对拉丁美洲出口的影响

实证研究

本节采用实证方法，介绍、分析和评估中国结构性改革（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对拉美国家出口的影响。分析过程分三个步骤：首先，基于拉美出口产品的构成和与中国市场的接触程度，将拉美国家分成不同群组进行分析；其次，使用 1994 ~ 2013 年 18 个拉美国家的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中国投资水平和不同群组中的拉美国家出口之间的相关性；最后，基于到 2030 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同情况，预测拉丁美洲出口模式的两个情境。第一

个情境的假设前提是中国进行稳定的改革，不受任何大的冲击，而第二个情境的假设前提是中国投资率“硬着陆”。(World Bank - DRC, 2013)。

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的目标是将群组数据或变量进行分类，使得每个群组中的元素是彼此“相似”的，而不同群组之间则是“相对不同”的 (Eissen et al., 1998)。我们用五个变量来描述每个国家的出口情况：i) 农产品、原材料和食品；ii) 化石燃料；iii) 金属和矿石；iv) 制造业；v) 商业服务业。对中国的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例作为贸易依存度指标^①。表 5. A1 - 1 描述了 2013 年 18 个拉丁美洲国家出口情况的各个变量。

表 5. A1 - 1 2013 年拉美国家出口构成

国家	总出口 (当前美元, 百万)	农产品、 原材料和 食品 (%)	化石燃料 (%)	金属和 矿石 (%)	制造业 (%)	商业服务 业 (%)	对中国出口 所占的 比重* (%)
阿根廷	91040	46.1	3.9	2.7	27.1	15.8	6.9
玻利维亚	13342	15.1	50.1	18.8	3.5	8.5	2.9
巴西	279637	32.4	6.4	14.6	30.5	13.4	17.8
智利	89471	23.2	0.8	49.0	11.2	14.3	23.6
哥伦比亚	65594	10.2	59.9	1.0	15.2	10.3	5.9
哥斯达黎加	19695	21.3	0.0	0.9	35.9	41.8	2.8
多米尼加共和国	14155	12.8	1.1	2.2	31.4	43.8	4.3
厄瓜多尔	26869	32.1	52.5	0.8	5.6	7.1	1.6
萨尔瓦多	7491	16.7	1.7	1.0	53.5	26.7	0.1
危地马拉	12474	38.6	3.7	4.6	33.3	19.3	0.8

① 前面四个变量和向中国出口的比重利用的是标准国际贸易分类 (SITC) (Rev. 3) 和联合国贸发组织数据库数据。标准国际贸易分类代码如下：农业、原材料和食品 (SITC 2 - 22 - 27 - 28 + 0 + 1 + 22 + 4)，化石燃料 (SITC 3)，金属和矿石 (SITC 27 + 28 + 68)，制成品 (SITC 6)。商业服务业在总出口中所占的比重是根据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 (WDI) 来进行计算。



续表

国家	总出口 (当前美元, 百万)	农产品、 原材料和 食品 (%)	化石燃料 (%)	金属和 矿石 (%)	制造业 (%)	商业服务 (%)	对中国出口 所占的 比重* (%)
洪都拉斯	6916	37.7	2.7	2.3	20.5	32.1	2.6
墨西哥	400076	6.3	12.2	2.9	71.3	5.0	1.7
尼加拉瓜	5382	38.6	0.4	0.7	37.5	14.6	0.4
巴拿马	10534	5.3	0.0	0.9	1.1	92.0	0.8
巴拉圭	10198	61.8	22.1	0.8	7.5	7.5	0.5
秘鲁	46888	15.3	11.6	34.8	10.5	10.7	16.6
乌拉圭	12319	55.2	0.4	0.2	17.1	26.4	10.2
委内瑞拉	96597	0.0	96.9	0.0	1.2	1.9	0.3

注：除委内瑞拉和洪都拉斯（2012年）以外，其他国家都采用2013年数据。* 2011~2013年出口的平均值。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 (2015), United Nations Commodity Trade Statistics Database (Comtrade), <http://comtrade.un.org/>。

在聚类分析中，有几种分组方法用以定义相似性或异质性。典型类别的聚类包括拆分、分层、重叠和模糊方法。聚类分析中的分层方法的目的在于定义不重叠的群组，每个国家分配到唯一一个群组。另外，我们使用沃德法测量簇之间的相似性（距离）水平，每个分组的平方误差的总和最小。图 5 - A1.1 是 18 个拉美国家聚类过程的树状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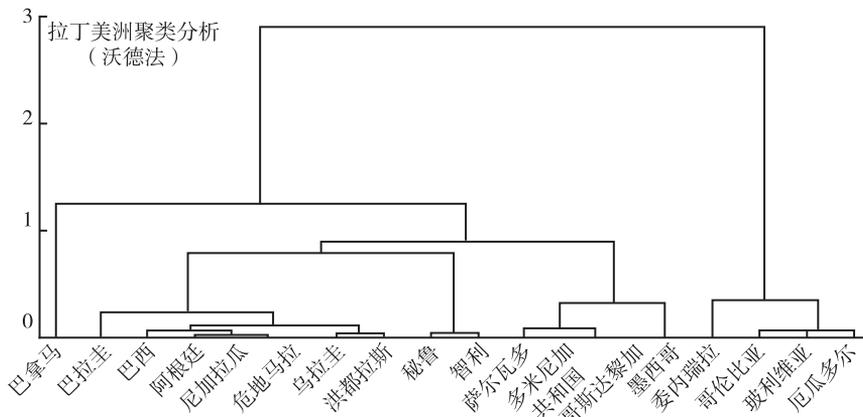


图 5. A1 - 1 群组树状

资料来源：OECD/CAF/ECLAC 根据 Avendano, Obach and Perea (即将出版) 计算。

利用聚类分类的最佳数量“简单—阶距离”的原则，我们将拉美国家分成了五个群组。这个简单的标准要求检验层级之间合并值的差异。差异越大，则证明数据已被进行排他性分类（Milligan and Cooper, 1985）。

根据出口构成和与中国市场的接触程度，将拉美国家分成五个群组。阿根廷、巴西、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拉圭和乌拉圭，其出口主要集中在农业，组成第一群组。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是第二群组，其出口集中于化石燃料。第三群组包括秘鲁和智利，它们严重依赖金属和矿石出口，这是中国投资的自然产品。第四群组包括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多米尼加共和国、哥斯达黎加和萨尔瓦多），它们专注于制造业出口，与中国市场的接触不多。最后，巴拿马作为单独个体，形成了一个群组，因为巴拿马服务部门的出口水平令人惊叹，大大高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商业服务业的出口比例（2013年服务部门出口占总出口的93%）。

中国投资对拉美国家出口的影响

18个拉美国家被包含在固定效应回归面板中，来评价中国转型（即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于国内消费，较少依赖投资）和1995~2013年拉美国家的出口之间的关系。

中国的投资水平是拉美国家出口的解释变量，因为中国对进口的需求是由投资推动的（唐，2003）。考虑到拉丁美洲的异质性，中国的投资水平对每个群组的影响不同。因此，分别计算中国投资对各个群组的影响。

模型如下：

$$\ln(\text{exports}_{it}) = \alpha + \beta_1 \ln(\text{inv}_{China_t}) + \beta_2 \text{Export_index}_{it} + \sum_{k=1} \beta_k (\ln(\text{inv}_{China_t}) \cdot D_k) + \beta_8 \text{ECI} + \beta_9 \Delta\% \text{GDP}_{China_t} + \beta_{10} \Delta\% \text{GDP}_{OECD_t} + \varepsilon_{it}$$

$\ln(\text{exports}_{it})$ 是每个国家的商品和服务的年度总出口额（美元）的对数。重点是捕捉中国经济对每个出口国的数量效应和价格效应的标称值。



$\ln(inv_{China_t})$ 是中国前三年投资的平均值的对数。投资是根据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来计算，包括有形资产形成总额和无形固定资产形成总额。选取最近三年的数据是为了将中国的投资对拉美国家出口的影响的滞后性考虑在内。

$Export_index_u$ 即出口价值指数，以每一个国家出口的当前值占基准期的平均值（2000 年数据）的百分比来表示。

$\ln(Inv_{China_t} \cdot D_k)$ 表示五个虚拟群组的产品与中国最近三年的投资平均值之间的相互影响，目标在于区分中国投资对每个群组的影响。

ECI 即经济复杂度指数，是衡量每个国家整体生产力特点的指数，指每个经济体生产的产品在精密度和多元化方面所积累的知识或汇集的竞争力。

$\Delta\% GDP_{China_t}$ 指中国经济实际年 GDP 的增长率。

$\Delta\% GDP_{OECD_t}$ 指 OECD 成员国实际年 GDP 的增长率，代表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和世界经济的增长趋势（Drummond and Liu, 2013）。

国家的出口总额和出口指数来自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GDP 增长率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世界经济展望数据。中国的投资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经济复杂度指数，来自《经济复杂性图册》（*Atlas of Economic Complexity*）（Hausmann and Hidalgo, 2014）。

估计：样本的结果

表 5. A1 - 2 总结了该模型估计的主要结果。这些结果表明，中国投资与拉美国家的出口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最近三年内，中国投资每增加 1%，农业群组^①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就增加 0.59%，群组三（智利和秘鲁）对中国的出口就增加 0.76%，群组二（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对中国的出口就增加 0.72%，群组四（墨西哥、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对中国的出口就增加 0.43%。

正如预期的那样，中国的投资和拉美国家的出口之间的关系因国家而

^① 农业群组是分析的基本单元。

异。首先，智利和秘鲁组成的群组是受中国投资水平影响最大的国家。其次是化石燃料出口国群组：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再次，中国的投资在巴拿马以及阿根廷、巴西、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拉圭和乌拉圭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最后，中美洲国家——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多米尼加共和国，以及墨西哥（群组四）受中国投资的影响较小。

出口指数的正向震荡导致拉美名义出口处于较高水平，减少了中国投资的影响（仍很重要，但影响下降较为明显）。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投资效果不仅通过出口量传导，还可以通过价格传导（Drummond et al., 2013）。中国 GDP 增长率非常高，而 OECD 国家尽管经济增长率为正，但是很低。这表明，拉美国家的出口对中国经济发展状态的敏感程度高于对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敏感程度。最后，一旦出口价格得到控制，经济复杂性指数（ECI）与出口之间呈显著负相关性，这表明在过去 20 年里，拉美出口集中在附加值低的产品上，如初级产品。

表 5. A1 - 2 固定效应面板模型结果

变量	-1 出口	-2 出口
中国投资水平(近三年平均)	0.590 *** -0.0299	0.497 *** -0.0424
出口指数		0.000480 * -0.000271
投资 * 群组 3 虚拟	0.172 ** -0.0696	0.167 ** -0.063
投资 * 群组 4 虚拟	-0.160 *** -0.0483	-0.077 -0.0525
投资 * 群组 5 虚拟	0.133 ** -0.0588	0.136 ** -0.0529
经济复杂性指数	-0.0981 -0.0855	-0.236 ** -0.0861
中国增长率	0.0291 *** -0.00695	0.0275 *** -0.00679
OECD 成员国增长率	0.00474 -0.00348	0.00526 * -0.00293



续表

变量	-1 出口	-2 出口
常数	16.50 *** -0.251	17.17 *** -0.313
观测值	342	342
判定系数(内含)	0.894	0.907
国家数量	18	18

注：星号表示稳健性标准差：*** $p < 0.01$ ，** $p < 0.05$ ，* $p < 0.1$ ；投资和出口以对数表示。

对2030年中国在两种情境下的预测

这两种情况都表明中国的增长率和投资率不断下降，但其中一种情境是这种下降速度更快。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情境不预设任何经济危机或外部或内部重大事件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的情况。它们只是模拟中国从一个靠投资拉动的中等收入国家转变成基于消费的高收入经济体。表 5. A1 - 3 预测了 2016 ~ 2030 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和投资率。以正常速度过渡的情境成为“基准情境”，以高速率过渡的情境成为“低投资情境”。

表 5. A1 - 3 2016 ~ 2030 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和投资率的两种情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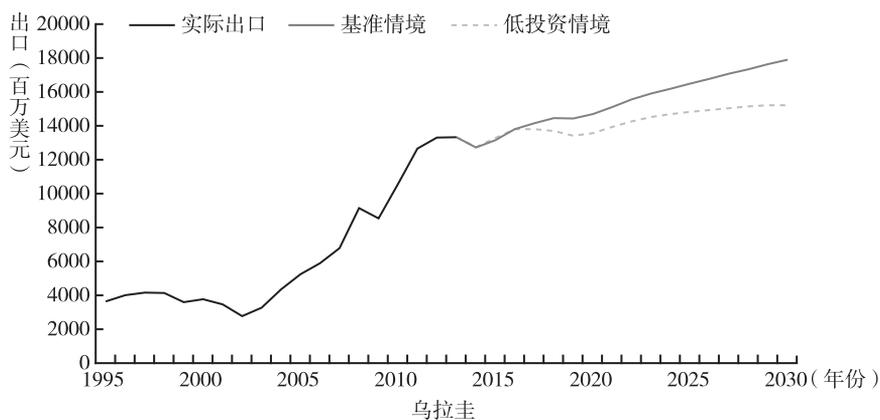
指标	年份	基准情境		低投资情境
		初始估计	最终预测	
经济增长率(每年,%)	2016 ~ 2020	6.8	6.6	6.3
	2021 ~ 2025	5.9	5.6	4.8
	2026 ~ 2030	5.1		3.2
投资占 GDP 的比重 (%)	2016 ~ 2020	38.0	42.4	35.0
	2021 ~ 2025	36.0	38.0	32.0
	2026 ~ 2030	34.0		30.0

资料来源：基准情境预测的前提是假定经济增长稳步进行，不会出现大的动荡（World Bank - DRC, 2013, p. 9）。低投资情境中作者假定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World Bank - DRC, 2013, p. 369），在投资/GDP 的比率下降 4 个百分点的基础上计算。基准情境的初始预测运用的是计量分析。最终预测的最终版本将视 2026 ~ 2030 年的结果可获得性而定。

表 5. A1 -4 拉美国家群组分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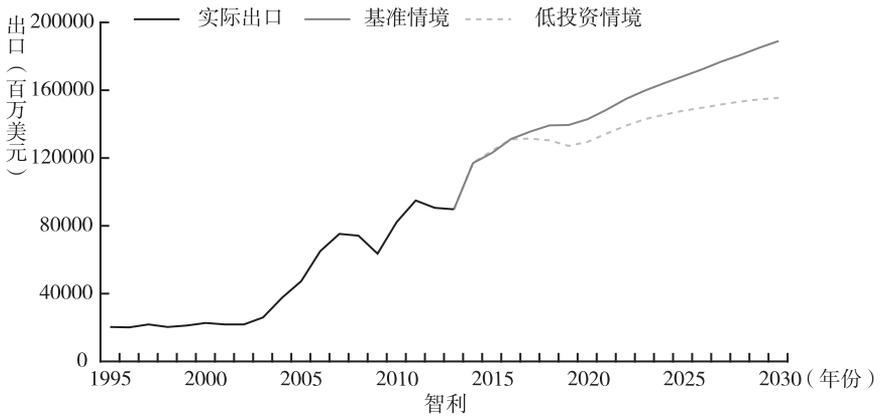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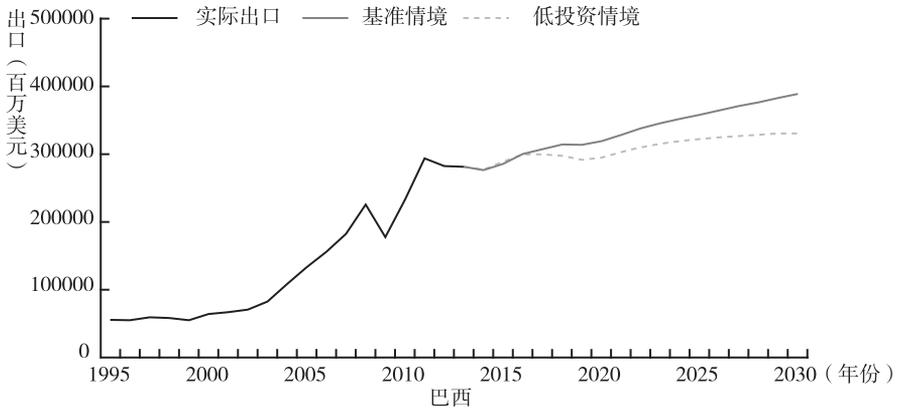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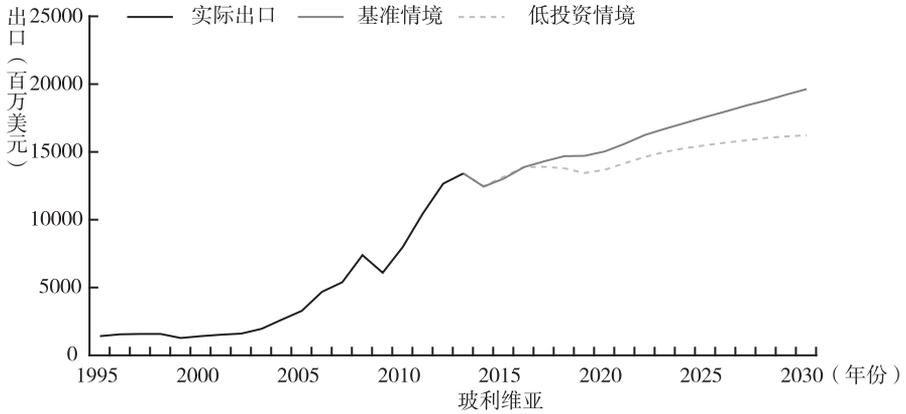
群组*	国家	代码
1	阿根廷	ARG
1	巴西	BRA
1	危地马拉	GUA
1	洪都拉斯	HND
1	尼加拉瓜	NIC
1	巴拉圭	PRY
1	乌拉圭	URY
2	巴拿马	PAN
3	智利	CHL
3	秘鲁	PER
4	哥斯达黎加	CRI
4	多米尼加共和国	DOM
4	萨尔瓦多	SLV
4	墨西哥	MEX
5	玻利维亚	BOL
5	哥伦比亚	COL
5	厄瓜多尔	ECU
5	委内瑞拉	VEN

注：* 根据沃尔德法进行分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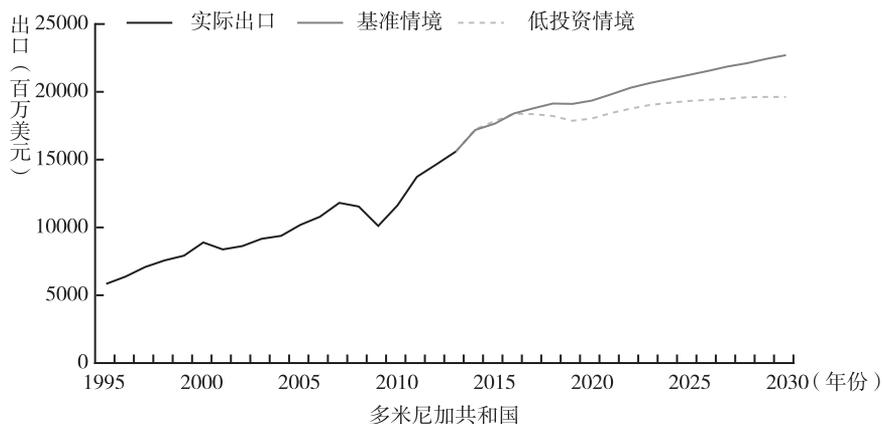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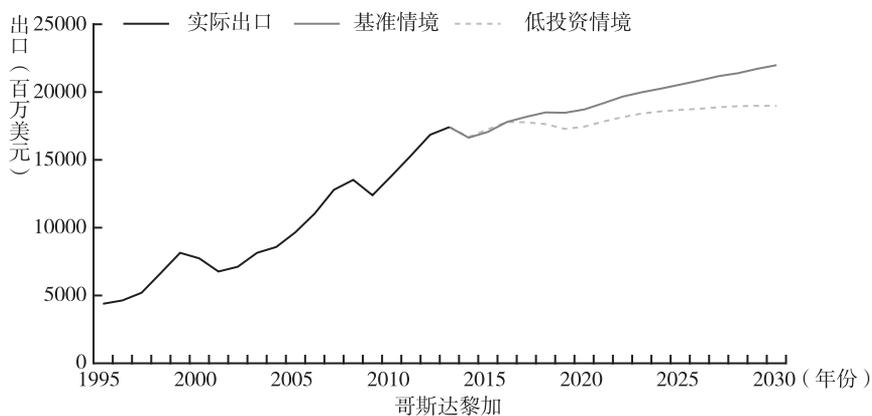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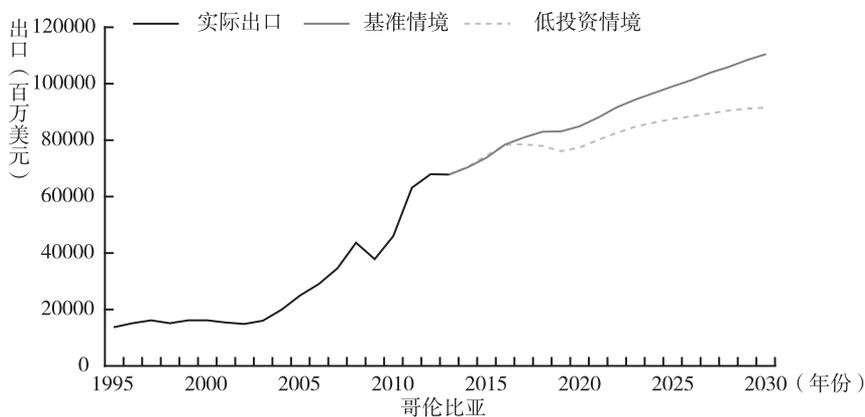




拉丁美洲经济展望（2016）：发展与中国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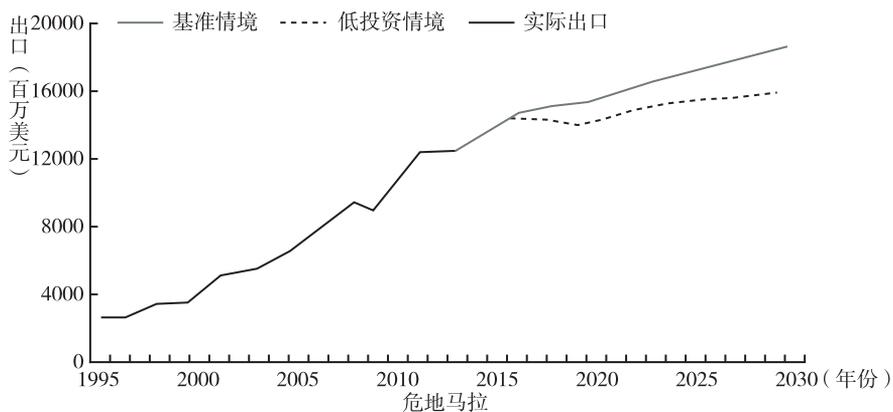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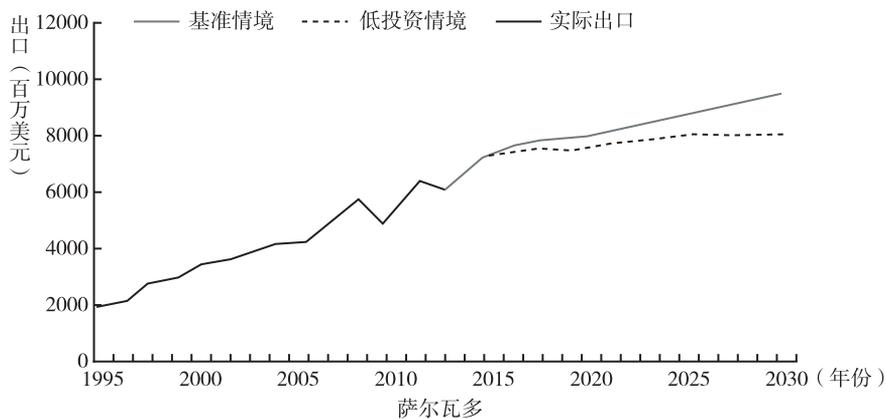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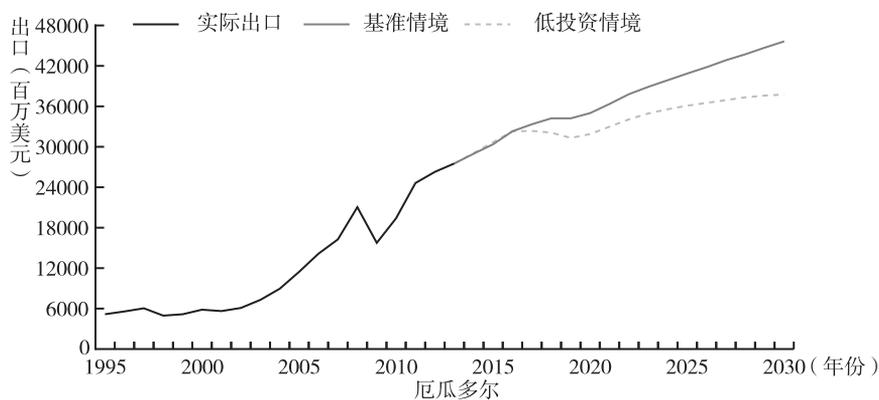


第五章 拉丁美洲—中国伙伴关系的发展趋势和前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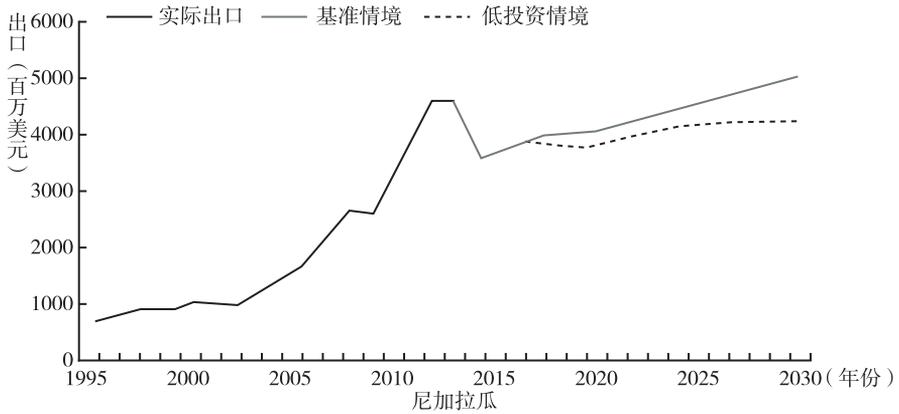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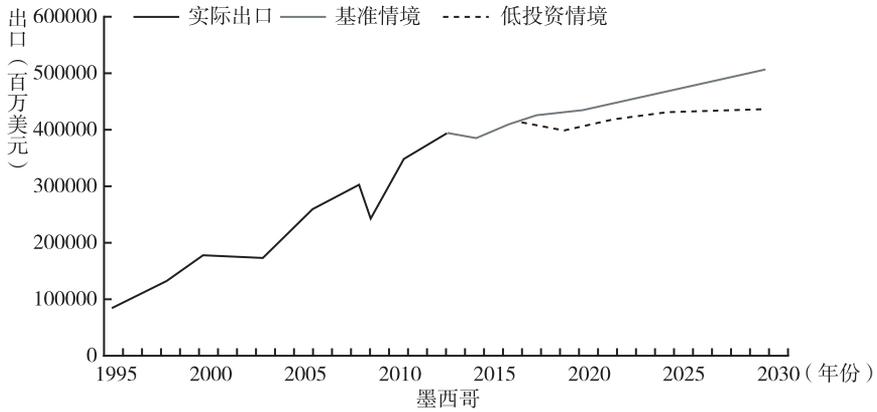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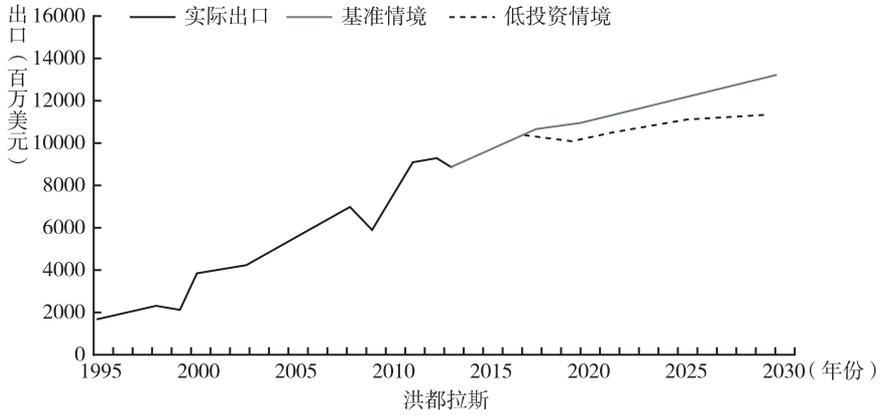




拉丁美洲经济展望（2016）：发展与中国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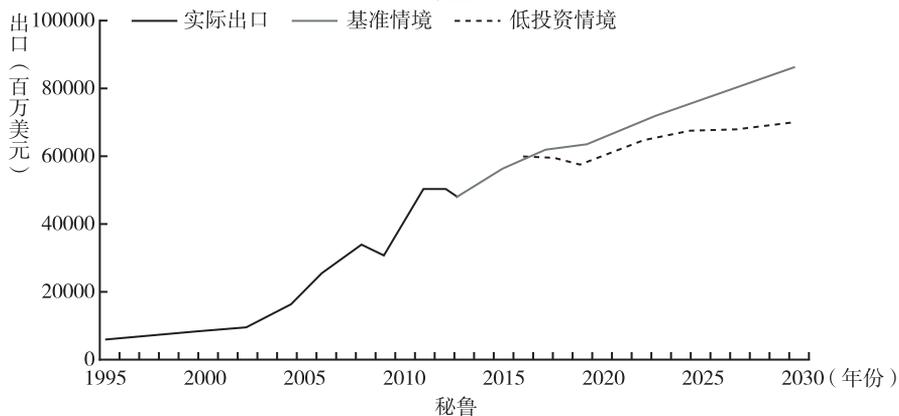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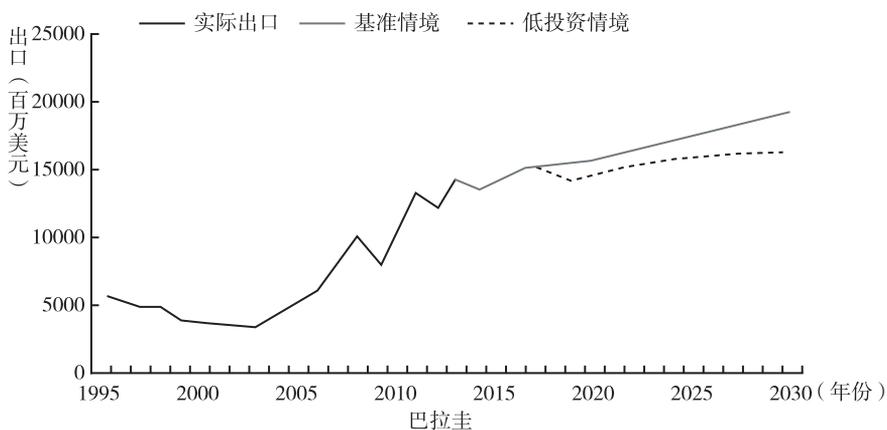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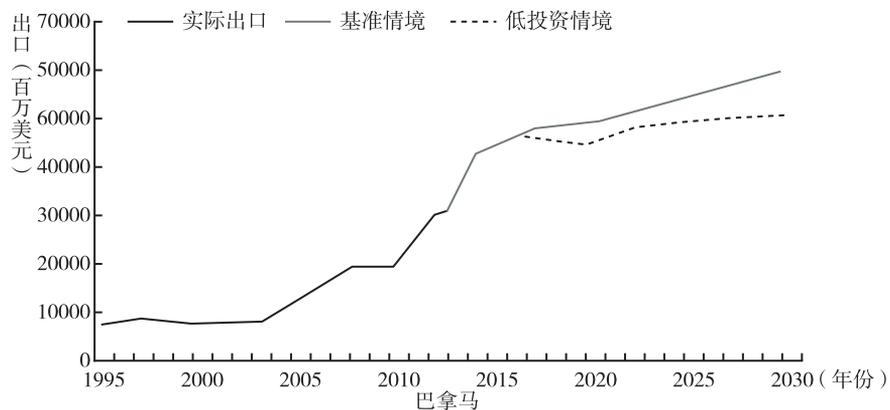


第五章 拉丁美洲—中国伙伴关系的发展趋势和前景





拉丁美洲经济展望（2016）：发展与中国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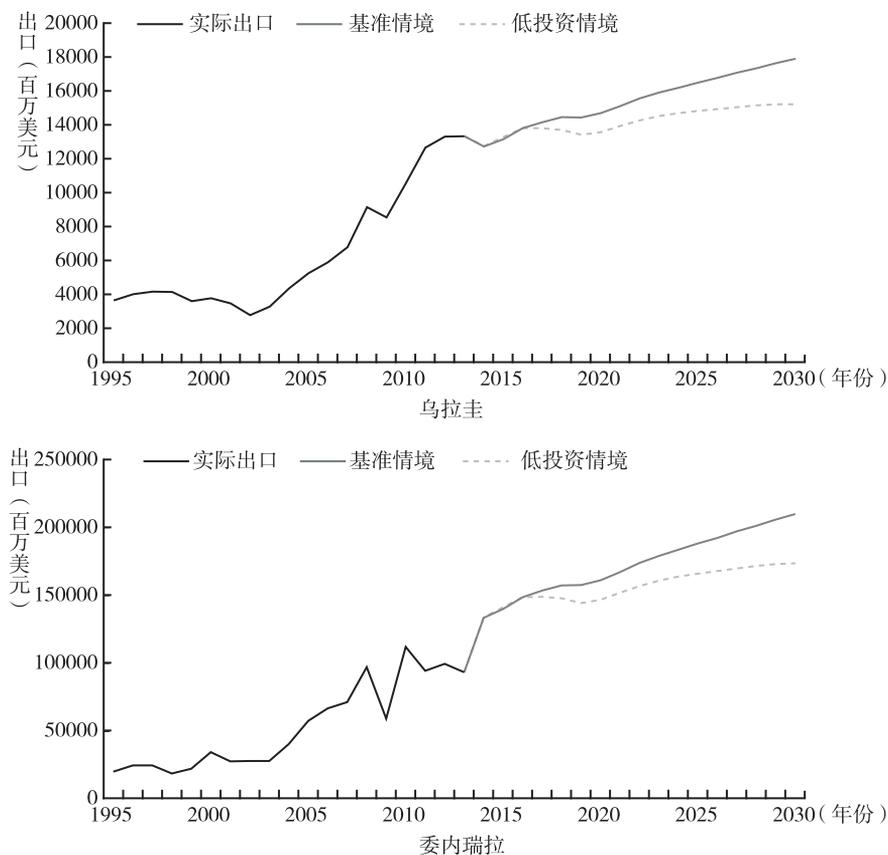


图 5. A1 -2 出口预测 (分国家) ——样本的结果

参考文献

Bahar, D. , R. Hausmann and C. Hidalgo (2014), “Neighbors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Evidence of international knowledge diffus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Elsevier, Vol. 92 (1), pp. 111 - 123.

Drummond, P. and E. X. Liu (2013), “Africa’s rising exposure to China; How large are spillovers through trad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king Paper*, Africa Department, www.imf.org/external/pubs/ft/wp/2013/wp13250.pdf.



拉丁美洲经济展望（2016）：发展与中国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

Milligan, G. W. and M. C. Cooper (1985), “An examination of procedures for determining the number of clusters in a dataset”, *Psychometrika*, Vol. 50, pp. 159 – 179.

United Nations (2015), United Nations Commodity Trade Statistics Database (Comtrade), <http://comtrade.un.org/>.

World Bank – DRC (2013), “China 2030: Building a modern, harmonious, and creative society”, The World Bank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of the State Council,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阿根廷

最近趋势

阿根廷第一大贸易伙伴是巴西。中国则是阿根廷的第二大贸易伙伴，阿根廷主要向中国出口大宗商品。2014年，阿根廷对中国出口占总出口的7%，进口总额的16%来自中国。用附加值方法计算，阿根廷对中国的出口集中在农业部门（57%）和小部分矿业产品（6%），以及高科技、低科技产品（20%）、服务（17%）上。相反，用附加值方法计算，大多数从中国进口的产品是中高科技和高科技产品（67%）。

阿根廷在全球价值链（GVC）中的位置位于拉丁美洲平均水平之下，比欧盟则低更多。阿根廷在价值链中的后向联系水平较低（14%），因为阿根廷致力于农业、矿业和服务业，这些行业无须供应很多国外中间投入品。阿根廷与中国的前向联系的47%都集中在农业部门和采矿部门，服务业也发挥了重要作用（34%），而后向联系都集中在中高科技和高科技产业（42%）。

阿根廷和中国之间的金融关系取得了重要进展。最近几年，中国已成为阿根廷双边贷款的重要贷款方，自2005年以来，中国给予阿根廷的贷款占中国对拉美贷款的16%（占阿根廷GDP的3%）。来自中国的大部分贷款已用于基础设施专项建设（占中国贷款总额的74%）或能源项目（26%）。

关于人口的竞争力，阿根廷的高等教育入学率相对较低，学生在PISA考试中成绩不佳，这能够解释为什么超过半数的受访企业称难以遇到称职的员工。事实上，57%的公司声称它们很难找到具备必要竞争力的员工，这一



用工难比例高于中国（2%）、拉丁美洲平均水平（36%）和 OECD 平均水平（17%）。14% 的阿根廷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比中国高（9%），但低于 OECD 国家（28%）。但是，中国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英文缩写 STEM）专业方面的人才占 48%，而阿根廷只有 13%。阿根廷 15 岁学生在 PISA 考试中的平均分为 388 分（2012 年数据），远远低于中国（550 分）和 OECD 国家（494 分）。

中阿关系进展

自 20 年前，阿根廷和中国就建立了经济合作伙伴关系。1992 年，中国和阿根廷签订了双边投资条约。然而，中阿关系的巩固是从 2004 年开始的，当时中国向阿根廷提供 200 亿美元融资额度（Arnson et al.，2014），这是中阿贸易与合作关系迅速发展的开端。

两国签署了众多贸易协定和合作备忘录，推动双边贸易和在基础设施、石油、天然气、矿业、核能、交通、金融、农业和林业方面的投资。2014 年中阿宣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签署了超过 15 项协议，其中包括中国投资两座水电站、铁路、造船、石化企业，以及一个帮助阿根廷建设第四家核电厂的协议（阿根廷总统办公室和部联邦规划公共投资与服务部，2014）。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中国承诺将提供 47 亿美元在圣克鲁斯建设两座水电站，提供 4.23 亿美元购买 11 艘船，提供 21 亿美元改造阿根廷铁路运输线（阿根廷总统办公室，2014）。

中国石油企业对投资阿根廷油田表现出极大兴趣，特别是 Vaca Muerta 石油和页岩气油田（Arnson et al.，2014）。2015 年，阿根廷 YPF 国家石油公司与中石化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以建立战略联盟，共同开发石油和天然气项目。如 2014 年贸易和合作协定所述，阿根廷 YPF 国家石油公司将接受来自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金融援助（YPF，2015）。

中国还与阿根廷在科学和技术上进行合作。2008 年，两国签署了成立中国—阿根廷食品科技中心的协议。该中心的主要目的是促进中阿两国在科学和食品技术领域的合作，特别是在粮食农业、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和能源

领域，以及粮食的生产、储存、包装和可持续运输领域的合作（阿根廷科技和生产创新部，2015）。

参考文献

Armsom, C., J. Heine and C. Zaino (eds.), (2014), *Reaching across the Pacific: Latin America and Asia in the New Century*, Wilson Center, Washington, DC., www.wilsoncenter.org/publication/reaching-across-the-pacific-latinamerica-and-asia-the-new-century.

ECLAC (2013), *Chine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ECLAC, United Nations, Santiago, Chile.

ILO (2015), “ILO Key Indicators of the Labour Market” (KILM) (dataset), www.ilo.org/empelm/what/WCMS_114240/lang-en/index.htm (accessed July 2015).

Ministry of Federal Planning, Public Investment and Services of Argentina (2014), “Argentina y China firman acuerdos para construir Cuarta Central Nuclear” (“Argentina and China signed agreements to build fourth nuclear power plant”), Buenos Aires, www.minplan.gob.ar/noticia/16229/argentina-y-china-firman-acuerdos-para-construir-cuarta-central-nuclear.html.

Minist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of Argentina (2015), CCAFST – Centro Argentino – Chino en Ciencia y Tecnología de los Alimentos (CCAFST – Argentine – Chinese Center for Science and Food Technology), www.mincyt.gob.ar/accion/ccafst-centro-argentino-chino-en-ciencia-y-tecnologia-de-los-alimentos-9557.

OECD (2012), “PISA 2012 Results: What students know and can do”, (dataset), www.oecd.org/pisa/keyfindings/pisa-2012-results.htm (accessed July 2015).

OECD/WTO (2015), Trade in Value Added (TiVA) (database), June 2015, stats.oecd.org/index.aspx?queryid=66237 (accessed July 2015).

Presidency of Argentina (2014), “Argentina y la República Popular China firmaron un acuerdo que estableció Asociación Estratégica Integral” (“Argentina and China signed an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Buenos Aires, published 18 July, <http://prensa.argentina.ar/2014/07/18/51417-argentina-y-la-republica-popular-china-firmaron-un-acuerdo-que-establece-su-asociacion-estrategica-integral.php>, The Inter-American Dialogue (2014), “China – Latin America Finance Database” (dataset), www.thedialogue.org/map_list/ (accessed July 2015).

UNESCO (2015), 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 (UIS) Education database (dataset),



拉丁美洲经济展望 (2016) : 发展与中国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

www.uis.unesco.org/datacentre/pages/default.aspx (accessed July 2015).

United Nations (2015), United Nations Commodity Trade Statistics Database (Comtrade), <http://comtrade.un.org/db/default.aspx> (accessed July 2015).

World Bank (2015a), World Bank Edstats: Education Statistics (dataset), <http://datatopics.worldbank.org/education/> (accessed July 2015).

World Bank (2015b), Enterprise Surveys – What businesses experience (datasets), www.enterprisesurveys.org/ (accessed July 2015).

World Bank (2015c), “International debt statistics” (dataset),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http://data.worldbank.org/news/International-Debt-Statistics-2015-now-available> (accessed July 2015).

YPF (2015), “YPF y Sinopec firman un MOU para desarrollar nuevos proyectos de petróleo y gas en el país” (YPF and Sinopec signed an MOU to develop new oil and gas projects in the country), Buenos Aires, www.ypf.com/YPFHoy/YPFSalaPrensa/Lists/ComunicadosDePrensa/12-YPF-Sinopec-MOU-Press-Release.pdf published 28 January.

阿根廷主要指标

贸易 ⁱ	2001年	2005年	2007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对中国出口(占总出口百分比)	4%	8%	9%	6%	7%	7%
从中国进口(占总进口百分比)	5%	5%	11%	15%	15%	16%
2014年向中国出口的五种主要产品(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值占总出口值的百分比)	大豆 (58%)	原油产品 (13%)	大豆油和 大豆产品 (10%)	没有加工 的烟草 (2%)	牛皮 (2%)	
各行业的附加值构成 ⁱⁱ	农业	矿业	低和中低科技	中高和高科技	服务业	
对中国出口,按部门,2011年	57%	6%	17%	3%	17%	
从中国进口,按部门,2011年	0%	0%	19%	58%	23%	
服务部门出口,按行业,2011年	传统	信息和 研发	金融	其他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 ⁱⁱ	阿根廷		拉美与加勒比		欧盟	
	2000年	2011年	2000年	2011年	2000年	2011年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总体参与度	25%	30%	39%	41%	45%	51%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向联系	19%	16%	14%	21%	20%	22%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后向联系	6%	14%	25%	20%	24%	29%
在中国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 ⁱⁱ	2000年	2011年				
在中国的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向联系(占全球价值链的百分比)	6%	12%				
在中国的全球价值链中的后向联系(占全球价值链的百分比)	1%	6%				

续表

部门构成 ⁱⁱ	农业	矿业	低和中低科技	中高和高科技	服务业							
与中国的前向联系,2011年	33%	14%	14%	4%	34%							
与中国的后向联系,2011年	8%	2%	34%	42%	14%							
人力资本和竞争力*	阿根廷		中国	OECD	拉美与加勒比							
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 (占2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 ⁱⁱⁱ	14%		9%	28%	14%							
具有初中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 (占2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 ⁱⁱⁱ	28%		14%	35%	23%							
受教育平均年限 ⁱⁱⁱ	9.78年		7.30年	11.39年	8.29年							
	理工科	文史哲	理工科	文史哲	理工科	文史哲	理工科	文史哲				
毕业生的专业比例(占大专以上学历的毕业生的百分比) ^{iv}	13%	61%	48%	24%	22%	56%	17%	63%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就业人口占总人数比例 ^v	1%	2%	75%	35%	30%	36%	5%	23%	71%	16%	21%	63%
声称难以找到适合的员工的企业的比例 ^{vi}	57%			2%			17%			36%		
PISA 考试中数学成绩,2012年 ^{**vii}	388分			550分			494分			397分		
融资和外国直接投资	双边贷款			债券			银行贷款			多边贷款		
国际金融市场融资(存量的占比),最近可获得数据的年份 ^{viii}	9%			63%			0%			28%		
占中国对拉美贷款的百分比,2005~2014年 ^{ix}	16%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2010~2012年平均值(百万美元) ^x	2050											

资料来源: i) 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 (Comtrade); ii) OECD/WTO 贸易附加值数据; iii)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司; iv) 世界银行教育统计数据库 (World Bank, 2015a); v) 国际劳工组织劳动力市场关键指标; vi) 世界银行, 企业调查 (World Bank, 2015b); vii) OECD 拉丁美洲 2012 年 PISA 成绩和中国 2009 年 PISA 成绩; viii) 世界银行国际债务统计 (World Bank, 2015c); ix) 美洲对话组织; x) 联合国拉美经委会 (2013)。

* 阿根廷数据是 2003 年数据, 中国和其他拉美国家的是 2011 年前后的数据, 见方法论附录。

** 中国的数据是 2009 年数据, 见方法论附录。



巴 西

最近趋势

中国是巴西的第一大贸易伙伴。2014年，巴西对中国出口占总出口的18%，进口总额的16%来自中国。用附加值方法计算，巴西对中国出口的超过一半的产品是农产品和矿业产品，其余是高科技、低科技产品（20%）和服务（21%）。相反，用附加值方法计算，大多数从中国进口的产品是中高和高科技产品（55%）。

巴西在全球价值链（GVC）中的位置位于拉丁美洲平均水平之下，这是由于巴西在价值链中的后向联系占比较低。巴西国内市场巨大，专注于农业、矿业和服务业，后向联系占比低（11%），前向联系占比高（24%），因为这些行业无须供应很多国外中间投入品。这体现了巴西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巴西与中国的前向联系集中在服务部门（占前向联系的46%），而后向联系集中在中高科技和高科技产业（39%）。

巴西和中国之间的金融关系不断升级。近年来，中国在巴西的双边贷款中占有不少份额，中国给予巴西的贷款占给予拉美总贷款的19%（占巴西GDP的1%）。这些贷款大部分集中在能源部门（56%），其次是矿业（6%）和基础设施（4%）。此外，巴西和中国在2013年签署了600亿雷亚尔/190亿元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协议（巴西财政部，2013）。中国和巴西之间的金融联系不限于联邦政府层面，巴西各州政府也获得了中国的资金。中国投资主要集中在农业、能源、基础设施和运输行业。例如，2009年马托格罗索州与中国江西三合国际投资公司签署了中国在巴西农业方面的第一大投资协议，双方致力于开展一系列农业企业业务（奥尔塔，2015）。此外，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金砖五国）创立了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BD）和应急储备安排（ARC），加强了巴西和中国之间的金融联系。此外，2015年中国还邀请巴西作为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关于人口竞争力，与中国相比，巴西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较高，但是巴西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专业的人才比例较低。巴西总人口的约 12% 完成了高等教育，超过中国（9%），但是低于拉丁美洲平均水平（14%）和 OECD 平均水平（28%）。这些毕业生中，只有 12% 拥有 STEM 学位，而近一半中国毕业生拥有 STEM 学位。另一个指标是 OECD 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对 15 岁的学生进行的数学、科学和阅读能力的评估。参加 PISA 考试的巴西学生的数学平均成绩（391 分，PISA 2012 年报告）低于中国（550 分）和 OECD 的平均水平（494 分）。

中巴关系进展

在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巴西和中国加强了在国际政治中的协调和合作，在 WTO 谈判和气候变化议程中采取共同立场（Whalley and Medianu, 2013）。然而，中国与巴西并没有签署任何双边优惠贸易协定或双边投资条约，部分原因是巴西作为南方共同市场的成员，必须与南方共同市场保持共同立场。

中国表现出投资巴西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的极大兴趣。以下几个项目已经在实施过程中：2015 年 5 月，巴西计划、预算和管理部和中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签订了投资和生产能力的发展框架协议，据此，将成立 200 亿美元的双边基金（巴西计划、预算和管理部，2014）。同年，巴西国家石油公司与中国的国家开发银行（2015 年提供 50 亿美元）、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签署协议（巴西国家石油公司，2015）。此外，巴西联邦储蓄银行（CEF）与中国工商银行签署了金融合作谅解备忘录，由中国工商银行的生态融资计划（Programa de Financiamento Ecológica）提供资金。

总体而言，中国在巴西的外国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初级产品部门，其次是一些制造业部门。巴西和中国正在谈判“第二代”投资，目的是将对原材料的投资重新引到重工业和基础设施上。



巴西和中国的合作在加强。2010年，中国和巴西签署了2010~2014年共同行动计划，包括不同领域的多个合作项目：农业、贸易、能源、金融、矿业和技术（巴西外交部，2012）。该文件在2015年得到更新，两国签署了2015~2021年共同行动计划。中国和巴西还签署了一项十年合作计划（2012~2021年），建立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并在外长之间建立全面对话机制（巴西外交部，2012）。这个机制和中国—巴西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COSBAN）一起，负责监督2004年以来两国在贸易、投资、金融、能源、农业、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合作，以及共同行动计划和十年合作计划的实施情况。自从1984年第一个科学、技术和创新双边合作协议签署之后，中国和巴西在研发领域已经签署了53项合作备忘录。最近一项备忘录是在2015年6月签署的，包括共同开发科技园协议，目的是促进具有共同战略意义的领域的合作，如农业科学技术、工业技术、高附加值的技术、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合作（MCTI，2015）。

参考文献

ECLAC (2013), *Chine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ECLAC, United Nations, Santiago, Chile.

Horta, L. (2015), "Brazil-China relations", *RSIS Working Paper*, No. 287, S.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Singapore, www.rsis.edu.sg/wp-content/uploads/2015/03/WP287.pdf.

ILO (2015), "ILO Key Indicators of the Labour Market (KILM) (dataset)", www.ilo.org/empelm/what/WCMS_114240/lang-en/index.htm (accessed July 2015).

MCTI (2015), "Brasil e China assinam memorando de cooperação em parques tecnológicos" ("Brazil and China sign memorandum for co-operation in technology parks"), Ministério da Ciência, Tecnologia e Inovação (Minist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Brasília, www.mcti.gov.br/visualizar/-/asset_publisher/jIPU015RgRmq/content/brasil-e-china-assinam-memorando-de-cooperacao-em-parques-tecnologicos.

Ministry of Finance of Brazil (2013), "Brasil e China fortalecem cooperacao bilateral

durante cupula dosBRICS” (Brazil and China strengthen bilateral co-operation during dome BRIC), Brasília, [www.fazenda.gov.br/divulgacao/noticias/2013/marco/brasil – e – china – fortalecem – cooperacao – bilateral – durante – cupula – dos – brics](http://www.fazenda.gov.br/divulgacao/noticias/2013/marco/brasil-e-china-fortalecem-cooperacao-bilateral-durante-cupula-dos-bric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Brazil (2012), “Plano Decenal de Cooperação entre o Governo da República Federativa do Brasil e o Governo da 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 (“Ten-Year Plan for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Federative Republic of Brazil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PRC”), Brasília, [http://daimre.serpro.gov.br/atos – internacionais/bilaterais/2012/plano – decenal – de – cooperacao – entre – o – governo – da – republicafederativa – do – brasil – e – o – governo – da – republica – popular – da – china/](http://daimre.serpro.gov.br/atos-internacionais/bilaterais/2012/plano-decenal-de-cooperacao-entre-o-governo-da-republicafederativa-do-brasil-e-o-governo-da-republica-popular-da-china/).

Ministry of Planning, Budget and Management of Brazil (2014), “Brasil e China assinam acordo para estimular investimentos” (Brazil and China sign agreement to boost investment), Brasília, [www.planejamento.gov.br/assuntos/assuntos – economicos/noticias/brasil – e – china – assinam – acordo – para – estimular – investimentos](http://www.planejamento.gov.br/assuntos/assuntos-economicos/noticias/brasil-e-china-assinam-acordo-para-estimular-investimentos).

OECD (2012), “PISA 2012 Results: What students know and can do” (dataset), [www.oecd.org/pisa/keyfindings/pisa – 2012 – results.htm](http://www.oecd.org/pisa/keyfindings/pisa-2012-results.htm) (accessed July 2015).

OECD/WTO (2015), Trade in Value-Added (TiVA) (database), June 2015, <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queryid=66237> (accessed July 2015).

Petrobras (2015), “Funding Agreement of USD 5 billion with China Development Bank Corporation”, Brasília, [www.investidorpetrobras.com.br/en/press – releases/funding – agreement – usd – 5 – billion – china – development – bankcorporation](http://www.investidorpetrobras.com.br/en/press-releases/funding-agreement-usd-5-billion-china-development-bankcorporation).

The Inter-American Dialogue (2014), “China-Latin America Finance Database” (dataset), [www.thedialogue.org/map_ list/](http://www.thedialogue.org/map_list/) (accessed July 2015).

UNESCO (2015), 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 (UIS) Education Database (dataset), www.uis.unesco.org/datacentre/pages/default.aspx (accessed July 2015).

United Nations (2015), United Nations Commodity Trade Statistics Database (Comtrade), <http://comtrade.un.org/db/default.aspx> (accessed July 2015).

Whalley, J. and D. Medianu, (2013), “The Deepening China Brazil Economic Relationship”, CESifo Economic Studies, Vol. 59, No. 4), pp. 707 – 730, earlier version available on line at [www.cesifo – group.de/ifoHome/publications/docbase.html](http://www.cesifo-group.de/ifoHome/publications/docbase.html).

World Bank (2015a) World Bank Edstats: Education Statistics (dataset), <http://datatopics.worldbank.org/education/> (accessed July 2015).

World Bank (2015b), Enterprise Surveys-What Businesses Experience (dataset), www.enterprisesurveys.org/ (accessed July 2015).

World Bank (2015c), “International debt statistics” (dataset),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http://data.worldbank.org/news/International – Debt – Statistics – 2015 – now – available](http://data.worldbank.org/news/International-Debt-Statistics-2015-now-available) (accessed July 2015).



巴西主要指标

贸易 ⁱ	2001年	2005年	2007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对中国出口(占总出口百分比)	3%	6%	7%	17%	19%	18%		
从中国进口(占总进口百分比)	2%	7%	10%	15%	16%	16%		
2014年向中国出口的五种主要产品(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值占总出口值的百分比)	大豆 (37%)	铁矿和精矿 (35%)	石油产品 (9%)	甘蔗或甜菜 (3%)	木浆 (3%)			
各部门的附加值的构成 ⁱⁱ	农业	矿业	低和中低科技	中和高科技	服务业			
对中国出口,按部门,2011年	14%	44%	15%	5%	21%			
从中国进口,按部门,2011年	0	0	22%	55%	22%			
服务部门出口,按行业,2011年	传统	信息和研发	金融	其他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 ⁱⁱ	巴西		拉美与加勒比		欧盟			
	2000年	2011年	2000年	2011年	2000年	2011年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总体参与度	29%	35%	39%	41%	45%	51%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向联系	17%	24%	14%	21%	20%	22%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后向联系	11%	11%	25%	20%	24%	29%		
在中国的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 ⁱⁱ	2000年	2011年						
在中国的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向联系(占全球价值链的百分比)	5%	19%						
在中国全球价值链中的后向联系(占全球价值链的百分比)	1%	8%						
部门构成 ⁱⁱ	农业	矿业	低和中低科技	中和高科技	服务业			
与中国的前向联系,2011年	10%	27%	12%	4%	46%			
与中国的后向联系,2011年	5%	16%	28%	39%	12%			
人力资本和竞争力 [*]	巴西		中国		OECD		拉美与加勒比	
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占2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 ⁱⁱⁱ	12%		9%		28%		14%	
具有初中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占2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 ⁱⁱⁱ	29%		14%		36%		23%	
受教育平均年限 ⁱⁱⁱ	6.99年		7.30年		11.39年		8.29年	
	理工科	文史哲	理工科	文史哲	理工科	文史哲	理工科	文史哲
毕业生的专业比例(占大专以上学历的毕业生的百分比) ^{iv}	12%	64%	48%	24%	22%	56%	17%	63%

续表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就业人口占总人数比例 ^v	15%	22%	63%	35%	30%	36%	55%	23%	71%	16%	21%	63%
声称有难以找到适合的员工的企业的比例 ^{vi}	75%		2%			17%			36%			
PISA 考试中数学成绩,2012 年 ^{vii**}	391 分			550 分			494 分			397 分		
融资和外国直接投资	双边贷款			债券			银行贷款			多边贷款		
国际金融市场融资(存量的占比),最近可获得数据的年份 ^{viii}	9%			41%			28%			23%		
占中国对拉美贷款的百分比,2005~2014 年 ^{ix}	19%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2010~2012 年平均值(百万美元) ^x	7101.9											

资料来源: i) 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 (Comtrade); ii) OECD/WTO 贸易附加值数据; iii)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司; iv) 世界银行教育统计数据库 (World Bank, 2015a); v) 国际劳工组织劳动力市场关键指标; vi) 世界银行, 企业调查 (World Bank, 2015b); vii) OECD 拉丁美洲 2012 年 PISA 成绩和中国 2009 年 PISA 成绩; viii) 世界银行国际债务统计 (World Bank, 2015c); ix) 美洲对话组织; x) 联合国拉美经委会 (2013)。

* 2011 年前后的数据, 见方法论附录。

** 中国是 2009 年的数据, 见方法论附录。



智 利

最近趋势

中国是智利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智利向中国出口的产品主要是铜。2014年，智利对中国出口占总出口的25%，中国成为智利第一大出口市场。智利进口总额的21%来自中国，中国是智利第二大进口市场。用附加值方法计算，智利对中国出口的产品的80%是矿业产品和中低科技和低科技产品（与铜精矿、铜矿和铜粗矿相关），其次是服务（18%）。相反，用附加值方法计算，大多数从中国进口的产品是服务（47%）、中高科技和高科技产品（31%）。

智利在全球价值链（GVC）中的位置位于拉丁美洲和欧盟平均水平之上，这是由于智利西在价值链中的前向联系占比较大。智利专注于发展农业、矿业和服务业，贸易开放度较高，价值链后向联系占比较小（20%），前向联系占比大（32%）。智利的后向价值链与拉美平均水平相当，低于欧盟平均水平。巴西与中国的价值链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集中在矿业、低技术和中低技术产业（占前向联系的72%和后向联系的76%）。智利独有的前向价值链特征是智利的出口产品（尤其是对中国出口）集中在矿产和金属上。智利贸易规则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使得智利融入了全球生产链，如今智利在全球价值链（GVC）中的份额日益增加。

智利和中国之间的金融关系依然一般。近年来，虽然中国给予拉美大量的双边贷款，但是智利仅收到中国对拉美贷款的0.1%（1.5亿美元）。这些贷款流向基础设施项目，如提高通信网络质量。中国对拉美的贷款集中在阿根廷、巴西、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91%）。

关于人口竞争力，与中国相比，智利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较高，但是智利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专业的人才比例较低。智

利总人口的约 16% 完成了高等教育，超过中国（9%），略高于拉丁美洲平均水平（14%），但是低于 OECD 平均水平（28%）。这些智利毕业生中，只有 19% 拥有 STEM 学位，而 48% 的中国毕业生拥有 STEM 学位。参加 PISA 考试的智利学生的数学平均成绩（423 分，PISA 2012 年报告）低于中国（550 分）和 OECD 的平均水平（494 分）。

中智关系进展

2006 年，智利成为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第一个拉美国家。此后，中智两国继续进行贸易谈判，两国在 2008 年签署商业服务附加条款（自 2010 年起生效），并在 2012 年签署另一个关于投资的附加条款（从 2014 年起生效）。自 2015 年 1 月起，7336 类 97% 的智利货物能零关税进入中国市场。从那以后，中智谈判主要集中在扩展现有的协议上。

智利正在与中国香港谈判新的投资协议。2015 年初，开展了第一轮谈判，在 2006 年举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时，双方就决定开展此类谈判，根据国际惯例的最低待遇进行，避免投资者歧视，对征收设置条件和要求，并建立补偿机制（CIEChile，2015）。智利和中国之间的金融关系有着悠久的历史，1994 年 3 月，两国就签署了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CIEChile，2015）。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比双边贸易额少。2014 年，中国在智利的投资总额为 1.03 亿美元，而同期双边贸易额超过 330 亿美元。因此，智利外国投资委员会正在积极吸引中国投资（CIEChile，2014）。

智利和中国将继续通过一系列的培训和合作协议，加强两国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合作关系。在 2013 年 12 月，智利科技研究委员会（CONICYT）和中国科技部通过了 2014 ~ 2016 年中智科学技术合作计划。该计划作为多项活动的平台，推动创新和人力资本培养，推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特别是在天文学、材料科学、可再生能源、电力工程和地震学领域（CONICYT，2015）。



参考文献

CIEChile (2015), “Chile and Hong Kong launch negotiations for Investment Agreement”, Comité de Inversiones Extranjeras (Foreign Investment Committee), Santiago de Chile, www.ciechile.gob.cl/en/espanol-chile-y-hongkong-inician-negociaciones-para-acuerdo-sobre-inversiones/.

CIEChile (2014), “Chinese province of Hubei seeks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in Chile”, Comité de Inversiones Extranjeras (Foreign Investment Committee), Santiago de Chile, www.ciechile.gob.cl/en/chinese-province-of-hubei-seeks-investment-opportunities-in-chile/.

CONICYT (2015), “CAS y CONICYT firmaron MOU para estrechar cooperación científica entre China y Chile” (CAS and CONICYT signed MOU to strengthen scientific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Chile), Comisión Nacional de Investigación Científica y Tecnológica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ical Research), Santiago de Chile, <http://www.conicyt.cl/pci/2015/09/16/cas-y-conicyt-firmaron-mou-para-estrechar-cooperacion-cientifica-entre-china-y-chile/>.

ECLAC (2013), *Chine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ECLAC, United Nations, Santiago, Chile.

ILO (2015), “ILO Key Indicators of the Labour Market (KILM)” (dataset), www.ilo.org/empelm/what/WCMS_114240/lang-en/index.htm (accessed July 2015).

OECD (2015), *A Diagnostic of Chile's Engagement in Global Value Chains*, OECD, Paris, forthcoming.

OECD (2012) “PISA 2012 Results: What students know and can do” (dataset), www.oecd.org/pisa/keyfindings/pisa-2012-results.htm (accessed July 2015).

OECD/WTO (2015), *Trade in Value-Added (TiVA)* (database), June 2015, <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queryid=66237> (accessed July 2015).

The Inter-American Dialogue (2014), “China-Latin America Finance Database” (dataset), www.thedialogue.org/map_list/ (accessed July 2015).

UNESCO (2015), 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 (UIS) Education Database (dataset), www.uis.unesco.org/datacentre/pages/default.aspx (accessed July 2015).

United Nations (2015), United Nations Commodity Trade Statistics Database (Comtrade), <http://comtrade.un.org/db/default.aspx> (accessed July 2015).

World Bank (2015a) World Bank Edstats: Education Statistics (dataset), <http://datatopics.worldbank.org/education/> (accessed July 2015).

World Bank (2015b), *Enterprise Surveys-What Businesses Experience* (datasets),

www. enterprisesurveys. org/ (accessed July 2015).

World Bank (2015c), “International Debt Statistics”, World Bank International Debt Statistics (dataset), [http://data.worldbank.org/news/International – Debt – Statistics – 2015 – now](http://data.worldbank.org/news/International-Debt-Statistics-2015-now) – available (accessed oJuly 2015).

智利主要指标

贸易 ⁱ	2001 年	2005 年	2007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对中国出口(占总出口百分比)	6%	12%	15%	23%	25%	25%
从中国进口(占总进口百分比)	6%	10%	13%	18%	20%	21%
2014 年向中国出口的五种主要产品(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值占总出口值的百分比)	铜精矿 (38%)	铜矿 (35%)	没有精 炼的铜 (9%)	木浆 (3%)	铁矿 (5%)	
各行业的附加值构成 ⁱⁱ	农业	矿业	低和中低科技	中高和高科技	服务业	
各行业对中国出口,2011	2%	19%	60%	1%	18%	
各行业从中国进口,2011	0	8%	14%	31%	47%	
服务行业出口,2011	传统	信息和 研发	金融	其他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 ⁱⁱ	智利		拉美与加勒比		欧盟	
	2000 年	2011 年	2000 年	2011 年	2000 年	2011 年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总体参与度	44%	52%	39%	41%	45%	51%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向联系	23%	32%	14%	21%	20%	22%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后向联系	22%	20%	25%	20%	24%	29%
在中国的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	2000 年	2011 年				
在中国的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向联系(占全球价值链的百分比)	12%	29%				
在中国的全球价值链中的后向联系(占全球价值链的百分比)	1%	6%				
部门构成 ⁱⁱ	农业	矿业	低和中低科技	中高和高科技	服务业	
与中国的前向联系,2011	1%	14%	58%	1%	24%	
与中国的后向联系,2011	3%	7%	71%	6%	12%	
人力资本和竞争力 [*]	智利		中国	OECD	拉美与加勒比	
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占2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 ⁱⁱⁱ	16%		9%	28%	14%	
具有初中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占2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 ⁱⁱⁱ	35%		14%	35%	23%	
受教育平均年限	9.78 年		7.30 年	11.39 年	8.29 年	



续表

	理工科		文史哲		理工科		文史哲		理工科		文史哲	
毕业生的专业比例(占大专以上学历的毕业生的百分比) ^{iv}	19%		49%		48%		24%		22%		56%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就业人口占总人数比例 ^v	10%	23%	66%	35%	30%	36%	5%	23%	71%	16%	21%	63%
声称难以找到适合的员工的企业的比例 ^{vi}	41%			2%			17%			36%		
PISA 考试中数学成绩,2012 年 ^{vii**}	423 分			550 分			494 分			397 分		
融资和外国直接投资	双边贷款			债券			银行贷款			多边贷款		
占中国对拉美贷款的百分比, 2005 ~ 2014 年 ^{ix}	0.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2010 ~ 2012 年平均值(百万美元) ^x	40.5											

资料来源：i) 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 (Comtrade)；ii) OECD/WTO 贸易附加值数据；iii)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司；iv) 世界银行教育统计数据库 (World Bank, 2015a)；v) 国际劳工组织劳动力市场关键指标；vi) 世界银行, 企业调查 (World Bank, 2015b)；vii) OECD 拉丁美洲 2012 年 PISA 成绩和中国 2009 年 PISA 成绩；viii) 世界银行国际债务统计 (World Bank, 2015c)；ix) 美洲对话组织；x) 联合国拉美经委会 (2013)。

* 2011 年前后的数据，见方法论附录。

** 中国是 2009 年的数据，见方法论附录。

哥伦比亚

最近趋势

哥伦比亚第一大贸易伙伴是美国。中国则是哥伦比亚的第二大贸易伙伴。2014年，哥伦比亚对中国出口占总出口的11%。用附加值方法计算，哥伦比亚对中国出口的产品主要是矿产（57%）、低科技和中高科技产品（26%），服务贸易占比为17%，主要是传统服务业。2014年，哥伦比亚进口货物和服务的19%来自中国。用附加值方法计算，哥伦比亚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大多数是中低科技产品（30%）和高科技产品（52%），其加起来超过进口产品的3/4。

哥伦比亚在全球价值链（GVC）中位于拉丁美洲平均水平之下，比欧盟则低更多。哥伦比亚在价值链中的后向联系水平（净出口额的8%）是拉美最低的六个国家（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之一。总的来说，像哥伦比亚这样专注于矿产行业的国家在价值链中的后向联系水平较低，因为这些行业无须供应很多国外中间投入品，但是与其他也致力于矿产的国家如智利相比，哥伦比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更低。哥伦比亚与中国的后向价值链集中在中高和高科技行业（2011年，占后向价值链的30%）。此外，哥伦比亚前向价值链水平（30%）高于拉美其他五个国家，哥伦比亚与中国的前向价值链集中在矿业部门（2011年，占后向价值链的61%）。

哥伦比亚和中国之间的金融关系和中国对哥伦比亚的直接投资正得到改善。最近几年，中国已成为拉美国家双边贷款的重要主体，但是只有1%的贷款流向哥伦比亚。中国对拉美的贷款集中在阿根廷、巴西、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91%），同时，2012年中国对哥伦比亚的外国直接投资（9.96亿美元）也低于拉美其他国家。

关于人口竞争力，与中国相比，哥伦比亚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



口比例较高，但是 45% 的哥伦比亚公司声称无法找到具有相应竞争力的人才。哥伦比亚总人口的约 22% 已完成高等教育，超过中国（9%）和拉丁美洲平均水平（14%），但是略低于 OECD 平均水平（28%）。另一个指标是 OECD 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对 15 岁的学生进行的数学、科学和阅读能力的评估。参加 PISA 考试的哥伦比亚学生的数学平均成绩（376 分，PISA 2012 年报告）低于中国（550 分）和 OECD 的平均水平（494 分）。另外，声称很难找到适合的员工的哥伦比亚公司数量远远高于拉美平均水平（36%）、中国（2%）和 OECD 国家平均水平（14%）。

中哥关系进展

自 21 世纪初起，中国和哥伦比亚之间的经贸关系稳步增强。在过去的 15 年中，双边贸易额增长每年达到 28.9%。2014 年双边贸易额达 175 亿美元。中国是哥伦比亚第二大贸易伙伴，但哥伦比亚是中国在拉美的第五大贸易伙伴。2013 年，中国和哥伦比亚签署了双边投资条约，2015 年中国和哥伦比亚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共同研究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行性，中哥关系又前进了一步（哥伦比亚总统办公室，2015）。

未来几年中国在哥伦比亚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将增长。2015 年，两国签署了包括两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合作协议，一个项目是在布埃纳文图拉港口城市建造工业园，由中国融资 30 亿美元，另一个项目是在奥里诺科区域，中国将投资修建从奥里诺科到太平洋海岸的公路，另外，还将进一步探索新的农业合作机会。该项目还将把 Meta 河建设成通航河流（上述公路沿着该河流建设）以刺激农业发展（哥伦比亚总统办公室，2015）。

中哥两国在关键经济领域的合作不断扩大。2012 年中国和哥伦比亚签署了九项协议，推动农业、经贸、水利、能源、质检和矿业等领域的合作。2015 年 5 月，两国签署协议，给予哥伦比亚学生 200 个到中国学习的奖学金名额，并制定布埃纳文图拉市的发展规划。

参考文献

ECLAC (2013), *Chine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ECLAC, United Nations, Santiago, Chile.

ILO (2015), “ILO Key Indicators of the Labour Market (KILM) (dataset)”, www.ilo.org/empelm/what/WCMS_114240/lang-en/index.htm (accessed July 2015).

OECD (2012) “PISA 2012 Results: What students know and can do” (dataset), www.oecd.org/pisa/keyfindings/pisa-2012-results.htm (accessed July 2015).

OECD/WTO (2015), Trade in Value-Added (TiVA) (database), June 2015, <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queryid=66237> (accessed July 2015).

Presidency of Colombia (2015a), “China anuncia que se iniciará estudio de factibilidad para la firma de un Tratado de Libre Comercio con Colombia” (China announces it will start a feasibility study for a freetrade agreement with Colombia), Bogotá, http://wp.presidencia.gov.co/Noticias/2015/Mayo/Paginas/20150521_14-Declaracion-Conjunta-entre-el-Gobierno-de-la-Republica-Popular-China-y-el-Gobierno-de-la-Republica-de-Colombia.aspx.

Presidency of Colombia (2015b), “Declaración Conjunta entre el Gobierno de la República Popular China y el Gobierno de la República de Colombia” (Joint Stat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Government of Colombia), Bogotá, http://wp.presidencia.gov.co/Noticias/2015/Mayo/Paginas/20150521_14-Declaracion-Conjunta-entre-el-Gobierno-de-la-Republica-Popular-China-y-el-Gobierno-de-la-Republica-de-Colombia.aspx.

The Inter-American Dialogue (2014), China – Latin America Finance Database (dataset), www.thedialogue.org/map_list/ (accessed July 2015).

UNESCO (2015), 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 Education (UIS) Database (dataset), www.uis.unesco.org/datacentre/pages/default.aspx (accessed July 2015).

United Nations (2015), United Nations Commodity Trade Statistics Database (Comtrade), <http://comtrade.un.org/db/default.aspx> (accessed July 2015).

World Bank (2015a) World Bank Edstats: Education Statistics (dataset), <http://datatopics.worldbank.org/education/> (accessed July 2015).

World Bank (2015b), Enterprise Surveys – What Businesses Experience (datasets), www.enterprisesurveys.org/ (accessed July 2015).

World Bank (2015c), “International Debt Statistics”, World Bank International Debt



拉丁美洲经济展望 (2016) : 发展与中国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

Statistics (dataset), <http://data.worldbank.org/news/International-Debt-Statistics-2015-now-available> (accessed July 2015).

哥伦比亚主要指标

贸易 ⁱ	2001年	2005年	2007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对中国出口(占总出口百分比)	0%	1%	3%	6%	9%	11%		
从中国进口(占总进口百分比)	4%	8%	10%	17%	18%	19%		
2014年向中国出口的五种主要产品(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值占总出口值的百分比)	原油产品 (84%)	铁合金 (6%)	废铜 (5%)	煤块 (1%)	铝废料 (1%)			
各行业的附加值构成 ⁱⁱ	农业	矿业	低和中低科技	中高和高科技	服务			
各行业对中国出口,2011年	0%	57%	26%	1%	17%			
各行业从中国进口,2011年	0%	0%	30%	52%	18%			
服务行业出口,2011年	传统	信息和 研发	金融	其他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 ⁱⁱ	哥伦比亚		拉美与加勒比		欧盟			
	2000年	2011年	2000年	2011年	2000年	2011年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总体参与度	30%	38%	39%	41%	45%	51%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向联系	20%	30%	14%	21%	20%	22%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后向联系	9%	8%	25%	20%	24%	29%		
在中国的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	2000年	2011年						
在中国的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向联系(占全球价值链的百分比)	2%	9%						
在中国的全球价值链中的后向联系(占全球价值链的百分比)	1%	9%						
部门构成 ^{ii**}	农业	矿业	低和中低科技	中高和高科技	服务			
与中国的前向联系,2011	1%	61%	14%	1%	22%			
与中国的后向联系,2011	5%	9%	39%	30%	17%			
人力资本和竞争力 [*]	哥伦比亚		中国		OECD		拉美与加勒比	
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占2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 ⁱⁱⁱ	22%		9%		28%		14%	
具有初中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占2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 ⁱⁱⁱ	22%		14%		35%		23%	
受教育平均年限	7.06年		7.30年		11.39年		8.29年	
	理工科	文史哲	理工科	文史哲	理工科	文史哲	理工科	文史哲
毕业生的专业比例(占大专以上学历的毕业生的百分比) ^{iv}	21%	63%	48%	24%	22%	56%	17%	63%

续表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就业人口占总人数比例 ^v	17%	21%	62%	35%	30%	36%	5%	23%	71%	14%	21%	65%
声称难以找到适合的员工的企业的比例 ^{vi}	45%		2%			17%			36%			
PISA 考试中数学成绩,2012 年 ^{vii**}	376 分			550 分			494 分			397 分		
融资和外国直接投资	双边贷款			债券			银行贷款			多边贷款		
国际金融市场融资(存量的占比),最近可获得数据的年份 ^{viii}	8%			52%			7%			33%		
占中国对拉美贷款的百分比,2005~2014 年 ^{ix}	0.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2010~2012 年平均值(百万美元) ^x	431.7											

资料来源: i) 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 (Comtrade); ii) OECD/WTO 贸易附加值数据; iii)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司; iv) 世界银行教育统计数据库 (World Bank, 2015a); v) 国际劳工组织劳动力市场关键指标; vi) 世界银行, 企业调查 (World Bank, 2015b); vii) OECD 拉丁美洲 2012 年 PISA 成绩和中国 2009 年 PISA 成绩; viii) 世界银行国际债务统计 (World Bank, 2015c); ix) 美洲对话组织; x) 联合国拉美经委会 (2013)。

* 2011 年前后的数据, 见方法论附录。

** 中国是 2009 年的数据, 见方法论附录。



哥斯达黎加

最近趋势

中国是哥斯达黎加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主要向中国出口微电子电路产品。2013年，哥斯达黎加对中国出口占总出口的3%，进口总额的10%来自中国，中国是哥斯达黎加第二大进口国。用附加值方法计算，哥斯达黎加对中国的出口超过85%都是中高和高科技产品（特别是集成电路），其次是服务（14%）。同样，从中国进口的附加值产品主要是中高和高科技产品（53%）。

哥斯达黎加在全球价值链（GVC）中位于拉丁美洲平均水平之上、欧盟之下。哥斯达黎加这样的国家很少出口原材料，国内市场狭小，制造业一体化程度高，具有较高水平的后向价值链（28%）和较低水平的前向价值链（17%），这就是哥斯达黎加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哥斯达黎加与中国的后向价值链集中在中高和高科技行业（76%）、服务业（10%）。哥斯达黎加在高科技制造业和附属服务业如信息服务和研发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在哥斯达黎加的出口构成中有所体现。

中国与哥斯达黎加的金融关系一般。只有不到1%的中国对拉美贷款流向哥斯达黎加。中国对拉美的贷款集中在阿根廷、巴西、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91%），对哥斯达黎加的贷款主要用于购买国家债券（75%）和公共交通工具（35%）。

关于人口竞争力，与中国相比，哥斯达黎加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较高，但是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专业的人才比例较低。哥斯达黎加总人口的约21%完成高等教育，超过中国（9%）和拉丁美洲平均水平（14%），但是低于OECD平均水平（28%）。哥斯达黎加这些毕业生中，只有12%拥有STEM学位，而48%的中国毕业生拥有STEM学位。参加PISA考试的哥斯达黎加学生的数学平均成绩（407分，PISA 2012年报告）低于中国（550分）和OECD的平均水平（494分）。

中哥关系进展

在过去十年，中哥两国之间外交和贸易关系大大增强，中国已经成为哥斯达黎加一个重要的经济和贸易伙伴。2007年6月，哥斯达黎加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推动双边投资协定谈判。2007年中哥签订双边投资协定，2010年，两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哥斯达黎加和中国继续加强贸易联系。自2011年年中以来，哥斯达黎加向中国出口的产品约99%均免关税进入中国市场（哥斯达黎加外贸部，2011）。此后，两国签订了香蕉、皮革、咖啡和鱼以及其他出口产品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议。最近一项协议在2015年签署，为哥斯达黎加金枪鱼和菠萝的出口打开了大门。

中国政府和哥斯达黎加政府都表示，两国希望推动外交、贸易和经济领域紧密而持久的关系。哥斯达黎加目前的国家发展计划旨在吸引投资，创造新的贸易机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改善基础设施和区域不平衡现象。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哥斯达黎加国家发展计划重视发展国际贸易，更具体地说，是发展中哥贸易，以作为国家发展的可能途径之一。2015年1月，中国和哥斯达黎加政府签署了一项谅解备忘录，为在哥斯达黎加建立一个经济特区进行联合可行性研究（哥斯达黎加外贸部，2015）。这项研究将由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商务部）和哥斯达黎加投资合作司（外贸部）共同完成，并会得到国家规划和经济政策部（MIDEPLAN）和一个国际专家团队的密切合作和协调。他们的研究成果将提供关于经济特区的地理位置和业务指导等信息，包括对市场、环境以及经济和金融政策的分析（美洲开发银行，2015）。

中国近年也成为哥斯达黎加基础设施融资的战略合作伙伴。2014年，哥斯达黎加国会批准了由美洲开发银行提供的4.5亿美元贷款，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美洲开发银行，2014），其中5000万美元是由美洲开发银行管理的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联合融资基金提供（美洲开发银行，2014）。此外，2015年，哥斯达黎加国会批准了由中国提供的4.85亿美元贷款，用于



连接中央山谷与加勒比沿岸的主要公路的扩建 (立法大会, 2015)。

此外, 两国科技部的负责人最近重申了两国对在科学技术和研究合作方面的承诺, 对 2007 年签署的合作协议进行了更新。新的协议显示, 人力资本的发展是合作的关键, 两国将扩大科学家和大学生交流项目。在此框架下, 两国的学术和科研机构签署了二十余项交流协议 (MICITT, 2011)。

参考文献

Asamblea Legislativa (2015), “Aprueban ampliación de ruta 32” (Rout 32 extension approved), Asamblea Legislativa (Congress of Costa Rica), San José de Costa Rica, www.asamblea.go.cr/Lists/Noticias/DispForm.aspx?ID=5540.

ECLAC (2013), *Chine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ECLAC, United Nations, Santiago, Chile.

IDB (2015), “Costa Rica firma acuerdo con China para crear una Zona Económica Especial” (Costa Rica signs agreement with China to create a Special Economic Zone),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Washington, DC, www10.iadb.org/intal/cartamensual/Cartas/HTMLPrintArticulo.aspx?Id=eac80761-2511-442d-92e5-15d7371e48ed.

IDB (2014), “Costa Rica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Program (PIT)”,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Washington, DC, <http://idbdocs.iadb.org/wsdocs/getdocument.aspx?docnum=38203765> published 2014.

ILO (2015), “ILO Key Indicators of the Labour Market (KILM)” (dataset), www.ilo.org/empelm/what/WCMS_114240/lang-en/index.htm (accessed July 2015).

MICITT (2011), “China y Costa Rica estarán más unidas por la ciencia y la tecnología” (“China and Costa Ricawill be more united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nisterio de Ciencia Tecnología y Telecomunicaciones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an José, https://micit.go.cr/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313:china-y-costa-rica-estaran-mas-unidas-por-la-ciencia-y-la-tecnologia&catid=40&Itemid=630.

Minister of Foreign Trade (2015), “Costa Rica y China fomentan crear Zona Económica Especial” (“Costa Ricaand China to create Special Economic Zone”), San José, www.comex.go.cr/sala_prensa/comunicados/2015/enero/CP-1839.aspx.

Minister of Foreign Trade (2011), “Aprobado TLC con China” (“FTA with China Approved”), San José, www.comex.go.cr/sala_prensa/comunicados/2011/mayo/00_cp-1282.aspx.

OECD (2012) “PISA 2012 Results: What students know and can do” (dataset), www.oecd.org/pisa/keyfindings/pisa-2012-results.htm (accessed July 2015).

OECD/WTO (2015), Trade in Value-Added (TiVA) (database), June 2015, <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queryid=66237> (accessed July 2015).

The Inter-American Dialogue (2014), “China-Latin America Finance Database” (dataset), www.thedialogue.org/map_list/ (accessed July 2015).

UNESCO (2015), 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 (UIS) Education Database (dataset), www.uis.unesco.org/datacentre/pages/default.aspx (accessed July 2015).

United Nations (2015), United Nations Commodity Trade Statistics Database (Comtrade), <http://comtrade.un.org/db/default.aspx> (accessed July 2015) <http://comtrade.un.org/db/default.aspx> (accessed July 2015).

World Bank (2015a) World Bank Edstats: Education Statistics (dataset), <http://datatopics.worldbank.org/education/> (accessed July 2015).

World Bank (2015b), Enterprise Surveys – What Businesses Experience (datasets), www.enterprisesurveys.org/ (accessed July 2015).

World Bank (2015c), “International Debt Statistics”, World Bank International Debt Statistics (dataset), <http://data.worldbank.org/news/International-Debt-Statistics-2015-now-available> (accessed July 2015).

哥斯达黎加主要指标

贸易 ⁱ	2001年	2005年	2007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对中国出口(占总出口百分比)	0%	3%	9%	3%	3%	n. a.
从中国进口(占总进口百分比)	2%	4%	6%	8%	10%	n. a.
2014年向中国出口的五种主要产品(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值占总出口值的百分比)	集成电路 (80%)	电子配件 (4%)	牛或马的 生皮和皮 (3%)	废铜和 废料 (2%)	藤条和 甜菜 (1%)	
各行业的附加值构成 ⁱⁱ	农业	矿业	低和中低科技	中高和高科技	服务业	
对中国出口,按部门,2011年	0%	0%	1%	85%	14%	
从中国进口,按部门,2011年	1%	0%	25%	53%	20%	
服务部门出口,按行业,2011年	传统	信息和 研发	金融	其他		
全球价值链中参与度 ⁱⁱⁱ	哥斯达黎加		拉美与加勒比		欧盟	
	2000年	2011年	2000年	2011年	2000年	2011年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总体参与度	40%	45%	39%	41%	45%	51%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向联系	13%	17%	14%	21%	20%	22%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后向联系	26%	28%	25%	20%	24%	29%



续表

在中国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 ⁱⁱ	2000年	2011年											
在中国的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向联系(占全球价值链的百分比)	2%	23%											
在中国的全球价值链中的后向联系(占全球价值链的百分比)	1%	6%											
部门构成 ⁱⁱ	农业	矿业	低和中低科技	中和高高科技	服务业								
与中国的前向联系,2011年	1%	0%	8%	33%	55%								
与中国的后向联系,2011年	5%	0%	9%	76%	10%								
人力资本和竞争力*	哥斯达黎加		中国		OECD		拉美与加勒比						
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占2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 ⁱⁱⁱ	21%		9%		28%		14%						
具有初中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占2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 ⁱⁱⁱ	16%		14%		35%		23%						
受教育平均年限 ⁱⁱⁱ	8.36年		7.30年		11.39年		8.29年						
	理工科	文史哲	理工科	文史哲	理工科	文史哲	理工科	文史哲	理工科	文史哲			
毕业生的专业比例(占大专以上学历的毕业生的百分比) ^{iv}	12%	69%	48%	24%	22%	56%	17%	63%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就业人口占总人数比例 ^v	13%	20%	67%	35%	30%	36%	5%	23%	71%	14%	21%	65%	
声称难以找到适合的员工的企业的比例 ^{vi}	38%			2%			17%			36%			
PISA 考试中数学成绩,2012年 ^{**vii}	407分			550分			494分			397分			
融资和外国直接投资	双边贷款			债券			银行贷款			多边贷款			
国际金融市场融资(存量的占比),最近可获得数据的年份 ^{viii}	4%			70%			4%			22%			
占中国对拉美贷款的百分比,2005~2014年 ^{ix}	0.3%												

资料来源：i) 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 (Comtrade)；ii) OECD/WTO 贸易附加值数据；iii)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司；iv) 世界银行教育统计数据库 (World Bank, 2015a)；v) 国际劳工组织劳动力市场关键指标；vi) 世界银行, 企业调查 (World Bank, 2015b)；vii) OECD 拉丁美洲 2012 年 PISA 成绩和中国 2009 年 PISA 成绩；viii) 世界银行国际债务统计 (World Bank, 2015c)；ix) 美洲对话组织；x) 联合国拉美经委会 (2013)。

* 2011 年前后的数据, 见方法论附录。

** 中国是 2009 年的数据, 见方法论附录。

多米尼加共和国

最近趋势

中国与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经贸关系刚刚起步，但是前景光明。2014年，多米尼加共和国对中国出口占货物总出口的2%，主要出口初级产品。铜矿占对中国出口额的32%，其次是铁合金（25%）、铜废料（12%）、医疗器械（7%）和铁废料（4%）。中国是多米尼加共和国第二大出口市场，位于美国之后，多米尼加共和国进口额的12%来自中国。

与其他拉美国家不同，多米尼加共和国没有获得来自中国的重大投资。虽然中国已经成为拉美重要的贷款方，但是中国对拉美的贷款集中在阿根廷、巴西、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91%）。多米尼加共和国没有从中国对拉美日益增加的贷款中受益。

关于人口竞争力，与中国相比，多米尼加共和国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较高，大部分劳动力集中在服务部门。多米尼加共和国总人口的约11%完成高等教育，超过中国（9%），但是低于拉丁美洲平均水平（14%）和OECD平均水平（28%）。多米尼加共和国居民受教育的平均年限的是7.5年，与中国相当（7.3年），但是低于拉美平均水平（8.3年）和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11.4年）。超过68%的劳动力在服务部门就业，略高于拉美平均水平（65%）和中国（36%），但是低于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71%）。

中国与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关系进展

中国与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经贸关系和合作刚刚起步。虽然中国与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贸易和外交联系始于20世纪90年代，但是，两国关系由于多米尼加共和国与中国台湾建交而中断。然而，2000~2010年这十年间，中国与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关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多米尼加共和国驻北京贸易发展办事处以及中国驻圣多明各市的贸易发展办事处的成立促进了双边经贸往



来和文化交流。随着两国之间的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两国外交关系也得到改善。最近,在世贸组织的谈判中,中国和多米尼加共和国持共同的提案,特别是在服务贸易的模式四“自然人流动”方面。

虽然两国外交关系复杂,但是中国和多米尼加共和国之间贸易往来增加了。虽然两国之间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或投资条约还没有取得进展,但是两国之间交易的产品种类越来越广。中国已表示有兴趣进口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烟草、鳄梨和可可,以及增加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投资,具体来说,是在能源和渔业领域进行投资。因此,在未来,中国和多米尼加共和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都将不断增加。

多米尼加共和国驻北京贸易发展办事处管理中国和多米尼加共和国之间现有的几个合作协议,比如与圣多明各理工学院 (INTEC) 签署的合作项目协议,该项目从 2008 年起为圣多明各理工学院的学生到中国学习硕士课程提供奖学金 (INTEC, 2015)。尽管两国间的合作至今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但是未来的发展前景是光明的。

参考文献

ILO (2015), “ILO Key Indicators of the Labour Market (KILM)” (dataset), www.ilo.org/empelm/what/WCMS_114240/lang-en/index.htm (accessed July 2015).

INTEC (2015), Instituto Tecnológico de Santo Domingo Technological (Institute of Santo Domingo), “Seis becarios del INTEC estudiarán maestrías en China” (“Six fellows of INTEC will study Masters in China”), www.intec.edu.do/noticias-y-actividades/noticias/item/seis-becarios-del-intec-estudiaran-maestrias-en-china.

OECD/WTO (2015), Trade in Value-Added (TiVA) (database), June 2015, <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queryid=66237> (accessed July 2015).

The Inter-American Dialogue (2014), “China-Latin America Finance Database” (dataset), www.thedialogue.org/map_list/ (accessed July 2015).

UNESCO (2015), 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 (UIS) Education Database (dataset), www.uis.unesco.org/datacentre/pages/default.aspx (accessed July 2015).

United Nations (2015), United Nations Commodity Trade Statistics Database

(Comtrade), <http://comtrade.un.org/db/default.aspx> (accessed July 2015).

World Bank (2015a), Enterprise Surveys – What Businesses Experience (datasets), www.enterprisesurveys.org/ (accessed July 2015).

World Bank (2015b), “International Debt Statistics”, World Bank International Debt Statistics (dataset), <http://data.worldbank.org/news/International-Debt-Statistics-2015-now> – available (accessed July 2015).

多米尼加共和国主要指标

贸易 ⁱ	2001年	2005年	2007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对中国出口(占总出口百分比)	0%	1%	4%	5%	3%	2%
从中国进口(占总进口百分比)	1%	5%	9%	10%	10%	12%
2014年向中国出口的五种主要产品(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值占总出口值的百分比)	铜矿 (32%)	铁合金 (25%)	废铜 (12%)	医疗科学 领域的设备 (7%)	废铁 (4%)	
行业构成 ⁱⁱ	农业	矿业	低和中低科技	中和高科技	服务业	
对中国出口,按部门,2011年	1%	62%	2%	35%	1%	
从中国进口,按部门,2011年	3%	8%	34%	27%	28%	
人力资本和竞争力 [*]	多米尼加共和国		中国	OECD	拉美与加勒比	
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 (占2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 ⁱⁱⁱ	11%		9%	28%	14%	
具有初中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 (占2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 ⁱⁱⁱ	23%		14%	35%	23%	
受教育平均年限 ⁱⁱⁱ	7.46年		7.30年	11.39年	8.29年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就业人口占总人数比例 ^{iv}	15%	18%	68%	35%	30%	36%
声称难以找到适合的员工的企业的比例 ^v	36%		2%	17%		36%
融资和外国直接投资	双边贷款		债券	银行贷款		多边贷款
国际金融市场融资(存量的占比),最近可获得数据的年份 ^{vi}	9%		63%	0%		28%
占中国对拉美贷款的百分比,2005~2014年 ^{vii}	0%					

资料来源: i) 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Comtrade); ii) OECD/WTO 贸易附加值数据; iii)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司; iv) 国际劳工组织劳动力市场关键指标; v) 世界银行, 企业调查(World Bank, 2015b); vi) 世界银行国际债务统计(World Bank, 2015c); vii) 美洲对话组织。

* 2011年前后的数据, 见方法论附录。



墨西哥

最近趋势

中国是墨西哥的第四大贸易伙伴，由于墨西哥与美国、加拿大签订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墨西哥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潜能没有发挥到极致。2014年，墨西哥对中国出口占总出口的2%，进口额的17%来自中国，用附加值方法计算，墨西哥对中国出口的产品主要是中高科技和高科技产品（40%）以及矿产（30%）。用附加值方法计算，大多数从中国进口的产品是中高和高科技产品（67%）。墨西哥从中国进口的75%的产品是中间投入品，11%是资本品。

墨西哥在全球价值链（GVC）中位于拉丁美洲平均水平之上、欧盟之下，后向价值链水平较高，而前向价值链水平较低。墨西哥的前向价值链水平较低（15%）是因为墨西哥的制造业一体化程度较高。但是墨西哥具有较高水平的后向价值链（32%）。墨西哥与中国的前向价值链主要集中在矿业（35%）、低和中低科技行业（14%）、中高和高科技行业（14%）以及服务业（34%）。墨西哥与中国的后向价值链主要集中在中高和高科技行业（89%）。

中国与墨西哥的金融关系取得了进展。虽然中国已经成为拉美重要的贷款方，但是中国对拉美的贷款集中在阿根廷、巴西、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91%），只有不到2%的中国对拉美贷款流向墨西哥。大约58%的中国贷款用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关于人口竞争力，与中国相比，墨西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较高，但是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专业的人才比例较低。墨西哥总人口的约15%完成高等教育，超过中国（9%）和拉丁美洲平均水平（14%），但是低于OECD平均水平（28%）。这些墨西哥毕业生中，只有27%拥有STEM学位，而48%的中国毕业生拥有STEM学位。参加PISA考

试的墨西哥学生的数学平均成绩（413分，PISA 2012年报告）低于中国（550分）和OECD的平均水平（494分）。

中墨关系进展

在过去的十五年里，中国和墨西哥之间的经济关系经历了不同阶段。一开始，两国的经贸关系的主要特征是竞争，因为两国的出口结构具有相似性，尤其是在电子、汽车部件、电子元器件、汽车和燃料等行业。2011年12月，墨西哥自2001年以来对中国产品强加反倾销税的期限到期，墨西哥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埃尔南德斯，2012），这推动两国为改善双边贸易关系而努力。

自2013年起，中国和墨西哥加强了金融联系。2013年，两国同意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这个制度框架下，解决双边经济利益问题，加强两国合作（墨西哥外交部，2014）。从那时起，两国已经举行了数次谈判，以确保墨西哥产品如鳄梨、猪肉、覆盆子、白玉米、浆果、乳制品、牛肉和龙舌兰酒可以进入中国市场。此外，中国和墨西哥在2014年签订了14个双边协议，金额达到74亿美元，包括成立一个规模为24亿美元的两国基金，用于两国企业在能源、矿业、高新技术制造业、旅游和农产品（牛肉、黑莓和覆盆子）出口中的投资以及联合科研。此外，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Pemex）和三家中国国有企业还共同成立了中墨能源基金，对能源基础设施、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及生产进行投资（墨西哥经济部，2014）。2015年以来，墨西哥能源改革之后，在1938年国有化后，墨西哥第一次允许外国直接投资进入能源领域，这为中国公司在该领域的参与打开大门。

墨西哥和中国已经设计了一个制度框架，建立解决关乎双边经济问题的常设对话机制。自2013年起，每年两国都举行会议。这些机制包括：中墨高层工作组（GAN），负责促进贸易和投资、产业合作和矿业合作；中墨企业家高级别工作组（GANE），为促进贸易和投资提供对话平台，私营部门参与其中；墨中高级投资工作组（GANI），制定双边投资工具。

尽管与拉美其他经济体相比，中国对墨西哥的外国直接投资较少，但是



中国对墨西哥制造业的投资不断扩大。多家中国企业已经投资墨西哥的家电、电子、汽车零部件和工业设备公司。2013年，中国的敏实集团在阿瓜斯卡连特斯追加了其在汽车零部件行业的投资。此外，2015年，海信宣布收购墨西哥夏普电视厂的资产，而德昌电机则宣布将在萨卡特卡斯开设第二家工厂。

中国和墨西哥都是亚太经合组织（APEC）成员。亚太经合组织成立于1989年，由21个经济体组成。亚太经合组织有三大支柱：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商务便利化和经济技术合作（APEC，2015）。由于墨西哥与世界大型经济体（包括中国）之间的贸易壁垒和障碍日益减少，墨西哥从中受益不少。

参考文献

APEC (2015),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www.apec.org (accessed 1 October 2015).

ECLAC (2013), *Chine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ECLAC, United Nations, Santiago, Chile.

Hernández, Hernández, R. (2012),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and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Mexico and China”, GIGA German Institute of Global and Area Studies, Germany; 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NICS) of the White Rose East Asia Centre (WREAC), United Kingdom, <<http://journals.sub.uni-hamburg.de/giga/jeca/article/view/495>>.

ILO (2015), “ILO Key Indicators of the Labour Market (KILM)” (dataset), www.ilo.org/empelm/what/WCMS_114240/lang-en/index.htm (accessed July 2015).

Ministry of Economy of Mexico (2014), “México y China firman 14 acuerdos bilaterales” (Mexico and China signed 14 bilateral agreements), Mexico D.F., www.economia.gob.mx/ eventos-noticias/informacionrelevante/10781-pie14-11-13.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Mexico (2014), “Programa de acción entre los Estados Unidos Mexicanos y la República Popular China para impulsar la asociación estratégica integral” (“Action Programme between Mexico and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promote 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Mexico D.F., <http://saladeprensa.sre.gob.mx/images/stories/pdf/mexicoenchina>.

OECD (2012) “PISA 2012 Results: What students know and can do”, (dataset),

www.oecd.org/pisa/keyfindings/pisa-2012-results.htm (accessed July 2015).

OECD/WTO (2015), Trade in Value-Added (TiVA) (database), June 2015, <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queryid=66237> (accessed July 2015).

The Inter-American Dialogue (2014), “China-Latin America Finance Database” (dataset), www.thedialogue.org/map_list/ (accessed July 2015).

UNESCO (2015), 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 (UIS) Education Database (dataset), www.uis.unesco.org/datacentre/pages/default.aspx (accessed July 2015).

United Nations (2015), United Nations Commodity Trade Statistics Database (Comtrade), <http://comtrade.un.org/db/default.aspx> (accessed July 2015).

World Bank (2015a) World Bank Edstats: Education Statistics (dataset), <http://datatopics.worldbank.org/education/> (accessed July 2015).

World Bank (2015b), Enterprise Surveys-What Businesses Experience (datasets), www.enterprisesurveys.org/ (accessed July 2015).

World Bank (2015c), “International Debt Statistics”, World Bank International Debt Statistics (dataset), <http://data.worldbank.org/news/International-Debt-Statistics-2015-now-available> (accessed July 2015).

墨西哥主要指标

贸易 ⁱ	2001年	2005年	2007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对中国出口(占总出口百分比)	0%	1%	1%	2%	2%	2%
从中国进口(占总进口百分比)	2%	8%	11%	15%	16%	17%
2014年向中国出口的五种主要产品(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值占总出口值的百分比)	摩托车 (21%)	铜矿石 (18%)	石油 (10%)	电子配件 (8%)	废铜 (6%)	
各行业的附加值构成 ⁱⁱ	农业	矿业	低和中低科技	中和高科技	服务业	
对中国出口,按部门,2011年	1%	30%	12%	40%	17%	
从中国进口,按部门,2011年	0%	0%	19%	67%	14%	
服务部门出口,按行业,2011年	传统	信息和 研发	金融	其他		
全球价值链中参与度 ⁱⁱⁱ	墨西哥		拉美与加勒比		欧盟	
	2000年	2011年	2000年	2011年	2000年	2011年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总体参与度	45%	47%	39%	41%	45%	51%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向联系	10%	15%	14%	21%	20%	22%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后向联系	34%	32%	25%	20%	24%	29%



续表

在中国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 ⁱⁱ	2000年	2011年											
在中国的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向联系(占全球价值链的百分比)	2%	8%											
在中国的全球价值链中的后向联系(占全球价值链的百分比)	1%	13%											
部门构成 ⁱⁱ	农业	矿业	低和中低科技	中高中高科技	服务业								
与中国的前向联系,2011年	1%	35%	14%	14%	34%								
与中国的后向联系,2011年	0%	1%	9%	89%	1%								
人力资本和竞争力 [*]	墨西哥		中国		OECD		拉美与加勒比						
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占2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 ⁱⁱⁱ	15%		9%		28%		14%						
具有初中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占2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 ⁱⁱⁱ	17%		14%		35%		23%						
受教育平均年限 ⁱⁱⁱ	8.47年		7.30年		11.39年		8.29年						
	理工科	文史哲	理工科	文史哲	理工科	文史哲	理工科	文史哲	理工科	文史哲			
毕业生的专业比例(占大专以上学历的毕业生的百分比) ^{iv}	27%	62%	48%	24%	22%	56%	17%	63%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就业人口占总人数比例 ^v	13%	24%	62%	35%	30%	36%	5%	23%	71%	14%	21%	65%	
声称难以找到适合的员工的企业的比例 ^{vi}	31%		2%		17%		36%						
PISA 考试中数学成绩,2012年 ^{**vii}	413分		550分		494分		397分						
融资和外国直接投资	双边贷款		债券		银行贷款		多边贷款						
国际金融市场融资(存量的占比),最近可获得数据的年份 ^{viii}	2%		74%		12%		12%						
占中国对拉美贷款的百分比,2005~2014年 ^{ix}	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2010~2012年平均值(百万美元) ^x	28.3												

资料来源：i) 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 (Comtrade)；ii) OECD/WTO 贸易附加值数据；iii)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司；iv) 世界银行教育统计数据库 (World Bank, 2015a)；v) 国际劳工组织劳动力市场关键指标；vi) 世界银行，企业调查 (World Bank, 2015b)；vii) OECD 拉丁美洲 2012 年 PISA 成绩和中国 2009 年 PISA 成绩；viii) 世界银行国际债务统计 (World Bank, 2015c)；ix) 美洲对话组织；x) 联合国拉美经委会 (2013)。

* 中国是 2009 年的数据，见方法论附录。

巴拿马

最近趋势

最近几年，中国已经成为巴拿马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巴拿马向中国出口的大部分产品都是初级产品。2014年，巴拿马对中国出口占总出口的9%，中国是巴拿马第三大出口市场。同时，中国是巴拿马第四大进口来源国，巴拿马进口额的8%来自中国。巴拿马出口的产品主要是农产品和矿产，特别是铜废料（占巴拿马对中国出口总额的42%）、面粉、谷类和肉丸（24%）和铝废料（14%）。

中国与巴拿马的金融关系还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但是中国对巴拿马的投资正在增加。最近几年，巴拿马通过发行债券，满足了69%的融资需求，只有2%的融资需求是通过双边贷款解决的。虽然已经成为拉美重要的贷款方，但是中国对拉美的贷款集中在阿根廷、巴西、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91%）。2013年中国对巴拿马的直接投资超过2750万美元，创历史新高。

关于人口竞争力，与中国相比，巴拿马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较高，但是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专业的人才比例较低。巴拿马总人口的约21%完成高等教育，超过中国（9%）和拉丁美洲平均水平（14%），但是低于OECD平均水平（28%）。这些毕业生中，只有22%拥有STEM学位，而48%的中国毕业生拥有STEM学位。

中巴关系进展

由于巴拿马的战略地理位置以及货物运输和食品行业的重要性，中国和巴拿马保持了强劲的贸易关系。2014年，中国是巴拿马运河的第二大用户，仅次于美国，货物运输量占运河运输总量的23.5%。事实上，中国远洋运输公司是巴拿马运河的主要用户之一，是巴拿马运河管理局的顾问委员会的



成员（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03）。此外，自2000年起，香港和记黄埔公司的子公司——巴拿马港口公司就是位于运河的两端的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的管理者。另外，巴拿马科隆自由贸易区是中国对拉丁美洲出口产品的跳板。2014年科隆自由贸易区出口到中国的商品价值37亿美元，占该地区出口总额的30.1%。

最近五年，中国对巴拿马的对外直接投资年平均为1.06亿美元，专注于港口、船只、银行和贸易领域（国家统计局，2013）。在未来几年，总部设在北京的公司中国港湾工程公司将在巴拿马建立区域办事处，目前，它正在评估参与巴拿马运河的多个项目，特别是设计、建造第四道船闸，并进行融资，以便超巴拿马型船可以通行（《迈阿密先驱报》，2014）。

参考文献

ILO (2015), “ILO Key Indicators of the Labour Market (KILM)” (dataset), www.ilo.org/empelm/what/WCMS_114240/lang-en/index.htm (accessed July 2015).

INEC (2013), “Inversión directa extranjera en la república, por país de residencia del inversionista; años 2011 – 13”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republic, by country of residence of the investor; years 2011 – 13), Instituto Nacional de Estadística y Censo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tistics and Census of Panama), PanamaCity, www.contraloria.gob.pa/INEC/archivos/P6391Cuadros%2003.pdf.

Miami Herald (2014), “Panama Canal: Is another expansion in the cards?”, Miami, www.miamiherald.com/news/business/article1979570.html, 12 August.

OECD/WTO (2015), Trade in Value-Added (TiVA) (database), June 2015, <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queryid=66237> (accessed July 2015).

Panama Canal Authority (2003), “Panama Canal Authority appoints six new members to the Advisory Board”, Panama, www.panacanal.com/eng/pr/press-releases/2003/03/05/pr99.html.

The Inter-American Dialogue (2014), China-Latin America Finance Database (dataset), www.thedialogue.org/map_list/ (accessed July 2015).

UNESCO (2015), 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 Education (UIS) Database (dataset),

www.uis.unesco.org/datacentre/pages/default.aspx (accessed July 2015).

United Nations (2015), United Nations Commodity Trade Statistics Database (Comtrade), <http://comtrade.un.org/db/default.aspx> (accessed July 2015).

World Bank (2015a) World Bank Edstats: Education Statistics (dataset), <http://datatopics.worldbank.org/education/> (accessed July 2015).

World Bank (2015b), Enterprise Surveys-What Businesses Experience (datasets), www.enterprisesurveys.org/ (accessed July 2015).

World Bank (2015c), “International Debt Statistics”, World Bank International Debt Statistics (dataset), <http://data.worldbank.org/news/International-Debt-Statistics-2015-now-available> (accessed July 2015).

巴拿马主要指标

贸易 ⁱ	2001年	2005年	2007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对中国出口(占总出口百分比)	0%	1%	6%	4%	6%	9%
从中国进口(占总进口百分比)	1%	2%	20%	8%	10%	8%
2014年向中国出口的五种主要产品(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值占总出口值的百分比)	铜废料(42%)	面粉、谷类和肉丸(24%)	铝废料料(14%)	观赏林木(5%)	牛、马的生皮和皮毛(4%)	
部门构成 ⁱⁱ	农业	矿业	低和中低科技	中高和高科技	服务业	
与中国的前向联系,2011年	25%	70%	4%	0%	0%	
与中国的后向联系,2011年	2%	11%	43%	29%	15%	
人力资本和竞争力 [*]	巴拿马		中国	OECD	拉美与加勒比	
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占2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 ⁱⁱⁱ	21%		9%	28%	14%	
具有初中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占2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 ⁱⁱⁱ	20%		14%	35%	23%	
受教育平均年限 ⁱⁱⁱ	9.35年		7.30年	11.39年	8.29年	
	理工科	文史哲	理工科	文史哲	理工科	文史哲
毕业生的专业比例(占大专以上学历的毕业生的百分比) ^{iv}	22%	66%	48%	24%	22%	56%
	理工科	文史哲	理工科	文史哲	理工科	文史哲
	22%	66%	48%	24%	22%	56%
	17%	63%	17%	63%	17%	63%
	17%	18%	65%	35%	30%	36%
就业人口占总人数比例 ^v	17%	18%	65%	35%	30%	36%
声称难以找到适合的员工的企业的比例 ^{vi}	19%		2%	17%	36%	



续表

融资和外国直接投资	双边贷款	债券	银行贷款	多边贷款
国际金融市场融资（存量的占比），最近可获得数据的年份 ^{vii}	2%	69%	4%	24%
占中国对拉美贷款的百分比，2005~2014年 ^{viii}	0%			

资料来源：i) 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Comtrade）；ii) OECD/WTO 贸易附加值数据；iii)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司；iv) 世界银行教育统计数据库（World Bank, 2015a）；v) 国际劳工组织劳动力市场关键指标；vi) 世界银行，企业调查（World Bank, 2015b）；vii) 世界银行国际债务统计（World Bank, 2015c）；viii) 美洲对话组织。

* 2011 年前后的数据，见方法论附录。

秘 鲁

最近趋势

最近几年，中国已经成为秘鲁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特别是在铜、金等初级产品贸易方面。秘鲁对中国的出口增长迅猛，特别是2000~2007年，增长率达到35%~50%。2014年，秘鲁对中国出口占总出口的18%，中国成为秘鲁第一大出口市场。秘鲁对中国出口的70%是基于自然资源的制造业产品，30%是初级产品。另外，2014年，秘鲁进口产品的21%来自中国，中国是秘鲁第二大进口市场。而92%向中国出口的产品是自然资源以外的制成品。

秘鲁和中国之间保持非常紧密的金融关系。近年来，中国已经成为秘鲁双边贷款的重要贷款方，中国对拉美贷款的2%流向秘鲁（23亿美元）。大部分贷款集中在矿业领域（20亿美元）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1亿美元），包括交通、环境和能源部门。2014年，中国最大的商业银行，也是第一家进入秘鲁金融系统的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在秘鲁开业，提供各种金融产品和服务，包括存款、转账、外贸、融资、保函和贷款业务等。

关于人口竞争力，与中国相比，秘鲁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较高。秘鲁总人口的约21%完成高等教育，超过中国（9%），高于拉丁美洲平均水平（14%），但是低于OECD平均水平（28%）。但是参加PISA考试的秘鲁学生的数学平均成绩较低（368分，PISA 2012年报告），远远低于中国（550分）和OECD的平均水平（494分）。

中秘关系进展

在过去的十年中，秘鲁与大多数亚洲国家都改善了关系，特别是通过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谈判改善双边关系。其中，2009年，秘鲁与中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FTA），于2010年3月1日起生效，该协定不仅让秘鲁产品在



中国市场享受最惠国待遇, 而且加强了秘鲁与世界上最主要的工业投入品供应商的贸易联系, 将秘鲁整合到亚洲需求链中, 使秘鲁成为南美洲的“金融中心”(秘鲁外贸与旅游部, 2015)。三年来, 秘鲁新增了 312 种出口产品 (97% 是非传统产品), 新成立了 468 家出口公司, 中秘贸易翻了一番 (秘鲁外贸和旅游部, 2015)。

此外, 中国和秘鲁都是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的成员, 亚太经合组织成立于 1989 年, 由 21 个经济体组成。亚太经合组织有三大支柱: 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商务便利化和经济技术合作。由于与世界大型经济体 (包括中国) 之间的贸易壁垒和障碍日益减少, 因此秘鲁从中受益不少 (秘鲁外交部, 2015)。

1980 ~ 2014 年, 中国对秘鲁的直接投资占秘鲁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 0.9%。2015 年, 中国、巴西和秘鲁政府宣布将投资 100 亿美元, 建造横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两洋铁路, 以改善南美国家和太平洋沿岸国家之间的连通性, 在太平洋沿岸和大西洋沿岸创造新的贸易机会, 推动南美实现新型工业化。

2015 年, 中国和秘鲁签署了多项协议, 包括水资源和能源管理。秘鲁能源和矿业部与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建立合作机制, 共同开发秘鲁能源领域。另外, 秘鲁农业部水务署和中国长江设计院签署了关于秘鲁南部水资源评估、规划和综合管理的合作协议。

秘鲁与中国的合作始于 1988 年。当时两国签订了促进经济、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基本协定。2005 年, 秘鲁科技创新委员会 (CONCYTEC) 和中国科学院签署了学术合作与交流协议, 鼓励专家合作和交流, 促进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奖学金计划的实施 (秘鲁外交部, 2015)。

参考文献

ILO (2015), “ILO Key Indicators of the Labour Market (KILM)” (dataset), www.ilo.org/empelm/what/WCMS_114240/lang-en/index.htm (accessed July 2015).

Ministry of Foreign Trade and Tourism of Peru (2015), “Tratado de Libre Comercio entre el Perú y China” (“FreeTrade Agreement between Peru and China”), Lima, www.acuerdoscomerciales.gob.p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category&layout=blog&id=42&Itemid=59.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Peru (2015a), “APEC Action Plans”, Lima, www.acuerdoscomerciales.gob.p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category&layout=blog&id=156&Itemid=174.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Peru (2015b), “Relaciones Bilaterales Perú-República Popular China” (BilateralRelations Peru-China), Lima, www.rree.gob.pe/politicaexterior/Paginas/Relaciones-Bilaterales-Peru-Republica-Popular-China.aspx.

OECD (2012) “PISA 2012 Results: What students know and can do” (dataset), www.oecd.org/pisa/keyfindings/pisa-2012-results.htm (accessed July 2015).

OECD/WTO (2015), Trade in Value-Added (TiVA) (database), June 2015, <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queryid=66237> (accessed July 2015).

The Inter-American Dialogue (2014), China-Latin America Finance Database (dataset), www.thedialogue.org/map_list/ (accessed July 2015).

UNESCO (2015), 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 (UIS) Education Database (dataset), www.uis.unesco.org/datacentre/pages/default.aspx (accessed July 2015).

United Nations (2015), United Nations Commodity Trade Statistics Database (Comtrade), <http://comtrade.un.org/db/default.aspx> (accessed July 2015).

World Bank (2015a), Enterprise Surveys-What Businesses Experience (datasets), www.enterprisesurveys.org/ (accessed July 2015).

World Bank (2015b), “International Debt Statistics”, World Bank International Debt Statistics (dataset), <http://data.worldbank.org/news/International-Debt-Statistics-2015-now-available> (accessed July 2015).

秘鲁主要指标

贸易 ⁱ	2001年	2005年	2007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对中国出口(占总出口百分比)	6%	11%	11%	18%	17%	18%
从中国进口(占总进口百分比)	5%	8%	12%	18%	19%	21%
2014年向中国出口的五种主要产品(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值占总出口值的百分比)	铜及精炼品 (48%)	精炼铜制 阴极管 (14%)	面粉、谷类、 鱼丸、肉丸 (12%)	铜矿石 及精矿 (12%)	锌矿石 及精矿 (3%)	
部门构成 ⁱⁱ	农业	矿业	低和中低科技	中高和高科技	服务业	
对中国出口,按部门,2011年	30%	70%	0%	0%	0%	
从中国进口,按部门,2011年	1%	7%	31%	31%	30%	



续表

人力资本和竞争力*	秘鲁			中国			OECD			拉美与加勒比		
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 (占2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 ⁱⁱⁱ	21%			9%			28%			14%		
具有初中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 (占2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 ⁱⁱⁱ	34%			14%			35%			23%		
受教育平均年限 ⁱⁱⁱ	9.01年			7.30年			11.39年			8.29年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就业人口占总人数比例 ^{iv}	26%	17%	57%	35%	30%	36%	5%	23%	71%	14%	21%	65%
声称难以找到适合的员工的企业的比例 ^v	28%			2%			17%			36%		
PISA 考试中数学成绩,2012年 ^{**vi}	368分			550分			494分			397分		
融资和外国直接投资	双边贷款			债券			银行贷款			多边贷款		
国际金融市场融资(存量的占比),最近可获取数据的年份 ^{vii}	11%			56%			0%			33%		
占中国对拉美贷款的百分比,2005~2014年 ^{viii}	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2010~2012年平均值(百万美元) ^{ix}	739.9											

资料来源：i) 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 (Comtrade)；ii) OECD/WTO 贸易附加值数据；iii)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司；iv) 国际劳工组织劳动力市场关键指标；v) 世界银行，企业调查 (World Bank, 2015b)；vi) OECD 拉丁美洲 2012 年 PISA 成绩和中国 2009 年 PISA 成绩；vii) 世界银行国际债务统计 (World Bank, 2015c)；viii) 美洲对话组织；ix) 联合国拉美经委会 (2013)。

* 2011 年前后的数据，见方法论附录。

** 中国是 2009 年的数据，见方法论附录。

乌拉圭

最近趋势

中国是乌拉圭第二大贸易伙伴。2014年，乌拉圭对中国出口占货物总出口的17%（其中包括从新帕尔米拉自由港向中国出口的大豆），主要出口产品是初级产品。大豆占对中国出口额的52%，其次是肉类（18%）、纤维素（17%）、羊毛和羊毛制品（6%）、肉类制品（3%）和皮革（1%）。2014年，乌拉圭进口额的22%来自中国，主要的进口产品是科技产品，如手机和电脑。

与其他拉美国家不同，乌拉圭没有获得来自中国的重大投资。虽然中国已经成为拉美重要的贷款方，但是中国对拉美的贷款集中在阿根廷、巴西、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91%）。中国对乌拉圭的外国直接投资主要是私人投资，集中在工业和服务业。2014年，多家中国公司在乌拉圭各个经济部门运营，涉及服务业（特别是电信和物流服务）、能源和制造业（特别是汽车行业）。

关于人口竞争力，与中国相比，乌拉圭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较高。乌拉圭总人口的约12%完成高等教育，超过中国（9%），但是低于拉丁美洲平均水平（14%）和OECD平均水平（28%）。参加PISA考试的乌拉圭学生的数学平均成绩（409分，PISA 2012年报告），远远低于中国（550分）和OECD的平均水平（494分）。

中国与乌拉圭的关系进展

中国和乌拉圭于1988年建立外交关系，并于1993年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于1997年生效。2000~2010年，两国经贸关系得到了长足发展；2002年，两国签署了关于乌拉圭奶制品出口到中国的卫生检疫协议；2005年签订了乌拉圭牲畜出口到中国的卫生检疫协议（WTO，2012）。



然而，迄今为止，两国之间没有任何特惠贸易协定，部分原因是乌拉圭作为南方共同市场的成员，必须与南方共同市场的其他成员统一立场。

两国之间的合作项目在最近几年有所增加。2009年，中国与乌拉圭签署了九项经济领域的合作协议，涉及贸易、发展和金融等领域。2011年，两国签署了价值5.28亿美元的大豆、牛奶、羊毛和木材产品出口协议，另外还包括科学、金融、旅游等领域的合作协议。2013年，两国签署了通信、教育、经济、地球科学、矿业和银行监管领域的合作协议。2015年，中国投资了800万美元，以促进两国在互利共赢的金融项目中的经济和技术合作。

参考文献

ILO (2015), “ILO Key Indicators of the Labour Market (KILM)” (dataset), www.ilo.org/empelm/what/WCMS_114240/lang-en/index.htm (accessed July 2015).

OECD (2012) “PISA 2012 Results: What students know and can do” (dataset), www.oecd.org/pisa/keyfindings/pisa-2012-results.htm (accessed July 2015).

OECD/WTO (2015), Trade in Value-Added (TiVA) (database), June 2015, <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queryid=66237> (accessed July 2015).

The Inter-American Dialogue (2014), China-Latin America Finance Database (dataset), www.thedialogue.org/map_list/ (accessed July 2015).

UNESCO (2015), 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 Education (UIS) Database (dataset), www.uis.unesco.org/datacentre/pages/default.aspx (accessed July 2015).

United Nations (2015), United Nations Commodity Trade Statistics Database (Comtrade), <http://comtrade.un.org/db/default.aspx> (accessed July 2015).

World Bank (2015a) World Bank Edstats: Education Statistics (dataset), <http://datatopics.worldbank.org/education/> (accessed July 2015).

World Bank (2015b), Enterprise Surveys-What Businesses Experience (datasets), www.enterprisesurveys.org/ (accessed July 2015).

WTO (2012), “Trade Policy Review: Uruguay”,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Geneva, www.wto.org/english/tratop_e/tptr_e/tp363_e.htm.

乌拉圭主要指标

贸易 ⁱ	2001年	2005年	2007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对中国出口(占总出口百分比)	5%	4%	4%	12%	16%	17%						
从中国进口(占总进口百分比)	4%	8%	12%	19%	20%	22%						
2014年向中国出口的五种主要产品(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值占总出口值的百分比)	大豆 (52%)	肉类 (18%)	纸浆 (17%)	羊毛织物 (6%)	肉类制品 (3%)							
各行业的附加值构成 ⁱⁱ	农业	矿业	低和中低科技	中和高高科技	服务业							
对中国出口,按行业,2011年	91%	4%	5%	0%	0%							
从中国进口,按行业,2011年	1%	10%	27%	39%	23%							
人力资本和竞争力 [*]	乌拉圭	中国	OECD	拉美与加勒比								
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 (占2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 ⁱⁱⁱ	12%	9%	28%	14%								
具有初中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 (占2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 ⁱⁱⁱ	16%	14%	35%	23%								
受教育平均年限 ⁱⁱⁱ	8.45年	7.30年	11.39年	8.29年								
	理工科	文史哲	理工科	文史哲	理工科	文史哲						
毕业生的专业比例(最近可用的数据) ^{iv}	15%	49%	48%	24%	22%	56%	17%	63%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就业人口占总人数比例 ^v	11%	21%	28%	35%	30%	36%	5%	23%	71%	14%	21%	65%
声称难以找到适合的员工的企业的比例 ^{vi}	30%			2%			17%			36%		
PISA 考试中数学成绩,2012年 ^{vii**}	409分			550分			494分			397分		
融资和外国直接投资	双边贷款			债券			银行贷款			多边贷款		
占中国对拉美贷款的百分比, 2005~2014年 ^{viii}	0%											

资料来源: i) 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 (Comtrade); ii) OECD/WTO 贸易附加值数据; iii)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司; iv) 世界银行教育统计数据库 (World Bank, 2015a); v) 国际劳工组织劳动力市场关键指标; vi) 世界银行, 企业调查 (World Bank, 2015b); vii) OECD 拉丁美洲 2012 年 PISA 成绩和中国 2009 年 PISA 成绩; viii) 美洲对话组织。

* 2011 年前后的数据, 见方法论附录。

** 中国是 2009 年的数据, 见方法论附录。



方法论附录：使用的定义和变量

全球价值链（GVC）参与：一国融入国际生产网络的指数，是后向和前向参与的总和。全球价值链参与的数据从 2011 年开始统计（最新可用数据），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等国的数据可以获得。

后向参与：在全球价值链的术语中，“后向联系”是指在生产中利用了外国的产出的情况下，外国价值链在一国出口中所占的比例。更确切地说，是指外国产品附加值在总出口中的百分比。价值链的参与是根据一个特定国家的出口中附加值的起源来定义的。广义上说，后向参与指数反映的是特定国家中国内公司在出口经济活动中利用外国中间产品附加值的程度。

前向参与：在全球价值链的术语中，“前向联系”是指国内中间产品的增加值在第三方出口中所占的比例。更确切地说，它是一个国家的出口总额中和附加值相关的部分占其他国家的出口总额的百分比。前向联系反映的是一个特定国家的出口被贸易伙伴的企业在其自身的出口中所利用的程度。

经济部门分类：本报告是根据 OECD - WTO 贸易附加值（TiVA）进行编码，该项分类包括类别和子类别，在后面的表格中予以所示。TiVA 中的分类适用于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墨西哥等经济体。

非贸易附加值经济体的经济部门分类：多米尼加共和国、巴拿马、秘鲁和乌拉圭等国家根据产品的技术含量把经济部门分为五个产品类别（Lall, 2000）。

教育水平分类：本报告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ISCED）（2011 年更新版）进行编码，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将教育分为六个层次，以进行教育数据统计。其中中学和高等教育的分类依照后面的表格中的标准。

部门分类

类别	子类别	贸易附加值编码
农业		C01T05:农林牧渔
采矿事业		C10T14:采矿和采石 C40T41:电力、气、水供应
低科技和中低科技部门	低科技部门	C15T16:食品、饮料和烟草 C17T19:纺织品、纺织品、皮革和鞋类 C20:木材和软木产品 C21T22:纸浆、纸、纸制品、印刷和出版 C36T37:其他未分类的制造业;回收
	中低科技部门	C23:焦炭、精炼石油产品和核燃料 C25:橡胶和塑料制品 C26: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 C27:基本金属 C28:金属制品
中高和高科技部门	中高科技部门	C24: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 C29:机械设备及其他未分类 C31:电气机械、器材及其他未分类 C34:汽车、拖车和半拖车 C35:其他运输设备
	高科技部门	C30T33X:计算机、电子和光学设备
服务业	传统服务业	C50T52:批发和零售贸易;修理 C55:酒店和餐饮 C60T63:运输和储存
	计算机和研发服务	C72:计算机和相关活动 C73T74:研发和其他商务活动
	金融中介	C65T67:金融中介
	其他服务业	C45:建设 C64:邮电和通信 C70:房地产活动 C71:机械设备租赁 C75:公共管理和国防;强制社会保障 C80:教育 C85:卫生和社会工作 C90T93:其他社区、社会及个人服务业 C95:家政服务



教育水平分类

水 平	命 名
中学教育 高中教育	ISCED 3
比初中更专业,教师素质更高。学生已经完成了包括初中在内的9年前期学习。	
高等教育	
A类高等教育	ISCED 5A
广泛学习基础理论培养专业竞争力以及进入高级研究计划具有较高竞争力要求的专业。学制:3年或4年	
B类高等教育	ISCED 5B
学习时间一般比A类短,主要目的是培养技术类、实践类和职业类的竞争力,以满足劳动力市场需求。学制:2年	
C类高等教育	ISCED 5C
面向博士等更高的学历,理论上学制3年,但大多数国家都会延长;专注于创新的、高级的研究。	

资料来源：OECD（2013）；UNESCO（2013）。

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一个国家在 PISA 2012 测试中的数学平均分一般被视为中学教育的绩效指标。PISA 的成绩介于 0 和 1000 之间，41 分等于一个学年。中国所采用的 2009 年的数据就包括从 11 个省、自治区、市（北京市房山区、天津、海南、河北、湖北、江苏、吉林、宁夏、四川、云南和浙江）的 621 所学校中采集的 21003 名学生的广泛样本。

文理科毕业生比例：理科学生数量是指毕业于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等教育领域的人数，文科学生数量是指毕业于人文、社会科学、法律与教育等专业的人数。

预估的中国直接投资：拉美经委会根据拉美国家的官方数据、公司报告、彭博社，以及外国直接投资市场和美国传统基金会等提供的信息，对该国的数据进行的估计值。

拉美和 OECD 国家的平均值：在计算拉美和 OECD 国家平均值时所选取的国家取决于该国最新数据的可用性，特别是采用最近一年的数据。计算拉美的全球价值链平均值的数据来自 6 个国家：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据库中，OECD 的数据采

用了 30 个国家的平均值，拉美地区的数据采用了 25 个国家的平均值。理科生平均值取自 12 个拉丁美洲国家和 34 个 OECD 经济体。在研究劳动力受教育年限不足而阻碍公司发展的主要原因的时候，采用的是拉美 24 个国家和 14 个 OECD 国家的数据。在计算就业分布时，采用的是 18 个拉美经济体和 34 个 OECD 经济体的数据。最后，在 PISA 2012 数据库中，OECD 平均值取自 34 个国家，拉美的平均水平的数据取自 8 个国家：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墨西哥、秘鲁和乌拉圭。

国家集团：文件中倾向于使用下列国家集团：

LAC (6 个)：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墨西哥。

EU (27 个)：除马耳他之外的所有欧盟成员国。

参考文献

Lall, S. (2000), “The technological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of developing country manufactured exports, 1985 – 98”, *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28, No. 3, pp. 337 – 369, www3. qeh. ox. ac. uk/pdf/qehwp/qehwps44. pdf.

OECD (2013), *Education at a Glance 2013: OECD Indicators*,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dx. doi. org/10. 1787/eag -2013 - en>.

UNESCO (2013), *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Education: ISCED 2011*, UIS, Montreal, www. uis. unesco. org/Education/Documents/isced -2011 - en. pdf.

译后记

浙江外国语学院是一所以外国语言文学为优势学科，文学、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理学、艺术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浙江省省属全日制普通本科高校，前身是创建于1955年的浙江教育学院。学校坐落于浙江省杭州市，现有文三路和小和山两个校区，全日制在校生7300余人。设有英语语言文化学院等12个学院（部），开设英语等25个本科专业。2010年成功实现改制更名以来，学校以“明德弘毅 博雅通达”为校训，以“全面建成外语特色鲜明、教育品质一流的知名高校”为奋斗目标，大力实施“品牌化、国际化、集群化”三大战略，致力于进一步推进特色发展。

浙江外国语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全方位指导和浙江省教育厅、财政厅、商务厅以及社科联等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亲切关怀下，于2011年10月28日正式成立的校级独立建制的高级研究机构。拉美所依托学校改制后的外语类专业的独特优势，立足浙江外向型经济，旨在以高起点国际化的视野，聚集国内外有志于拉美研究的人才潜心研究，以服务于国家外交、地方建设及学校发展需要，团结校内外科研人员从政治、经济、教育、社会等领域深入开展拉美领域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注重对与浙江省乃至与我国发展状况类似的拉美重要国家开展国别研究，积极服务浙江经济发展，进而辐射周边省市乃至全国。2014年，我所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北京外国语大学等多家单位发起成立了“拉美研究与中拉合作协同创新中心”。2015年，我所实施了驻所研究员制度，设立了墨西哥等15个国别研究中心，实现了拉美地区国别研究的全覆盖。2016年，在省财政专项资金的支持下，我所正在筹建“拉美研究大数据实验室”。目前，我所共拥有专兼职研究人员40余名，已完成或

在研的有关拉美研究的课题中，国家社科基金有 2 项，省部级课题达 20 余项，已出版的著作或公开发表的论文超过 100 余篇，已经成为国内外有一定影响力的拉美研究基地。

《拉丁美洲经济展望（2016）：发展与中国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是联合国拉美经委会、拉丁美洲开发银行和 OECD 发展中心每年联合发布的研究拉美经济形势和趋势的权威性报告，其中文版之前一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翻译出版。2016 年，有关合作中断以后，在征得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领导同意之后，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帮助下，我们与 OECD 发展中心取得了联系，得到中文版翻译出版的授权。我所高度重视，克服时间紧迫、任务繁重等困难，快速高效地完成了这项工作。本报告的翻译工作由我主持，具体分工如下：前言、第一至三章由我翻译，第四章由我所秘鲁研究中心主任郑淑菲翻译，第五章和国别信息由我所委内瑞拉研究中心主任陈岚和我翻译，最后由我进行统稿并根据本书英文版进行校对。

衷心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世界出版社祝得彬社长对本书获得 OECD 发展中心的授权以及本书的翻译工作给予的全力支持和无私帮助。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吴白乙所长、柴瑜所长助理对本项工作的支持。感谢浙江外国语学院领导一直以来对我所工作的支持。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团队成员在高温酷暑下高效完成本项工作的辛勤付出。

由于 7 月底才拿到本书的正式授权，翻译出版的时间非常紧张，加上我们的水平有限，因此，本书翻译中难免会出现许多错误，敬请读者指正。

唐俊

浙江外国语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所长

中国拉丁美洲学会副秘书长

2016 年 8 月 31 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拉丁美洲经济展望.2016: 发展与中国的新型合作
伙伴关系 /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中心, 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CAF-拉丁美洲开发银行主编; 唐俊
等译.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11

书名原文: Latin American Economic Outlook 2016:
Towards a New Partnership with China
ISBN 978-7-5097-9814-0

I. ①拉… II. ①经… ②拉… ③C… ④唐… III. ①
经济展望-拉丁美洲-2016 IV. ①F173.0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45727号

拉丁美洲经济展望(2016): 发展与中国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中心
主 编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CAF-拉丁美洲开发银行
译 者 / 唐 俊 等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责任编辑 / 杨 慧 王小艳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世界出版分社(010)59367004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9.25 字 数: 290千字

版 次 / 2016年11月第1版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9814-0
定 价 / 4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拉丁美洲经济展望 (2016)

发展与中国的新型伙伴关系

本书探讨了中国和拉丁美洲之间不断发展的关系。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已成为拉美地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这种关系现在已经上升到新的层面，并给拉丁美洲提供了一个建立互利共赢伙伴关系的机会。随着中国经济从以出口和投资型为基础向消费和服务型模式转型，通过参与该进程，拉丁美洲将会有更大收益，从而摆脱仅仅是一个大宗商品供应商的角色。本报告从贸易、金融 and 科技等不同角度分析了中国新模式对拉丁美洲的影响，确立了潜在战略和政策以加强拉丁美洲与中国的伙伴关系，总结了这些领域的宝贵经验和最佳实践，提出了促进拉丁美洲稳定长期增长、确保社会议程连续的战略。

目录

- 第一章 面向发展的中拉伙伴关系
- 第二章 拉丁美洲的宏观经济前景
- 第三章 财富转移、中国“新常态”和拉丁美洲
- 第四章 中拉贸易的趋势和机遇
- 第五章 拉丁美洲—中国伙伴关系的发展趋势和前景

www.latameconomy.org

本书的官方版本如下：Latin American Economic Outlook 2016: Towards a New Partnership with China/ Perspectivas económicas de América Latina 2016: hacia una nueva asociación con China,[©]OECD/United Nations/CAF 2015。

英语版本：ISBN 9789264246201/DOI:<http://dx.doi.org/10.1787/9789264246218-en>。

西班牙语版本：ISBN 9789264246331/DOI:<http://dx.doi.org/10.1787/9789264246348-es>。

本书由 OECD 安排出版，但并非 OECD 官方译本。

www.oecdbookshop.org - OECD 网上书店

www.oecd-ilibrary.org - OECD 网上图书馆

www.oecd.org/oecddirect - OECD 标题提醒服务

在线查阅本书请访问 <http://dx.doi.org/10.1787/9789264246218-en>。

本书已在 OECD 网上图书馆发布，所有 OECD 书籍、期刊及统计数据该网站均有收录。

登录 www.oecd-ilibrary.org 查询更多信息。



出版社官方微信

www.ssap.com.cn



定价:48.00 元